

科文证券点金丛书

〔美〕詹姆斯·格兰特 著

BERNARD BARUCH:
The Adventures of A Wall Street Legend

谁执股市 与政坛牛耳

华尔街投资大师
伯纳德·巴鲁克传奇



中国标准出版社
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
STANDARDS PRESS OF CHINA
SCIENCE &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LTD. (H.K.)

谁执股市与政坛牛耳：

BERNARD BARUCH:

The AdventUres Of a Wall Street legend

华尔街投资大师伯纳德·巴鲁克传奇

[美]詹姆斯·格兰特

北京科文国略信息技术公司 供稿

张睿骥 傅兴潮 苗晨 宋云天 译

中国标准出版社

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1999—27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执股市与政坛牛耳 / (美)格兰特(Grant, J.)著; 张睿戡等译。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0. 1

(科文证券点金丛书)

ISBN 7—5066—2049—9

I. 谁…… II. ①格…②张… III. 巴鲁克一生平事迹 IV. K83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320 号

Bernard M. Baruch: The Adventures of A Wall Street legend

Copyright © 1997 by James Grant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work has bee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Inc.

Publishing by arrangement with John Wiley & Sons, Inc.

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 1999 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标准出版 社
科文(香港)出版有限 出版 公司

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电话: 68522112

北京科文剑桥图书公司承销

北京安定门外大街 208 号三利大厦

邮政编码: 100011 电话: 64203023

北京市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开本 850X1168 1 / 32 印张 14.75 插页 8 页 字数 347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66—2049-9 / F. 033

印数 1—15000 定价 28.00

目 录

第一章 医生的儿子——“我的父亲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重要的人物”..... 1

伯纳德·巴鲁克对家谱知之不多，但喜欢不断提起自己的家族史，认为自己是古代司祭和国王们的后代。……“巴鲁克”一词出于《次经》，在希伯来语中是“赐福”的意思。……父亲反叛的证据被巴鲁克在小阁楼里发现，他一下感觉自己是个大人了，对自己的父亲感到分外骄傲。……毕业时巴鲁克没有获得任何学术荣誉，但他给人的信任感却完美无暇……

第二章 起家——周薪三美元..... 19

巴鲁克的父亲对他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儿子从赌场带回来”。……在巴鲁克眼里，正是这种自控力使巴里尔在股市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定金交易的优势是可以用一小笔定金来控制一大笔投资，对此，巴鲁克简直入了迷。……奇迹发生在 1897 年。他当初投入的区区 300 美元，最终却足足赚了 60000 美元，《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糖股交易史上，还从未发生过仅有那么少的人判断正确的事”。

第三章 远眺当年华尔街..... 34

纽约证券交易所 1903 年 4 月 22 日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从周围建筑物的窗子里撒出无数彩屑和彩条。它“是对我

们深爱的国家的一个祝福”。……“当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地位就超过了一般的公司，我相信今天它的地位一定超过了所有的公司”。……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于 1896 年 5 月 26 日以 40.94 点创立……世纪之交，债券持有人的风险是到期不付，或者是一些效益丰富的证券提前偿清。

第四章 巴鲁克时代--序曲..... 50

1897—1900 年大约三年的时间，巴鲁克的个人资产上升到 100 万美元，而他刚入行时不过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小子！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赚得上百万美元的资产，真是一个奇迹！……三人达成协议，共同完成这项购并计划，巴鲁克的任务是使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下滑，直到该公司的管理和运作不能正常维持为止。……“股市的发展最终会证明我是正确的，我耐心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巴鲁克时代终于来了。

第五章 巴鲁克时代..... 78

父亲给他的赠言是“愿诚实之镜照亮你的一生”，然而，“诚实作人”远非易事。……巴鲁克的一番表态，使后来演变成美国股票交易所的场外证券交易所最终未能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部分……后来，这次谈判的结果传到了丹尼尔的耳朵里，据说他在听完律师的汇报后，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巴尼坚持认为他该拿 100 万美元，那就如数给他吧”。……“我至少不会故意让自己朋友的股票下跌！”

第六章 “他是犹太人！”“可他是巴鲁克！”..... 102

对巴鲁克来说，这座水上庄园的魅力在于它非常偏僻，一

般人难以到达；对喜欢活动的客人而言，最大的诱惑在于打猎。它是巴鲁克一个人的。……众所周知，赛马俱乐部不欢迎犹太人入会。……此时的巴鲁克在积极参与公职活动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和野心……他对威尔逊可称得上是“一见钟情”了……

第七章 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124

“巴鲁克对于任何一个董事会都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华尔街日报》）……并非只有瓦伯什一家公司正在面临困境，其现状只不过是美国大多数铁路公司的一个缩影而已。……整个事件拖得如此之长，这些都被他视为自己的一大失败……应该用大象这种动物来形容他的性格……这家巴鲁克当初可以用 25 万美元收购的公司此时的市场价格飙升到了 216,535,000 美元。

第八章 众矢之的..... 147

他是以一位富豪的身份进入美国政界的。……就在巴鲁克刚刚品尝到参与公众事业的乐趣时，他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次经历已经悄悄降临。……至此，巴鲁克已经在规则委员会的委员面前表现出他在股票交易方面游刃有余的风范……《纽约时报》社论的大标题是“他根本无需内部消息！”

第九章 从纽约到华盛顿..... 168

巴鲁克的财富是在低税收和有限的政府控制下的华尔街股票市场上获得的，但后来他却帮助建立了一种高税收和政府经济的干预制度。他把当时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变成了一

种战时的社会主义。……凭着在华尔街的经历，巴鲁克毫不费力地适应了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的角色。没有多久，他的手下便开始毕恭毕敬地称他为“头儿”。

第十章 巴黎和会显风采..... 194

“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尚处于难产中的对德政策，会毁了整个世界”。……他的意志在赔款委员会里居“支配地位”，“是巴黎和会上最不偏不倚的人”。……“我不希望用任何方式向德国表示我的一点同情，但是，如果……那将是极端错误的”。……巴鲁克被参议院的这一投票结果震惊了，他坚信，凯恩斯是罪魁祸首之一。于是，他打算……

第十一章 农民·金钱·麦克阿杜..... 215

巴鲁克出于农民真诚而纯结的感情进行了这笔投资……他一度想买下一家中等规模的日报，但朋友向他指出，既然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任何一家报纸的头版，就没有任何理由背上这样的经济包袱……巴鲁克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而是一个折中主义者……麦克阿杜想当总统又想发财，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后一个目标妨碍了前一个。

第十二章 1928—1933..... 244

证券交易所已经不再是巴鲁克的一切……我们的主人公之所以后来在经济事务方面享有极高的声望，1929 年表现出的过人的洞察力起的作用最大。……他并非“神仙巴鲁克”，但那可能是他唯一不能胜任的称号了。……在 1931 年这样的年头，竟能拥有 870 万美元现金，这确是一项罕见的、惊人业

绩。

第十三章 财而优则仕..... 280

对于巴鲁克来说，所谓政治观点远不如权力、党派、友谊之类的东西实在。……新政府禁止“囤积”黄金，可是他手里的金砖相当于一家银行的储备。……他更喜欢被公众看成是一个睿智、审慎的美国政治家……他与罗斯福夫人是“合作伙伴关系”……

第十四章 他的职业是冒险..... 311

巴鲁克对妻子的哀悼与其说是出于悲伤，不如说是出于他对妻子的负罪感。……“巴鲁克对医生的话言听计从”。他的日子还长着呢……41 年 2 月后罗斯福总统定期与巴鲁克会面并共进午餐……巴鲁克很讲究斗争策略，他不会故意在高层官员中树敌。……“巴鲁克”这个名字确定无疑地已经上了纳粹的黑名单……

第十五章 他离 95 岁还有 59 天..... 349

“让巴鲁克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这个人认为自己应该管理整个地球，甚至还能管理月球和土星。现在就让我们见识一下这个老人的本领吧。”（杜鲁门总统语）……巴鲁克一派对苏联的怀疑态度更深，而且更关心美国原子能产业的资产权会在多大程度上受损害。……巴鲁克建议，为应付这种可能性，在制定条约前，应废止安理会的几个常任理事国对它的否决权。



蹒跚学步时的投机家。



22 岁时的伯纳德·巴鲁克，他正在显示其经常惠顾伍兹健身馆的成果。



哈特威·巴鲁克：本书主人公的哥哥，演员，是弟弟心目中英雄的化身，摄于 1897 年前后。



年轻的、崭露头角的经纪人巴鲁克。摄于 1897 年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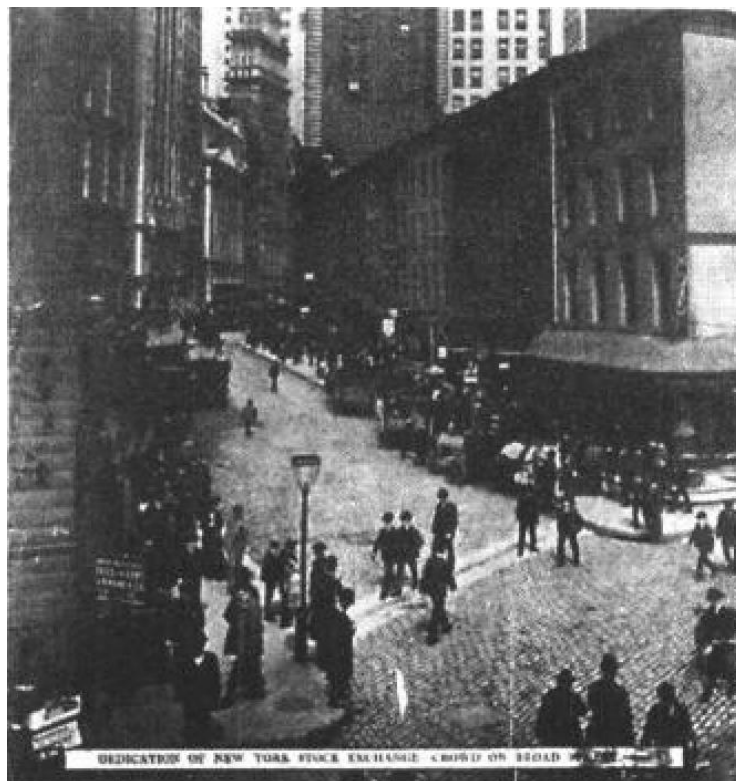
亚瑟·豪斯曼，曾经是巴鲁克的雇主，后两人成为合作伙伴。

巴鲁克自己当老板——风险资本家、银行家、百万富翁。摄于 1903 年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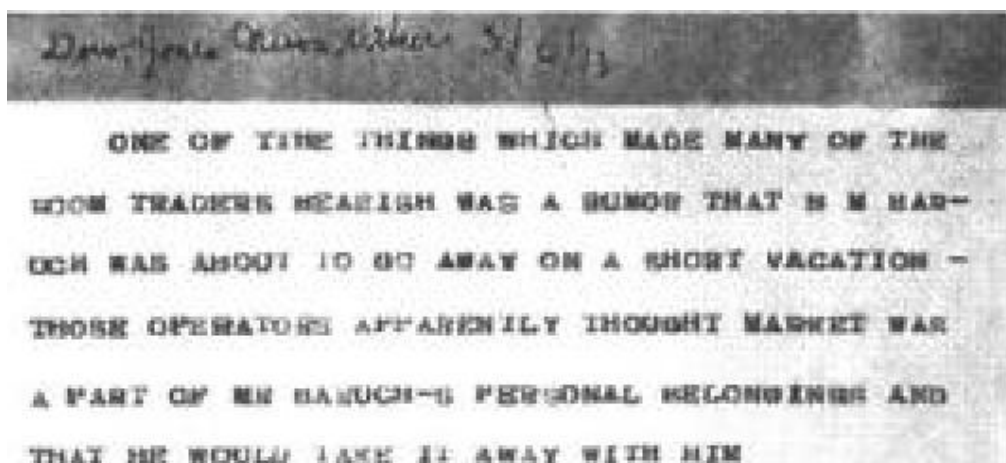
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经纪人们对巴鲁克留下的记录啧啧称奇——这是巴鲁克在华尔街叱咤风云的年代。摄于 1899 年



1903 年 4 月 23 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开业，百老汇街上人车熙熙攘攘。



1906 年的华尔街街景，横贯东西，远处为著名的三一教堂。



20 世纪，某报登载漫画，称巴鲁克为“制造神话的人”，并记述他的各种经营活动。事实上，实际情况远超过这些。

以下是来自“道·琼斯”的一则幽默声明（曾被各种媒体转载，充分展示巴鲁克对证券市场的巨大影响力）：

近有传言，伯纳德·M. 巴鲁克先生将外出度假数日，此传言令交易所里的人们沮丧不已，担心行情下跌。经纪人普遍认为，证券市场几乎已成巴鲁克先生的私人财产，度假时他极有可能一并装箱带走。



图中的黑体字为：牛市乎？熊市乎？转变近在咫尺！

TWENTY MILLION WON BY BARUCH

Daring Speculator, Operating From
Little Private Office, "Cleans
Up" on Wall Street.

NEW YORK, Sept. 18.—Following the recent active market it was reported in Wall Street to-day that Bernard M. Baruch, a daring speculator, has "cleaned up" \$20,000,000.

Word was passed around at the opening of the market Tuesday that the long-delayed activity had come at last, and stocks began to climb at once. Such favorites as Steel, Union Pacific, Amalgamated, Reading and other issues went soaring upward, and the trend of the whole list was toward better prices.

The rise had hardly started before brokers began to believe that Baruch was busy again. Every rise was watched as a barometer of what might be expected, and the floor of the Stock Exchange was again the scene of intense activity after months of comparative quiet.

The Stock Exchange to-day contains no more spectacular character than Bernard M. Baruch. He has two brothers on the exchange, Hartwig N., of Baruch Brothers, and S. W., of A. A. Housman & Co. He was at one time connected with the firm of Baruch Brothers, but for some years has been doing business by himself, and, in a little private office in a building overlooking Trinity Church yard, he sits and does things when the time is ripe.

狂赚两千万——胆色过人的投机家，从小小的私人办事处起家，在华尔街赚了个盆满钵满。

（纽约 9 月 18 电）近来股票市场相当活跃，今天从华尔街传来消息，胆色过人的投机商伯纳德.M. 巴鲁克“狂赚 20,000,000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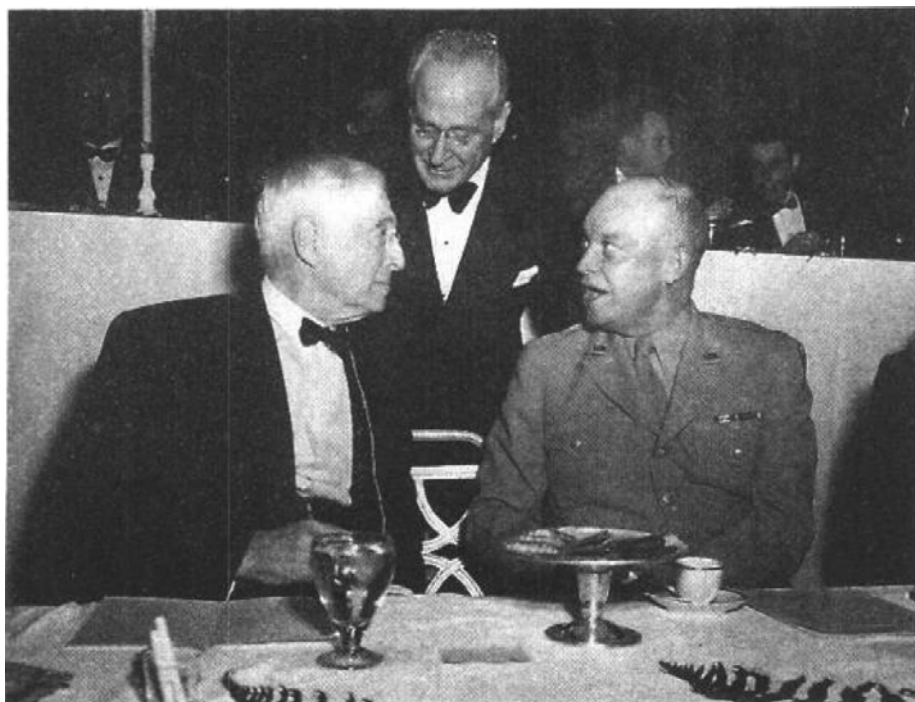
1919 年巴鲁克参加巴黎和会
时留影十足的外交官派头。

既是美国民主党的主要资助人，又不
妨做一回农民兄弟的朋友巴鲁克头戴平
顶宽边草帽的留影。摄于 1923 年。





1933 年 3 月 4 日，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总统就职典礼，好像一个名流巨擘云集的名利场，巴鲁克不可能不露面（图中，站在一群海军军官之前、白发、戴着眼镜的那位便是）



巴鲁克、赫伯特. 贝阿德. 斯沃普和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餐后交谈（1947 年摄于著名的纽约 “沃多夫-埃斯托利亚饭店”）



巴鲁克与温斯顿·丘吉尔在一起——两位政坛老手正散步、闲谈、呼吸新鲜空气(1949年摄于查特威尔庄园)。

巴鲁克在报纸社论版上的性格形象：一方而他被视作“公园长椅政治家”（登载日不详）画中说：“既然伯纳德·巴鲁克能以公园长椅为家，我们在这儿坐五分钟都不行吗！？”





一方面，他被看作中央集权制的支持者（载于 1950 年）。

图中戴眼睛的老者为巴鲁克，左边人说：“你，你提的什么建议！”中间跌落的纸片上写着“社会主义”。

一方面，他被周围人看作不可缺少的好公民（载于 1955 年）。

图中右下方纸上写着“他妈的整个国家”。屋内横幅上是“生日快乐”，人说：“嘿，他来啦！”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内容提要

本书主人公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股票交易商，一位大众瞩目的投资家，一位通晓商业风险的资本家，一位曾经征服了华尔街的最著名、最受人敬慕的人物——伯纳德·巴鲁克。试图用传记来挖掘巴鲁克投资天才的本书作者，则是全美最优秀的金融作家——詹姆斯·格兰特。他们两人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堪称经典：一部情节复杂、结构一流、首次展现巴鲁克辉煌事业的个人传记——《谁执股市与政坛牛耳》隆重面世。现在，这部传记获得了再版，从而使我们得以再次领略到这位当年的华尔街奇才的迷人风采，同时也使我们再次认识了这位揭开巴鲁克神秘面纱的天才作家。

伯纳德·巴鲁克魅力四射，对如何交好新闻界深谙其道，因此他的名声总是带着点传奇色彩，正如他的实际财富要少于人们的估计一样。人们尊称他为“总统顾问”、“公园长椅政治家（the Park Bench Statesman）”，但或许更多的人们还是称他为“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一种具有先见之明的经济行为，可惜事实上巴鲁克并非如此。在1929年股市大崩溃来临前夕，当巴鲁克丰富的股票经验告诉他必须马上撤回大多数投资时，他并没有将股票如数抛出）。

但是在这部迷人的传记里，巴鲁克的真实生活却远比一些传奇故事更吸引人。有时他显得非常矛盾，个人的观点随时都会改变，就像买卖股票一样。例如，像伯纳德·巴鲁克这样精明的投资家，却会在对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进行大笔投资后，不知为何又对发展这一实体犹豫不决。这使他错过了一次绝好的赚钱机会，没能使自己的钱袋像羡慕他的人们想像的那么鼓鼓囊囊。

伯纳德·巴鲁克的发财致富依靠自由而免税的市场。在担任纽约证券交易所经理时，他拒绝了革新时代提出的制定政府商业规范的要求。但是在 1918 年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时，他又积极地拥护战时社会主义，从而开创了美国中央计划经济的先例。在 20 世纪 20、30 和 40 年代，他激烈反对美国实行中央集权制的转变趋势，尽管他当初还曾支持过那些发起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家。他是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经济后台——可是，他与杜鲁门总统的关系却以痛苦的决裂告终。

詹姆斯·格兰特以自己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研究作风，向读者展示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有纽约证券交易所档案室里从未开封过的材料，有从未出版过的法律文书，有巴鲁克自己的亲笔交易记录，及其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的早期档案。在这部传记里，您可以读到许多惊人的故事，如 1917 年臭名昭著的“和平笔记泄漏调查案”，在此案中巴鲁克被控未经授权向人透露国家文件以从中获利；1918 年他在华盛顿有争议的创业和 1919 年在凡尔赛和平公约上的作用；20 年代他对美国制定政策所起的幕后的决定性作用等等。您还可以读到巴鲁克与罗斯福新政之间离奇而通常带着苦味的关系，以及他在战后担任美国代表参加原子弹控制谈判的故事。

本书内容翔实，叙述精练，写作手法奇特，是一部传记大手笔，与具有传奇色彩的主人公一样具有纪念意义，值得一读。

作者詹姆斯·格兰特，著有《点子就是金钱》(Money of the Mind)等书，《格兰特利率观察报》创办人、编辑，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每周评论员，长期参加“华尔街周报与路易斯·拉克什”专题小组讨论电视节目。

译者 1999 年 8 月于北京

再版前言

传奇人物的真实故事

我和伯纳德·巴鲁克朝夕相处了整整四年，当然，他已是故人，一个躺在档案袋里的人。我们俩一起时喜时悲，时哭时笑。在给他写传记的过程中，我始终有那么一个假设，即在这个投资家和总统经济顾问身上，传奇色彩和神话故事其实比我们大家想像的要少得多。在揭露事实真相时，我希望将这段著名的美国式生活置于将近一整世纪的美国金融历史之中。

结果表明，我至少在一个方面获得了成功。那就是我终于可以有力地证明，巴鲁克，这个赚钱天才，说到底还是一介凡人。在1929年股市达到顶点的那一刻，他没有将自己的股票抛出——事实上是因为他过于固执——这一事件或许在1996年充满高度投机风险的股市环境里更具有学术意义。但是随后我却很快明白，他的这一看似错误的举动其实意义重大而令人感动。显然，道德高尚的巴鲁克以自我承担痛苦和错误行为所获得的成功，远比有传奇色彩的巴鲁克以自己犀利的洞察力可能获得的成功，更要来之不易。于是，对他的疑虑渐渐逐一化解，心中油然而生一份深深的敬意。

而现在，除了崇敬之外，我又对他多了一种喜爱之情。在阅读了巴鲁克生前的一些来往信函，拜访了至今还健在的他的旧友之后，我开始喜欢上他了（一次，巴鲁克给他的老朋友法兰克·坎特，巴尔的摩《太阳报》政治专栏作家写信，信中提到坎特领取由巴鲁克提名的学位一事，巴鲁克写道，“一想到你在学位授予仪式上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笑

得几乎要晕了过去。不知你可怜的老伴是怎么忍受过来的!”)。后来，我也成了他的朋友。之后，随着时间的飞逝，几年以后当我的研究开始进入他的公共事业部分时，先前所有的感觉统统一扫而光，心中惟有一种难以压制的愤怒。到了1983年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我很高兴终于能看着他渐渐远去。我知道，巴鲁克对于和我的这种“共事”一定感到比较满意。

我们两人的生活风格是千差万别的。巴鲁克生于1870年，死于1965年。他生前居住在纽约市五号街，他的巨宅像南卡罗莱纳州的植物园，又像苏格兰式的城堡，错落地掩映在周围的华屋巨宅之中。他喜欢打猎、赛马、拳击、飙车、冒险，喜欢呆在他那些充满欢乐的公司里。他会在赛马季节去加利福尼亚西部的萨拉托加旅游，或者去欧洲吹吹海风。他总同时担当着“男人的男人”和“女人的男人”两种角色。他的朋友圈是不喜欢传记作家的，在他们眼里，与人无害的传记作家一副书呆子气，笔头老是写啊写的（或时刻准备着写点什么，或总是装着写着什么），但是除了他们笔下的写作主题，其他事情一概不谈。巴鲁克喜欢听到别人谈论自己，但即便如此，作家们还是对他谈得很少。

本书对巴鲁克的私生活也进行了一些描述（1983年本书第一次出版时，读者对此还颇有微词），这是因为我决定对巴鲁克的情爱和性爱也应保持高度的真实性。对此我也曾动摇过，想忽略了事，以证明巴鲁克对异性并无多大兴趣，或证明他的婚姻是成功而幸福的，或者两点皆是。但其实两点皆不是。这里提供的一些情况尽管证据间接，但却明确凿、令人信服。其实巴鲁克与妻子的关系有名无实，他确实需要婚姻之外的女性的陪伴。他爱女人，女人们也爱他。

至于金融方面，上面提到的一些从未开封过的原始资料将使读者对巴鲁克的投机本领和投资策略一览无余。这些资料包括巴鲁克经手的一些与股市有关的起诉文件、他参与过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商议记录，以及

记录他对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进行投资的来往信函——这可是一笔巨大的研究“财富”。我还研究了她的经纪行从 20 年代后期到 30 年代早期的记录，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保存着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旧文件。我想，这些资料肯定还没人动过。

反复阅读巴鲁克的生平记录，我认为这个大冒险家在签订凡尔赛和约事务中尤其显得与众不同。作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顾问，巴鲁克在经济谈判中具有一种罕见的、意义非凡的感觉。他与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①在一起，就像两把架在一起的利剑。通常，巴鲁克对公共事务的表态总是含糊晦涩，但却是集权专制国家的顽强捍卫者。在凡尔赛，他独到的华尔街智慧——直觉、敏锐、务实、对结果的耐心、对未来的执著——却正是那一历史时刻所迫切需要的。

我的政治观点随意而自由，但巴鲁克却不是。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政治观点通常不是随意的。有时候，他是一个典型的格罗孚·克利夫兰民主党人，一个狭隘政府的一分子，一种“硬通货”，一个独立的自由党人。但更多时候，他却自称是另外一种人。在政治舞台上，除了用爱国热情去促进他所理解的美国利益外，他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标。一次，他用不短不长的一句话来总结自己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我绝对信赖懂得自己照顾自己的美国人但必须让他们知道要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什么”。

但在金融理财上却恰恰相反，他的一生目标明确，充满艺术、充满灵感。在股市上他大起大落，有惨重的损失，也有巨大的利润。在资本投资上他不是失算（如在试图挽救瓦拔什皮兹堡铁路公司一事），就是优柔寡断（如投资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一事）。1932 年股价跌至最低时他没有买进，1929 年股价升至最高时他又没有及时抛出。但是他仍然

^① 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创始人，认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管理通货，主要著作有《就业、利息和倾向通论》等——译注。

日进斗金，并且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始终江山稳坐。即便他有时也少买快抛，或有时似乎不愿冒险，那也是因为他主要是在以自己的财产冒险。他属于自由资本家一类，在本世纪后期制度健全的金融市场上已很少见到。

当我写着这些的时候，股市走势正强，股票买卖从未如此普遍，人们都觉得把钱投入共同基金比存入银行风险更小。^①尽管没人能说出在这样一个“牛气冲天”的股市里的巴鲁克会持什么态度，但我猜想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一定不会同意这么做。相反，他很有可能会更加固执，就像当初“柯立芝时期”^②他固执地站在一个极端上一样。巴鲁克的投资天才表现在他在交易中的灵活性。他的行动远比他所说的话（或被别人引用的话）更为重要。在 30 年代早期股市长期处于“熊市”的情况下，他有能力挽回自己大部分的损失，这一点足以让每一个投资者钦佩不已。

巴鲁克是一个老派的百万富翁，他的钱比大家想像的要少，但比大家想像一个百万富翁的生活所必需的多。他生活幸福吗？他是一个可怜的父亲，一直梦想着拥有一条铁路却始终实现不了，他政治生涯的后几十年一直在追求着这样一个梦想。但就他个人而言却绝对是幸福的。他的虚荣心纯正无邪。他会一字一顿地说：“我多棒啊！”在纽约市麦迪逊大街上散步时，他会向每一个过路人点头打招呼，相信他们也会报以微笑，而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座落于麦迪逊大街和 43 号街上的巴鲁克斯兄弟公司里，在特别剪辑部的一面墙上至今挂着一幅无名照片，照片里的绅士尽管已上了年纪，但仍穿着得体，气质高雅，两眼炯炯有神，

^① 从股市集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可以得出股市走势正强的结论，例如，每月 200 亿美元流入共同基金以前闻所未闻，现在则变得非常轻松——原注

^② 柯立芝，1879-1933，美国第 30 任总统 [1923-1929]。共和党人，对内实行不干涉工商业政策，一面减税，一面坚持高额保护关税，对外推行孤立主义，任内美国经济繁荣，历史上称之为“柯立芝时期”——译注。

一副自满自得的神情。他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朋友伯纳德·梅涅斯·巴鲁克。

詹姆斯·格兰特

1996 年 12 月于纽约

市

初版前言

他是全美国的经济顾问

多萝西·帕克^①曾说有两样东西困惑着她：拉链的原理和伯纳德·巴鲁克的确切作用。对于后者，帕克小姐是指巴鲁克在其成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一份有薪水的日常工作。其实，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他不需要这样一份工作；而作为一个在公共场合以建议代替行动的人，他通常也不想要这样一份工作。1903年在他33岁时，他放弃了一家华尔街股票经纪行的高薪，决心用自己的钱来进行风险投资活动。在这一领域他获得了辉煌的成功，尽管也并不是没有遭受过“可以让一个有家室的男人走到门外一枪崩了自己”的损失（这是他的原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一直从事着个体投资活动。之后，他的“作用”才变得有形而真实——开始领导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旨在用暂时的中央计划政策重整市场经济。停战以后，他又远赴巴黎，为美国的和平谈判人员服务，然后回国料理自己的财务，并时而从事一种顾问工作：为总统、为民主党、为农场主、为国会委员会以及通过他在新闻界的一些朋友，更多时候为大众充当经济顾问。尽管他有时也同意在某个部门任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担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但一般他仅作为私人顾问，而非官方顾问。更确切地说，他更愿意为所有部门服务。在白宫对面的一条大街上，人们经常能看见一幅熟悉的画面，一位老人坐在公园长椅上深深地思考着。这令无数的美国人可以放下心来，感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拥有一位深思熟虑的顾问。从联合国卸职回来后（又从事了几年战时顾问工作），巴鲁克赢得了大众热情

^① 多萝西·帕克，1893-1967，美国女诗人，短篇小说家，主要作品有诗集《放情集》、短篇小说《高个金发女郎》等，后者获1929年欧亨利最佳短篇小说奖——译注。

洋溢的爱戴，很少有其他当选官员享有如此殊荣。随后几年里，各种荣誉奖项、奖状、委任状、决议状铺天盖地而来，其中有 1955 年酸奶食用者协会颁发的镶边会员证书，1956 年西点军校颁发的 1918 届荣誉学员证书等等。

1965 年，巴鲁克以 94 岁的高龄与世长辞。《国家评论》杂志以斯多葛派的传统深刻地说他是一个“优秀公民”，“不热衷于党派、派系和利益之争……坚信守法的政府是合理社会的一部分。当守法的政府受到内外敌人的威胁时，他时刻准备为保护政府而作出自己的贡献”。许多人也许会问，已有四位作家写了巴鲁克的传记，其自传也已出了两本，对于这样一个大人物，我还有什么好写的？我的回答是，有关他的金融事业的大部分情况还没有被人发掘。尽管对这一主题巴鲁克自己也写了一些，但他记忆中的往事毕竟还是有限而不完整的。有时他也会感叹自己在股票买卖中为什么不犯错误，但也仅限于此。实际上，他是一位天才股票交易商。但是，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位经理，作为一名不太幸运的铁路股东，以及 1929 年股市大崩溃时作为一名暂时不知所措的投资者，有关这些情况的细节以前却从未有人提起。而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则以钱和市场为叙述重点。

任何一位在股市上赚到了 100 万美元，然后冒险用这第一个 100 万去赚取第二个、相对不那么重要的 100 万，然后再冒险……依此类推，直至积聚了大约 2500 万美元的人，就像巴鲁克所做的那样，肯定愿意见好就收洗手不干了。对于这种投机思想，弗莱德·施韦这样写道：“这种想法使我中产阶级的灵魂瑟瑟发抖”。巴鲁克对他的中产阶级朋友们有这样的赌博心理感到吃惊——他告诉哈罗德·伊克斯，他曾用 10000 美元跟人打赌罗斯福 1940 年会第三次连任总统，而总统认为结果里面含有私人利益在内，于是要求如果巴鲁克获胜的话自己也应分得一部分。结果他们真的赢了——但是这种大起大落的日子随着巴鲁克

40 多岁的结束而结束了。中年和晚年，巴鲁克对自己的财产十分保守、节约。在创建海湾硫磺公司（后称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这一大型计划中，这位投资资本家后来变得那么小心谨慎，终致失去了其投资伙伴多次提出的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他们的财产的机会。

一位成功的股票交易商必须不迷信任何亏本理由。如果他在股市上犯了错误，他必须有“砍一刀去一截”的决心和面临“一夜赤贫”的冒险精神。巴鲁克将这种交易精神带进了国家政治领域。总的说来他相信旧时代民主党的硬通货原则、低关税原则和个体自由原则，但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政治形势发生改变时，他又不得不服从于新的时代。在公众生活中他是最谨慎最不愿冒险的人。年青时他以抓住机遇的冒险精神而致富，年老时则又以确保安全的稳妥思想而闻名。

除了他的个人自传外，巴鲁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 Seeley G. Mudd 图书馆为世人留下了一大批精彩的档案，一些记录了他的一生的合法的、共同的、公共的资料，以及一批他的朋友、崇拜者和追随者。岁月无情，这些人也一个个离我们而去。但是与巴鲁克的生命轨迹有过交叉的人们对我的工作都很支持，有的愿意与我分享他们记忆中的往事，有的愿意为我提供帮助。对于这些支持者，我想在此一并感谢。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他们是：

（省略——编排者）

我在写作过程中尽可能地使用原始资料 and 文件，但如果没有一大批专家、研究工作者、学者和档案专家们的帮助，这一点恐怕也将不太可能。因此在此我也想对这些人表示感谢（同样以字母顺序排列）：

（省略——编排者）

特别要感谢一位永不知疲倦的记者 Mark Fury，以及一位素未平生的学者 Jordan A. Schwarz，他对巴鲁克进行过专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著有《大投机家：伯纳德.M. 巴鲁克 1917-1965 年在华盛顿》一书（Chapl Hill 出版社，北卡罗莱纳州，1981 年）。并对 Patricia Miller 一丝不苟的检查和校订工作表示深深的感谢。

另外，我还要感谢西蒙与夏思特出版社的编辑 Alice Mayhew 和巴隆出版社的编辑 Alan Abelson 和 Robert M .Bleiberg，感谢他们多次为我付出了最宝贵的时间。

詹姆斯. 格兰特

于纽约巴鲁克林 1983 年 8 月

第一章

医生的儿子

当伯纳德·梅涅斯·巴鲁克年老耳聋时，他还是喜欢呆在电话机旁不断地给他的股票经纪人打电话。股市收市后，他喜欢躺在安乐椅里，闭上眼睛，听着经纪人给他阅读股市行情长长的报单。通常他喜欢和他们谈论通货膨胀的威胁（这令电话那头的人感到非常厌烦，因为在 50 年代，很少有人对这一问题感到担忧）或他自己的往事。

一天，他突然问一位他比较喜欢的经纪人：“我想你一定认识了不少重要人物了吧？”

那人表示同意，并说：“他们都非常感激您”。

“那么，在所有这些重要人物里，你觉得我有多重要？”

“第二号”。

巴鲁克对这一回答略感不悦。在他的托勒密宇宙体系^①里，他便是地球，其他人则是小得多的星星和月亮。他的虚荣是纯正而单一的，但对此那位经纪人并没有能很好地理解到。于是，巴鲁克又试着哄诱他作进一步的阐明，那人却不再多说什么。直到一段时间以后，巴鲁克的好奇心又战胜了自己的骄傲。

他忍不住又试着问那位经纪人：“前几天，你说我是你认识的人当中第二号重要的人物。那么谁是第一号？”

“当然是我的父亲罗！”

^① 托勒密，生活于公元 2 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地理学家、数学家，建立地心宇宙体系（托勒密体系）学说，著有《天文学大成》、《地理学指南》等——译注。

巴鲁克松了口气，微微地笑了，说：“你知道，我的父亲也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重要的人物”。

巴鲁克的父亲叫西蒙·巴鲁克，是一位医生，有四个儿子，巴鲁克排行老二。西蒙·巴鲁克 1840 年出生于德国什未森地区一个普鲁士村庄里。1855 年，他为了躲避普鲁士的征兵，设法逃到一个海港上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在南卡罗莱纳州坎登，他遇到了另外一名来自什未森地区的移民梅涅斯·鲍姆。鲍姆开着一家杂货店，他收留西蒙当了一名伙计，并热心地教西蒙英语，后来还资助西蒙上了南卡罗莱纳州医学院和弗吉尼亚州医学院。到了西蒙毕业的时候，美国内战爆发了。这位昔日的普鲁士逃兵毅然决定加入南部邦联军队。1862 年 4 月，他被任命为南卡罗莱纳步兵旅第三营助理中士。

还没来得及怎么训练，用西蒙·巴鲁克医生自己的话说，他就被派到了战场上。他参加了包括马纳萨斯第二次战役、南部山区战役、弗莱得里克堡战役、昌斯勒斯维尔战役、葛底斯堡战役、威尔德涅斯战役、斯鲍兹法尼亚战役、科尔德哈宝战役、西达克利克战役和彼兹堡战役在内的一系列战役并受了伤。他两次被北方联军俘虏，这在他记忆中是最忠于南部邦联的时刻。被关押在巴尔的摩的福特·麦克亨利监狱期间，他写了一篇散文，从其标题《胸部的两处刀伤》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英雄气概。他告诫他的弟弟赫尔曼要远离军队。赫尔曼当年也象西蒙一样从德国逃到了南卡罗莱纳，内战爆发时他刚刚 17 岁。但当兄弟俩下一次见面时，俩人都穿着制服。赫尔曼成了一名南方盟军的一名骑兵。他对哥哥解释说，他再也无法忍受女人们指责的目光了，于是报名参了军。

成家的本能使巴鲁克医生在南卡罗莱纳州温斯保罗休假时，爱上了种植园主父亲的女儿，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伊莎贝尔·沃尔夫。这在战时已算晚了。伊莎贝尔是 13 个孩子中的长女，战争开始时她才 11 岁。她的父亲西林·沃尔夫有 26 个奴隶，因此伊莎贝尔从来不用自己穿衣

服。但是战争夺走了家里的一切，北方联军烧掉了他们家的房子和田里的庄稼，赶走了所有的牲口，放跑了所有的奴隶。许多年以后，沃尔夫家的一位朋友写信给巴鲁克，告诉他她当时的记忆：“我对你们家最初的记忆，便是那天晚上你们在温斯保罗的家被谢尔曼的军队烧得一干二净。我的父亲罗宾逊医生从乡下回到家里时，发现你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带着所有的小孩在希伯来城里四处乞讨”。战争结束后他们才重又建起了家园，但沃尔夫的财产（据 1860 年统计有房产 13000 美元，“个人资产” 67750 美元）却无可奈何地被认定为是南部邦联的财产。西林·沃尔夫去世时 84 岁，当时他正坐在椅子上取暖，那张椅子突然向前翻倒，可怜的老人和椅子一起跌进了火里。

战争结束时，巴鲁克医生身无分文，伤寒症使他身体变得很虚弱，但他决心要在坎登开办一家乡村诊所。当他拄着拐杖回到家里时，却发现不但北方佬把自己的外科手术工具烧了个精光（后来一个同情南方邦联的巴尔的摩人又送给他一套），而且一个北方联军军官还赢得了伊莎贝尔的欢心。这个叫坎廷上尉的北方佬想尽办法向伊莎贝尔大献殷勤，但巴鲁克医生有 6 英尺高，一双蓝眼睛很是迷人，而且他先认识伊莎贝尔，所以还是占了优势。1867 年 12 月 28 日，他终于和伊莎贝尔结了婚。51 年以后，一位陌生人拜访了时任威尔逊总统的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的伯纳德·巴鲁克，要求为他赴法国参战提供帮助。他还带着一封巴鲁克母亲写的亲笔信，上面写着：“携此信者是坎廷上尉的儿子。我知道你会尽力帮助他的”。

伯纳德·巴鲁克对家谱知之不多，但喜欢不断提起自己的家族史，认为自己是古代司祭和国王们的后代。他指出，根据在德国与他同姓的人和父亲方面的人的情况，姓巴鲁克的人源于一支葡萄牙——西班牙的拉比部落，混有波兰或俄罗斯血统（本书主人公名字中的梅涅斯得自于当年收留他的梅涅斯·鲍姆）。他曾写道：“祖父还认为自己是古犹太人

专门编制档案的巴鲁克的后代，那人曾编写了《耶利米预言》一书，‘巴鲁克，得自于《次经》’^①。父亲也默认这一点”。后来，在巴鲁克 1931 年与爱达荷州共和党人，参议员威廉·埃德加·博拉共赴波兰途中，由于博拉对自己的姓氏渊源一无所知，巴鲁克便漫不经心地把博拉也拉进了巴鲁克宗族，并指出，据推测，姓巴鲁克的与大卫王^②有着一定的联系。

巴鲁克的祖父伯恩哈德·巴鲁克身高六英尺，戴着一付厚厚的眼镜，是个业余的梵语学生，喜欢在露天啤酒店里睡大觉。巴鲁克的祖母却完全是另外一类人，她身材娇小，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是一位勤俭节约的女家长（巴鲁克曾在回德国探望父亲的老家时看到自己的祖母）。她做少女时名叫特丽萨·格鲁恩，巴鲁克认为她是波兰人。

巴鲁克从来不在这些事情上牵涉太多，他只说自己的血液里，一半是移民的，一半是早期美国人的。从文字上看，这一说法对了一半。从巴鲁克的母亲这边说起，西林·沃尔夫是第一代美国人：尽管西林出生于普鲁士，但他的岳父家却是在美洲新大陆早期建立起来的。当初一位名叫伊萨克·罗得里格兹·马奎斯的船主，于 16 世纪 90 年代在纽约登陆，成为他们家第一位美洲殖民者。他驾驶着自己的“海豚号”往返于纽约和英格兰，有时也从非洲贩运奴隶到新大陆。巴鲁克在自传中也提及了这一事实，但没有道歉的含义，只是用“‘海豚号’曾以载渡了一名外科医生而闻名”这样的描写来减轻这一商业污点。另外，巴鲁克认为，马奎斯的子孙后代在美国内战中所遭受的灾难已足以抵过他当年的罪过。像巴鲁克后来所做的那样，马奎斯在曼哈顿附近购置了一幢时髦豪宅。他的家族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后裔，即人称西班牙系(Sephardic)犹太人。对巴鲁克的虚荣，有一个有关宗族渊源的玩笑，说他（巴鲁克）

^① 《次经》，指见于 70 子希腊文译本和通俗拉丁文本但未为希伯来文原本或基督教新教译本收录的经文——译注。

^② 大卫王，公元前 1000～公元前 962，古代以色列国王，建立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据基督教《圣经》记载，系耶稣的祖先——译注。

是当今世上唯一的一名西班牙系犹太人。

第一位出现在南卡罗莱纳的巴鲁克的母系祖先是塞缪尔·马克斯（按巴鲁克的拼法），他大约于 1800 年到达南卡罗莱纳。他有个女儿叫德博拉·马克斯，嫁给了拉比·哈特威·科亨，正是他们的女儿萨拉嫁给了从普鲁士来的移民西林·沃尔夫。1850 年 3 月 4 日伊莎贝尔出生时，家谱上写着“上帝赐福与她”。这样，当她嫁给西蒙·巴鲁克时，整个家族都认为这很吉利，因为“巴鲁克”一词在希伯来语中正是“赐福”的意思。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哈特威生于 1868 年，我们的主人公巴鲁克随后生于 1870 年，赫尔曼生于 1872 年，而西林生于 1874 年。

四个儿子中长得最漂亮的是伯纳德·巴鲁克，当初是个胖小子，大伙儿都叫他“肉团”。他长着一双蓝眼睛，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脸雀斑，动不动就发脾气。一次因为生气，他居然从早餐桌对面抓过一块肉来，满怀恶意地整个儿吞了下去。打架的事儿更是少不了他。由于妈妈的宠爱，他就坚持吃饭时要坐在妈妈的右边（这点后来还成了他的个人习惯，结婚后他一直坐在妻子的右边）。孩提时代的一次痛苦经历他至今还记忆犹新，那事儿发生在他父亲的老恩人梅涅斯·鲍姆家里。对儿子寄予厚望的妈妈把巴鲁克叫到屋子中央。

“亲爱的，给我们说点儿什么吧”，妈妈说。

于是巴鲁克用唱诗的音调开始背诵托马斯·坎贝尔的《霍亨榾》一诗的前几句来：

太阳低垂在榾树上，

白雪皑皑一片苍茫；

急速翻滚着的伊塞，

象冬季般那样昏黄。

尴尬的父亲听了有点坐立不安，用大姆指按着鼻子一个劲地嘲笑儿子。小男孩终于冲出屋去，回家时哭了一路，最后才慢慢地睡着了。

巴鲁克一家住在坎登镇上，他们宽敞的三层楼房有高大的窗子和带柱子的阳台。起初父亲赚得并不多，有时在巴鲁克家后园忙乎了一天，像他一样受了战争重创的病人们也只能用实物来支付医疗费——几只鸡或是一些棉花什么的，有时甚至是一条狗。巴鲁克夫人给人教钢琴和声乐，兼卖黄油和牛奶。但不管怎么说，和战后南卡罗莱纳的大多数家庭相比，他们家还算过得去，事实上，慢慢地，后来变得相当不错了。医生的医术逐渐在提高，父亲后来购置了一些土地和牲口。一个名叫米纳娃的黑人保姆照看着孩子们。巴鲁克记得她头脑简单、迷信、可爱，是个专断的管家。每次巴鲁克医生对孩子们很凶时，他的妻子就会警告他说：“医生，别对他们那么凶，他们会不喜欢你的”。

巴鲁克在坎登呆了 10 年，这个镇给当初的男孩留下的印象是又大又深奥。受母亲和父亲（母亲曾加入过南方邦联女儿会，父亲则加入过南方叛军）及南卡罗莱纳州的影响，他生来就是一个南方人，成了百万富翁后他还回到坎登买了一个男爵的身份。甚至在纽约呆了 70 年以后，他还是改不掉南方人的口音。

在他孩提的记忆中，坎登完全是马克·吐温作品里的哈尼堡的翻版。春天河水涨得满满的，逼得船筏上的小伙子一个个满头大汗；孩子们每天都扑腾在池塘里；上城区和下城区的小伙们隔一段时间就要打一场棒球比赛。医生的儿子小巴鲁克们当然属于上城区一边儿。在巴鲁克的自传里，对弟弟赫尔曼和西林很少提起，倒是对哥哥哈特威写了很多。哈特威在打架中战无不胜，是球队的偶像，在池塘里能游得很远，会在大人们面前朗朗背诵，而且还有一条白色大驯犬，叫“尖牙”。巴鲁克后来开始去由学校老师的妻子开办的幼儿园里上学，“尖牙”每天都护送他到大门口，然后再乖乖地回家去。“印象最深的是，我坐在地板上一

遍遍地念‘我看见了一只猫’，‘我看见了一条狗’，阿姨则抱着婴儿喂他喝麦片粥”，巴鲁克曾这样给记者马克·沙利文写道，“孩子们叫啊，喊啊，那课堂还成什么课堂！”

巴鲁克童年时期的坎登是一个坐落在南卡罗莱纳中北部松林带地区的小县城，他出生那年整个县城的人口是 1007 人，到 1880 年上升到了 1780 人。当地的经济靠落后的农业支撑（例如那时还普遍不实行庄稼轮作）。巴鲁克医生是一个思想不拘一格有公众意识的人，他对改进农事作业很感兴趣，在自己家后面一块有三英亩大的土地上种了棉花、玉米和甘蔗等试验田，并订了一些有关农业的报刊杂志，一本本码放在医疗室里的黄色架子上。

巴鲁克夫人是家人举止文雅的推动者，她鼓动丈夫把放在农事上的精力转到更有利的医疗上去。她对宗教的虔诚令人吃惊，并竭力向自己的儿子们灌输一种艺术和宗教的感觉。她本人对基督教义和犹太教义都十分崇拜，并要求儿子们也要遵奉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安息日。在这点上巴鲁克比他的兄弟们更听妈妈的话，但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和父亲一样成了一名无神论者。他唱歌总是走调，还拒绝练钢琴，倒是对上树掏鸟蛋和到处打野兔情有独钟。为了赚钱买火药和子弹，他还乖乖地去地里摘棉花。孩提时代的他还有另外一个爱好，在威斯堡祖父家住的时候，他被来往于夏洛特-哥伦比亚-奥古斯塔之间的火车迷住了。看着一节节的火车轰隆隆地疾驰而过，他一边使劲地扔石块，一边想：要是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火车，那该有多威风啊——这就是一个还不到 10 岁的孩子的不太实际的梦想。

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南卡罗莱纳是一块被征服了的土地。巴鲁克医生反对火并，也不曾有过什么奴隶，但正是在那充满了政治暴力的日子里，他产生了反叛南部重建法规的想法。可能是在思想绝望或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时候，他给一位前南方邦联成员写道：“当我们什么都失

去了的时候，便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依靠。那就是利剑。生活在这样一种暴政和精神物质压迫之下，唯有为正义而死的觉悟，才能使我们略感幸福”。

父亲反叛的证据终于被巴鲁克和哈特威在自己家的小阁楼里发现了。经过一阵翻箱倒柜，两兄弟从一个垫了许多马鬃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套南方盟军的制服，下面是一块白色的头巾和绣有深红色十字架的长袍——这可是爵士级三K党^①标志啊。尽管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三K党于鼎盛时期从美国中西部地区招收绝望无救之徒，但在南部重建时期，三K党却主要是由前南方盟军军官、地主和有一技之长之人领导的（尽管也吸收一些粗人恶棍当喽罗）。在以坎登为县城的克沙县，黑人人口超过了白人人口，达到了 2:1，这一选举比例上的失衡使三K党认为只有一种办法来进行调整，那就是对黑人民兵、黑人选民、北方来的教师、北方联盟成员、共和党候选人以及其他寻求权力平等的联盟力量（这是一个阵营的叫法）或拎着毯制手提包的北方投机客^②（这是另一个阵营的叫法）进行恐怖威胁。当巴鲁克夫人在阁楼里发现了两个吓得目瞪口呆的小家伙时，她要他们俩发誓绝不说出去，因为三K党是非法的，其党徒遭到通缉。哈特威和巴鲁克一下感觉自己是个大人了，对自己的父亲感到格外骄傲。

巴鲁克亲眼目睹了南方重建时期的暴力事件。在一个选举日的前夜，父亲出门躲避去了，母亲对大街上的嘈杂声特别警觉。巴鲁克后来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她要哈特威和我去取枪。

我们把枪端了起来——两支都是前装式的长枪，一支是单筒的，一

^① 三K党，1915 年成立于美国乔治亚州，主要活动于美国南部的秘密组织，其成员限于土生的新教白人，反对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外国人——译注。

^② 北方投机客，指美国内战后重建时期到南方去投机的北方人——译注。

支是双筒的。母亲要我们把弹药填好，到二楼阳台上找个地方埋伏起来。

“不要乱开枪”，她提醒我们，“除非我叫你们射击”。

我们就那样站在那儿，心怦怦乱跳，手里的枪几乎和我们自己一样高，眼睛紧紧盯着各种肤色的人群碾过大街。他们嘴里喝着劣质的威士忌，纷纷向投票站和集会地点走去。

随后发生的事我有点记不清了，只记得看见一个黑人从一棵树后倒了下来。人群突然一下四散逃开了。我们跑到那个黑人倒下的地方，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却发现他的头被劈开了，斧子还砍在那儿。母亲赶紧端了一盆水来，把他的衣服解开。我不知道那人怎么样了，但我能断定他活不长，因为他的头都已.....

可以理解，巴鲁克夫人想找一个更加和平的环境里扶养孩子，但是也不知为什么，巴鲁克医生却总不愿意搬家。据巴鲁克的说法，直到巴鲁克的一位朋友，有着 13 个孩子的司法官上校威廉.M. 沙农在一次决斗中丧了命，他的想法才有了改变。决斗发生在 1880 年 7 月，当时巴鲁克还太小，对臭名远扬的切斯特菲尔德县“决斗世家”的博根. 凯什，即决斗获胜者的儿子的神枪法还不太清楚。据巴鲁克回忆，他的父亲曾试图制止这场血腥的决斗，后来又努力化解对凯什进行报复的动向。尽管我们后来也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但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巴鲁克对这一事件大为震惊。当时的坎登是个动不动就决斗的地方，或许正是沙农的死，使巴鲁克医生再也受不了了。发生了这一切以后，他们准备举家离开这个地方。1880 年末，巴鲁克医生卖掉了他的诊所、住宅和试验田，加上他的存款，总数相当可观，大约有 18000 美元。保姆米纳娃留了下来，爱犬“尖牙”也送了人。有人问巴鲁克夫人为什么要去纽约，她说她只是想给孩子们买到最好的外套。

1881 年冬天结束的某一天，伯纳德. 梅涅斯. 巴鲁克第一次在纽约

市露了面。为了避开夏季征兵，已经是个青年的巴鲁克整天穿着大衣，有时还有长毛衣，假装感觉城里冷得刺骨。当然，他或许还感觉这个城市实在太太，而父亲在 57 号街西 144 号的公寓租下的两间房又是那么的小。

据 1880 年的人口调查，纽约城的人口超过南卡罗莱纳州，在小小的一平方英里土地上，就挤着 222,000 人，相当于整个克沙县的十倍。城市黑人人口只有 20000，约占总人口的 1.7%；而另一方面，外来人口却达 479,000，占总人口的 40%。而在克沙县情况刚好倒过来，黑人占了绝大多数，外来人口（可能还包括巴鲁克医生在内）仅有屈屈 74 人。

在巴鲁克眼里，纽约城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或者是和原来颠倒的，或者两者都是。水会从笼头里自动流出来，人们什么时候都穿着鞋子，蒸汽机车在头顶的高架铁轨上呼啸而过，从冒着烟的车里钻出来的女人们都在扑着粉的脸上披着纱巾。未满十一岁的巴鲁克又敬又畏，但受了勇敢的哈特威的影响，他从未感觉那么兴奋过。

巴鲁克一家住在北方人居多的曼哈顿边缘地区附近。当时，在五号大街和 59 大街交汇的地方，也就是后来的广场饭店的所在地，住着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人和一条小狗。公寓附近有一个铁匠，巴鲁克对他的肌肉羡慕不已。在 86 大街上，除了约克维尔村外，稀稀落落地住着东区的上流人物。到了 1884 年，在西中央公园和 72 大街交汇处矗起了一幢新大楼，由于不能随便进入，人们便叫它“达科他楼”^①。黑人居住区叫“山羊村”（Goatville），因为它就象曼哈顿的四只脚。布朗克斯就已是郊区了。而巴鲁克林大桥也刚刚于上一年造好。

一家人第一次在北方过冬，是又冷又挤，又忧又虑。巴鲁克记得，

^① 达科他位于美国中北部，与加拿大接壤，19 世纪 80 年代还较少有人去，因此此处把不随便进入的地方叫“达科他”——译注。

一家人挤在公寓的一面墙上勉强取暖，因为墙后面是一个烟囱。两间房一间给哈特威和巴鲁克睡，一间是西林、赫尔曼和父母的。房东老太太，也不知是雅各布小姐还是雅各布夫人，倒是非常和蔼，巴鲁克还记得她常给自己和兄弟们糖吃。^①刚搬到纽约不久，巴鲁克医生就病倒了。据另外一名医生诊断说，巴鲁克医生的心脏出了问题，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一家人非常悲伤，曾一度想回到南卡罗莱纳去。但后来巴鲁克医生又看了一次，这次诊断使全家人破涕为笑（也是准确的），原来不过是消化不良引起身体不舒服罢了。

不久巴鲁克一家便适应了城市生活。巴鲁克进了位于 54 大街与第 6 和第 7 大街交汇处的第 69 公立中学。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第一天上学时，如何由校长领着去班里，如何被介绍给他的老师凯瑟琳·德弗罗·布雷克小姐，以及如何由一个名叫克莱伦斯·休思曼的胖男孩指引回家的路。14 年后这个胖男孩成了巴鲁克在华尔街工作时的上司。学期末，巴鲁克收到了一份礼物——一本有布雷克小姐题辞的《奥列弗游记》，上面写着：“奖给有绅士风度的杰出的巴鲁克”。（巴鲁克后来用最好的方式对她进行了回报。1923 年，当布雷克小姐被提升为地区督办员时，巴鲁克在纽约市长约翰·F. 海兰先生面前为她说了许多好话）。同时，哈特威也在社区里获得了新的地位。一次，两名青年对哈特威冷嘲热讽，并叫巴鲁克“小白脸”，哈特威向他俩进行单挑，结果把跳出来的一个狠狠揍了一顿。

就在巴鲁克和哈特威用各自的方式在本地区显声扬名的时候，他们

^① 巴鲁克家过着艰苦的生活可以看出他们在去首都屈就生活之前是有所心理准备的。他们从南卡罗莱纳带去了 18000 美元，当时的银行利息是 4%，这样一年能拿 720 美元。尽管 720 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纽约的房租却相当的不合理。公寓房年租费在 1880 年是 600-1000 美元，到了 1881 年就涨到了 660~1100 美元，置备家具还另外需要 2500-5000 美元。1881 年的房租费是自内战以来最贵的一年，当时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在纽约时报上解释说：“大家都知道新近搬到这个城里来的人绝大部分都很有钱，都想租一套舒服点的房子，这一心理促使了房租的上涨”。但是大衣的价格却因为制造技术的改进而下降了，巴鲁克夫人为儿子们置办大衣大概不过花了 100 美元不到——原作者注。

的父亲也在自己的医疗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884 年他被任命为蒙蒂菲奥慢性病人护理院主任，在发展阑尾切除技术上他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全能型医生，他积极参加从妇科到眼科的各种学术讲座和医疗会诊，并对水的疗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92 年，他第一次写了一篇英文专著文章，《水在现代医疗中的作用》。同年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教授水疗法，并经常向报刊杂志投稿，另外还是在美国推广公共浴室的主要倡导者。

在他的带领下，纽约改进穷人生活状况协会终于于 1891 年在东低区开设了一家大众浴室。但巴鲁克医生希望不光是慈善机构，政府也应采取行动。正当一些进步想法和政策在 90 年代获得了一些进展，呼吁开设公共浴室的力量在阿尔巴尼和坦慕尼协会总部^①里取得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公共浴室和淋浴设施的增多形势遇到了改进公寓房管道输送能力的挑战。根据熟悉当初这场卫生改革运动的历史学家的说法，开设公共浴室的观点受到的挑战是如此的激烈，以致其支持者甚是寥寥无几。但巴鲁克医生仍然宣称，“我认为，为挽救人们的生命，阻止疾病的扩散，我在推广公众浴室方面所做的工作，比我做了一生的内科医生更为重要”。在父亲的影响下，巴鲁克一生都支持、宣传泉疗法和水疗法。本世纪 20 年代末，纽约州州长为重新开放萨拉托加温泉一事请巴鲁克帮忙，巴鲁克爽快地答应了。他后来意识到自己是在纪念父亲西蒙·巴鲁克。

巴鲁克夫人发现在纽约有许多妇女俱乐部、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每个星期日，她都要赶到巴鲁克林高地去听亨利·沃德·比切尔牧师的布道。最多时候她曾同时是 32 个不同组织团体的成员。

随着她的儿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先跳过我们的故事的发展顺序），

^① 阿尔巴尼，美国纽约州首府。坦慕尼协会，成立于 1789 年的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由原先的慈善团体发展而成。此处均指纽约市政府部门——译注。

随着丈夫在事业上不断获得进步，随着她的第二个儿子打入华尔街并迅速发财致富，巴鲁克夫人手下的仆人也越来越多。过去她必须一大早就起来检查教育自己的四个孩子，现在她只需发号施令就行了，家里有洗衣工、司机、女仆和厨师。进入本世纪后，家里位于西 70 大街 51 号的住房宽敞多了，她也用上了一个鲜红色的起居室。因为参加了各种俱乐部和慈善机构，她的电话信函也很多，于是便选了一个中意的外甥女当自己的秘书，叫弗吉尼亚·沃尔夫（后来改叫爱泼斯坦），从芝加哥来。一天弗吉尼亚坦白自己是社会党人，巴鲁克夫人听了并无生气，说：“那又怎么样，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又漂亮又可人嘛”。

巴鲁克夫人的个人观点非常鲜明，她有一张很大的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半身照，认为对着照相机镜头的瓦格纳太过傲慢。和丈夫的观点相反，她反对妇女参选、女权运动和参与社会活动，还发表演说，支持妇女安心家务，还曾因此受到妇女政权论者的反对。1914 年，巴鲁克夫人就性别和家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写道：

不久前，纯粹出于好奇，我去一家大饭店的舞会上瞄了一眼。结果看到了可悲的几幕。

首先我看见了一位认识的可爱姑娘，我认识她，她居然坐在一个开放式包厢里，嘴里叨着香烟，周围簇拥着几个陌生的男人。也许是我太保守了，但我总觉得如果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了，那别的事情难道就不会发生吗？

我看了一下时间，当时已是下午六点半了。随后我又看见了另外一名认识的年轻妈妈，她一会儿和这个男人跳舞，一会儿又和那个男人跳舞。显然，她是一个人溜出来偷欢的。

这令我很困惑。由于生活和年龄的缘故，我可能比其他女人在这方面更有特权，但我绝不会在傍晚六点以后还一个人呆在包厢里，和别的

男人们一起进行当前盛行的玩乐.....

哎，现在的社交场合，年长的监护人太少太少了.....

对于受到较多批评的交谊舞，我倒并没有看出什么不妥来。只是交谊舞太诱人，使人们对之疯狂了，这一点我是反对的。我看人跳过探戈，发现它确实很美。但是马克西舞里有一些舞步却让我有些不太明白。更何况我还从未参观过再低级一点的舞会.....

我认为，现代女人的生活目标，应该是把现代男人拉回到家里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女人自己首先必须呆在家里。

巴鲁克夫人对新女性的反对意见只是在理论上，但她从没和谁树立个人恩怨。就社交活动，她的建议就是时刻记住自己作为某某夫人的身份。当她的丈夫对她喋喋不休的说教略感不耐烦时，她只是轻轻地责怪说：“医生，咱俩谁都有错”。

巴鲁克夫人对第二个儿子在教育上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只希望巴鲁克在地理学上有所成就。她希望他能留在家里和自己呆在一起。当时纽约市还没有公立高中，那些立志上大学的年青人一般都早早地接受高级中学的教育。巴鲁克宣布他一定要考上耶鲁大学，并希望得到家人的支持。但他的母亲却说他年纪还太小。结果 1884 年秋天，年方 14 岁的巴鲁克进了纽约市立大学。

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纽约市立大学还是一个小小的市政英才教育学校，没有娱乐操场，没有宿舍，没有学生会，也没有其他额外的教学设施。整个校园仅由一幢带塔楼的建筑物组成，位于列克星顿大街和 23 大街的拐角处（即现在的纽约市立大学伯纳德.M.巴鲁克分校所在地），学校只有 13 名教授和 37 名讲师。入校第一年（或称预科班）的学生倒是挺多的，但五年以后到了该毕业的时候，还在校学习的就寥寥无几了。

1884 年秋天和巴鲁克一起入校的有几百人，但到了 1889 年和他一起毕业的却只剩了 50 人。“当我们刚入校时，我们是人数众多而头脑空空”，巴鲁克评论自己所在班级的历史，“而现在呢——看看吧——我们是人数空空而头脑充实”。同学们一个个年轻活泼，充满了乐观、爱国的情。在班级年志上，他们把“在我们庄严的国旗和神圣的宪法下”举行建国百年庆典确定为年度最重大事件。但另一方面，他们和本世纪一些玩世不恭的青年学生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在上面提到的这本班级年志上，也收录了一篇有关“作弊学”的幽默散文和一些“科学欺骗术”。

除了教学方面的原因外，巴鲁克把班里较高的辍学率归结为经济困难。尽管学费不用交，但为了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学生们必须边学习边工作，许多人不堪重负，不得不中途退学了。按巴鲁克的说法，他的经济也十分拮据，课余做着书报信件的收发工作，为父亲保管整理医药书籍，为了节省车钱只好每天步行去学校。父亲给他的零花钱是每星期 25 美分，直到上了高年级才多了一倍。从这一点上也大致反映了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已有所好转。巴鲁克初中毕业时，他们家住在西 54 大街 158 号。1885 年春天，他们搬到了东 59 大街 43 号。到了大学三年级的那个春天，他们又搬到了东 60 大街 47 号。据推测，1888 年一个暴风雪的早晨，巴鲁克就是从这条大街出发，硬是步行着坚持去上学。当他最后终于走进校门时，人也完全冻僵了，却发现班里一个人都没有。

19 世纪 80 年代的纽约市立大学，校长亚历山大·斯图尔特魏伯坚持不采用在哈佛十分流行的选修教育系统，认为那太过于荒唐。因此，巴鲁克和他的同学们只有一个重要的选择，要么学科学，要么学人文学。巴鲁克一开始选择了科学，后来认为是错误的，便转入了人文学。在他的自传里，他认为自己作为学生实在是太可怜，但显然这是一个错误的记忆，或者他是有意装作学校里没有真正的大学问家和教授。在全班 50 名学生中，毕业时他排在第 13 位，其中的最强项是希腊语、拉丁语、

英语和法语。成人后的巴鲁克以精于计算闻名，而并不是言辞。但在大学时，他的语言能力却远远超过计算能力。他一共学了四年数学（主修微积分），五年拉丁语，四年英语和希腊语，三年历史学，两年化学和两年不到一点的物理学。绘画最令他头痛，当时叫作“美学”。

巴鲁克三年级下学期时上了乔治·本顿·纽科姆教授开的政治经济学，但学得并没有象后来回忆得那么好。一学年下来，其中还包括一个学期的哲学，他在全班 54 名学生中排名 35（那年唯一比此还差的是应用数学，排名 37），但不管怎么说这门课算是通过了。他后来引用纽科姆的话回忆道：“价格上涨会产生两个作用——产量增加、消费下降，其结果是价格逐渐回落。而价格下跌也会产生两个作用——一是产量下降，因为没人会生产亏本的产品；二是消费增加，二者的合力是重新建立正常的价格平衡”。

纽科姆并不相信这种自然作用，因此无论在授课讲座还是在专著文章里，他对政府在经济领域里的干预作用均表示理解。1885 年他这样写道：“经济这一端是隶属于社会这一端尤其是伦理道德这一端的，只要对前者的一味追求阻碍了对后者也是更高级一端时，社会道德和意志就可能也必将出来干预……”巴鲁克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社会是有自己的意志和道德的，个人必须服从于集体。我们不必知道他的这种观点是从纽科姆那儿得来的，还是从哪一本指定的经济学教材里学来的，但有两点我们已经明白，其一，法兰西斯·A. 沃克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不支持求利赚钱，对巴鲁克后来所从事的股票交易行业也略有敌意；其二，这种观点或多或少表达了巴鲁克几十年后可能鼓吹的一些东西。与此相关连，关于资本，巴鲁克认为：“升值的唯一途径是积蓄，保值的方法是自我克制和厉行节约”。所以，许多年以后，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摆脱经济萧条的方法是鼓励消费而不是自我克制和厉行节约的观点的时候，巴鲁克坚决表示反对，也就不足为怪了。

大学里的巴鲁克长得非常瘦削，因此在朋友圈里他最后一个交上女友。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比最后的身高少一英寸），在全校高年级同学里是最高的男生，但体重仅 170 磅，双腿又细又长象豆芽，行动缓慢。上高年级时在《校园杂志》五月号里有一段含意暧昧的话：“兜网球运动使巴鲁克的身体很快强壮起来”。犹太人的身分使他不能参加学校里的大学生联谊会，但有一个学期他曾担任高年级班班长，还是班日活动委员会主席。他是高年级保密协会会员，1889 年校际运动协会大会三名 CCNY 代表之一。大学期间他的行为基本无懈可击，除了二年级时因为一个同学骂他母亲“臭婆娘”时打了人家一个嘴巴以外。当时的情景巴鲁克记得非常清楚。魏伯校长停了他几天课，但对那一嘴巴却大而化小了，只建议说像他这样的男孩应该申请西点军校。魏伯本人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在“极限战术”中击败了皮凯特而荣获葛底斯堡最高荣誉奖章。不幸的是，巴鲁克的申请报告有去无回，他被查出左耳几乎完全失聪——巴鲁克后来怀疑这是在学校棒球比赛中头部被球棍击中而造成（巴鲁克接着还说，他赢得了九局本垒跑）。除了那一记耳光外，巴鲁克喜欢在同学中间说，如果我是军人，我一定当将军。我们相信那确实很有可能。

尽管毕业时巴鲁克没有获得任何学术荣誉，但他给人的信任感却完整无暇——年轻英俊、和蔼可亲、精于算术、惊人记忆。《校园杂志》曾作了这样的报道，在 1889 年班日活动中，巴鲁克获得了同学们的一件特殊礼物，“作为最佳健美者，‘矮子’巴鲁克被赠予一条八岁小孩穿的齐膝裤.....”就这样，伯纳德·梅涅斯·巴鲁克装备停当，准备向外面的世界出发。

第二章

起家周薪三美元

1889 年 9 月 23 日《校园杂志》报道：“89——巴鲁克进军华尔街”。

巴鲁克在学校时想在医学上有所成就，但毕业以后，也无非成天在手术室里进进出出，偶尔翻翻医学书籍而已。父亲对他的将来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倒是母亲一个劲地鼓动他向商业方向发展，她相信巴鲁克的长相说明了这一点。

颅相学是一种当时非常风行的伪科学，通过观察头颅上的隆脊形状来推测一个人的天资。巴鲁克一家搬到纽约不久，母亲就带着巴鲁克去拜访了一个名叫福勒的颅相家。颅相家问巴鲁克夫人对儿子有什么想法。

“我想让他当个医生”。

“他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福勒一边说，一边用手在孩子的眉间评说着，“但我给您的建议是，他应该做大事——比如金融或政治”。

1889 年春夏，巴鲁克在一家咨询公司小心起步，一切平淡无奇。之后他开始给父亲的病人打电话求职，其中之一是丹尼尔·古根海姆^①，经营刺绣出口和矿产进口家族的第二个儿子。巴鲁克比他的“准老板”足足高出一英尺，但两人见面时的这种尴尬被古根海姆的一个微笑轻轻打消了。想必这次会面巴鲁克一定给古根海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后来古根海姆问他愿不愿意去墨西哥做矿石进口生意，巴鲁克说愿意。但他的母亲却不太愿意。

另外一个巴鲁克父亲的病人叫查尔斯·A. 泰特姆，是一个费城旧式家庭的贵族，同意他在自己的玻璃器皿批发公司做学徒。由于生意就在曼哈顿，母亲没有表示不同意，于是巴鲁克就接下了这份活儿，周薪三美元。事情发生在 1889 年的夏天。当时巴鲁克医生是住院医师，居住

^① 丹尼尔·古根海姆，1856-1930，美国企业家，梅尔·古根海姆之子，控制美国冶炼公司股权，为美国采掘业奠定基础，并设立古根海姆发展航空基金。梅尔·古根海姆，1828-1905，美国企业家，原经营瑞士刺绣进口业，靠购得两处铜矿股权发家，在 7 个儿子的协助下于 1891 年组成科罗拉多冶炼公司——译注。

在新泽西州长岛海边旅游胜地的西极饭店。有时他的儿子们从纽约坐火车来渡周末，便在他的办公室里搭起轻便折叠床。星期六晚上，巴鲁克总是违背家规偷偷溜出去，到当地赌场（在当时变革时期人们把赌场叫“地狱”）去刺激一下。一次当他正坐在卡西诺赌场的轮盘赌桌前，面前堆着好些筹码时，他的父亲出现在了门口。一下子整个屋子鸦雀无声，似乎巴鲁克医生身上的那种仁慈赋予了在场的每个人。只见他走到儿子的桌旁，拖出一条凳子来坐在儿子身边，轻声地说：“儿子，准备好的话，咱们回家”。巴鲁克赶紧收拾停当，跟在父亲后边回到了旅店。在紧邻着父母卧室的办公室里，巴鲁克迟疑着脱了衣服准备上床。这时父亲又出现在门口。“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他说（他已49岁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儿子从赌场带回来”。但40年过去后，巴鲁克对这话始终不明白（不知为什么，巴鲁克医生认为赌马和轮盘赌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儿。就在几年以前，他还给了自己的儿子两个银币，让他赌一匹叫帕沙的赛马赢。结果这匹马使小巴鲁克在第一次赌马中就输了）。

最后当巴鲁克迷迷糊糊正要睡着的时候，妈妈出现在他的轻便床边。他睁开眼睛，妈妈把儿子抱在怀里，轻声地安抚着他。巴鲁克完全醒了，妈妈离开屋子后，他失眠了。凌晨五点，他悄悄地起了床，穿好衣服，轻轻地走出屋去。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餐厅里，巴鲁克和一些铁路工人、马车夫一起随便吃了早点，就爬上开往纽约的第一列火车。天亮不久，他就到了曼哈顿，和一个堂兄弟及其朋友们聚到了一起。当有人提议打一天扑克牌时，巴鲁克马上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去，因为父母亲住在长岛。正当一群人在地下室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堂兄弟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了一声：“天呐，伊莎贝尔姨妈来了！”

巴鲁克夫人吃力地从楼梯上下来。巴鲁克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罪恶竟会在妈妈那儿唤起一种相反的、母亲的内疚；他也没有想到，妈妈

竟会立刻尾随着而来。一群年轻人默默地穿上大衣，一个个地从巴鲁克夫人身边匆匆而过。但她似乎什么都没看到，眼里只有自己的儿子，伸开双臂一下抱住了巴鲁克，说：“见到你我真得很高兴！你太敏感了，我担心你会出什么事儿”。

她说她在火车上碰到一个人，一番交谈后，那人告诉她说他是一个银行家，正在找一个学徒，必须可靠、聪明、能吃苦。巴鲁克夫人马上回答说正好有一个合适人选——“我的儿子，伯纳德”。

这位银行家名叫尤里乌斯·A. 科恩，在股票交易所任职，家住东六十区。科恩先生出于法兰克福招聘法考虑，想找一个年轻人当办事员，让他边干边学。学徒期满后才能领取薪水。银行事务听起来可比买卖玻璃要强得多，于是巴鲁克去惠桃泰特姆公司报了到，开始为科恩打工，地点在 46 号交易厅。不久他便开始学习什么是风险投资，什么是套利，什么是外汇，并重新有了 3 美元一周的薪水。

但这种学习被一次偶然的事件打断了，或者说被改变了方向。1890 年，巴鲁克医生要远行去欧洲看望父母，包括赫尔曼叔叔在内的巴鲁克家族成员都赶到海港码头上为其送行。离开船没有几个小时了，赫尔曼突然说巴鲁克为什么不也跟着一块儿去。父亲点了点头，说只要巴鲁克能及时赶回家收拾行李，并在开船前再赶回来，就能一起去。于是巴鲁克飞也似地跑开了。但不久他便开始深深后悔不该如此。在开往欧洲的船上，他和三个陌生人合住一个船舱，那三个人都是古巴人，一上来就晕了船，并晕了一路。最后船终于靠上了欧洲大陆，父子俩马不停蹄，直接坐车去普鲁士城市波森。在那儿，巴鲁克医生在离开欧洲 35 年后，第一次重又和自己的父母亲相聚了。医生马上把高大英俊的小伙子介绍了祖父，说这是他的儿子，伯纳德。就这样，一家三代一起驱车去什未森。

与此同时，巴鲁克夫人在科恩的公司里顶替着缺工的儿子。那年秋天，科恩没有辞退从欧洲回来的巴鲁克，倒是巴鲁克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了。1890 年底他辞了职，与大学时期的好友迪克·吕顿一起准备去淘金致富。两个冒险家白天乘火车到了丹佛，夜晚坐马车赶到了克里坡河，一路西行到了科罗拉多金银矿。白天他们在地下当“装岩工”，将炸下来的石块清洗干净；到了晚上则聚在一间屋子里狂赌。

巴鲁克从未对拳击失去兴趣，1944 年，当弗兰克林·D. 罗斯福第四次连任美国总统时，巴鲁克把自己的拳击冠军奖杯仔细擦干净后寄给了总统表示祝贺。在伍兹地区生活的日子里，他留下了一件最喜欢的纪念品，那是在西 69 号大街小伙子俱乐部任健身教练时拍下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刚做完上拳击台的准备活动，两手臂交叉在赤裸的胸前，两拳紧抱，肌肉鼓胀。厚厚的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光洁的脸、笔挺的鼻子，还有一身的腱肉，无不显示着他天不怕地不怕的自信。

但那时巴鲁克还没有找到一份工作，母亲一直在为此操心。在做慈善事业时她认识了一位富有的慈善家，纽约商人艾布拉姆·B. 德弗里斯，德弗里斯又把她介绍给了亚瑟·A. 豪斯曼。豪斯曼恰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购”得了一个董事会的席位，他会见了巴鲁克，并雇了他。

豪斯曼人高马大，高六英尺重两百多磅，生性乐观。他比巴鲁克大 15 岁左右，单身未婚，是其五个姐妹的衣食靠山，父亲曾是纽约干果批发商。1876 年豪斯曼开始在华尔街谋事，不久便在职业经纪人和客户们中间赢得了“公牛”的好名声。1898 年他展示了自己的多面才华——一月份时他以和平为由大股吃进，6 月份时他又以战争为由大股抛售（当年 4 月美西关系紧张）。“我敢肯定”，那年夏天他宣称道，“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无比繁荣的时期”。后来确实证明了这一点。麦金利^①时

^① 威廉·麦金利，1843-1901，美国第 25 任总统，共和党人，修订关税，提高税率，1898 年发动美西战争，吞并夏威夷，对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1901 年遇刺身亡——译注。

期的一路“牛市”证明了豪斯曼是正确的，同时也使他一下发了大财。到上世纪末，他在华尔街以“摩根的经纪人”出名，意指他是摩根派驻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代表。“尽管豪斯曼从不承认”，一家报纸对此作了评论报道，“但华尔街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摩根的办公室里召开的每天一次的例会中，都有他的身影”。

从1891年初开始，巴鲁克当起了办事员，或叫办公室勤杂工，或叫跑腿儿的。他一会儿拿着证券跑到这儿跑到那儿，一会儿又忙着打电话进行数据核对，一会儿又埋头抄写整理信函，一会儿又在豪斯曼先生的笔记本上记下交易记录，有时还要给豪斯曼的两个兄弟克拉伦斯和弗莱德去买三明治。这最后一项丢人的差使让巴鲁克很恼火，有时还遭到其他年轻人的讥笑，但巴鲁克回忆说：“只要付钱，我什么都可以干。对那个污辱我的年轻人，我找他打了一架，从此他们再也不敢笑话我了”。

巴鲁克非常羡慕那些从常春藤联合会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起点总要比巴鲁克高一两级，口袋里的钱也比他多。他们可以在德尔莫尼科饭店或弗莱德·艾伯林斯饭店用午餐，星期天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马车回家。而巴鲁克却只能每天啃三明治，回家时得步行着喝西北风。但话也说回来，这种羡慕激发了动力，口袋空空也避免了无谓的消遣，巴鲁克把大部分闲暇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他参加了速记班和商业法夜校，熟记各铁路和工业公司的经营情况和业务范围，通读了《商业金融史》和《谋生手册》。他还学着画了一幅精致的全国地图，添上了各条铁路干线及其运输的主要商品名称，这样无需再花费大量研究时间就能迅速掌握每条新闻的重要金融价值。不久，他便以一个知识渊博的聪明年轻人在公司里出了名。

1895年初，风险投资大王詹姆斯·基恩授命巴鲁克调查巴鲁克林联合汽油公司及其新的证券。这样，昔日的跑腿小伙升级为一名年方25

的初级金融分析员。同时，巴鲁克还偷偷地做着另外一份兼职——海上保险辛迪加的一个人向他提供了 1500 美元，“任务”是提高公司信用度。当然，这件事基恩一点儿都不知道。

回顾基恩的经历，可以用一个词形容——“走运”。这位大商人从 50 年代起在加利福尼亚开始创业，做过矿工、记者、骡贩，进行矿业股票风险投资，银行帐户上的数字曾一度升到 150,000 美元，后来又一贫如洗还欠了一屁股债，于是萌发出当股票客户还不如当股票经纪人的想法。这一革命性的想法使他不久就成了百万富翁并当上矿业股票交易所的总裁。1876 年他卖掉铁路股票发了一笔大财，可惜 80 年代在小麦期货中又如数亏光还赔进不少。不久他东山再起，在证券买卖中再次发迹。1901 年他替摩根购进美国钢铁公司新发行的大份额股票。一位崇拜者赞美他的一生是一曲“赌博交响曲”。当被人问及为何一直拿自己的财产作赌注时，基恩回答说：“为什么狗有追逐不完的兔子？生命就是冒险。男人生来就有冒险精神”。被激怒时他会高声咒骂，灵感突发时则引用喜欢的一两句诗。被基恩称为“大执事”的 S. V. 怀特同样是一个大起大落的冒险家，并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冒险之王。基恩这样提醒他：“不安悬在王冠之上，恐惧永远伴着权杖”。

巴鲁克和基恩的认识是通过豪斯曼的一个律师朋友米德顿·斯库伯莱德·巴里尔介绍的。巴里尔的父亲是铁路巨头康涅狄斯·范德比尔特^①的律师，巴里尔一开始在父亲的办公室实习，并业余做几笔股票生意，后来慢慢地做起了专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A. A. 豪斯曼公司和其他经纪公司主要是做大宗业务，巴里尔则是该公司一个零售客户，于是业务关系把他和巴鲁克联系在了一起。巴里尔与基恩和豪斯曼关系甚笃，

^① 范德比尔特，1794～1877，美国航运和铁路巨头，经营渡船起家，1847 年创建航运公司，经营从纽约到旧金山的客货运输业务，1863 年拥有纽约-哈莱姆铁路及纽约中央铁路等——译注。

经常与基恩一起乘坐往返列车，与豪斯曼一起喝高杯酒^①，他们三人对股市总是持乐观态度，逢涨就买，逢跌却喜欢观望一阵。正是基恩说出了这么一句至理名言：“第五大街的琼楼玉宇从来不属于空头客”。巴鲁克对巴里尔的评价是：“他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自己的经纪人什么事情都能摆平。这种信念使我得益匪浅。我学会了让自己相信，人类的聪明才智能征服人类遭受的一切苦难……”由于交际应酬，巴里尔免不了经常饮酒。一天，他的医生劝诫他不要再饮酒了，他真的从此就戒了。在巴鲁克眼里，正是这种自控力使巴里尔在股市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经人介绍，巴里尔接见了勤奋上进的巴鲁克。这位失去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的老人对年轻的巴鲁克印象很好；巴鲁克则因为受到了巴里尔的注意而表现得更加出色。就这样，巴里尔一碰到什么问题，总是先询问巴鲁克的意见，然后再去找什么参考书籍。一段时间以来，两人经常在联合股票交易所（the Consolidated Stock Exchange）的地下餐厅里共进午餐，他们一边吃着烤牛肉和土豆泥，一边谈论着股市的行情和自己的看法。巴里尔深深地被巴鲁克身上的那种可信赖感所打动，认为这种资质应该引起基恩的注意。

基恩是一个狂热的赛马迷——他曾把自己心爱的冠军马西森比的颅骨捐赠给了国家历史博物馆，并象一位老朋友一样时不时地去那儿看望——并且喜欢用钱来表达自己的对赛马的判断。一次基恩有一匹马要去科尼岛参加比赛，基恩希望在她身上下一大笔注，但他又不想引起别人不必要的注意，便决定采用匿名的方式偷偷进行。巴里尔推荐了巴鲁克，说他一定能够胜任。于是年轻的巴鲁克便被叫到了基恩的办公室里。面试中基恩对巴鲁克的性格、经历和体格非常满意，便交给他几千美元的现金，并叮嘱说一切都要悄悄地进行。

^① 用威士忌或白兰地等烈酒搀水或汽水加冰块制成的饮料，盛在高玻璃杯内饮用——译注。

基恩的马轻而易举地赢了比赛（巴鲁克回忆道）。我回到了 34 号大街准备坐渡船回去。口袋里的钱鼓鼓囊囊的，我老担心着有人会给我头上来一下子，把钱都抢走，太可怕了。

涨潮的大浪在前面一下一下地击打着渡船，我又开始担心渡船不会被掀翻。我赶紧扣紧大衣的扣子，心想一旦船往下沉的话，我必须从人群中尽量挤出去，这样才不会有人把我拖下去。

幸好，可怜的巴鲁克安全地着了陆，从此他赢得了基恩的信任，并开始为他做事，担任巴鲁克林联合汽油公司的调查员。

如果说巴鲁克的社交能力是天生的话，那么他在金融市场的活动能力则得自后天，从此二者相辅相成。他的朋友帮助他不断地进行风险投资，等他更有钱的时候，而社交圈子越来越广，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从而使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大量而及时。他的朋友圈中包括当时最大的套利公司之一莱登伯格·泰尔曼公司的套利部经理理查德·列姆伯格，豪斯曼公司的大客户弗兰德·艾迪。艾迪和巴鲁克一见如故，并在新教圣公会教堂的坚信礼中做了巴鲁克的第一个孩子贝尔的教父。年老后的巴鲁克曾告诉一位经纪人朋友说，在他早期的创业过程中，曾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客户赋予他“自由买卖”的权力，意指在股市利润中的自由分享权。如果巴鲁克长得没有那么英俊友善，或许他就根本不可能结识这样一位施主；但同时如果他的脑袋瓜儿没有那么机智敏捷，或许他也不可能引起这位大老板的注意。

由于巴鲁克总是做小笔股票买卖，因此他在股市上发展很慢。在联合证券交易所里，他经常替“荷尼曼 & 王子公司”做小股生意，当然这家公司并没有和王子有多近的关系。他还替亲戚做一些公债投资，其中包括他的叔叔，芝加哥服装设计师哈里·C·列顿。遗憾的是叔侄俩把钱都赔光了。巴鲁克后来回忆说，他有时用一个美元与人赌下一笔证券交

易是涨、是跌还是原价不动，根据是报价盘上的现价。不难想象他肯定也会在买空卖空的场外证券交易所^①做这样的小额投机买卖。他做的第一笔赔本的家族生意是投资一出外地人演出的情节剧^②《东方的琳》。

1890 年，巴鲁克的哥哥、一个雄心勃勃的演员哈特威，受另外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演员的劝说，两人计划在新泽西州森特威尔市一家剧院里上演《东方的琳》。巴鲁克也被哥哥说服了，认为这个主意绝对没错。于是（我们再次引用巴鲁克自己的话）：

可能这批演员都是艺术家吧，也可能这批艺术家只是没有读懂《东方的琳》的剧本吧，总之，在演出的第一幕中，观众有时愤怒，但有时也还开心。但到了演出的第二幕时，场下就只剩下一片愤怒了。

我发现，尽管台下的观众人数不多，但还是超过台上的人。我担心再这样下去一定会出事的，就和剧团管理人员商量索性给观众们退票得了。然后我就像《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里的伯爵一样偷偷地走到后台，对演出团说幸好我已经买好了返程票，走一小段路穿过一条黑乎乎的大街就是火车站。

我猜想，当大伙儿还在车站里等车的时候，观众们已经意识到他们看不到第三幕戏了。正在此时来了一辆火车，大家七手八脚地爬了上去，也没顾得上它究竟是开往什么地方的。真幸运，这列火车正好开往纽约。

后来还有一次，巴鲁克听一个从欧洲返回美国时认识的人说，有人计划铺一条电车轨道，直接通到伊利湖一个岛上的一家饭店。这个计划让巴鲁克一下心痒起来，他极力说服了父亲投资 8000 美元。结果这么

^① 场外证券交易所，纽约市一个在布罗德街头（场外）进行证券交易的市场，后来不断发展，规模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专营新建和小型公司及很多外国企业的股票。它还从事期权交易，每天公布正式牌价，1953 年后改称美国股票交易所——译注。

^② 情节剧，也称传奇剧，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叶流行于欧洲的一种戏剧，大都表现抽象的善恶斗争，充满奇情和夸张，通常有惩恶扬善的双重结局——译注。

大一笔投资一分都没捞回来。尽管父亲对此从来没有责怪过巴鲁克，但他还是感到痛苦难堪。几天后当他对母亲提及田纳西煤铁公司的股票已跌得很低，用 500 美元就能赚回一大笔钱来时，父亲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巴鲁克面前，手里拿着一张 500 美元的支票。这种对儿子的极端信任，让巴鲁克感动不已。

接踵而至的 1893 年的金融大恐慌给每一名证券经纪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要想寻找足够的有偿债能力的客户变得相当困难。起步不久的巴鲁克更是什么样的客户都找不到，一来他没有名气，二来他所效劳的公司无关紧要，三来他做的债券总是赔本。为了招徕客户，他先写好股市行情分析报告，然后挨家挨户地去敲公司办公室的门。一次他去拜访有名的干货商詹姆斯·泰尔科特，却被秘书拦在了门外，于是巴鲁克就耐心地等在外面的大街上，直到目标出现在眼前。他紧追了几步，简单作了自我介绍后说，铁路公司的纷纷倒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因为合并与联合将不可避免，股票升值是个必然，只要看准投资方向；而他，巴鲁克，事先对形势作过了仔细研究，就是最佳经纪人选。个子高高、蓄着灰白胡子的泰尔科特是 17 世纪定居康涅狄格州移民的后代，他被巴鲁克的一番话打动了，便授命巴鲁克购买俄勒冈 & 大陆运输公司 6% 的债券，当时每股约 78 美分。形势确如巴鲁克所分析的那样，铁路股升值了，巴鲁克在该股涨到 1.25 美元的时候抛了出去，从此，泰尔科特成了巴鲁克的固定客户。

巴鲁克对待客户的钱总是小心又小心，但对自己的钱却是大手大脚的。他常常做一些信用交易，或称定金交易，在他特别自信的时候会倾囊而出。定金交易的优势是可以用一小笔定金来控制一大笔投资，但同时不得不冒赔光血本的风险。当时的定金很低，只需股价的 10%，余下的 90% 由客户提供，贷款抵押则是股票本身。只要股价上涨或维持不动，那么抵押就是安全的；但如果股价下跌了，抵押就会遭受损失，经纪人

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贷款。时间允许的话，由经纪人给客户发一封加急电报，或直接打电话通知。客户可以选择是否追加投入。如果不追加投入，则由经纪人将股票抛出，尽量挽救贷款，并以自己的定金补足所有亏损的金额。在定金交易方式中，输赢实际都在经纪人。例如投资的客户以每股 100 美元用现金买进，当股价涨到 105 美元时，他的赢利只是 5%；但对经纪人来说，由于在买进时他只需付每股 10 美元的定金，因此 5 美元的涨幅就是 50%的赢利。对此，巴鲁克简直入了迷。

但不管怎样，定金交易中的每一笔赢利总是伴随着相当的亏本。就巴鲁克而言，亏本的情况还占了多数，因为他总是投入太多而收回太少。于是到了 1897 年左右，巴鲁克对定金交易渐渐失去了兴趣。

这种狂燥抑郁的经济生活使巴鲁克感到非常沮丧，同时还狠狠地挫伤了他与未婚妻安妮·格里芬之间的感情。他俩是在巴鲁克快大学毕业时结识的。格里芬的家住在西 58 号大街 41 号，那里是上层社会的居民区，巴鲁克在那儿有过一次碰鼻子的求爱经历。当时他看到格里芬从马路对面走过来时，他“举了举帽子，说：‘您就是安妮·格里芬小姐吧？’，不想她一甩头说‘不是！’扭头就走”。

安妮和巴鲁克几乎一样高，瘦长的脸，薄嘴唇，细腰肢。几年以后，当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长到和他俩差不多高时，一家五口走在大街上，大家都以为走过去一支棒球队。格里芬的父亲叫本杰明·格里芬，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是“联谊会”^①会员，玻璃进口公司梵一霍恩—格里芬公司负责人之一；格里芬的母亲是土地商 W. J. 威尔考克斯的女儿。因此父母俩都很有钱，家里养着好多马，还有一辆自己的马车。

格里芬先生是美国新教圣公会牧师的孙子，他反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之间的异教婚姻。尽管格里芬先生对巴鲁克本人没有什么意见，相

^① 美国大学优秀生和毕业生的荣誉组织，成立于 1776 年——译注。

反对他还很放心，但觉得宗教的差异会破坏了安妮的幸福。这种想法使一对爱人只好背着偷偷地谈恋爱。两人还设计了一种信号来表示他们的幽会是否存在着危险：窗帘放下表示：不行，格里芬先生在家；窗帘卷起表示：快来吧，宝贝！幸好格里芬夫人站是巴鲁克一边，她非常欢迎他到马萨诸塞州的皮兹菲尔德去作周末客人，母女俩经常在那儿避暑。每到那时，巴鲁克就会和安妮先跳几支舞，然后两人骑上自行车远远地消失了。

和结婚有关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钱的问题了。每次等巴鲁克好不容易积攒起一笔钱来，马上就会被扔进股市这个无底洞里去。1895 年，巴鲁克想寻求一个更稳当的经济来源，他向豪斯曼申请将自己的周薪从 25 美元提升到 50 美元。豪斯曼拒绝了这一申请，但提出了一个更好的协议方案：巴鲁克可以获取公司年利润的 1/8。万一公司生意没有上一年好的话，巴鲁克则领取 35 美元的周薪。很明显豪斯曼给巴鲁克涨了工资了，因为 1894 年是华尔街很平淡的一年，而接下来的日子里形势显然在变好结果，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名初级证券交易经纪人，我决定增加自己的个人开销”，巴鲁克写道，“于是我添置了一件艾伯特王子牌外套、一顶丝质礼帽，以及所有与之匹配的小饰物”。1895 年，即他当初级证券交易经纪人的第一年里，A. A. 豪斯曼公司赚了 48000 美元，这样巴鲁克就获得了 115 美元的提成，折算成工资是周薪美元。不过尽管巴鲁克有钱了，但那一年甚至再后一年他也没有结婚。

奇迹发生在 1897 年。那年春天巴鲁克对美国炼糖公司的股票发生了兴趣，财运的好坏就取决于关税的高低了。只要外国低价糖被关税挡在外面，美国炼糖公司的股票就会看涨；但如果挡不住外国糖的话，该股票的价格就会随着公司的利润下降而下跌。当时，参议院正在讨论一项降低外国糖进口税提案，同时众议院也正在进行类似的立法程序。参

议院的一举一动时刻牵动着股市的涨跌。巴鲁克坚信参议院通不过这项提案，理由是西方的甜菜种植主们和华尔街一样希望通过关税保护来获得更大的利润。他用 300 美元为自己的明智推断下注。如果定金是 10% 的话，他可以操作 3000 美元股票。那年四、五月间，该股每股约 115 美元，但到了 7 月底就涨到了 139 美元。随着股价的上涨，巴鲁克又用自己以前做定金交易赚取的现金吃进该股，他不断地买，把自己的赌本和赢金再作赌注全部买进。等到股价涨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他又开始时刻提醒自己，一旦有突然下跌的迹象就马上指令抛出。但这种被不断警惕着的“停止损失”指令^①始终没有发出，巴鲁克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当最后参议院否决了这项提案时，股价持续向上爬升。8 月 31 日那天，一则有关财政部将禁止进口荷兰糖的消息带动股市创下了日涨幅最高纪录，每股飞涨 8 美元，达到 156.25 美元。就在这时，巴鲁克抛出了。他当初投入的区区 300 美元，最终却足足赚了 60000 美元。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巴鲁克忙着不断买进时，华盛顿人正在忙着卖出，华尔街一片悲观情绪。^②

詹姆斯·基恩长期统治着他的公司，但巴鲁克是否加盟我们不得而知。传闻“标准石油”的人也购进了大量糖股。哈里·康坦特是巴鲁克喜欢的一位经纪人，他和亚瑟·豪斯曼在该股猛涨到 156.25 美元那天都狠狠地吃进了一大批，但结果这个价就成了该股的全年最高价。第二天的《华尔街日报》这样报道：“糖股的涨跌归因于专业股票交易商 [豪斯曼]，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够他受的了”。

当巴鲁克告诉安妮说他在股市上赚到了 60000 美元，他们终于可以结婚了的时候，安妮根本不相信。他们在电话里这样说：

^① 专指授意证券经纪人在一种证券的市场价格低于某规定价值时即予出售的指令——译注。

^② 7 月 3 日的《华尔街日报》写道：“华盛顿各家报纸记者均持股价必将下跌观点，华盛顿几乎所有的证券交易所都短缺该股……没有一个人不相信，美国炼糖公司已快倒闭了”。7 月 24 日该报又写道：“在糖股交易史上，还从未发生过仅有那么少的人判断正确的事”。原著注。

“你每次都是赚多少赔多少”。

“这次我把它存起来”。

结果两人都错了——巴鲁克没有把钱赔光，但把钱花光了。不过安妮被巴鲁克说服了，她父亲的反对意见也被撇到了一边，婚礼于 10 月 20 日在安妮的家里举行，主持人是格里芬家的一个亲戚理查德·梵·霍恩，他事先把巴鲁克偷偷拉到一边，说如果有什么不妥的话，他可以取消仪式中关于圣父、圣子和圣灵的部分。巴鲁克感谢他的好意，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新婚蜜月是在华盛顿特区和老康姆福特度过的，在奇萨皮克湾上，新郎一路晕船。他们还去了一趟巴鲁克在南卡罗莱纳州坎登的出生地，然后回到纽约，和巴鲁克的父母亲以及三个兄弟一起住在西 70 大街 51 号的家里。就在那儿，巴鲁克和安妮一起生活了两年多。

在当时，男人把妻子带回家和父母亲住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事。但或许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样安排，或许安妮有她自己的顾虑，亦或许巴鲁克的母亲太过专断，习惯了一个人掌管整个家和她的儿子，总之，最初几个月的家庭生活对安妮来说是一段艰难婚姻的前奏曲，多多少少有点被她父亲言中，不管是否是他所认为的那种原因。

1897 年秋天对巴鲁克来说很重要。在出击美国炼糖公司股票和举行婚礼之间，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购得了一个席位（“很好”，他母亲听了这一消息后说：“在那儿你会有所作为的”）。在出演《东方的琳》一剧中不太顺利的哈特威，有一天突然从剧院回到家里，说他和剧团闹翻了。当时巴鲁克正和母亲一起在玩单关扑克牌游戏。巴鲁克从扑克牌上方看着自己的哥哥，突然心血来潮，说如果你愿意离开舞台安定下来，我就把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的职位让给你。哈特威接受了这个条件。巴鲁克非常高兴，但随后就后悔了。在接下来的几个不眠之夜，他想来想

去，始终觉得没有别的可干了，只好再去买一个席位。到了9月底，他送给父亲一份令老人家目瞪口呆的结婚纪念礼物。以父亲一年婚龄1000美元计算，本打算送3万美元的，但由于他在购买哈特威的席位上额外花去19000美元，就只好送了2万美元。这样，在短短几个月里，巴鲁克赚了6万美元，但在他所敬爱的两个男人身上和结婚一事上，他一下花掉了2/3。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过。

第三章

远眺当年华尔街

仅从时间段来看，巴鲁克在华尔街当“学徒”时，华尔街的情况并不好。但等他当上了“熟练工人”以后，一切都变得最合时宜了。巴鲁

克在 A. A. 豪斯曼公司工作初期，发生了著名的 1893 年股市大恐慌，紧接着就是长期的经济大萧条。铁路公司纷纷倒闭，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狂热的人们在货币问题上分成两派。1894 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每个席位仅售 14000 美元，是有史以来的最低价。1893 年，在芝加哥，前往参观“哥伦比亚博览会”的普通游客云集，大批流浪者也被股市的“恐慌风暴”刮到了那里，组织者不得不匆匆搭建起无数个流动厨房。

直到威廉·杰宁斯·布赖恩^①在 1896 年总统选举竞选中失败了，及后来“银色运动”的发起，经济萧条才慢慢结束。随后经济繁荣接踵而至，证券经纪人巴鲁克的脸上始终带着舒心的微笑。1896 年发生了一股企业合并浪潮，1901 年美国钢铁公司以 14 亿美元的总额实现资本化，多出公债 1/3，此时，这股浪潮达到最高点。工业公司、铁路公司纷纷重组，华尔街发行了一大批新的证券。90 年代初期还只是由一些专业人士经营的证券市场，越来越多地大众化了。到世纪之交，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无数人买卖着无数种股票的现象。1899 年，巴鲁克林捷运公司（Brooklyn Rapid Transit Company）电车股票从 61 美元一下跃升到 137 美元，使所有的旁观者和交易员诧舌不已：原来赚钱是那么容易，后人更是称之为“奇迹”。在 90 年代末，40 万股的日交易量就被视为生意不错，到了 1901 年，一个平平常常的营业日就能成交 300 万股，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每个席位售价达到了 8 万美元。用“人人都在赚钱”的话来形容那些日子一点都不过分。

一帮持有钢铁公司股票的百万富翁来到纽约，钱对他们来说，和路边喝醉了的水手们一样，引不起多大的兴趣。唯一能满足他们的游戏就是股票。这帮人中，我们不妨为大家列举几个：约翰·W. 盖茨，大名鼎鼎的“一局百万”，他的一些朋友，如约翰·A. 德雷克、洛亚尔·史密斯

^① 布赖恩，1860-1925，美国国会议员，曾三次竞选总统，均告失败，1913-1915 年任国务卿，主张和平外交，因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严守中立遭反对而辞职——译注。

等；一批持有雷得-李兹-摩尔股票的人，他们卖掉了手中的一部分钢铁股，用赚来的钱在股市又买进了洛克岛系统的大部分股票；还有施瓦伯、弗里克、菲普斯及匹兹堡^①集团；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在一次混乱中赔光又在另一次中大赚的大赌徒们。他们都可能一次就买进或卖出所有的股票。基恩为美国钢铁股票专门开了一个交易市场，在那里没几分钟就有一个经纪人卖出 10 万股。一个疯狂的时代！每次赢利都大得令人惊讶无比。而且，股票交易没有所得税！这种日子真是空前绝后。^②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巴鲁克的故事和华尔街密切相关。在那里发生的一切社会、金融和城市建设变化，在今天看来都合情合理。当初的纽约市是这样的：以纽约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金融中心在布罗德大街和华尔街上，这块马蹄型的地方不大，终日阳光普照。在华尔街北面百老汇大街上的“三一大厦”位于“三一教堂”的正北面，只有 6 层。穿过百老汇大街，矗立着八层楼高的“公平大厦”，而不是今天的 38 层（但在 1951 年这幢大楼却是世界上最高的办公大楼）。市中心的大街上到处都是马车，有四轮马车、双轮马车和有轨电车，另外还有手推车，车夫们都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如果光着头不戴帽或者只穿衬衫不穿外衣就走出门去，会遭到路人的公开嘲笑。在 1904 年修成地铁以前，市中心的主要交通工具是 6 号大街的高架列车。花上 25 美分，高架列车将把你带到中央公园、广场饭店、40 号大街的自来水库、麦氏联合广场、张

^① 匹兹堡，美国宾西法尼亚州西南部城市，是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译注。

^② 盖茨，著名的有刺铁丝经销商、证券投机商、大赌徒，曾组建美国钢铁联合企业之一的美国钢铁钢丝公司。德雷克，盖茨的金融、赛马助理。史密斯，实业家。据巴鲁克回忆，一次在沃尔多夫，4 个人一起玩巴卡拉纸牌游戏，盖茨一气之下要和史密斯和德雷克赌一百万一局，吓得两人脸都涨红了。巴鲁克也在其中，幸好和盖茨打对家（“一局百万”盖茨在这次纸牌游戏中输赢各 50 万——一个心惊肉跳的平手）。

“雷得-李兹-摩尔”中的雷得和摩尔是指丹尼尔.G.雷得和威廉.H.摩尔，两人均拥有国家钢铁公司、美国马口铁公司、美国钢板公司和美国钢圈公司的重要股权。这几个人在上述几家钢铁公司合并成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时大发其财。在大联合之前，威廉.B.李兹是美国马口铁公司的总裁。其他像查尔斯.施瓦伯、亨利.C.弗里克和亨利.菲普斯也都是一些钢铁公司的大老板——原注。

伯斯大街，绕过世界上最陡的铁路，穿过报纸广场、市政厅和老邮局大楼，经过圣保罗教堂墓地、泽西城轮渡，到达学院路。总之，从巴鲁克在 72 号大街附近西端大道 245 号的寓所出发，有大约 40 分钟的路途。巴鲁克当办事员的第一年，即 1891 年，是证券交易清算所（the Stock Exchange Clearing House）成立的前一年，买进或卖出每一张股票都须经过人工接收和传递，即使有时显得多余亦是如此。从这个旧式的股市往东几个街区，码头工人们忙着将停靠在东河岸边海轮上的货物装到马车上。夏天，光屁股的孩子们在福尔顿鱼市码头周围戏水打闹。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路边交易场里，经纪人们经年累月地在露天进行着买卖。

纽约的许多高层建筑物在当时根本不存在，包括现在建在自由大街上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佛罗伦萨分行。1914 年以前，美国还没有任何联邦储备机构，国会不设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有联邦银行存款保险，也没有区别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联邦法律。最主要的是，没有联邦收入所得税，中间只出台过一个规定，但很快于 1895 年被高级法院作废。直到巴鲁克晚年，美国才对金融领域制定了完整的联邦法律体系，而在巴鲁克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却只有很少几个州的政府对此有明文的规定。

90 年代初期，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很轻松愉快，当时的交易大厅和现在一样，兴致勃勃的人们都在一个高台里进行一笔笔买卖。一个由证券所交易人共同选举产生的 40 人管理委员会负责维护公正，防止出现差错。世纪之交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是一个非官方机构，很有点俱乐部的味道。由于未组成公司，因此其律师坚持认为证券所不属公司法约束。其宗旨是提供这样一个市场（正如 1902 年的章程所阐述的）：“……为方便本所交易人进行有关交易提供场所和其他设施；在所有交易人之间维护高标准的商业信誉和正直形象；促进并向大家灌输公正合理的交

易买卖原则”。管理委员们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股价的涨跌由抛售者和买进者自己决定，证券所作为一个机构应对尽可能不干涉该过程。他们提出，任何证券交易和席位购买均自愿进行，不强迫于人，同时打算加入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证券所的章程。^①

尽管股价是完全自由浮动的，但证券所的制度却极其严格。就语言表达而言，要求广告语清晰而明确（1902 年，为适应牛市需要，一句骂人话将处以高达 50 美元的罚金，而以前不过 10 美元）。章程明文规定公司事务第一，个人事务第二。禁止任何交易人与买空卖空的投机商号或野鸡证券交易所进行接触，在那些地方人们手中并没有大把的股票，却仅凭行情涨落对股价打赌。禁止在国内不同证券所之间进行套利（在一个市场买进而几乎同时在另一个市场卖出同一种证券，利用两地的价格差异进行牟利的秘密行为）。实际上，几乎任何可能危害证券所声誉并引起不快的行为都是禁止的。其中对证券所最大的犯罪是破坏每股 12.5 美分的佣金率规定。第一次触犯将被处以最高五年的停职处罚，第二次触犯就遭开除。假象交易，或称“虚抛”，也不允许，但处罚相对较轻，最高可处以停职一年的处罚。受到管理委员会审讯者，在听证会上有权与指控人对质，但无权雇用律师为其辩护。

新世纪到来不久，纽约证券交易所变得不但有钱，而且也更具影响力了。管理委员会委员 W.H. 格兰贝利曾于 1906 年向其他委员指出了这一点。许多年以前他就说，纽约中心铁路公司曾宣布要把该公司的证券办事处从市中心的松树街搬到非商业区的 42 号大街上去，但证券所认为空间距离会给该公司的证券经营业务带来一定的麻烦。康涅狄格. 范德比尔特对这句话掂量了一下后说：“在市中心设立办事处也并没有给纽约中心铁路公司带来多大的方便嘛”。于是该公司果然将办事处搬走

^① 另外还有一项附属规定，任何人加入了证券所，遇有同事过世，都必须按惯例交纳 10 美元的安抚金。如果当事人一家的生活收入全靠过世人在证券市场的工作，则至少可以获得证券所死亡保险基金会提供的 1 万美元安抚金——原注

了。但到了 1904 年，这个办事处的地理位置再次遇到了麻烦，证券所有规定：每个注册公司都应在曼哈顿设立办事处。这一点使铁路公司显得违反了证券所的规定。结果，除了最大的几家公司以外，所有公司，尽管有些不太情愿，都服从了这条规定。一段时间以后，就连曾威胁要退出证券所的美国钢铁公司也让步了。格兰贝利说：“当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地位就超过了一般的公司，我相信今天它的地位一定超过了所有的公司”。

1903 年春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新营业楼落成（至今还在使用）。其占地面积之广足以容纳越来越多的证券商，而且建筑气势宏伟壮观，令每个交易人感到地位大大提高。营业楼的设计者是建筑师乔治·B·波斯特，预计 1902 完工，成本预算 100 万美元。结果工期拖长了一年，成本飞增至约 400 万美元，原因之一是布罗德大街的地下排污系统，之二是难以搬动的大理石底盘，之三是对原设计方案的大量修改。其中有一个修改方案是由建设委员会提出来的，认为交易大厅的电话间应该设在新街的入口处，而非波斯特设计的在布罗德大街入口处。委员会认为，这样的好处一是可以节省五英尺的大厅空间，二是免得电话员给证券所交易人的出入制造不必要的碍手碍脚。波斯特同意了这一修改方案。在早期的设计方案中，证券所曾有过把交易大厅设在二楼，而把一楼出租给银行的想法，但有人指出，大量的人们赶着乘坐电梯可能会造成金融恐慌，于是交易大厅重又置于地面楼层了（当时一位记者这样写道：“其中有两点尤其必需，一是离大街较近，二是交易大厅有宽敞的出口”）。由于 1893 年发生过一名捣乱分子制造的爆炸事件，这次证券所决定大大缩小参观通道的空间。

交易大厅的面积扩大了 60%，但安装了更好的照明和通风设备，底盘重达 776 吨，在布罗德大街上矗立着六根科林斯式柱子，上面是一组大理石雕像，中间的图案象征着团结和正直。为照顾证券所交易人的生

活方便，在营业楼的四楼专门设了一个门诊部，地下室设了澡堂。

1903年4月22日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从周围建筑物的窗子里撒出无数五彩纸屑和纸条。在证券所里面，新的董事会办公室里装饰着象征胜利的棕榈树、各种花卉和美国国旗。上午11点刚过，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主持人J.P. 摩根穿过人群走上讲台。“三一教堂”的大主教摩根·迪克思博士作了祷文“白银归于你，黄金归于你，哦，众神之主啊……”——证券所董事长鲁道夫·开普勒在致辞中将这一建筑物形容为国家命运的一个特写，他说，这是“代表着我们在通往至高境界的前进道路上的许多突出变化之一，创造了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前所未有的进步和繁荣，是对我们深爱的国家的一个祝福”。之后，由一位资格最老的证券所交易人读了贺词，期间得到了三次欢呼，其中尤以摩根的声音最大。

当然，挑剔的批评家不难从这一建筑物上找出若干瑕疵。比如证券买卖操作过程有时显得过于吵闹等等，但总的来说，这一建筑物的优点远远多于缺点，这使得纽约证券交易所显得非常与众不同。至少就建筑角度看，它完全符合人们对它的每一句赞美。

90年代大型工业公司的出现，或曰“托拉斯”^①，对大众来说是一个灾难，但对华尔街来说却是一次天赐的金融良机。起初的十几年里，证券市场上主要以铁路股为主，甚至到了190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领头交易项目还是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业公司股票少而又少。90年代最活跃的工业股是全国绳索公司，这是一家准绳索垄断公司（用老百姓的话讲），其产品用于在1893年股市大恐慌里上吊自杀。公众反托拉斯的情绪越来越高涨，绳索公司的倒闭使老练的华尔街都震动了。绳

^① 托拉斯，企业公司的一种垄断性联合，它是通过把股份转移给一个托拉斯以换取信托证书来进行的。这一制度给予受托管理人以极大的商业和工业权力。根据1890年的谢尔曼的反托拉斯法和随后的法律，这种制度是非法的——译注。

索公司宣布破产第二天，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也从每股 84 美元狠狠跌至 58 美元。在漫长的萧条期，企业合并——几家小公司为发展规模生产并最后达到创办人所希望的垄断效果而进行的联合——现象不断减少。但在“麦金利牛市”期间企业合并重新热了起来，尽管受到谢尔曼法案^①的威慑，但企业合并并发行新的股票是一种更大的刺激。1894 年《华尔街日报》认为在其最重要的 12 只股票中，只有 2 只是工业股：美国炼糖公司和美国西部联合企业。到了 1896 年，这 12 只股票就完全由工业股构成了，包括：美国棉油、美国炼糖、美国烟草、芝加哥汽油、蒸馏 & 养牛、通用电气、莱克利德汽油、全国制铅、北美、田纳西煤铁、美国皮革和美国橡胶。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②于 1896 年 5 月 26 日以 40.94 点创立起，到了同年 8 月 8 日一下子下跌到了 24.48 点，是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但 3 年以后，即 1899 年夏天又上升两倍到了 77 点。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任何一个可能的制造领域都建立了托拉斯。保守的银行家、精明的商人、理论经济学家，都受了规模生产病毒的感染。人们一边在诅咒托拉斯，一边却又忙着购买它们的证券。整个儿一个托拉斯创办人收获的季节”。

其他进行合并的商业领域，包括铜、胶水、干草、钢铁、面粉、针、线、电梯甚至信封。有些合并给了投资者很大的希望，有些则完全失败，再次证明了“生意=风险”的公理。

世纪之交爆发的工业公司合并浪潮，同样在铁路公司之间掀起不小的波澜：在大萧条前，共有五家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公司在抢碗饭；但

^① 约翰·谢尔曼，1823～1900，美国财政专家，1855～1861 年任美国众议员，1861-1877 年任美国参议员，1859-1861 年任众议院税务委员会主席，1867-1877 年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1890 年的反托拉斯法和收购白银法都冠其姓氏——译注。

^② 道琼斯平均指数，综合反映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要挂牌证券价格的加权平均数，由道·琼斯公司计算所得，每小时一次在他们的《华尔街日报》上公布并每日由世界上其他许多报刊报道。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一译道·琼斯工业股平均指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显示纽约证券交易所普通股票价格和收益变动的指数，它根据 30 家最大的美国工业公司的数字编制而得——译注。

20 世纪开始时就只剩下了两家，即受希尔控制的西北铁路公司联合和受哈里曼控制的南方铁路公司联合。到了 1902 年，美国州际商会不再担心破坏性的竞争，转而开始担心行业垄断，所有未被合并幸存下来的铁路公司都开始成为被担心的对象。

新的铁路公司不断战胜原来的铁路公司，象巴鲁克这样的经纪人则一头扎进这一复杂领域，学习哪些证券该买，哪些证券该卖。人们都知道铁路公司在法律和重组的泥潭里陷入得太深，不可能再有什么利润可言了。在这十来年的后期，铁路修筑工程几乎停止，大约 70% 的铁路普通股没有股息。但是，公司重组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到了 1900 年，铁路公司的一些致命特征开始恢复正常，一些在萧条中看到机会的乐观人士也得到了充分的回报。亨利·克雷·弗里克认为，处于这一形势好转过程中的铁路债券，是投资者们的“伦勃朗”^①。

铁路公司的重组给美国金融带来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趋势——长期的利率下跌。19 世纪的后 1/4 个世纪，比如银行存款利率从 6% 下调到了 3.5%。相对利率较高的公司债券价格也因此而上涨。例如芝加哥 & 西北铁路公司债券价格上涨了 7%，即在约 25 年里从 830 美元增值到了 1450 美元。一些低价格债券获得了大约 8.5% 的收益。一些高价格债券也获得了近 3.5% 的收益。90 年代有理由认为利率将会持续下跌，根据债券价格学，长期债券的收益将超过短期债券。那些未能得到按时偿还，只好退而求其次的倒霉的铁路债权人，便要求延长债券到期日，他们的要求通常能够获得同意，作为对他们只能获得较低的年利率的一种安慰。直到 90 年代铁路公司开始重组，美国还很少能看到四十年或更长的债券。现在则变得很常见了，有长达 100 年的瑞丁 & 阿奇逊债券，更有长达 150 年的北部太平洋债券。

^① 伦勃朗，荷兰著名画家，擅长运用明暗对比，此处意指铁路股暗淡期的结束和光明期的到来，也指相对于低投资的高回报——译注。

那个时期的债券市场和之后的情况几乎正好完全相反。世纪之交债券持有人的风险是到期不付——当其投资的铁路公司发生破产时——或者是一些效益丰厚的证券提前偿清，而不是象本世纪 70 年代的那种由通货膨胀造成的一般性破坏。甚至在 90 年代中期，短期债券仍呈利率下跌之势。今天的债券到期日可谓五花八门，但在当时却只有短期贷出货币市场。用行话讲是货币“无弹性”。在庄稼收获季节，资金需求大量增加，但各家银行自己处境困难，却又没有可提供借贷的联邦储备体系^①。同样的，也没有联邦储备来购买国库债券。因此，短期贷出货币价格随着供求关系忽上忽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其利息在股市大恐慌时曾高达 100%甚至更高，但在平稳时期却跌至 1%或 2%。

长期债券市场的走势是美元健康程度的一面镜子。世纪之交的货币价格一路下跌。农产品价格在 1893-1896 年之间下跌了 22%，体现在商品购买力上，货币价值相对上升了。这正好和通胀经济管理法则相反。美国南部和西部掀起了一股购买白银的浪潮。与黄金相比，白银更便宜，但货币金属更丰富，当时人们预测价格将会上涨。在东部却存在着一种反对通胀、支持现有的金本位制^②的情绪。自从 1879 年以来，美元以一盎司 20.67 美元的固定价格兑换黄金。这种金本位制给公众金融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兑换权。1879-1893 年间，只有 3400 万美元的国库中期债券贴换成了黄金。纸币因其使用方便受到欢迎。但到了 1893 年 3、4 月间，公众开始需求黄金本身了。其原因有二，一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它认为在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金属货币同时流通

^① 联邦储备体系，一译联邦准备体系、联邦储备制度，指由 12 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组成美国的中央银行权力机构，由位于华盛顿的强有力的联邦储备局集中控制，现在已变得颇似一个政府部门。所有国民银行、大部分州银行和其他银行都在各自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存入一定数量的储备金，而联邦储备银行则充当银行的银行，发行纸币和硬币，提供贷款，为票据提供贴现，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建议等——译注。

^② 金本位制，一译金本位、黄金本位，是一种货币制度，按此制度，货币的标准单位的价值相当于规定成色的固定分量的黄金，各个金本位制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固定不变，有助于国际贸易。但这种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对付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权力——译注。

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必被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排挤掉；二是国会通过了一项收购白银法案，它要求财政部用纸币收购正在贬值的白银，并用黄金兑换纸币。由此，公众突然大批涌向财政债券。1888 年时的政府黄金储备曾超过 2 亿美元，但 1895 年却急速减至 0.41 亿美元。

尽管 1893 年秋国会又废除了收购白银法案，财政部仍难以控制黄金的流失。不但流出去的黄金越来越多，而且随着大萧条的进一步恶化，收进来的黄金却越来越少。白银动荡无法平息。外国投资商们看到诸多大公司经营管理不善，都惊恐万分，纷纷将美国证券兑换成黄金。1894 年政府两次发行债券恢复财政黄金储备，但没过多久，又发行了大量纸币，超过了先前兑换成黄金的纸币，形成了一个“没完没了的兑换之链”。1895 年政府雇请 J. P. 摩根和奥古斯特·贝尔蒙赴国外收购黄金。1896 年政府又发行了更多的债券，3 年总数达到 3 亿美元（一个巨大的数字：90 年代联邦政府每年的支出不过 3.5 亿美元左右）。1896 年，民主党发起金银复本位运动。曾支持过金本位制的克利夫兰总统遭到了自己的民主党的反对，结果由布赖恩接替总统，当时布赖恩是主要的金银复本位制论者。但布赖恩总统后来又被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击败，使金本位制得以再次保持。

然而在谁也不曾料到的 1/4 个世纪里，通胀论者大发其财。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克朗代克以及南非兰德^①，人们发现了无数个金矿。1896-1900 年全球黄金产量达到了十几年前的两倍之多。钱多了，商品价格和银行利率也开始上涨，公众的担心从通货紧缩开始转为通货膨胀。1900-1910 年，普通商品价格指数平均每年上升 3%，但在 1890-1899 年，这一指数却几乎刚好相反。巴鲁克是黄金的终身信徒，晚年的他引领着美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金本位制。

^① 克朗代克，加拿大西北部育空河支流克朗代克河周围的河谷地区，1896 年发现金矿，引起淘金热。兰德，南非德兰士瓦省南部高地威特沃特斯兰德的简称，是世界最大金矿区——译注。

黄金是一种国际货币，而华尔街则是一个世界性的市场。纽约人时刻注意着黄金的进出、世界农业新闻，尤其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情况。在 1897 年夏天的股市旺季，大约有 300 名英国证券商活跃在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上。大西洋两岸的套利商人加班加点地（在纽约天不亮就起床，在伦敦则一直到深夜）干着，希望在一个市场上低价买进，然后同时在另一个市场上高价卖出。因此，巴鲁克和他的同事们每天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问“伦敦那边怎么样？”

纽约证券交易所是纽约市——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的——第一号市场。除了前文提到过的场外证券交易所以外，在纽约市还有另外一些交易所，包括煤铁交易所、棉花交易所、产品交易所和联合证券&汽油交易所等。在三大证券交易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时间最早，手续费最贵，注册费最高。场外证券交易所的手续费是不固定的，而联合证券&汽油交易所的手续费相当于纽约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每股 12.5 美分的一半。另外，在三大证券交易市场中，也只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所有注册公司将利润、税收和收支情况向公众公布。

世纪之交，公司财务报告很不规范。铁路公司，作为当时主要的投资项目，倒是定期地向公众公布其经营情况，但其他的工业公司就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了。例如美国炼糖公司，它是 90 年代在证券市场上最活跃的公司之一，巴鲁克在其股票上打了自己的第一个漂亮仗，直到 1909 年，这家公司才开始公布自己的利润状况；美国皮革公司的 1900 年年度报告是薄薄的一张纸，上面简单地列了一张收支平衡表。

《华尔街日报》曾在 1899 年对此种现象作了这样的评论：“向公众公布的数字很少，而且所公布的数字难以使人了解其真正的净利润情况，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其实，这些数字也正是那些向竞争对手保密的非常敏感的数字。这样，在一家工业公司的 100 名股东中，有 95 名股东在向公司经理们询问该公司净利润情况时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这

些数字里面都有了，大家自己看吧”。

当时，在法庭上偶尔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知情者”在公开市场买进或抛出某公司股票之前是否必须公布有关情况。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直到 1909 年，在总共 16 个案例中，有 11 次法庭裁定是 NO。这样，尽管提供假情况和“无意的或故意隐瞒的”情况属于非法，但是公司主管们或其他知情者仍然我行我素，以其独有的能了解情况的优势进行证券交易（巴鲁克后来也对这种做法表示了反对意见，但他也经常利用这种优势获得好处）。美国炼糖公司总裁亨利·O·哈弗梅尔尤其在他自己公司的股票上大赚特赚。一位《纽约先驱报》的记者曾于 1897 年这样写道：“华尔街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美国炼糖公司的股票每上浮或下跌一次，都能给哈弗梅尔先生带来足够造一幢摩天大楼的进帐”。

早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之前，纽约证券交易所就采取了一些措施增加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透明度（以降低知情者相对于不知情者的交易优势，尽管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例如 1906 年西尔斯—罗拔克公司提出注册申请时，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该公司向注册委员会提供如下材料：股票经营许可证、公司章程副本、合法企业证书、有公共财务员签名的赢利情况和收支平衡表、证券样张、房地产契（及抵押负担和抵押权，如果有的话）。该公司承诺每年公布公司财务情况，并压缩对本公司股票的风险投机买卖，“……例行的合法交易或回笼收购除外”。就在该公司申请注册那年，一名注册委员会委员对他的同事们说“在不具备如此充分的资料的情况下，任何一次证券交易都将成为一场极端危险的赌博”。^①

在制定公司内部规定方面，如果说纽约证券交易所是自觉的话，那

^① 纽约证券交易所对自己在公开投资状况领域所做的首创工作很感自豪。1901 年在公司新营业大楼的奠基石上，铭文内容还特意包括了注册委员会制定的对新股份公司的要求——原注。

么场外证券交易所则是自发的。而跃跃欲试、急于和纽约证券所一争高下的联合证券交易所尽管也是一家有组织机构，但没有制定任何正式规定。无组织性的场外证券交易所更是没有成文的规定，也没有常设委员会，没有注册手续，也没有屋顶。滋生这些落拓不羁的交易环境的原因有二，一是场外证券交易所交易人的独立自由权，二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关于禁止其交易人在纽约其他证券市场进行交易的规定。不管其他高级证券所对其是多么的难以容忍，场外证券交易所还是相当活跃。无论刮风下雨，都有大批野鸡经纪人聚集在布罗德户外大街上，交易的证券包括美国标准石油、美国气动马颈圈和联合铜业等等。

在繁忙的日子里，这些经纪人们从人行便道一直挤到马路中间。他们是未经加工的钻石，全天候交易商，高兴的时候分发粗大的雪茄，不高兴的时候互相用水枪喷射。根据证券史学家罗伯特·索贝尔的记载，他们常常穿着奇装异服，动作大而有力（他们会用一种手语跟高高地趴在周围大楼办公室窗口的办事员交流传递信息），布罗德大街上的马经常因此而受惊，并把交通搅得一团糟。户外交易标准可想而知是多么的随便。并不是每笔交易都具备正式报告，有的是伪造的。1906 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人威廉·H. 伯格对同事们说他的办公室决不需要场外证券交易所的报价表，“……因为我相信那儿的合法交易不会超过 25%”。这一观点也许太过意气用事，但是曾于 1909 年负责调查纽约证券市场的休斯委员会^①却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该委员会这样形容场外证券交易所：“报价通常是‘虚抛’，助长了证券交易中的欺诈行为^②”。

^① 休斯，全名查尔斯·伊万斯·休斯，1862-1948，美国法学家，1910～1916 年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1921-1925 年任国务卿，支持美国进入国际联盟，1921～1922 年担任华盛顿裁军会议主席，1930-1941 年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译注。

^② 纽约证券交易所对场外证券交易所的蔑视，正如许多改革家对高级证券所的蔑视一样。负责调查所谓的货币托管组织一案的普乔委员会于 1913 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换句话说，纽约证券交易所很大程度地为道德伦丧和经济腐败提供了条件；不难想象，全国组织、经营类似的其他机构也同样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原注。

纽约证券交易所遇到的另一个中的竞争麻烦是投机商号，也即野鸡证券交易所，其中的经纪人利用股价的短期涨落进行诈骗渔利。他们手中并不掌握着实际的证券，这正符合纽约证券交易所对赌博的定义。更过分的是，投机商号还盗窃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报价单，并抢夺交易人的佣金，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不能容忍的。但是，打击投机商号的法律行动非常之少，野鸡所越来越猖狂。1905 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听说，匹兹堡竟有 60 个这种非法的秘密窝穴活跃着野鸡交易。在米尔沃基，更有该市的一些大银行家也成了野鸡所的主顾。

在世纪之交，纽约证券交易所反对赌博行为，但默认一定程度的价格操纵行为。而现在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它作为此类行为的仲裁机构，却刚好相反，默认赌博行为而禁止人为操纵：风险投资人可以在不同市场对股票价格下注，但不允许对价格有任何秘密勾当。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区别这两种行为的标准微妙而敏感。它禁止虚假交易，即所谓的“虚抛”，但它允许另外一种人为操纵，叫“虚买虚抛指令”(matched orders)，即委托一名经纪人在证券市场上收进某种证券，同时又委托另外一名经纪人抛售等量的同一证券，目的是制造市场兴旺的假象，以诱骗公众。对证券所的管理层而言，这种行为有一定的好处，即无论收进还是抛售，证券都能收取佣金。而且，操纵者也必须冒一定的风险，因为交易规则禁止他告诉其经纪人他们在进行着相反的交易，这样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即经纪人A以高价收进某种股票，而经纪人B却以低价抛出该种股票，从而使操纵者遭受损失。但是市场无法判断投机卖空^①，因此在经纪人的单独操作或集体操作下，股价就有可能被人为大幅压低或抬高。而买进或抛出这两种市场行为均只需交纳区区 10%的保证金。

^① 卖空，指尚未买进某种证券即行预售期货约定将来交货。在此种行为中，卖方允诺按某一商定的价格，在将来某个规定的日子交给买方一种证券，但他当时并不据有该种证券，而寄希望于交货期以前能以较低的价格买进再交货——译注。

哈里·康坦特是一名深受巴鲁克欣赏的证券交易与操作天才，他很有教养，说话柔和，1905年，他曾用一个营业日就一举吃进了全国铝业公司的控股权，而又使股价未发生过度骚乱。当时，全国铝业公司是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的组成部分。1899年秋天，有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里目击了康坦特的交易技巧，他这样描写道：

我站在〔巴鲁克林捷运公司〕交易人群里，近距离观察到了经纪人将该种股票的价格压下来的各种技巧。如果谁想见识一下专业的操纵技巧，那么这就是最好的时候。当时该股买进报价^①83.5美元。经纪人康坦特先生突然接到了一条信息，使他紧张地忙乱了约十分钟时间。在卖出报价低于买进报价意愿之前，根本没有人有时间进行报价。随后经纪人不断地将该股票抛售给任何有意买进的人，他显然想在股市收盘前的有限时间里尽可能地压低股价。其实股市价格回升得很快，本可能以相当强劲的势头收盘，并在第二天早上的报纸出现几篇“股市坚挺”的文章。但是当空头党发现了这种状况时，自然会设法阻止，并因此将所有阻止行情上涨、避免强势收盘的专业技巧都用上了。

许多年以后，当公众对华尔街的怀疑程度越来越大，举行了第一次对证券市场进行联邦调查的货币托管组织听证会，其中康坦特是召传唤的经纪人之一。当被问及有关操纵技巧时，这位魔术师（一位客户还称其为“无声的闪电”）温和地回答说：“据本人所了解的情况，实在不知道有什么技巧”。

在任何情况下，操纵市场比投机行为更易招受道德的谴责。没有哪个交易商比詹姆斯·R·基恩于80年代中期在轧空^②小麦市场的失败企图中损失得更惨了。康坦特自己也于1901年在轧空北太平洋公司股票中

^① 报价，买主在特定时间对某种证券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译注。

^② 轧空，通过在市场上全部买进某种证券或股票，来提高其价格的做法——译注。

遭破产出局。杰伊·古尔德，这位几近完美的镀金时代的铁路大财主，据其自传所述，也在股票交易中失败了。

还有一次堪称最离奇古怪的操纵失败案，起源于一本小说《——13号星期五》，作者托马斯·W. 劳逊，1907 年出版。该小说描写了一个通过大批卖空股票成功压低市场的故事。劳逊把这个凭空想象的故事写得足以乱真，并宣称在现实股市中，这就是一个绝对可靠的杀手锏。小说的描写和作者的保证给费城一位名叫阿尔伯特·E. 艾佩雅的经纪人、同时又是个遭人咒骂的失败的银行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07 年 6 月 12 日，艾佩雅想模仿小说中的做法，一下卖空了几千股，结果并没有发生什么书中描写的股市崩溃，倒是他自己的钱袋彻底崩溃了。《纽约时报》14 日在费城报道：“艾佩雅失踪了，但估计他不会去波士顿领取劳逊的奖金，尽管劳逊曾许诺，有谁证明书中的经验不灵，就可以领取奖金 5000 美元，也尽管艾佩雅在此留给大家的证据是多么的明显而令人信服”。

这就是伯纳德·巴鲁克图谋发迹的环境——当年的华尔街。

第四章

巴鲁克时代——序曲

1898 年美西冲突骤起，此时的巴鲁克和安妮刚刚结婚 6 个月，正处于新婚燕尔、如胶似漆的甜蜜阶段。况且，他的左耳听力不是很好，不适合上战场。此外，A. A. 豪斯曼公司的生意以及自己年迈的母亲（巴鲁克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孝子，每次见到母亲时，他总是张开双臂，亲热

地将母亲揽入怀中。即使对不苟言笑的父亲，巴鲁克也会在他的额头正中间庄重地吻上一下，以示他的尊敬）都还需要他的关照。所以，虽然他口上终日“报效祖国”，但实际上并不真的希望自己有参战争的机会。无论如何，我们的主人公最终选择了华尔街，而不是战场。

1898 年的美国，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还算不错——春季，战争阴云日渐浓密，股票市场有所降温。但是到了夏季，前线传来了打胜仗的消息后，股票价格又一路回升——豪斯曼公司及其主要合伙人大大松了一口气。27 岁的巴鲁克此时是一名股票经纪人，或称为“投资代理人”。固然此时的他既非腰缠万贯的富翁，也非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投资专家，但他的老板阿瑟·豪斯曼却已经被《纽约时报》称为“受到最知名、投资实力最强的百万富翁们认可的最佳代理人，在（1897 年的）股票投资交易中显示了很强的影响力”。与此赞誉恰好同时出现的是，豪斯曼公司刚刚公布了公司新一年的财政规划文本，这一文本又正好被英国最著名的《泰晤士报》选中，与铁路建造商詹姆斯·J. 希尔^①和投资银行家雅各布·H. 席夫这样的商业巨擎的评论文章同期刊出。豪斯曼和《纽约时报》财经版编辑亨利·阿罗威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一点，无意中推动了巴鲁克的事业发展，并为他后来赢得办事果断的美誉。在华盛顿正式宣布美国海军于 7 月 3 日这一天在圣地亚哥取得了美西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之前，阿罗威适时地把这一消息透露给了豪斯曼。豪斯曼赶紧又给当时正在新泽西州朗布兰奇陪妻子和家人共度周末的巴鲁克通了电话。两人一致认为，这一胜利意味着，战争即将结束，美国的金融市场将随之快速反弹，甚至有可能出现强劲势头。第二天是 7 月 4 日国庆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按照惯例将停业一天，但是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应该和往常一样正常营业。此时如果在伦敦低价购进股票，然后在纽约高价抛出，中间的差额利润将是可观的。可难题是，巴鲁克如何在第

^① 詹姆斯·杰罗姆·希尔，1839～1916，美国金融家和铁路建筑家，1893～1907 年任圣保罗铁路公司总经理，1907～1912 年任该公司董事长、北方证券公司总经理——译注。

二天伦敦证券交易所敲钟开盘之前，赶到位于纽约的办公室？由于时差，伦敦证券交易所开盘时，纽约才刚凌晨 5 点钟。

国庆日前一天已没有到纽约的火车，巴鲁克只好租了一列专车。该车仅包括一个火车头、一节供给车厢和卧铺车厢。专列于 7 月 4 日凌晨 2 点到达朗布兰奇火车站。他最小的弟弟、豪斯曼公司雇员西林·巴鲁克，阿瑟·豪斯曼的弟弟克勒伦斯·豪斯曼，以及巴鲁克一共三位男士一前一后上了火车。火车一路狂奔向纽约驶去，巴鲁克的思想野马跟着纵横驰骋。他想的是美国作为一个老殖民地是怎样依靠不断的积累而创造了现在的巨大财富，想到明天的证券股票市场将是怎样的牛气冲天，而自己将是其中的一员！太让人兴奋了！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只除了一件——他忘了带上办公室门的钥匙！此时他还不知道。

在国庆日的第一缕曙光出现在天边之前，载着巴鲁克一行的专列终于停靠在哈德森河畔的杰西港岸边。三位经纪人睡眼惺松地走下专列，乘上了一艘开往曼哈顿的小船，下船后一路小跑到了金融街。此时的巴鲁克林街区已经开始响起了国庆节的鞭炮声，黎明来临前的市区温度很低，让人感到丝丝凉意。

走到公司门口，三位男士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巴鲁克这才突然想起自己忘了带钥匙，几个人急得围着屋门乱转，忽然不知谁注意到了屋顶的天窗。于是三人中体重最轻的西林踩着哥哥的肩膀，从天窗爬进去，打开了房门。巴鲁克赶紧冲进办公室、打开发报机，向伦敦发出大量买进股票的电传。很快，豪斯曼本人也亲自赶来了，用手摇电话机把这一消息通知给仍在梦乡里的客户。巴鲁克隐约听到豪斯曼大声地向他们通报，声音充满了牛市气息，“美国打了大胜仗……新市场兴起……简直可以和英国的股市相媲美……近年来最空前的股市繁荣景象！”随着豪斯曼的一个个电话，购买股票的订单开始像雪片般飞来。

第二天，纽约股市开盘较高，但在中午前有所回落。在欧洲，即使是在战败国西班牙，多数人们仍然相信和平将带来好运，因此许多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也纷纷出现上扬趋势。A. A. 豪斯曼公司在星期二上午已开始赢利，虽然它并非国庆节这天从伦敦购进大量股票的唯一一家公司，但毕竟这一举动显示了该公司极强的预见性和有勇有谋的一面。^①

巴鲁克第一天到华尔街任职时，认为 6000 美元的年薪是绰绰有余的，足以支付一切开销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巴鲁克的视野逐渐开阔，他开始觉得即使拥有 100 万美元的年薪也不过如此。根据现有资料，从 1897-1900 年大约 3 年的时间里，巴鲁克的个人资产上升到了 100 万美元，而他刚入行时不过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小子！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他就赚得了上百万美元的资产，这真是一个奇迹。而与此可以相提并论的是，为获得这些财富，巴鲁克表现出了他不拘一格的投资手段。如今在华尔街比拚的投资者，几乎每个人都是某一领域的高手，或是经纪专家，或是风险投资家，或是场内交易人、投资银行家，而巴鲁克却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将所有这些角色集于一身。

最能代表巴鲁克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赚钱风格的一件事，发生在 1898-1899 年间，当时他参与了购买利吉特 & 梅尔斯烟草公司这桩生意。这次交易始于一位来自安纳波利斯市的哈兹尔丁来豪斯曼公司的访问。哈兹尔丁在美西战争爆发之前曾从美国海军退役开始经商，但战争爆发之后又再次应征入伍，同年秋天，他又脱下军装重新开始打理自己的生意。这一次，哈兹尔丁带着重要的内部消息前来拜访豪斯曼。他告诉豪斯曼说，他发现联盟烟草公司有收购利吉特 & 梅尔斯烟草公司的意图，而他本人又正好与利吉特 & 梅尔斯烟草公司的高层人士有一些私交，能够为联盟烟草公司的购并计划助上一臂之力。

^① 《纽约时报》对于巴鲁克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还特地进行了未点名的赞扬，该报在 7 月 5 日的一篇报道中称：“值得称道的是，豪斯曼公司一位当时正在朗布兰奇度假的交易人奉命赶回纽约，他在凌晨 2 点租了一辆火车及时到达办公室向国外发送电报，该公司于 7 月 4 日这天总共购买了 25000 股股票”——原注。

联盟烟草公司之所以对利吉特&梅尔斯烟草公司如此感兴趣，一个主要原因是，利吉特&梅尔斯烟草公司属于为数不多的美洲烟草公司管辖范围之外的大型烟草公司。美洲烟草公司很多年来一直占据着烟草业的头把交椅，该公司的营销范围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烟草市场以及大部分的咀嚼烟条销售市场。当时正是托拉斯企业最为盛行的时期，美洲烟草公司的总裁詹姆斯.B. 杜克一心想使自己的公司垄断整个烟草业。而一些知名的大财主和从美洲烟草公司跳槽出来的威廉. 巴特勒却鼎力支持联盟烟草公司，以打破杜克的垄断美梦。为此，两家公司同时把购并目光集中到了利吉特&梅尔斯烟草公司身上。

尽管美洲烟草公司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但其公共关系却并不理想。一些新组建的烟草公司以及它的老竞争对手对它又恨又怕。就连美洲烟草公司的客户也对该公司的一些做法很反感，但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再加上美洲烟草公司为了取得竞争优势，曾经率先打出了降低销售价格的招牌，所以很多客户也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对杜克而言，降价确实使他的公司损失不小，但这一代价换来了另一方面的成功，即美洲烟草公司生产的咀嚼烟条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渐渐超过了利吉特&梅尔斯公司的产品，从而为它最终的购并计划垫定了基础。到 1898 年年底，就在美洲烟草公司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取得这场兼并战的胜利之时，联盟烟草公司突然插进一杠，决心使利吉特&梅尔斯公司成为自己麾下的一个分公司。

事实上，在此之前，联盟烟草公司已于 1898 年秋季通过卖空交易分别收购了三家主要的烟草公司中的两家，可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即利吉特&梅尔斯公司，却一直没有收购成功。于是，豪斯曼、巴鲁克和哈兹尔丁三人达成协议，集中现有财力、运用一切手段，共同完成这项购并计划。

对于巴鲁克而言，由于他年纪尚轻，缺乏合股金融业务的理论和经

验，因而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大的努力。此外，巴鲁克对利吉特&梅尔斯公司生产的主打产品——咀嚼烟条感到恶心，这一点也不利于他全身心地投入。但另一方面，巴鲁克也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有利条件。首先，他个人能力很强；其次，他已经从哈兹尔丁那里了解到了很多相关信息，况且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后者作后盾。于是，他着手进行了第一项工作，即与联盟烟草公司的一位主要股东托马斯·福特恩·瑞恩以及联盟烟草公司总裁威廉·巴特勒的弟弟乔治·巴特勒进行会谈，以探听两人的口风。经过正式会谈，巴鲁克写道：“他们两人一开始都非常谨慎，不过我还是感觉到了，联盟烟草公司确实有购并利吉特&梅尔斯公司的意愿，哈兹尔丁的推测是正确的。而且，因为有哈兹尔丁提供的内幕消息，我最终使他们相信了我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助他们一臂之力”。不久，瑞恩邀请巴鲁克和一位名叫威廉·H. 佩齐的律师前往圣路易斯市，帮助联盟烟草公司谈判收购利吉特&梅尔斯公司的协议。于是，巴鲁克吻别安妮，乘上了西去的列车。

到达圣路易斯后，巴鲁克发现整个谈判气氛对联盟烟草公司十分有利。只有一位股东称他有意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杜克，而利吉特&梅尔斯公司的总裁莫西斯·威特莫上校对于托拉斯企业非常反感，早就发誓坚决不同意杜克收购自己的公司。更重要的是，威特莫总裁与其他一些股份继承人以及公司管理人员所拥有的公司股份显然占了半数以上。联盟烟草公司的意见主要由乔治·巴特勒进行陈述，而他又正好是威特莫总裁的一位老朋友（这一点确实是巴鲁克没有预料到的，而哈兹尔丁肯定对此早有了解，这让巴鲁克不禁有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除了参与谈判之外，巴鲁克和哈兹尔丁还肩负着与利吉特&梅尔斯公司的股东们建立良好个人关系的重任。经过几个星期的友好相处，以及充分运用南方商人天生的低调推销战术，巴鲁克又被瑞恩召回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瑞恩给巴鲁克的任务是通过卖空操作使美洲烟草公司控制的托拉斯在股市上跌价。其中，首选打击目标就是美洲烟草公司本身。但是，由于每位卖空者必须早晚在某一时间购买这些股票，以弥补卖空交易造成的股票亏空，而美洲烟草公司当时在市场上的流动股份很少，所以瑞恩最终选择了美洲烟草公司的分公司、在场外证券交易所进行室外交易的大陆烟草公司作为这次行动的打击目标。巴鲁克的任务就是使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下滑，直到该公司的管理和运作不能正常维持为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瑞恩给巴鲁克提供了 20 万美元的流动资金。

1899 年 1 月，天气异常寒冷，巴鲁克在列威诺和托贝两位场内经纪人的帮助下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他采取的战术是在大陆公司股票坚挺时售出，在其疲软时购进；在股票价格攀升时空头卖出，然后在股票价格下滑时购进先前售出的股份，以弥补股票数量的不足。每天早上，巴鲁克与已经怀上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安妮匆匆道别后，就赶紧来到瑞恩位于纽约西 72 号大街的住所，向他进行情况汇报。巴鲁克发现这里的大街上总有许多小男孩在一起玩耍。瑞恩每天都在他的起居室里接待巴鲁克，而且总是一边刮脸一边倾听。当月，大陆烟草公司的股票价格从每股 43 美元降到每股 37 美元。2 月 18 日，股票价格创下最低纪录 30.5 美元。虽然大陆公司股票下滑的主要原因被归因于烟草业的激烈竞争，但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股票下滑的幅度远远超过母公司美洲烟草公司。一天，就在大陆烟草公司受到最惨重的一次打击之后，瑞恩要求巴鲁克告诉他为达到这一目的，巴鲁克花去了多少资金。出乎他的意料，巴鲁克告诉瑞恩说他的 20 万美元不仅一分未少，反而通过不停地买卖已有所增加。听到这一消息，万分欣赏的瑞恩装作非常严肃地说：“我只要你把美洲烟草公司的那帮家伙激怒，可没有让你置他们于死地呀”。

与此同时，纽约和圣路易斯的报纸都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灵通人士的话称，联盟烟草公司与美洲烟草公司之间的竞争简直就是一

场闹剧。一些人指出，虽然威特莫总裁拒绝将利吉特&梅尔斯公司出售给美洲烟草公司，但如果有另外一家公司能使他相信该公司反对建立托拉斯集团企业，那么威特莫总裁很有可能会同意与这家公司合并。基于这一原因，联盟烟草公司才在事先通知美洲烟草公司的前提下收购利吉特&梅尔斯公司。等到购并计划实现之后，美洲和联盟两家烟草公司将会最终达成妥协。这一猜测最终在 2 月份得到了证实（不过巴鲁克和杜克的传记作家都对于这一传言持怀疑态度）。不管怎样，随着利吉特&梅尔斯公司收购战尘埃落定，美洲烟草公司和大陆烟草公司的股票价格出现了回升。

等到与瑞恩开始商谈 A. A. 豪斯曼公司应该从这一交易中得到多少报酬的问题时，巴鲁克尽力使瑞恩的律师为豪斯曼公司说好话。他提出如果威廉·佩奇能够说服瑞恩给予豪斯曼公司尽可能多的劳务费，那么他将答应支付佩奇 1 万美元的好处费。尽管对于巴鲁克做出这一承诺有些惊讶，佩奇还是允诺将尽力而为。但是，作为瑞恩的律师，他也说自己不能在违背客户利益的情况下私自获取好处。最终，豪斯曼公司获得了 15 万美元的劳务费。巴鲁克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时称，考虑到瑞恩从这笔交易中赚得的收益 15 万美元的劳务费“简直是九牛一毛，对瑞恩根本不算什么”。但是，由于豪斯曼公司只是参与了这笔交易的谈判过程，所以只能是瑞恩愿意给多少就拿多少，否则一分钱都进不了帐。得到这笔劳务费后，豪斯曼公司 1899 年的收入上升到了 50.1 万美元。巴鲁克在公司中的股份占到将近 1/3，总额为 16.7 万美元。这一数额比起当初被巴鲁克视为一大笔财富的 6000 美元来说，整整多了 16.1 万美元。正是应了华尔街盛行的“赚钱容易守钱难”这句话，腰包渐鼓的巴鲁克很快又失去了辛苦赚来的财富。致使巴鲁克的财富在顷刻间损失殆尽的罪魁祸首，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威士忌生产公司——美洲酿酒公司。该公司的普通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转手买卖的频率一般不高，因而股票

价格浮动不大。1898 年，美洲酿酒公司的股票最高时售价 15.375 美元，最低为 6.5 美元。1898 年春天，当巴鲁克将他所有的存款都用于购买美洲酿酒公司的股票时，买进价为每股 10 美元。

当时，一直有传言说应该买进美洲酿酒公司的股票。6 月初，新闻媒体还对此进行了报道，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圈内人士对于威士忌生产行业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后来又有人传言说美洲酿酒公司的股票之所以行情看好，主要是因为包括美洲酿酒公司在内的 4 家主要酿酒公司正在酝酿合并计划，以组建一个威士忌生产托拉斯。不出所料，6 月底，上述几家公司就正式宣布了准备组建托拉斯的计划。

在世纪之交，“托拉斯”这一经营和管理理念对于当时投资者的诱惑力简直可以与 90 多年后“因特网”对世人产生的影响力相提并论。华尔街当时的看法是，威士忌制造公司的合并对每个人都有利可图，尤其是对美洲酿酒公司进行投资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正是考虑到这一原因，以及另外一个因素，巴鲁克才大量购进美洲酿酒公司的股票。这后一个因素就是瑞恩本人也购买了美洲酿酒公司的股票，虽然巴鲁克没能亲耳听瑞恩本人谈起过，但至少他听一位自称与瑞恩关系非同一般的消息灵通人士是这么说的。这一说法的确是有根据的，因为据报道，“威特尼辛迪加”也参与了酿酒公司的合并事宜。威廉.C.威特尼可是华尔街上最有头有脸的人物之一，他在纽约第五大道上拥有的豪华私人别墅曾经让巴鲁克的母亲赞叹不已，巴鲁克夫人对儿子说：“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你也能住进那样一所房子里”。现在，联盟烟草公司收购利吉特&梅尔斯公司的行动已经大功告成，巴鲁克开始雄心勃勃地制定自己的投资计划，这就是，将赚来的所有资本都用来购买美洲酿酒公司的股票。

巴鲁克这次投资行动的结果可以用两个数字来概括。6 月 13 日时

的股票价格还是 10.25 美元，但到了 6 月 29 日，股票价格就已经下跌到了 6.25 美元。对此，巴鲁克称这是他从事投资活动以来所遇到过的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最大的一次跌幅。当他向妻子安妮讲述自己这次投资的详细情况时，巴鲁克不得不告诉妻子，为了弥补这次投资的损失，他们必须缩减生活开支，其中一项就是可能要卖掉家里的带蓬马车。这部马车是巴鲁克送给安妮的礼物，车上安装有当时最流行的平板玻璃，而且还特意雇用了车夫和仆人以照顾安妮乘车出行，因为当时安妮已经怀有 7 个多月的身孕。

我用略带胆怯的声调（巴鲁克后来写道）向瑞恩讲述了自己那次投资失败的原因。

瑞恩问道：“我告诉你买进美洲酿酒公司的股票了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就这件事向他打听过任何内幕消息，我坦陈自己是在听到了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士的话才做出这一决定的（巴鲁克说，瑞恩的这位密友是他在利吉特 & 梅尔斯公司收购行动中经瑞恩介绍认识的）。

瑞恩听完我的话后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以后千万不要盲目听信一些有关我向他人讲述了些什么话的传言，因为很多向我打听内幕消息的人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得知真相。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你例外”。

在准备投资美洲酿酒公司之前，巴鲁克没有仔细了解的信息还包括，该公司的大多数管理人员都非常刁钻滑头，用基恩的话说，“他们把自己的小算盘拨得精到家了！”

在酿酒业股市低迷的情况下亏损大笔资金的确令人感到非常遗憾。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巴鲁克的大多数朋友因为投资都赚了大钱（阿瑟·豪斯曼那时刚刚乘豪华汽车到美国西部进行了一次一万多英里的汽车旅行。他回来时告诉巴鲁克说沿途各地政局稳定，到处

都是发财的机会，老百姓的粮仓都满满的，尤其是铁路建设非常兴旺。阿瑟甚至说：“这次旅行让我对美国的铁路运输业和工业发展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浓厚兴趣，我准备在证券市场上大力投资这两个行业……”），巴鲁克不禁有几分着急，他不甘心自己在酿酒业的投资就这样白白损失掉，于是他再次冒着风险，卖掉了自己手中正在攀升的其他股票，想通过增加对美洲酿酒公司的投资来挽回败局。不幸的是，事与愿违，巴鲁克的这一做法导致他越陷越深，损失也越来越大。最终，巴鲁克下定决心宁可赔本也要抽身，但他在这次投资中的表现已经让安妮大失所望，就连他本人也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而此时距离巴鲁克成功促成联盟烟草公司购并行动的时间只相隔短短几个星期。

值得庆幸的是，巴鲁克在痛苦的深渊里没有挣扎多久，就重新看到了一线生机。5月份，就在他还在投资威士忌酿酒业的计划中一筹莫展时，华尔街一位颇具实力的知名人物、前纽约州州长罗斯威尔·帕蒂伯恩·弗劳尔突然去世。弗劳尔是倡导股市行为的先驱。1898年年初，当那些鼓吹股票市场不会长久繁荣的人占据社会主流时，弗劳尔就公开宣称自己主张建立一个能够持续兴盛的股票市场。一年之后，弗劳尔又说：“我对美国的股票市场充满信心，我本人就是这些股票的持有人，因为我坚信美国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由于他提出了这些旗帜鲜明的观点，在一段时间内，弗劳尔受到了包括拉塞尔·塞奇在内的一些持相反意见的巨富的排挤和嘲笑。但是，股票市场的变化最终证明弗劳尔的观点是正确的。后来，弗劳尔的影响日渐增强，以致于在他事业的最鼎盛时期，仅凭他一句话，美国的股票市场就会出现转机。在这期间，由弗劳尔亲自出面促成的一件典型事例，就是他鼓动公众购买美国当时规模最大的拖车制造公司、巴鲁克林捷运公司的股票，从而大大加快了该公司的发展。1897年，当该公司的股票还是每股20美元时，弗劳尔号召纽约州的普通民众投资该公司，以实现使其股票价格上升至每股75美

元的目标。当巴鲁克林捷运公司的股票上升至每股 50 美元时，弗劳尔甚至大胆地预测该公司的股票价格还会继续上升，有可能达到 125 美元。由于弗劳尔本人亲自到这家公司实地考察，帮助其提高管理效率，再加上曼哈顿和科尼岛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当年春天，巴鲁克林捷运公司的股票就真的如弗劳尔所言，飙升至 125 美元的惊人价格。

弗劳尔出生于纽约州北部，在农村的小学校里接受的教育，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住在乡下，因此，在他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弗劳尔非常平易近人，经常和来自农村的纽约州民众谈天说地，而且还会不时地蹦出诸如“杀虫剂”或“施肥”等农民经常使用的字眼，谈到每年的农事也是一板一眼，毫无虚假做作之态，因此他在民众中享有相当的声望。弗劳尔任总裁的公司华尔街上也称得上是一家领军企业，但弗劳尔本人却总是一幅普通市民模样，没有一点儿银行家的架子。他很少修饰自己的外表，就连刮脸也是能省就省，爱好之一就是喜欢咀嚼烟条，教训下属时他的左脸也经常是被烟条撑得一鼓一鼓的，再加上他态度一向和蔼，所以作为公司老板，弗劳尔颇受拥戴。作家亨利·克鲁斯曾经写道：“这位前州长倡导美国精神，旨在树立美国民众对国家未来的信心。他让每位美国人都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在不冒任何风险的情况下投资股市”。

1899 年 5 月 11 日是一个星期四，这天晚上，弗劳尔到位于长岛东港的一家乡村俱乐部参加钓鱼活动，他想趁这个周末好好轻松一下。谁知，星期五早上刚一起床，他就对人说自己的胃不太舒服，好象有点消化不良，当天晚上，弗劳尔就死于心脏病突发。弗劳尔的突然去世使得好几个受到这位前州长关照和帮助的“弗劳尔赞助公司”就象失去了父母的孤儿一样一下子变得无依无靠，这其中包括 BRT、大众燃气、联邦钢材、罗克岛铁路和纽约空气制动器公司。星期六，也就是弗劳尔去世的第二天，股票市场就开始狂泻不止。直到经过包括摩根、基恩、戴瑞

斯·米尔斯以及洛克菲勒在内的一些大公司的共同努力，才在两天后制止了股市的进一步下滑。其中，已经下跌至每股 100 美元的 BRT 股票又回升到了 115 美元。

当年夏季，股票市场暂时回稳，但 BRT 公司却遇到了一些麻烦。在奥尔巴尼，有人传言说政府将征收一项新的市内有轨电车特许税，而纽约市也将出台一部规定有轨电车必须将地上电缆全部埋入地下的法律。BRT 公司于 8 月底出版的年度报告显示赢利额有所下降，而且该公司头一次在年度报告中没有公布财政收支平衡表。于是，BRT 公司的股票价格又开始下滑。由于公司股票在弗劳尔去世后的一跌一升中，巴鲁克曾经获利不少，因此这次他准备借着该公司股票下滑的机会再赚一笔。9 月初，公司的股票再次跌至每股 100 美元，这一价格已是该公司所能允许的最低限额，如果继续下跌，BRT 很快就将破产。巴鲁克后来写道：“为了不使 BRT 濒临破产，当 I&S·沃姆瑟公司合伙人之一的儿子、喜欢体育运动的艾利·沃姆瑟提出以 100 美元的价格购买 2000 到 3000 股时，我当时脑子一转，觉得这笔交易值得一做，于是就答应如数卖给他”。但是，实际上巴鲁克手头根本没有这么多股票，他是在卖空，而缺少的那部分股票他必须向其他人去借，然后等自己以更低的价格买进之后再偿还借来的股票。

巴鲁克这次选择卖空的时机可谓恰到好处。9 月 5 日，就在他卖出股票的当天，铁路和工业股票的平均股价突然爆跌。而且，基恩、哈里·康坦特和朱尔斯·S·巴奇等经纪人还组成联盟，一致决定出售 BRT 公司的股票。据说这么做的原因是出于预测到有人要通过轧空头的方式来挤垮他们。而仅仅 3 个月前，因为投资不利惨遭失败的巴鲁克，这次也大胆地做出了出售 BRT 公司股票的决定。很快，他就在这笔交易中赚到了 6 万美元，自信心也因此而有所恢复。^①

^① 等到年底时，BRT 公司的股票已跌至每股 60 美元。12 月份，该公司悬赏 25000 美元请知

巴鲁克 70 多岁时，有一天他邀请加拿大著名摄影师约瑟夫·卡什为他拍照，卡什当时刚刚为英国的伊丽莎白公主拍完照。在拍摄过程中，卡什顺便说起伊丽莎白公主是如何如何的美艳绝伦和富有魅力。巴鲁克听后笑了笑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懂得每位贵族和富豪都是光芒四射，魅力无穷。我自我感觉就要比 20 岁多岁时更有魅力得多”。事实上，即使是在 28-30 之间这短短的几年间，巴鲁克的人格魅力就已经开始随着他的阅历一年胜过一年，而且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对于 19 世纪末这几年间的经历，巴鲁克曾深有感触地说：“数不清的财富接踵而来，简直让我应接不暇”。巴鲁克和他的父亲一样，性格达观开朗，遇事从来不慌不忙。巴鲁克一家人之间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因此，他和安妮两人的第一个孩子贝勒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而且是由他的父亲在他的避暑小农庄里亲自接的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巴鲁克直到快 30 岁、自己也即将为人父时才离开父母位于纽约西 70 号大街上的住所另立门户。而他的三个兄弟在巴鲁克搬走时仍与父母同居一屋）。很多年来，巴鲁克医生一直担心自己年龄越来越大，有一天会连病人家的楼梯都上不去，会被那些年轻医生夺走饭碗。为了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巴鲁克于 1900 年 7 月父亲过 60 岁生日那天，将一笔价值 75000 美元的退休养老金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父亲，这才打消了老人对于退休后没钱养活自己的担忧。据巴鲁克称，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自己赚来的钱为父亲做点事情。

此时的巴鲁克确实魅力非凡，而且在华尔街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不时有人向他提出有关股票投资的种种建议。1901 年 4 月底，一位名为哈利·威尔的股票经纪人登门拜访巴鲁克，请他考虑购买自己新成立的一家名为联合香烟的零售连锁店的股份。威尔介绍了连锁店现有的经营规模，并提出了相当可观的收购价。巴鲁克打电话给瑞恩，请他

情人提供信息，以便找到和处罚那些故意散布有关该公司的谣言和误导性消息，致使该公司的股票一路狂泻的人。——原注

考虑这一建议。但是，瑞恩认为这笔交易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经济效益，于是巴鲁克只得以瑞恩不感兴趣为由婉言谢绝（事实证明，瑞恩的观点并不正确。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在 1901 年底，瑞恩任董事的美洲烟草公司最终购买了联合香烟连锁店的大部分股份，在短短 5 年时间里，这家连锁店开设了 150 多家分店，瑞恩倒也因此沾了光）。

威尔这次还顺便提起他正好还持有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的 5000 股股票。巴鲁克知道这家公司的股票 1895 年时是每股 2.5 美元，1898 年便已是每股 19 美元了，但他还是认为威尔提出的每股 100 美元的出手价有些过高。尽管如此，为保险起见，巴鲁克还是给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查理斯·S·梅伦打了个电话，向他咨询权威意见。梅伦不仅对巴鲁克的观点表示赞同，而且还准备卖掉自己持有的北方太平洋公司的 2500 股。这样，当巴鲁克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威尔后，威尔对手中股票的信心开始下降，最后赶紧以每股 102 美元的价格仓促地出了手。但是，就在威尔售出股票后的两个星期之内，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票突然飙升至每股 1000 美元，这一涨幅堪称股票交易历史上最惊人的一次升盘了。根据威尔事后的计算结果，由于巴鲁克提供了错误的信息，他总共损失了 250 万美元的收入。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预测股票市场的走势很容易出差错。华尔街上每一笔财富的获取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你过早地购进了，有时又太晚地售出；有时尽管你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很可能赶上背运而错失良机。尽管巴鲁克于 1901 年春天也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但总的说来，他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此时正是麦金利股市最繁荣兴盛的时期，很多人都认为股票价格将持续攀升。的确，过去是有过牛市在顷刻间毁于一旦的先例，但现在却是一个被人们称为新时代的崭新时期。美国的钢铁业已经获得了 10 亿多美元的投资，黄金价格也一直保续稳定，整个国家经济持续繁荣的前

景不容置疑。在股票市场，由詹姆斯·J. 希尔和 J. P. 摩根两人发起的联盟行动已经收购了芝加哥的伯灵顿 & 昆西铁路公司，其他铁路公司也满心期待着它们也能吸引那些富有的辛迪加的注意，从而促进公司的发展。亚利山大·达纳·诺伊斯对这一自信时期作了如下描述：

也许 1901 年的美国股市称得上是历史上经营投机的第一次具体表现。这种经营模式的理念和具体操作完全以新时代的来临为基础。在这一时期，旧有的规则和理论以及金融操作先例都已过时，曾被视为风险太大或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如今都可以在不冒任何风险的前提下实现。1901 年这种妄自乐观的情绪在公众（至少是在纽约民众）中扎下了根，1929 年的情景与 1901 年非常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1901 年没有大学教授将流行思维这一问题作为自己政经课上的主讲内容之一。

事实上，无论是新时代、华尔街还是持续牛市，这些与詹姆斯·J. 希尔每天的经营活动都没有太大关系。希尔从事的是铁路建筑业，主要经营大北方及北方太平洋两家公司。他曾不无炫耀地说，自己一生中从未以“赌博或投机”为目的购买过任何一股股票。但是，正是希尔本人（而不是 J. P. 摩根等投资人或受聘担任北方太平洋公司总裁的梅伦）最先注意到了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出现反常攀升势头。4 月份一个月，北方太平洋一直上扬。4 月 26 日一天就 3 个点。希尔听到消息后，当即决定第二天晚上启程赴纽约，亲自调查这件事：显然，有人正在收购北方太平洋的股票。最有可能的一位买主是 E. H. 哈里曼！

虽然说“同行是冤家”，且希尔与哈里曼又都经营铁路建筑业，但两人的关系却一直不错，哈里曼只是和希尔的投资人摩根有过一些过节。哈里曼与摩根之间最早产生敌意的时间恐怕要追溯到 1887 年，当时哈里曼和摩根一起竞争收购杜巴克·休克斯城市铁路公司，最后哈里曼战胜了摩根。1894 年，哈里曼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试图阻止摩根对破产的伊利公司进行重组的计划。摩根为此不惜诉诸法

律，最后法庭判决摩根胜诉。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却证明哈里曼的观点是正确的：摩根的重组计划正如哈里曼所预料的那样以失败告终。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令摩根更为痛心的事情，那就是 1895 年，他以联盟太平洋铁路公司效益不佳为由将其转让给哈里曼之后，哈里曼竟然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这个濒临破产的企业重新焕发生机，这一巨大的成功让摩根觉得很不是滋味。有一天，在证券交易所内，巴鲁克注意到一位身材瘦小、戴着眼镜而且有些罗圈腿的男士站在联盟太平洋公司的交易台前。巴鲁克就问别人：“那个想吃进全部联盟太平洋的家伙是谁？”别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里曼。

哈里曼与摩根之间新一轮的争斗以前面提到过的北方太平洋公司收购伯灵顿公司这一事件开始。伯灵顿公司对于北方太平洋公司的战略价值在于，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急需的通往芝加哥的交通运输线路。哈里曼同样也想在芝加哥为联盟太平洋公司建立一个铁路运输的终点站，所以他向希尔和摩根提出，收购伯灵顿公司 1/3 的股份。当然，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希尔和摩根的拒绝。哈里曼于是采取了非常大胆的行动：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购进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票，想以此来达到收购伯灵顿公司的目的。希尔通过仔细研究和分析 4 月份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价走势，很快注意到了哈里曼的这一动向。但巴鲁克不知道其中的蹊跷，所以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也间接地让威尔失去了一个赚钱的大好机会。

4 月 29 日，星期一早晨，希尔乘火车一到纽约就直奔自己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而此时哈里曼本人和他的投资人杰科伯·斯奇夫已在那里等候他了。哈里曼和斯奇夫开门见山地对希尔说，现在他们三人所持有的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加在一起已经完全拥有该公司的控股权，希望希尔好好考虑一下甩掉摩根，改和他们两人合作。当然，希尔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做，于是，北方太平洋公司争夺战的对阵双方逐渐明朗。

就在哈里曼凭借美孚石油公司提供的数百万美元资产继续大量购

进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票时，希尔也开始马不停蹄地联络自己的投资人，争取不让哈里曼的收购计划得逞。经过一番调查，希尔发现摩根家族的一些成员不仅没有站在他这一边，反而由于禁不住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居高不下的诱惑，纷纷售出了他们手中的股票。而此时摩根本人正在欧洲度假，住在法国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家大酒店里，发给他的电报直到星期六才辗转到他手上。等到摩根将购进全部股票的指令电报当天传回纽约时，证券交易所早已关门打烊了。

同一个星期六，哈里曼不知为什么突然生起病来，而且一直有些心绪不宁。事实上，有关他实现控股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计划离板上钉钉已经不远了，至少原则上没有问题。但是，虽然哈里曼持有半数以上拥有投票权的股票，包括普通股和优先股，但他在普通股上尚未拥有绝对的控股权。而且，他当天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董事们能够在1902年1月1日通过投票方式使他拥有的优先股退出交易，那么即使他在优先股上拥有控股权，最终也无济于事。当时正好赶上新一届董事会选举，但是希尔和摩根如果可以劝说大多数董事同意将选举日期推迟到1月1日之后，那么他们就会竭尽全力在这一天的投票表决中使哈里曼持有的优先股，也就是他拥有控制权的那部分股票退出交易，从而阻止他最终拥有北方太平洋公司的控股权。^①但不管什么原因，哈里曼无法亲自采取行动，于是他就打电话给斯奇夫，指示他尽可能地购进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票，使自己能在普通股上也拥有绝对的控股权。

^① 投票权股票，指股票持有人有权在公司股东大会上投票表决的股票。

普通股，指股票中最的一种。其所有人在优先股股息支付后，有权先于延期付息股参与公司利润的分配。普通股可以是先偿息普通股或延期付息普通股。普通股持有人承担着公司大部分风险：如利润很小，他们只能得到很少的股息，甚至没有股息；但如果利润很大，他们可得到比其他资本类别的持有人高许多的资本收益。

优先股，指在支付普通股或延期付息股的任何股息前必须按固定股息率先支付股息的股票。优先股可以是：可转换优先股，累积优先股，非累积优先股，参与分红优先股，参与分红累积优先股，参与分红非累积优先股，可赎回优先股等。

控股权，指持有公司50%以上投票权股票，运用这种权力可以指导该公司的计划和活动。
——译注。

但是，斯奇夫正好是一个犹太教徒，而星期六这天是犹太教法定的安息日，当哈里曼的指示传到正在家中休息的斯奇夫耳朵里后，斯奇夫不愿因此打乱自己的作息安排，觉得下星期一再处理也不晚。然而事实证明，“下星期一”晚了。

习惯早起的巴鲁克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证券交易所了解行情，通过比较伦敦和纽约两地的股价差，决定自己如何进行套利交易。有时，尤其是星期一的早上，纽约和伦敦股票市场的行情会有很大差异，同一种股票的报价可能在大西洋两岸不同的证券交易所里上下极为悬殊。在这种情况下，巴鲁克就可以从伦敦购进在纽约售出，或者相反。就象一个艺术馆的馆长每天都要对自己馆内的展品一一过目，如果有哪一件没有摆正就会动手调整一样，巴鲁克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伦敦和纽约市场上差异最大的股票，通过自己的套利买卖使两地间的价格持平，并从中获取大笔收益。

5月6日是星期一，这天巴鲁克像往常一样，很早就来到了老产品交易所，这家交易所可是有年头了。此时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在建造新的交易大厅，所以就临时在这里租了一个大厅进行交易。与巴鲁克一起浏览伦敦股市行情的是詹姆斯·基恩的女婿、股票交易所董事泰尔伯特·泰勒。出于好意，巴鲁克对泰勒说，与伦敦交易所的价格相比，北方太平洋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看起来高得有些反常。通常情况下，如果泰勒准备在纽约购进或售出也在伦敦上市的股票时，巴鲁克都会主动提出帮他做成这笔交易，当然，由于两人关系密切，巴鲁克宁可自己在套利买卖中少赚一点也要满足泰勒的要求。但是这一次，泰勒听了巴鲁克的话后，却没有马上从伦敦低价购进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反而对巴鲁克的信息反应相当平静。巴鲁克后来对这件事这样写道：

“巴尼[巴鲁克的昵称]，”泰勒一边说一边用手中的铅笔不时地敲

着自己的嘴唇，“你是不是准备在北方太平洋上狠狠赚一笔？”

“没错”，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可以告诉你怎样来赚这笔钱。在伦敦买进，在这儿售出，从中赚套利利润”。

泰勒继续用铅笔敲着嘴唇，然后又敲了一下额头，然后慢慢地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做这笔套利买卖”。

我没有马上询问其中原因，因为我知道如果泰勒想让我了解内情的话，他一定会主动告诉我的。于是我提出，如果他想要现货的话，我马上就可以把自己从伦敦购进的股票卖给他。

“好吧”，泰勒说，“你可以在伦敦吃进北方太平洋，但是如果我需要的話，你必须按照我指定的价格给我”。

我同意了这一要求。泰勒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带我来到一个背人的地方，用一种低得几乎无法听清的声音说：“我知道你总是能尽量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我才愿意向你透露这个消息。现在对北方太平洋公司的控股权争夺得越来越热闹了，而基恩正是摩根的代理人”。

“千万要小心”，泰勒最后叮嘱我说，“不要对北方太平洋进行卖空，如果我打算收购，你必须当时就给我现货，而不是到伦敦购进后再给我”。

这是巴鲁克一个月之内第二次听到有关北方太平洋公司的内幕性消息。上一次梅伦告诉他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票不会持续攀升，他还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威尔，结果导致威尔损失了不少。但泰勒的消息似乎要可靠得多，因此巴鲁克决定这次一定要谨慎行事。为此他特意制定了两项针对性措施：第一，除了那些已经握在手中的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票以外，他将不再空头购进该公司的股票；第二，在预测股市下滑之前以

卖空的方式出售其他公司股票。巴鲁克推测，大多数没有从泰勒那里获得内幕性消息的交易人，一样会错误地认为应该卖空北方太平洋，为了弥补空缺可能会出售其他公司股票筹集资金，因此其他股票的价格可能会出现暂时下跌，那时他再以低价收购这些股票，不就可以大赚特赚了吗？巴鲁克这次之所以能够打出这样一个如意算盘，主要是因为他已经掌握了只有那些正在争夺北方太平洋公司控股权的圈内人士才了解的内幕性消息。同一个星期一，圣保罗市一位记者就囤积北方太平洋公司股票一事采访希尔，希尔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本人对这种投机收购深表厌恶。

就在这个星期一，北方太平洋公司股票的开盘价为 114 美元，在交易了 40 万股之后以 127.5 美元收盘。由于哈里曼不想将股价抬得过高，而且他一心以为自己已经拥有普通股和优先股的控股权（这一点其法律顾问向他做了担保），所以哈里曼暂时停止了继续收购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行动。而希尔和摩根在这一天也同样尽力收购了 15 万股。星期二，价格上升到了 146 美元，希尔和摩根也停止了收购。但是，两个相互竞争的对手谁也没有想到，北方太平洋的上涨趋势只不过刚刚开始。

新一轮的股价上升狂潮主要是由在此之前的卖空交易引起的。这些卖空交易人就象巴鲁克在得到泰勒的告诫之前一样，都认为北方太平洋股价高得有些反常，这种情况不会维持太久，应该趁着价格较高的时候赶紧空头卖出，然后再用低价弥补空缺。事实上，有着这种想法的交易人太多了，以致于星期三传出摩根和哈里曼为争夺控股权都在大量囤积北方太平洋的消息后，已经有 10 万股售出，而且大多是以卖空的方式售出的。因此，看到北方太平洋丝毫不见下滑趋势，自己又无法低价收购弥补空缺，这伙人唯一的下场就是破产。根据交易规则，卖空人必须在成交后两天内将现货转到收购者手中，否则，收购人有权提出任何偿还要求，并把欠款账单直接寄到那些倒霉的交易人手中。

通常，故意大量囤积某种股票，最后发生挤兑卖空致使破产的情况极其常见。但是，在这次摩根和哈里曼争相收购北方太平洋的事件中，倒是谁也没有想到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事实上，那些收购者都希望把价格控制在一定上限之内，而不想把市场搞得混乱不堪。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出人意料，那些做卖空交易的人的悲剧结局使两个都想收购北方太平洋的竞争者无心再战，于是希尔和哈里曼通过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

星期三交易所停业后还有很多急红了眼的交易人挤在北方太平洋交易台前请求工作人员再给他们一些股票认购单(这一天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票以 160 点收盘，上升了 16.5 个点数，比上星期六增加了 50 多点)。但是，工作人员已被告知不得再销售该股，因为买卖双方都在计算各自的最终数目。对于那些购买证券的人来说，如果说要冒什么风险的话，那顶多不过是手中的证券变成了一堆废纸。但对于处在绝境中的卖空交易人而言，风险却是无限的，他们不仅可能血本无归，而且弄不好还会家破人亡，倾家荡产，因为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不停地攀升。因此，星期三这天晚上，大多数经纪人已吓得要死，觉得明日就是世界末日，都不敢回家，挤在沃尔道夫的公共酒吧里，这些平日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交易人现在一个个着急得脱了外衣，他们预感到牛市冲天的大好时光将一去不复返。巴鲁克作为这次股市风波的见证人，不仅没有赔钱反而大赚了一笔，巴鲁克后来对此作了如下描述：

恐怕只有最坚强的人才能保持表面的镇静。我看到阿瑟·豪斯曼和曾有“股市投资大王”之称的约翰·W. 盖茨站在一起。这位说话直爽、和蔼可亲的芝加哥人仍是一幅临危不惧的模样。对于那些称他在此次“北方太平洋风波”中损失惨重的谣言，盖茨矢口否认，说自己没有赔掉一分钱，而且，即使真的破了产，他也会坦然面对。其实，如果说这一声明的前半部分完全是出于违心的话，那么后半部分倒真是发自盖茨的内心。

星期四早上，北方太平洋以 170 点开盘，上午 11 点前达到了 400 点，到中午时又上升到 700 点。股市里的交易人都好象发了神经一样，一波接一波的以 300、230、300、400 以及 320 的价格购进北方太平洋。为了筹集款项，经纪人不得不连夜借钱，据称贷款利率高达 60%。后来竟传出谣言说阿瑟·豪斯曼因劳累过度病死了。更有趣的是，这一消息居然还通过电报发送到了纽约。为了辟谣，豪斯曼不得不亲自在交易所露面。就在下午 2 点钟前，又有 300 股北方太平洋易手，每股 1000 美元，现金支付。

与此同时，与北方太平洋连连攀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公司的股票大多一路下滑，引起了股市的一片混乱。其中，美国钢铁公司下降 6.75 点，美国炼糖下降 8.375 点，联合铜业下降 10 点。到下午股市快开门时，形势终于有了转机，那些弥补不了亏空的北方太平洋焦头烂额的卖空交易人获悉，他们不必在当天还上这些股票。这一消息一经宣布，股市很快回弹，北方太平洋也开始回落。等到收盘铃声敲响时，北方太平洋已回落至 300 点，最多的一次交易也不过 1000 股，最少的只有 190 股。这时，又传来了另外一个消息：希尔和哈里曼决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低价格将北方太平洋出售给那些急需弥补空缺的卖空交易人。随着这一消息的公布，前一天闹得沸沸扬扬的股市大恐慌总算平息了。

由于提前获得了内幕消息，巴鲁克在这次北方太平洋交易中不仅没有亏本，反而大大地发了一笔。他在股市出现动荡之前以卖空的方式出售了大量其他公司的股票，然后又在星期三和星期四两天，在这些股价爆跌时低价购进，弥补空缺。而且，他还把自己以前从伦敦股市上以 112 到 115 美元的价格买进的北方太平洋趁股价大涨时一举抛出，获得了颇为丰厚的利润。据巴鲁克称，星期三一天他就赚得了自己从事投资行业以来最大的一笔财富，至于这笔财富的具体数额，巴鲁克却一直没

有透露。^①

对于希尔、摩根、斯奇夫和哈里曼等人而言，这次收购北方太平洋公司的争夺战最终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双方达成协议，由摩根负责组成下一届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董事会，但哈里曼必须是董事之一。此外，哈里曼还将在伯灵顿公司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该董事会将在有关联盟太平洋公司（哈里曼拥有控股权）和北方太平洋公司之间相互竞争的事项中将严格保持中立。

曾透露了重要信息给巴鲁克的泰尔伯特于 1908 年与基恩的女儿杰西卡离了婚。他的晚年生活是在法国南部度过的。在那里，泰尔伯特对园艺活动着了迷，而且还因此获得过当地好几次鲜花博览会头奖。

巴鲁克在北方太平洋风波中收获了一笔意外横财之后不久，一天下午他在沃尔道夫酒吧遇到了富有的咖啡经销商赫尔曼·西尔肯。西尔肯是巴鲁克的一位客户，偶尔从事股票交易，不过最擅长的是市场销售。那天，西尔肯闲来无事顺口说到了制铜业。他说现在市场上有大量的铜，可价格却仍然很高，有不少人正在收购铜，这一行业的出口已呈下降趋势。如果降低铜价，那么联合铜业公司的股价势必随之下滑。联合铜业公司建于 1899 年，当初组建的目的是为了垄断全球铜业市场。但据西尔肯称，这一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

巴鲁克于是对这家公司专门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西尔肯是对的。果然，当年夏初，铜业股票价格开始下降，由 6 月中旬的 130 点下滑到 7 月中旬的 111 点（虽然这段时间业务繁忙，但巴鲁克还是抽出时间为妻子购买了一辆新型潘哈德马车，而且还没忘记请《纽约先驱报》的一

^① 巴鲁克不只是以卖空股票的方式进行交易，而且他还对进行期权的卖空交易。期权给予持有人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以固定价格购买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例如，美国钢铁公司的期权可以允许其持有人在 6 月 30 日以前以每股 50 美元的价格购买 100 股该公司的股票。如果这种股票在期权截止日期前已上升到每股 100 美元，期权持有人仍然可以以每股美元的价格购进股票。因此，股票期权称得上是卖空交易人用来预防投资风险的保险单——原注。

位摄影记者给自己拍摄了一张站在马车后轮旁的照片；照片登出时，这位记者特别在旁边注上“职业马车夫巴鲁克先生”，以及“他这辆外观豪华的四轮马车引得路人都驻足观看”的字样）。9月6日，麦金利总统突然遇刺，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全面崩溃，后来虽然有所反弹但没有持续多久便再次陷入下滑困境。事实上，直到3年之后，托马斯·W. 劳森才透露组建联合铜业公司的惊人消息，即该公司的资产实际上远没有估计得那么高。巴鲁克当初决定抛出该公司股票的原因是，他看出市场对铜的需求和原料供应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所以，在麦金利遇刺后不久，当联合铜业还在105到115点之间徘徊时，巴鲁克就果断地抛掉了所有股票。

两年后，巴鲁克曾和许多卖空交易人一样打算通过空头交易出售BRT公司的股票大赚一笔。但这次的形势却有些不同。联合铜业公司是由美孚石油公司（即威廉·洛克菲勒和亨利·H. 罗杰斯）出资组建的，而且还有很多颇具实力的华尔街一流投资专家为该公司出谋划策。基恩也持有该公司的股票。因此，当有传言称巴鲁克认为联合铜业可能下跌时，托马斯·F. 瑞恩亲自将巴鲁克拉到一边告诫他说：“巴尼，我听说你对联合铜业的前景不太乐观，打算进行卖空交易。我只是想告诉你最好小心行事，否则的话，公司后台老板们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刚刚经历了北方太平洋风波的冲击、体验到了卖空交易失手后的惨痛教训的人们，听到这样一个警告晚上竟难以成眠了。华尔街的许多头面人物在麦金利遇刺之后纷纷表示将站在联合铜业公司一边，帮助其渡过难关，J. P. 摩根更是一马当先，公开宣称他认为公司的股票前景看好。在这种情况下，巴鲁克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下面这段叙述就是对当时情景的一些回忆片断，不过这些话并没有记载在他的自传中：“这件事情让我感到压力很大——确实很大。我被冠以各种各样难听的称呼，有人还传播各种谣言，对我的人格和才干进行肆意污蔑，这让我感

到非常难过……但我只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我只相信咖啡商赫尔曼西尔肯”。谈到他每天在证券交易所里的活动，巴鲁克说：“虽然每时每刻都挤在〔联合铜业公司〕交易台前，但我更喜欢绕着台子走来走去，让经纪人替我进行具体操作。那时的我，好比一个正在上演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戏的演员，我对自己的表演信心十足，随时等候接受观众的鼓掌——股市的发展最终会证明我是正确的，我耐心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9月14日，麦金利总统医治无效而去世的消息传来，巴鲁克又抛出了一些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19日为麦金利总统举行国葬，股市没有开盘。第二天是星期五，联合铜业公司的全体董事本打算开会协商重新确定普通股红利的未来走势（当时为每股8美元）。虽然新闻媒体对此持乐观态度，但星期三的交易情况却表明圈内人士对此意见不一。星期五下午，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开始上升，表面看来，该公司的红利前景可观。但实际上，董事会已决定将该公司的红利降低到每股6美元。对此，巴鲁克自然是欣喜若狂。星期六当天，联合铜业一个上午就下跌了7美元。巴鲁克估计，到下个星期一，输赢就能见分晓了。

不巧的是，巴鲁克夫人就在此时打电话提醒儿子说，下星期一是赎罪日。这让巴鲁克担忧起来，因为他知道所有犹太教徒都非常尊重这一最圣洁的节日，都会在这一天呆在家中，不愿做任何世俗的事情，更不用说到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交易了。巴鲁克本人并非笃信宗教，若非出于对父母的孝顺，他不会如此看重这个节日。不过，最终还是母子之情占了上风，巴鲁克决定星期一在家陪父母，不去交易所。于是，巴鲁克委托艾迪·诺顿做这笔交易。艾迪·诺顿是巴鲁克的一名交易代表，曾在北方太平洋风波中以卖空方式出售了300股价格1000美元的股票。巴鲁克指示诺顿继续按照熊市的操作规则进行交易，具体地讲，就是为了抑制交易人购买联合铜业，诺顿必须时刻保留一些现货，在必要时随时

抛出，达到稳定股价的目的。为了防止股价上涨——而不是如自己所料想的下跌——的意外，巴鲁克指示他的另一名交易代表哈瑞·康坦特购进联合铜业，以弥补自己卖空后的亏空。精心安排好这一切后，巴鲁克认为自己至少不会遭受损失。

赎罪日这天，巴鲁克是与母亲、妻子和孩子一起在新泽西州的南厄比伦渡过的。在此之前，他特意吩咐下属，任何人不得因为公事给他打电话。事实上，当电话真的一个接一个响个不停时，巴鲁克还是感到自己的心绪受到了影响。事后，巴鲁克称他最终还是经受住了电话铃声的诱惑，一个电话也没接，不过这一说法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直到日落之后，教徒们才可以从事世俗尘事。巴鲁克也在此时才获悉联合铜业出现了下跌趋势。该公司股票以 100 点开盘，后来跌到 97.785，然后又在上午 11 点左右回升至 98.5，在此之后就开始一点点地越滑越低，到下午 3 点收盘时跌至 93.75 点。事实上，联合铜业在这一年里一直没有再回升，截止 1901 年新年止，已经跌到了 69.5 点。经过计算，巴鲁克发现自己的财产总数已经涨到了 70 万美元（巴鲁克很快将这一成功归于听从了家人的劝告，星期一当天出外度假了。巴鲁克说，如果那天他仍象往常一样到交易所来，那么很有可能会在联合铜业回升至 98.5 点那一刻时就立即见好就收。也许这是他的真心话，但是不要忘了，即使果真所言是实，巴鲁克那天看到股价继续下跌后，肯定会以卖空方式抛出更多的股票，从而获利更大）。

巴鲁克在卖空领域显示出的卓越才干使他很快赢得了一些抛售者的欣赏，他们表示愿意付给巴鲁克高额佣金，请他帮助料理以出售为主的投机生意。事实上，当时巴鲁克本人的股票业务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以致于每次代表客户进行的交易实际上他完全可以独立完成。于是，巴鲁克作为经纪人的地位和声誉因此得到加强。巴鲁克在这次联合铜业下跌事件中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下面这段新闻报道是盛赞巴鲁克

投资天才的最初几篇文章之一：

在联合铜业大幅下跌过程中，出现了一位卓越的投资家。虽然在此之前，他已一度在华尔街圈内人士中声名鹊起，但由于他本人不愿过多在公开场合曝光（这一点在华尔街金融界比较少见），所以很多公众对他还是不太了解。这位投资家就是 A. A. 豪斯曼公司的合伙人伯纳德·M. 巴鲁克。关心华尔街金融事务的公众可能对于沃姆瑟、菲尔德、奥利弗以及康坦特等人的姓名早已耳熟能详，但对于巴鲁克，大家可能知道得不多。事实上，来到华尔街的短短几年里，他就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在上述这些知名人物中间，巴鲁克以精明、有远见和胆识过人著称，他的才干可以说仅次于声名显赫的投资巨头基恩。自联合铜业开始出现下滑势头以来，在所有的知名投资家中，只有巴鲁克一人洞察了事情的本质，因此，他和他的交易代表不仅没有象其他人那样损失惨重，反而获利丰厚。这一事件反映了巴鲁克对股市的动向是如何的了如指掌，也反映了他在众多的嘲讽和讥笑面前是如何的镇定和自信。巴鲁克的所作所为，使我们不禁回想起前些年基恩在糖业投资方面表现出的胸有成竹和大将风范。巴鲁克的前途不可限量，未来的他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他的发展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巴鲁克时代终于来了。

第五章

巴鲁克时代

20 世纪 30 年代，巴鲁克突然萌生利用赚得的钱帮助民众摆脱经济危机的念头，不过，这一念头转瞬即逝。其实，30 年前的巴鲁克尽管没有后来那么财运亨通，也曾产生过类似的想法。巴鲁克不满足于现状的一个原因是，他觉得自己一直是在利用别人的资产进行投资，而真正的投资人不应该是股票经纪人、银行家或其他任何受托人，而应该是完全独立于这些人之外，自己拥有一定资产的独立投资商。与此同时，随着财富与日剧增，巴鲁克开始仔细思考自己应该怎样花这些钱。他的弟弟赫尔曼此时已从医学院毕业，这又激起了巴鲁克小时候对医学的兴趣。一段时间以来，巴鲁克还打算当一名律师，或者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救济穷人。但是，一想到未来几年的时间都要在大学课堂里度过，巴鲁克便放弃了这一天真的想法。为了有一些时间好好思考自己的未来，1902 年夏天，巴鲁克带上妻子安妮和父亲以及一位名为亨利·C. 戴维斯的商业伙伴一起到欧洲度假。

戴维斯是豪斯曼公司在美国西部的投资代表，他到达伦敦后不愿到欧洲大陆的国家去。于是，巴鲁克和妻子安妮以及父亲三人丢下戴维斯一路东行，一直到达君士坦丁堡。后来，巴鲁克医生因为有事提前回国，最后只有巴鲁克和安妮两人来到了巴黎，住进巴黎有名的里兹饭店。一

天深夜，巴鲁克睡得正香，突然被饭店服务员叫醒，说有加急电报，从纽约来，上面有弟弟西林的签名。电报称豪斯曼财政状况不佳，急需援助。巴鲁克惊得“两腿发软，差一点坐在地板上”。如果说豪斯曼陷入了经济困境，也就是说整个豪斯曼公司陷入了困境。而巴鲁克是 A. A. 豪斯曼公司的合股人，320 万美元的个人财产是该公司的破产担保金。因此，现在的巴鲁克和阿瑟·豪斯曼乘的是同一条船，一人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就会直接影响到另一个。于是，巴鲁克赶紧发了一份电报，将一笔资金转到豪斯曼的账下，并马上订了回纽约的船票。

船到纽约港，巴鲁克大老远就看见豪斯曼在码头上焦急地踱来踱去。一见到巴鲁克，豪斯曼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和一个名叫艾德文·霍勒的铁路建筑商一起购买了明尼阿波利斯 & 圣保罗和科罗拉多 & 南方铁路公司的股票，造成目前的窘境。霍勒本人是科罗拉多铁路公司的董事，他坚信该公司的股票将大幅度上涨，但实际情况却是持续下跌。豪斯曼当初在购买该公司股票时手头并不宽裕，现在为了不赔本，只好守着这些股票，同时又要筹措更多的资金去购买其他正在攀升的股票。

回到纽约后，巴鲁克亲自为豪斯曼筹款。最后，股市终于出现反弹迹象，豪斯曼终于抛出了手中的股票，还赚了钱。由于巴鲁克的及时帮助，豪斯曼身陷困境居然没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表现出来。

能够帮助一位曾经提携过自己的人，巴鲁克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尽管他和豪斯曼兄弟的感情很深，他还是决定撤出自己在豪斯曼公司的股份。一来是他不想再附属于任何一家公司，二来据猜测是巴鲁克担心豪斯曼对股市行情不加分析就做判断的做法没有信心，担心早晚连累自己跟着破产。也许巴鲁克并非对股市发展总是持悲观态度，但豪斯曼却是绝对的乐观派。巴鲁克曾经谈到一件反映他和豪斯曼两人意见相左的事情。他写道：

有一天股市普遍下跌，收盘后我在沃尔道夫酒巴里喝酒，听到一些交易人正在相互安慰对方。我是一个不愿意为将要发生的事情大声争论的人，我喜欢用事实说话。这时，詹姆斯·基恩恰好走了过来。

“伙计们，你们对 A. A. 豪斯曼公司怎么看？”基恩用他惯有的尖嗓门大声地问道，“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这家公司的两位掌门人一个喜欢大叫大嚷牛市，另一个却认为熊市随时可能占上风吗？”

1903 年 8 月的时候，巴鲁克已经搬到了自己新组建公司的办公地点，^①他在办公室里摆放了三件装饰物，这三件物品都与他的父母有关，第一件是他的公司开张时母亲寄给他的贺电；第二件也是母亲送给他的，是一只绿色带红点的搪瓷小猫；第三件是一张安在像框里的父亲的照片，上面还有父亲写给他的赠言“愿诚实之镜照亮你的一生”（巴鲁克只提到了这三件饰物，可能安妮当时也送了一些纪念品，但巴鲁克没有提及过）。由此可见，在经过了几个月的思考之后，巴鲁克决定仍然留在华尔街从事投资事业，但不再与豪斯曼合伙，而是单干。尽管仍然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各种股票交易，但巴鲁克现在开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风险投资，尤其是采矿业，只偶尔有客户请他作经纪人进行投资活动。但是，有一件事却是个例外。有一天，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来到巴鲁克的办公室，请他帮助自己投资一笔从姨母那里继承来的价值 25 万美元的遗产。这位女士说她觉得巴鲁克非常精明、穿着时髦而且“长相有些滑稽”^②。事实上，如果说巴鲁克的脸部真有些不太对称

^① 在巴鲁克的自传当中，他称自己很快搬出了位于布罗德大街 20 号的豪斯曼公司总部，迁到了位于百老汇大街 111 号特瑞尼特大楼的新办公室。但直到 1906 年，纽约市的公司名册上才对此有所记录。事实证明，纽约市公司名册记录更为准确。1906 年，就在特瑞尼特老楼旁边又盖起了另外一幢高 21 层的新楼，而且也叫特瑞尼特大楼。巴鲁克的办公室位于第 7 层，而老特瑞尼特大楼仅有 6 层高。在有关的法庭记录里，巴鲁克称他离开豪斯曼公司的时间是 1903 年 8 月 10 日，所以很显然，他最初搬进的新办公室在那座老特瑞尼特大楼里。——原注

^② 这位前来拜访巴鲁克的女士名叫莎拉·肯德里克·斯特拉汗，她的孙女玛西娅后来谈到这件事时写道：我并不清楚祖母是否与巴鲁克先生提前预约了见面时间，但她确实去了他的办公室。巴鲁克先生一定是不忍心拒绝外表秀丽、一幅英国淑女模样的祖母，所以他主动提出传授给她一些投资窍门，但没想到祖母却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一点也听不懂你讲的这些东西，我只想让你帮我做这笔投资”。然后她就把草拟的协议推到巴鲁克先生面前，巴鲁克先生当时一定大吃了一惊，不过他还是镇静地说：“我应该给你一份收据”。

的地方（巴鲁克本人当然不承认这点，许多女士也不同意），那就是他的鼻子有些过长，嘴唇也显过宽。这时的巴鲁克已经剪去了他的小胡子，头发也象很多银行家一样故意染上了几丝银发（1903 年是巴鲁克作为一个独立投资商从事股票投资的第一个年头，这一年在纽约市的姓名地址录里他的名字后面登记的职业是“银行家”，而不再是“经纪人”。但是，很显然有人认为这一称呼并不恰当，于是到 1904 年，巴鲁克姓名后面重又换成了“经纪人”。此时巴鲁克的两个弟弟西林和哈特曼也加盟了他的公司）。

“诚实做人”远非易事。事实上，尽管父亲一直谆谆教导，但巴鲁克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教导去做。有一次，他没能经受住几位在 A. A. 豪斯曼公司认识的巴尔的摩人的诱惑，对他们所谓的财务报告产生了兴趣。这份报告涉及都市铁路公司，这是一家位于曼哈顿的大型市内有轨电车公司，该公司当时正在进行不正当交易。1902 年初，巴鲁克最喜欢的一位经纪人哈里·康坦特代表该公司的股东，控告都市铁路公司的某个租赁项目“充斥了腐败和贪污受贿现象”。最终，包括托马斯·福特恩·瑞恩在内的董事全都被指控有贪污之嫌（虽然没有受到起诉或被判刑）。1902 年秋，在公布所有贪污受贿的丑闻之前，上述几位巴尔的摩人带着他们掌握的内幕消息来找巴鲁克。他们手中的都市铁路公司财务报告肯定说明了该公司已处于经营不善的境地，而巴鲁克则可以趁此机会进行卖空交易，等都市铁路公司的股票大幅下跌之后再以低价买进。巴鲁克将以他的资产做担保，如果获利就收取一半利润，其余一半由这几位提供内幕消息的人——即巴瑞达·特纳、弗兰克·G. 特纳和摩特兹·普莱格瓜分。当然，他们达成的这一交易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证据，也没有指定任何具体的执行日期，不过双方在巴鲁克必须抛售都市铁路公司

祖母却回答：“不必了，先生。我们握一下手就算你付给我收据了”。说完，祖母就和巴鲁克先生握手告别了。谁知两三个月后，祖母就开始收到这笔投资的分红，而且今年已经 72 岁的我现在还在收取这笔投资的红利——原注。

1 万股股票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至少这几位巴尔的摩人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是这么讲述的。

1902 年 10 月，即巴鲁克被指责与上述几位先生秘密进行这一非法交易时，都市铁路公司的股票价格为每股 142 美元。一年后，股价下降到 105 美元（这一下降幅度几乎与道·琼斯铁路指数下跌幅度完全一致）。1903 年 9 月底，普莱格控告巴鲁克在这期间独自获得了巨额利润。普莱格指控巴鲁克总共获得了 50 万美元的收益，却只有 4271 美元能够查到正当来源。对此，巴鲁克不仅否认隐藏了自己的收益，而且根本不承认看到过“什么专业财务人员撰写的报告”。不过，巴鲁克最终还是同意退还 9000 美元私了。他后来解释说：“这是一种妥协的作法，目的是为了 avoid 成为这一件毫无来由的诉讼案的被告人而招来更多麻烦”。巴鲁克说这番话的时间是 1904 年。假如普莱格真的被巴鲁克骗得如他自己所称的那样惨，那么他肯定不会因为拿到 9000 美元就此罢休。另一方面，如果巴鲁克在这件事中的确百分之百的清白，那他自然也不会白白掏出这笔赔偿费。1901 年，巴鲁克曾经因为他的车夫撞伤行人而受到指控，被判支付受害者 1000 美元医疗费，当时他不服判决进行了上诉，由此可见巴鲁克在法律事务上可不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无论如何，巴鲁克和普莱格都没有将这件官司告诉另外两个与普莱格一起为巴鲁克提供财务报告的合伙人。9 年之后，另外两人获悉此事后，分别对巴鲁克提出控告，均得到了补偿。

但股票投资同行们却对此事不屑一顾（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此事，或认为不值得一提）。1903 年 12 月 9 日，巴鲁克被选为由 40 位交易人参加的管理委员会。1904 年之后，巴鲁克仍在未注册委员会长期任职，并把这一机构视作他敦促其他成员允许采矿业公司股票上市的重要论坛。事实上，在证券委员会成立之前好几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已经开始行使权力，要求股票上市公司提高公司的运作透明度，尽可能多

地公布某些重要数字。进入 20 世纪后，按照注册委员会的规定，那些想要享受上市股票特权的公司，必须适时公布公司运作情况。未注册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将那些还不愿意或不能很快公开其运作情况、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具备上市资格的、声誉良好的公司列入该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之内。

根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巴鲁克是一个非常热心委员会工作的人。他亲自检查股票订购单的印刷质量，操心各种行政事务，而且对于那些尚未具备上市资格的公司总是热心地劝说它们尽快上市。记录显示，1906 年 1 月 24 日，巴鲁克就曾经敦促美国冶炼证券公司赶紧解决优先股问题，以便履行其向注册委员会做出的提交相关情况的承诺。冶炼公司是由巴鲁克的朋友古根海姆家族^①提供资金组建的。

随着 20 世纪的到来，采矿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尤其是在场外证券交易所和波士顿交易所里，制铜业更是吸引了众多投资商的注意。纽约证券交易所对采矿业以及相关公司的股票和债券的发展一直持保守态度，但后来却惊奇地发现，这一行业确能给经纪人带来丰厚的佣金回报。1906 年初，未注册委员会（当时成员已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法兰克·K. 斯特吉斯）开始考虑吸收矿业股上市的事项。更重要的是，该委员会还考虑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是否应该象场外证券交易所那样从事场外交易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将意味着一向以场内交易自居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将允许进行被视为幕后买卖的场外交易。对此持赞同态度的人士认为，让场外证券交易所进行的所有买卖进入纽约交易大厅的做法会给投资人带来更加丰厚的回报。而对此持反对态度的人士则指出，场外证券的场外交易有失身份甚至有些属于非法买卖，因此即使是只允许那些声誉相对较好的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例如联合铜业和格林纳集团，也会使现有的交易标准受到一定的负

^① 古根海姆家族，详见第二章——译注。

面影响。1906年3月，巴鲁克在未注册委员会上就吸收场外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一事发表意见，由于会议记录员在记录过程中不可能一字不漏地将他的原话全部记录下来，所以与他原来的发言相比，下面这些断断续续的记录肯定在力度上打了折扣，但仍足以体现巴鲁克鲜明的意见。其大意如下：

如果必须现在就提出我的观点，那么我要说，本人与托马斯先生的意见一致，反对将场外交易引入纽约证券交易所，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我认为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种更便利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必非得为场外证券提供一个交易场所。我认为，一旦我们为这些证券提供了交易场所，无论它们是否正式上市，其价格是否收录进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在公众的眼里，这些股票都享有了与在纽约交易所里正式上市的股票相同的地位和声誉。毫无疑问，我们的投资人也会相应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如何才能正确判断，哪种股票值得投资呢？目前，我们正是通过场内和场外两种交易来帮助大家辨别股票的好与坏的。所以，如果现在有人愿意冒风险投资场外股票，他们可以到场外证券交易所进行场外交易。我已经列出了一个场外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清单，从中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即如果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吸收那些目前尚未正式上市但很快就将公开发售的股票和债券入市，那么留在场外证券交易所里的股票种类和数量将大幅减少。不过，我也想指出，我本人对此研究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有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唯一办法就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内，建立一个专门的矿业股交易部，因为在场外进行交易的大多数股票都与采矿业有关。

说这番话时的巴鲁克，刚刚获得列入社会名人簿的荣誉，所以他的讲话就显得分量很重。最后，巴鲁克又对场外证券交易所的地位进行了总结：“我认为我们应该仍然将其视为场外交易所，那里买卖的股票与

场内交易的股票有着本质的区别，无论是股票价值还是社会声誉都不如场内股票高”。巴鲁克的这一明确表态，使后来演变成美国股票交易所的场外证券交易所最终未能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部分；不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会同意对矿业股采取较为宽松的交易政策。也许是由于巴鲁克的影响力非同一般，所以未注册委员会还收到了对那些“据本委员会认为拥有恰当的赞助人支持、其证券具有合法发行渠道的矿业公司”进行调查，以便吸收它们入市的指示。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未注册委员会致信采矿业的最权威人士，向他们征求意见。1907年1月，未注册委员会收到以了古根海姆家族的首席工程师约翰·黑斯·哈蒙德及其助手A·切斯特贝蒂的来信，2月份又收到了投资商犹金·梅耶和露天采矿工程师丹尼尔·杰克林的回信。丹尼尔出生于密苏里州的一个小农场，孩提时的最大梦想就是拥有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田地。他认为，即使是一块表面看来蕴藏量并不很丰富的铜矿土地，只要有足够的蒸汽掘土机和足够的冶炼加工厂，一样能获取丰厚利润。丹尼尔已经看好的一块地位于犹他州的一个无人峡谷。其合伙人艾诺斯·沃尔说：“这块地有一英里宽，几英里长”。早在1903年，丹尼尔就曾和巴鲁克进行过磋商。巴鲁克当时很快对丹尼尔的提议产生了兴趣，主动提出大量购进犹他铜业公司股。事实上，巴鲁克是唯一一个被丹尼尔说服的人。在此之后，丹尼尔曾试图吸引联合铜业公司的本·古根海姆和约翰·黑斯·哈蒙德提供投资，都没有成功。1904年夏天，丹尼尔还向当时正打算购买一处铜矿的通用电气公司提出了这一计划，但是该公司一位董事并不相信丹尼尔提供的那些“鬼数字”。1906年，犹他铜业公司终于说服了古根海姆，他答应提供资金并向公众公开发行可转让的债券。于是，1907年初，巴鲁克、丹尼尔和犹他铜业公司总裁查尔斯·迈克尼尔三个人一起坐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会议室的圆桌边，讨论了吸收犹他铜业公司股票入“大黑板”（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俗

称)事宜。^①在未来10年间,犹他铜业公司总共开采了617,785吨铜,支付了7600万美元红利,积累了4800万美元的运作资本,成为世界铜矿开采业的领军企业。

巴鲁克与古根海姆家族的商业往来始于1889年,当初丹尼尔·古根海姆邀请巴鲁克一起到墨西哥去购买产矿地(一次,巴鲁克向托马斯·F·瑞恩打听丹尼尔的为人。瑞恩赞许地说:“他可是个大人物,一把采矿钻时刻不离手”)。古根海姆家族的族长梅尔·古根海姆以前是巴鲁克医生的病人,她是新泽西州朗布兰奇赌馆的赞助人之一。1901年,梅尔和她的7个儿子拥有了美国冶炼公司的控股权之后,其第4个儿子索罗门有意为巴鲁克提供了有关该公司情况的数据资料。巴鲁克于是购买了一部分美国冶炼公司的股票,而且还推荐朋友们也来投资该公司。

巴鲁克和古根海姆家族的第一次合伙进行的大型项目,是由巴鲁克代表美国冶炼公司谈判收购两家西海岸冶金公司。1905年1月初,巴鲁克启程前往华盛顿州埃弗莱特的特科马冶金公司总部,一同前往的包括亨利·戴维斯和来自威廉·H·帕奇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事实上,早在1898年,巴鲁克就与帕奇一起合作帮助联盟烟草公司谈判收购了利吉特&梅尔斯烟草公司。短短几年,巴鲁克已经从一个刚到圣路易斯见世面、初出茅庐的年轻经纪人,成长为古根海姆家族的首席谈判专家和决策人。

巴鲁克拜访的第一位股东是百万富翁大流士·米尔斯,他在纽约布罗德大街拥有一幢自己的办公大楼。米尔斯喜欢蓄一撮山羊胡子,喜欢到英国乡村旅行,他风趣幽默,尤其擅长讲一些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期的笑话和故事。但是,米尔斯生就敏锐的商业头脑,就连他以慈善为目的的开设的一些低价位旅馆,也都能为他带来不少的收益。米尔斯持有特

^① 有关巴鲁克对于犹他铜业公司感兴趣的说法并未在未注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出现过。一种可能是巴鲁克确实从未表明过这种态度,或者他只是私下里说过类似的话,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持有该公司的股票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也许巴鲁克认为自己是否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与他人无关——原注。

科马冶金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此外，还少量地投资了旧金山的塞尔拜冶金&制铅公司，而这家公司正是古根海姆家族想要收购的另一个目标。当巴鲁克开门见山地询问米尔斯出价多少肯出售特科马公司股票时，米尔斯当即婉言拒绝了。不过米尔斯最后还是留了一丝回旋余地，同时答应不把巴鲁克来访一事告诉也有意收购该公司的洛克菲勒集团。

告别了米尔斯，巴鲁克又拜访了特科马冶金公司总裁、戴维斯的老朋友威廉.R.拉斯特。巴鲁克提出以每股 800 美元的高价收购拉斯特持有的股票，拉斯特没有拒绝，于是，接着，包括米尔斯在内的其他几位股东也不得不同意按巴鲁克的条件出售股票。有关收购塞尔拜公司的谈判进展得相对缓慢一些，这主要是因为有人故意把巴鲁克代表古根海姆家族利益的消息捅了出来。但是由于拉斯特的鼎力相助，再加上米尔斯也施加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塞尔拜公司的股东们最后还是表示愿意转让手中的股票。最后，心满意足的巴鲁克于 3 月初乘船回到了纽约。不久，塞尔拜公司的收购事项圆满结束。但收购特科马公司的计划却遇到了一些麻烦。后来，巴鲁克从纽约以发送电报的方式又与对方谈判了 3 个多星期，拉斯特和戴维斯这才于 3 月底达成了协议。巴鲁克圆满完成了任务，之后该讨论可以从古根海姆家族那儿获取多少佣金的问题了。

巴鲁克当初与古根海姆家族达成的协议是，首先收购塞尔拜和特科马两家公司，之后将其合并，并重新对其进行资本评估，巴鲁克将持有新公司上市股票的大部分，价值约 100 万美元。但是，丹尼尔最终却决定将这两家公司全部并入到美国冶炼公司名下。至于巴鲁克应该得到多少佣金，丹尼尔请巴鲁克与古根海姆家族的律师塞缪尔.安特梅耶协商解决。对于这次谈判，巴鲁克作了如下描述：

我对安特梅耶先生说，我应该得到 100 万美元佣金[巴鲁克认为这笔钱是早已说定的了]，其余的一切免谈。但安特梅耶先生却反问我，

是不是打算勒索美国冶炼公司。

听了这话，我一下站了起来，冲着坐在谈判桌对面的安特梅耶先生说：“不，目前我还没做出这样的决定”。

然后我说了声再见就离开了房间。

后来，这次谈判的结果传到了丹尼尔的耳朵里，据说他在听完律师的汇报后，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巴尼坚持认为他该拿 100 万美元，那就如数给他吧”。

古根海姆家族支付给巴鲁克的支票上的具体数额是 110.645 6 万美元。他一收到支票就立即给拉斯特和戴维斯每人签了一张 30 万美元的支票，以示答谢。两人收到支票后目瞪口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巴鲁克竟会付给自己那么大的一笔酬劳。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一点，即古根海姆家族是否真的想以美国冶炼公司股票的形式支付巴鲁克佣金。大家推测该公司确实有这一意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很有可能是巴鲁克拒绝了这个提议。1905 年年初，美国冶炼公司股每股 82 美元，到 4 月中旬，部分原因是由于巴鲁克指示古根海姆家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内发动几家公司联合抬高股票价格，所以美国冶炼公司的股票也随之上升到了 120 美元。但之后不久，其他公司开始纷纷撤出资金，美国冶炼公司股又开始下跌（其中原因后面详述）。可能是因为巴鲁克认为股价已升至一定高度，也可能是因为他认为任何一家大公司都没有权力为了赚取普通民众的财富而私自抬高股价，总之，巴鲁克通知古根海姆家族说，他准备抛出美国冶炼公司的股票，并将建议他的朋友们也这么干。古根海姆家族的人对于巴鲁克的决定自然十分生气，其中的原因也许正如巴鲁克所声称的那样，这些人毕竟还是股票市场上的业余选手，对股资操作还不太了解，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古根海姆家族认为巴鲁克的这一做法简直就是一种忘恩负义的

举动，他竟然在收取了 7 位数的高额佣金后还会对支付者下如此黑手！无论如何，美国冶炼公司的股票仍然恢复了攀升的势头，到 1906 年 1 月已达到 174 美元。但在此之后，股市普遍下滑，美国冶炼公司股也未能幸免，到春夏之交时已跌至 138.5 美元。

在华尔街，有人开始传言股市的下跌是巴鲁克进行卖空交易造成的。这只是一个谣言，并非真实情况——尽管巴鲁克本人并不认为进行卖空交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却为自己制定过这样一个原则，即至少不应故意让自己朋友的股票下跌——因此，当索罗门·古根海姆轻信了这一传言时，巴鲁克马上亲自到索罗门家里澄清了事实。索罗门听了巴鲁克的解释后，向他道了歉。

被巴鲁克奉为真理的观点之一，就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行业的投资要领，所以最佳的投资途径就是找到自己最了解和最熟悉的行业，然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进去。对巴鲁克而言，他坦陈自己一直没能掌握农产品的投资诀窍。他说：“每次想到自己在咖啡、糖业、棉花和其他农产品领域的投资回报，我的自信心就会受到无法形容的巨大打击。在我看来，只要我对某种农产品进行投资，该种产品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巴鲁克最初对农产品进行投资遭受的最惨痛的打击是一次咖啡投资。1905 年年初，就在他作为古根海姆家族的代表启程赴华盛顿州进行收购两家冶金公司的谈判时，巴鲁克吃进大量咖啡股票。

巴鲁克是在听了赫尔曼·西尔肯的建议后这么做的，西尔肯曾在投资联合铜业公司一事上给予巴鲁克很多正确有益的咨询意见；他当时是美国市场上最大的巴西咖啡进口商，因此他说起这一农产品时常常带着一种权威语气，由不得别人不信。西尔肯预测，1906 和 1907 年巴西咖啡将欠收，前一年收成不好是由于气候原因，第二年产量偏低则是由于巴西政府有意减少咖啡产量。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咖啡产量超过以往各

个年度，价格自然是随之大幅下降，从 1905 年年初的每磅 7.65 美分跌至 1906 年 12 月的每磅 6.65 美分。巴鲁克当初是在手头现金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购进的，所以咖啡价格每下降一分他就不得不筹措更多的资金填补亏空。为了筹集资金，他甚至连手中持有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正在攀升的股票也抛了出去。这时的西尔肯却仍信心十足地认为咖啡价格一定会上涨。

很显然，咖啡市场需要紧急救援。于是，巴西政府在与西尔肯协商之后，打算制定一个计划，提供资金储存过剩咖啡，维持咖啡市场价格稳定。但是，后来尽管筹集了所需的全部资金，并用这笔资金建立了仓库，但是市场上的咖啡价格还是持续下跌。截止 12 月上旬，每磅咖啡的价格已跌至 6 美分。等到巴鲁克最后终于忍痛把手上的咖啡如数抛出时，他总共损失了 70-80 万美元。更令他伤心的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这次失败的原因，完全是由于盲目听信了老朋友的话，而正是这位老朋友曾经让他亲身感受到商品供求关系法则具有的永恒性并从中受益。由于没能对变化的市场加以分析研究，所以造成了如此大的损失，而且，为挽救这一不可能弥补的损失还抛出了利润可观的股票。可以说，这次经历让巴鲁克终生难忘。

1906 年圣诞节前后，巴鲁克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两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是巴鲁克早有耳闻的旧金山的银行家威廉·克罗克。这两位客人的到来，使刚刚经历了咖啡投资打击的巴鲁克及时摆脱了失败的阴影。克罗克向巴鲁克介绍了与他一同前来的另一位客人，内华达州参议员、戈德菲尔地区联合矿业公司总裁乔治·尼克森。尼克森当时虽然是美国参议院的在职议员，但同时还经营着自己的几家公司。克罗克在介绍尼克森时说：“尼克森现在急需 100 万，他有偿付能力”。

戈德菲尔的联合矿业公司组建于 11 月，成立后很快就以效益颇

佳闻名。该公司由四家分公司联合组成，尼克森现在想立即兼并另外一家联盟矿业公司。收购条件是必须马上交付 100 万美元定金，并在几个月后再交付 160 万美元现金或同等价值的股票，具体条件由出售者指定。但是，尼克森筹资并购的消息一经透露后，联合矿业公司的股票马上开始出现下跌趋势，结果加剧了尼克森参议员的财政困境。

巴鲁克非常欣赏克罗克的为人，而尼克森又是克罗克亲自陪同前来的，因此他认为自己应该对尼克森也表示出一定的友好态度。于是，巴鲁克找来一些商业伙伴，几个人一起组建了一个辛迪加，很快筹集了 100 万美元现金（对于巴鲁克的慷慨和热情，尼克森非常感激。这位参议员曾在 1907 年 6 月时说：“巴鲁克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实在是个大好人”）。巴鲁克为尼克森开具了 100 万美元的现金支票，尼克森则答应在 1908 年 2 月以前全部还清。作为感谢，尼克森给巴鲁克和为他提供贷款的几个朋友购买 100 万股联合矿业公司的股票期权。

随后，巴鲁克又帮尼克森解决了提高联合矿业公司在股票交易所里的交易地位的难题。他叫尼克森揣上 100 万美元的支票后，到沃尔道夫的咖啡馆里找张桌子，坐下来喝上几杯咖啡。如果有人询问他本人的财政情况，就可以大大方方地掏出这张支票，然后再说是巴鲁克为他提供的资金。尼克森参议员立即照办。果然，一切正如巴鲁克所料，当有人向他提出资金问题时，尼克森毫不犹豫地甩出了口袋里的支票，引得在场的人一片哗然。

下一步，尼克森就赶赴芝加哥与联盟矿业公司谈判收购事宜。显然，如果联盟矿业公司的人同意尼克森以购买股票的形式而不是现金购并该公司，那么尼克森的财政压力将大大减轻。与此同时，如果能让联盟矿业公司的人相信尼克森公司的股票将持续攀升，那么用股票支付收购金的方式也会对出售者有利。不管怎样，联盟矿业公司的人最终在这次

谈判中同意了尼克森以股票形式支付收购金的提议。^①

尼克森采取的收购策略获得了戈德菲尔德联合矿业公司董事会的赞同，得到了股东的批准。尼克森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巴鲁克预测股市将出现反弹，他持有的戈德菲尔德联合矿业公司股也确实开始上涨了，所以可谓皆大欢喜。

在戈德菲尔德的讨论议程上，其中之一是巴鲁克是否应该享有购买股票期权。因为新闻媒体曾对此提出了批评，而联合矿业公司的股东在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也表示出了异议。《内华达采矿新闻报》还将尼克森描述成一个金融文盲，而把巴鲁克称为邪恶天才。有人传言说，巴鲁克在一些实力强劲的利益集团支持下，准备夺取联合矿业公司的控股权。至于那些股东，他们一想到巴鲁克手中握有的购买股票期权就感到生气。但是，由于罢工不断、公司管理全面出现混乱等原因，该公司的股票最终没能保住 7.75 美元的下限。此时巴鲁克本应赶紧购进，但他没有这么做。到 9 月下旬，双方达成了妥协，巴鲁克同意放弃购买 10 万股股票期权，并同意将帮助筹集的那 100 万美元现金也主要以股票形式偿付。后来，联合矿业公司渐渐走上正轨，1909 年该公司股票红利涨至每股 90 美分。

认为巴鲁克是股市上的常胜将军——即他每次都能在股市大跌前及时抛出——的说法并非完全正确。巴鲁克本人曾于 1929 年回忆起自己早年的投资事业，亲口谈到一些失败的例证，而且还有当时的记录。在他的自传里，巴鲁克也写道，虽然自己在 1903 年所谓的“有钱人的恐怖”股市大跌之前抛出了手中的股票，1907 年也是如此，但他承认，

^① 巴鲁克的猜测并非完全正确。事实是，联盟公司想要试探联合矿业公司股的坚挺程度，故意在场外证券交易所卖出了相当数量的该公司股票。不过巴鲁克早已预测到了这一点，已经提前下达了一个收购指令，由于进出数量基本持平，联合矿业公司股没有出现大幅下滑。联盟矿业公司这才同意尼克森以股票形式支付收购金。不过，期间，场外证券交易所内却没有任何有关联合矿业公司股的交易记录——原注。

自己“同许多人一样，根本没有预料到股市会出现如此剧烈的震荡，只是猜测可能会由于政府的紧缩银根政策受到一些影响罢了”。巴鲁克写道：“为此，我特意增加了在曼哈顿银行的现金赢余，而且我还告诉斯蒂芬·贝克（国家商业银行总裁），我可能会随时要求将我的存款兑换成现金”。^①

1907 年的金融大恐慌影响到了巴鲁克的切身利益，因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股票市场和铜矿业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铜年初的价格还是每磅 25 美分，到初秋已跌至 15 美分。为此，联合矿业公司不得不关闭了蒙大拿州布特的矿井，古根海姆家族也关闭了墨西哥的铜矿。与此同时，银行方面的消息也对铜矿开采业十分不利。在 10 月份尼克伯克信托银行倒闭之前，国家商业银行也因管理人员吃进联合铜业公司股票而负债累累，犹他铜业公司尽管筹集了 900 万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巴鲁克的投资），但该公司也不过刚刚开张，对整个铜矿开采业面临的糟糕状况无能为力。10 月底，巴鲁克收到犹他铜业公司总裁查尔斯·迈克内尔的加急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速汇现金。

据巴鲁克称，当时迈克内尔提出需要 50 万美元现金，与通常情况下每天的头寸相比，这一数字高得惊人。6 月 30 日，该公司银行账面上的赢余只有 35807 美元。虽然客户还有 90580 美元未付，但该公司同时也欠其供应商 18887 美元。在这样的关键时刻，50 万美元现金称得上是一笔巨款了。10 月 24 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贷款利率上升到 100%，J. P. 摩根被迫召集投资商共同筹款 2500 万美元，以缓解这一金融危机。

^① 1911 年，波士顿新闻报刊登了一篇有关巴鲁克在这一时期的交易情况的文章。其中写道：在 1906 年被哈里曼称为股市最为火爆的时候，巴鲁克持有大量联盟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满心期待着这种股票的价格能够上涨到每股 250 美元。但是，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位朋友寄来的一本书的复印件，这本书是 1851 年在伦敦出版的，作者是理查斯·迈凯，书名为《流行幻想与民众疯狂》。在这本书里，理查斯详细地描述了有关中世纪炼金潮、十字军东征以及历史上其他一些引起公众“疯狂”的事件。这些事件都给巴鲁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投机，风潮与当时华尔街上的交易人对于铁路公司的股票的热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于是他卖出了手中持有的铁路公司的股票，开始转而期待这些股票马上就要下跌——译注。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巴鲁克还是尽量满足了迈克内尔的借款要求。巴鲁克在自传中写道，他把现金用盒子封装好，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船送到盐湖城，而且只象征性地提出了 6% 的利息，不过迈克内尔则称当时的利率是 20%。巴鲁克用剩余的资金以低价购买了犹他铜业公司的股票。^①

在那个多事之秋，看到已是 70 岁高龄的摩根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竭尽全力化解美国银行体系面临的这一严重危机，巴鲁克心中不禁产生了一丝内疚。作为股票投资领域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巴鲁克感到自己有责任与摩根并肩战斗，共同抑制正在不断高涨的公司破产浪潮。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的巴鲁克无法入睡，从头到尾仔细想了想应该怎样向摩根说出自己的打算。他想象着自己如何出现在摩根的办公室门前，然后大踏步走进去，告诉摩根自己很愿意参加他的筹款活动。巴鲁克猜测摩根一定会睁大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问自己打算提供多少资金。如今的巴鲁克，可不是当年那个挤在沃尔道夫交易所里整天进行卖空交易的年轻人了， he 现在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投资家，因此巴鲁克想象着自己会毫不犹豫地说准备集资 150 万美元。这将是一笔巨额款项，即使是一些银行，恐怕也不可能筹集到这么多的现金，摩根肯定会大吃一惊。但是，第二天醒来，天生不喜张扬的个性占了上风，巴鲁克最终还是决定以匿名的方式通过曼哈顿银行来提供这笔款项（一直倡导股市将会持续繁荣的阿瑟·豪斯曼有幸没有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打击。8 月 12 日，在他位于长岛的乡村别墅里，豪斯曼突然病逝，享年 52 岁。在豪斯曼的葬礼上，巴鲁克和西林都作了他的抬棺人）。

在 1903 年股市恐慌之前的几年里，巴鲁克还购买了橡胶制品生产公司的股票。非常巧合的是，当年在豪斯曼公司里供职时，曾担任过巴

^① 根据不同的消息来源，很难判定巴鲁克是否真的进行了这些交易。例如，盐湖城的《先驱报》、《新闻报》、《采矿评论》以及犹他铜业公司 1907 年的年度报告都未提及这些交易——原注。

鲁克指导人的米德顿. S. 伯瑞尔也同期加入了橡胶制品生产公司的董事会。对此，可能有两种解释：其一，因为巴鲁克持有该公司的股票，所以伯瑞尔才成为董事之一；其二，因为伯瑞尔加入了橡胶制品生产公司的董事会，所以巴鲁克才会投资该公司。巴鲁克喜欢随时了解自己投资的公司的发展情况，而伯瑞尔又正好能够为他提供有关橡胶制品行业的权威消息。不管怎样，橡胶让巴鲁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天，他向丹尼尔. 古根海姆提议，两人一起筹集一笔资金，买断橡胶制品生产公司的控股权，争取使这一公司发展成象美孚石油公司那样的知名企业。丹尼尔说，他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再作决定。但是丹尼尔考虑的时间太长了些，巴鲁克没有时间等他，当他注意到该公司的股票开始出现攀升势头时，就抢先购进了一批。

就在同一时期，一位名为威廉. A. 劳伦斯的发明家发现了一种可以从银胶菊灌木中提取橡胶的方法。1905 年下半年，劳伦斯向托马斯. 瑞恩和罗得岛共和党参议员、巨富内尔森. 艾尔德里奇提出给予财政支援的要求，两人把劳伦斯的要求转给了丹尼尔，而丹尼尔联想到巴鲁克正好对橡胶感兴趣，便又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巴鲁克。于是，1905 年 12 月，由艾尔德里奇、巴鲁克、古根海姆家族成员、瑞恩以及包括约翰. D. 小洛克菲勒在内的一些股东组建了大陆橡胶公司，注册资金 3000 万。根据协议，公司在托里昂地区开设一家精炼厂，按照劳伦斯的方法从银胶菊中提炼橡胶。这时，橡胶制品生产公司提出与大陆橡胶公司签订合同，等 3 年后精炼厂开工，该公司将购买生产出的橡胶原料。但是，等到精炼厂真的开工后，橡胶制品生产公司却以产品质量不合格为由拒绝履行与大陆橡胶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当时，这时两家公司都已改了名称，实际上是美国橡胶公司拒绝履行与洲际橡胶公司签订的合同。尽管巴鲁克并不喜欢凡事对簿公堂，但还是主张控告美国橡胶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因为巴鲁克认为，托里昂橡胶精炼厂生产的橡胶在质量上绝对没有

任何问题。但是，J. P. 摩根和第一国家银行总裁乔治·F. 贝克“劝说他们撤销诉讼”。但是巴鲁克并不善罢甘休，提议洲际橡胶公司在公开市场上尽量买进美国橡胶公司股，撤换美国橡胶公司的管理人员，在对该公司有利的前提下重新签订一份合同。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了洲际橡胶公司决策层的反对。最后，据巴鲁克本人称，他还试图与另外一家橡胶公司签订橡胶采购合同，但这一交易却由于对方太贪心，提出的价格太不合理而没有成交。

有过这次经历之后，巴鲁克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对手都感到了厌恶，于是他下决心撤出橡胶投资业。巧的是，巴鲁克正好在 1910 年墨西哥大革命开始之前抛出了手中的股票。而就在这次革命运动中，银胶菊生产基地被破坏殆尽，托里昂精炼厂也不得不关门停业。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巴鲁克抛售股票时，当时曾阻止他控告美国橡胶公司不履行合同的家公司却在不断买进。当时的一则新闻报道称：“当摩根公司仍在以每股 30 美元的价格大量购进洲际橡胶公司的股票时，伯纳德·M. 巴鲁克却适时地撤出了。他在这一行动中表现出的才智，可以由最近在墨西哥大革命中托里昂精炼厂被迫关门这一事件准确地反映出来。目前，洲际橡胶公司的股票已跌至每股 15 美分”。

作为一个独立风险投资家和半个投资经纪人，巴鲁克的投资经验主要依靠对市场行情的准确判断、坚强的意志以及善于游说的本领。巴鲁克属于那种具有雄才大略之人，一些具体操作的细节往往留给别人去处理。其中，小犹金·梅耶就是这么一位负责具体事务的合伙人。实际上，梅耶不仅是巴鲁克的个人金融投资公司总裁，而且还是铜业股的行家里手、后来被称为投资研究专业的先行者。

几十年后，梅耶还记得他和巴鲁克在 1909 年一起买下古根海姆家族未被认购的全部发行股票这件事情。发行股票的公司是古根海姆家族下属的布拉登铜矿开采公司，该公司从智利境内海拔 8000 英尺的安德

斯山脉西侧开采矿石。在巴鲁克和梅耶同意认购价值 150 万美元的布拉登公司可转让债券以便再向其他投资人出售时，离该公司正式开工的时间还不足两年。

（梅耶说：）[巴鲁克]对这件事根本没插过什么手——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他只不过是和古根海姆家族比较熟悉罢了。作为股票投资的合伙人，巴鲁克非常称职，因为他会不辞辛苦地推销自己手中的股票。此外，巴鲁克身后有一大批追随者，他与好多人交情不错。但是，其实他对这些人并不十分了解。尤其在法律条文方面，巴鲁克更是一个门外汉，所以每次我和其他人等都不得不帮他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对具体操作进行具体管理。巴鲁克对于我送给他审阅的文件只是象征性地画个圈签个名，大多数情况下对文件内容看都不看一眼。

在购买布拉登铜矿开采公司股这件事情上，巴鲁克甚至比往常更漫不经心，当布拉登公司提出这一要求时，他正和安妮在巴黎度假。在此之前，梅耶已经向巴鲁克提交了一份认购计划书，并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帮助布拉登公司做一些股票促销宣传。但是，1909 年 7 月，据梅耶称，布拉登公司股票上市后受到了冷落，他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古根海姆家族虽然声誉不错但却没能激发起投资者的热情和信心。梅耶于是指出要对所有细节信息进行保密——比如公众的债券认购总量仅达到 15 万美元，因为一旦这些消息泄露出去，古根海姆家族的声誉将蒙受巨大耻辱，而且还会导致梅耶和巴鲁克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活动受影响^①。在梅耶独挡一面做出了所有的决定之后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巴鲁克才从伦敦发来一封电报，称布拉登公司在大西洋对岸的股票市场上销售艰难，古根海姆家族的头衔已不再具有号召力。电报是这样的：“目标恐怕难以实现，不受欢迎。巴鲁克”。

^① 事实上，此时的巴鲁克早已不仅仅是一个跑龙套的股票交易人了。当布拉登公司的债券受到投资人的冷遇时，他不惜筹集了 100 万美元的款项帮助其进入交易市场，直到有交易人愿意出资购买这种股票为止——原注。

虽然巴鲁克对古根海姆家族的影响力感到有些失望，但他对梅耶的判断力仍然抱有信心。当布拉登铜矿开采公司股认购面临困境时，梅耶给在巴黎的巴鲁克发电说，他预计美国国内钢铁市场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尤其是美国钢材公司股将大幅上扬。这份电传意义非凡，因为梅耶是站在一个丝毫不逊于 J. P. 摩根的所有理论的高度上对美国钢材公司上市股票发展趋势进行阐述的，这种带有深入研究性的报告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梅耶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是出于美国钢材公司的股票红利持续上升。他发给巴鲁克的电报称，[美国铜材公司] 6 月份的收入高得非同寻常，股票销售势头良好，而且到 10 月或第二年 1 月股息可能还会上涨。巴鲁克收到梅耶的电报后，于 7 月 30 日进行了回复，回电称：“巴鲁克定于星期一投资美国钢材 92 万”。10 月 26 日，当第二次红利真的如梅耶所预测的那样继续上涨时，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了 18%。

在决定购买布拉登铜矿开采公司未被认购的所有股票时，巴鲁克和梅耶本打算凭借这一收购拥有买卖该公司的股票期权，使自己的投资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8 月份回到纽约后，巴鲁克和梅耶两人决定对当初与布拉登公司签订的合同进行一些修改。巴鲁克后来写道：“我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让我们现在就收购布拉登股票，或者在我们对买卖股票期权进行修改之前，向其他投资人出售股票都不可行”。从表面上看，巴鲁克和梅耶与古根海姆家族至少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即由他们两人负责具体运作，使布拉登公司的上市股票能够全部销售出去。这一协议在当时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根据 1934 年制定的证券交易法的有关法规，这种做法属于违法行为。

购买布拉登公司股票一事给巴鲁克带来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但为另外一家古根海姆家族的下属公司提供资金的投资项目却使巴鲁克在很短时间内就获利颇丰。这是一家制铜公司，在智利拥有的察基卡马塔矿

井比犹他铜业公司位于宾哈姆的矿井规模更大、所在地更偏僻但蕴藏更丰富。察基卡马塔矿井在 1836 年以前一直由英卡思公司开采，1913 年时根据特拉华法加入智利制铜公司。1915 年，当铜价为每磅 20 美分时，察基卡马塔矿井的开采成本为每磅 6 美分。小犹金·梅耶发现这一聚宝盆后，就开始与古根海姆家族谈判认购价值 1500 万美元的可转让债券事宜（古根海姆家族的声誉此时也已恢复如初）。巴鲁克这次又参与了梅耶的认购计划，结果证明这是巴鲁克一生当中收益最大的一次投资。

巴鲁克自从进入风险投资行业以来，让他在最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感到失望的一次经历，就是投资阿拉斯加詹尼尔黄金开采公司。该公司于 1800 年就划定了位于詹尼尔市郊盖斯汀诺海峡岸边的一块矿产土地。一位名叫弗莱德·W. 布莱德勒的知名工程师对这块矿区的黄金开采前景非常乐观。该矿区矿床较浅，又正好与丹尼尔·杰克林投资的阿拉斯加金矿公司的矿区相邻。1915 年，阿拉斯加詹尼尔黄金开采公司决定发行 40 万股股票，并请巴鲁克认购全部股票。巴鲁克同意了这一请求，不过这次他又同样邀请了小犹金·梅耶与他一起完成投资计划。

但是，在阿拉斯加詹尼尔黄金开采公司公开宣布这一认购计划之前，华尔街交易人不知怎么都听到了一些风声，天天有人找巴鲁克认购该公司股票。一位供职于巴尔的摩一家公司的经纪人给巴鲁克写信道：“亲爱的巴鲁克先生，不知您能否关照一下一个来自乡下的朋友？我只想请您卖给我几百股阿拉斯加詹尼尔黄金开采公司的股票”。但巴鲁克已无法满足这位经纪人的要求，因为所有的股票转瞬间已经销售一空。甚至在股票价格尚未确定之前——对此巴鲁克非常气愤——场外证券交易所就开始对该股进行场外买卖了。《华尔街日报》将这种超前需求称为“史无前例、绝无仅有”。最终，交易人认购的股票数量竟然超过了实际印制和流通总数的 4 倍之多。

巴鲁克和梅耶每人都以每股 10 美元的价格出售了 10 万股阿拉斯加

詹尼尔黄金开采公司股，佣金是每股 1.75 美元。此外，巴鲁克还得到了在 6 月底之前能以每股 8 美元的价格购买 75000 股的期权。这就是说，无论这种股票的市场价格如何变化，巴鲁克都有权享有 8 美元购入价的优惠。4 月 15 日，就在阿拉斯加詹尼尔黄金开采公司刚刚计划请巴鲁克认购该公司所有股票后 3 个星期，该股市价已攀升至每股 15 美元。但到 7 月底，又回落到了 9.5 美元。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自此之后，阿拉斯加詹尼尔黄金开采公司股开始持续下跌，最后几近一分不值。第一个不好的消息是由于经营不善，杰克林决定终止其位于阿拉斯加詹尼尔黄金开采公司旁边的阿拉斯加金矿公司的黄金开采活动。此外，即使是阿拉斯加詹尼尔黄金开采公司本身，据采矿历史学家 T.A. 理查德称，该公司的加工厂在设计上“有明显失误”，导致生产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到 1916 年年底，该公司市价每股 7.75 美元。到 1917 年跌至 2 美元。1920 年，公司总裁弗莱德·布莱德勒不得不请各位股东出资购买公司债券，以补足用来恢复采矿和加工程序所需的资金。在筹款会议上，小犹金·梅耶对布莱德勒的提议毫不客气地回绝了，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与阿拉斯加詹尼尔黄金开采公司的关系是，我对它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我却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至少现在看来，我所拥有的股权还不至于让我又以 6% 的利率购买价值 42.5 万美元的债券，我敢确定，大部分收益最终将被美国政府收归国库”。

梅耶的这番话使布莱德勒最后仅得到了两笔各值 500 美元的投资，于是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部分资产贡献出来。布莱德勒的这一举动感动了包括巴鲁克在内的一些大股东，于是大家都慷慨资助，最后总共筹集了 190 万美元。布莱德勒之所以不愿意放弃挽救阿拉斯加詹尼尔黄金开采公司的努力，主要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声誉和该公司的发展前景息息相关，而巴鲁克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表示愿与布莱德勒并肩战斗。直到

1931 年，阿拉斯加詹尼尔黄金开采公司才开始扭亏为赢。到了 1934 年，当金本位制被取消，美元价格相对黄金开始贬值时，阿拉斯加詹尼尔黄金开采公司的利润大幅度增加，公司股东们也都喜笑颜开，巴鲁克尤其获利颇丰，因为在此之前他早已预计到美元将会贬值，所以一直在大量收购黄金——对于巴鲁克而言，这笔横财也算是对他长期从事投资事业的一种回报吧！

第六章

“他是犹太人！”“可他是巴鲁克！”

作为百万富翁，巴鲁克最大的爱好是环游世界，他的声望和地位使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当年，火车是一种大众交通工具，但巴鲁克已经拥有了属于他个人的旅行专列。而且，巴鲁克很早就对驾驶汽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拥有的第一辆汽车是一种 8 或 10 缸的 PANHARD 轿车。第一次上路时，汽车发出的轰鸣声把大街上的马匹吓得到处乱跑，周围的邻居更是大为不满，其中包括巴鲁克的合伙人小犹金·梅耶的父亲。巴鲁克购买的第二辆汽车是一辆黄颜色、40 马力的梅塞德斯汽车，当时售价 22,000 美元。后来在新泽西州朗布兰奇举行的一次汽车比赛中，巴鲁克驾驶着这辆汽车以近 100 公里的时速战胜了驾驶国产汽车的美孚石油公司董事 A.C. 伯茨威克。事实上，巴鲁克酷爱高速驾车的天性甚至帮助他摆脱了严重的晕船病，后来他还与弟弟哈丁一起买了一艘 190 马力的快艇，闲暇时到海边驾艇兜风。1906 年，由美国摩托艇俱乐部组织的在哈德森河上进行的一次国家杯快艇大赛上，巴鲁克和哈丁以一个艇头的微弱优势夺得了冠军。

驾驶汽车方面，巴鲁克丝毫不比他雇佣的司机本领差，甚至可以说超过专业司机的水平。1908 年，在纽约西区第 55 大道上，巴鲁克的私人司机驾驶着他的汽车冲上了人行道，据说还撞倒了一位行人。其实，早在 1901 年就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出事当天，巴鲁克打电话告诉他的司机说：“你今天可以休息了。我马上要到纽黑文去一下”。后来在法庭上，这位司机承认自己知道在没有得到老板允许的情况下不得驾车外出的规定，但他觉得反正老板有事外出，何不趁此机会出去过一把瘾呢？于是他就开车到巴鲁克林观看了一场汽车比赛。但就返回途中，撞倒了一位当时正过马路的行人。为此，法庭判决巴鲁克支付 1000 美元医疗费。这位司机好象名叫赫里奇·黑尔吉巴奇，从巴鲁克购买这辆车起就一直担任他的专职司机，巴鲁克对他的评价是，一个“不喝酒时头脑清醒而且非常善良的人”。不管这位撞人的司机到底是不是赫里奇，反正

据法庭记录，最终巴鲁克并没有因此而辞退这位司机（1913 年，巴鲁克的母亲曾经对儿子这种过于放纵司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她说：“你必须让你的司机知道他开车速度不应该过快，否则在行人也不太注意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出车祸”）。夏季来临时，巴鲁克一般会到欧洲旅行，这时他往往会带上一辆汽车，以便随时可以过一把瘾。

事实上，要与巴鲁克合伙做生意或者掌握他的行踪都非易事，因为他大多数时间里都在不停地四处周游。每年巴鲁克都要在美国东西南北走个来回，以便对各地的地理环境有一个细致的了解，这对商业投资非常有利。夏天他一般到欧洲度假；冬季来临时则会有一大部分时间住在南卡莱罗纳州的一个水上庄园里。这座名为赫伯考的庄园取自印地安语，意思是“水流之间”。巴鲁克一直把这座庄园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而巴鲁克的大女儿贝勒则称这里是她的第一故乡），因为在这里，巴鲁克能够真切地感到自己与来自南方的父母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这座水上庄园的第一位主人是约翰·卡特瑞勋爵，当时他受到查尔斯二世的犒赏，拥有了这块面积 12000 亩的田地。这块位于大西洋和瓦卡马河之间的狭长土地实际上并不止 12000 亩，它的真正面积是 13970 亩。卡特瑞勋爵与巴鲁克两人至少在两个方面上拥有共同点。首先，他们俩都对开采贵金属非常感兴趣；第二，两人都非常健谈而且说话风趣幽默。但是，卡特瑞勋爵却从未看上这块受赠的土地，所以在 1730 年以 500 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一位名叫约翰·罗伯特的英国人。这一转让交易声明买者有权在这里进行伐木、打猎、放牧、钓鱼以及其他不包括开采金银矿在内的活动，因为对贵金属情有独钟，所以卡特瑞一心想把这里的矿藏归为己有。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最终证明这座庄园里并未蕴藏什么金银矿。

到 19 世纪末，这座水上庄园已经被分成了好几个小庄园，庄园西岸的沼泽地种上了水稻。1875 年，一位名叫罗伯特·詹姆斯·道纳德森

的苏格兰人买下了这里大片的田地。1904 年，道纳德森的 3 个儿子决定出售这块地。此时，巴鲁克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买主之一。一家当地报纸将巴鲁克描述为一位“风度翩翩、谈吐优雅”、“见多识广”而且“年轻有为、聪明过人”的投资家。对于道纳德森家族而言，虽然这块土地的农作物产量并不低，但由于偷猎者频繁入侵，以及其他方面原因，他们最终决定卖掉整个庄园的 3/4。谈判时，巴鲁克采取的策略是见机行动，不急于出价。为此他拒绝了在 1904 年圣诞节期间正式出资的建议，将购买日期延长到了第二年 2 月，最后，直到 1905 年 5 月，巴鲁克才以 2 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总面积为 10000 亩、包括弗兰德菲尔德种植园及另外几块面积不大但名字非常好听的港湾田地在内的大片庄园。1906 年，巴鲁克又以 25000 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位于费兰德菲尔德种植园北部、与其毗邻的 2522 亩土地；接着又于 1907 年以 10000 美元买下了再往北的另外 2500 亩田地。这样，巴鲁克总共拥有了 15000 亩土地，此外种植园工居住的民房以及先前庄园里的农奴和他们的家人聚居的 4 个小村庄也归巴鲁克所有。为此，巴鲁克共花费了 55000 美元，相当于 1200 股美国钢铁公司的价格。1912-1913 年，曾到这一水上庄园游玩过的客人哈里·佩尼·威特尼主动提出以 100 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这座庄园，被巴鲁克婉言谢绝。最后，巴鲁克将这笔财产交给女儿贝勒管理，贝勒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并立下遗嘱将庄园用于海洋和生物研究。

对巴鲁克来说，这座水上庄园的魅力之一在于它非常偏僻，一般人极难到达。要从纽约前来这座庄园，必须先乘火车到达南卡莱罗纳州的乔治敦，再乘船穿过温亚海湾才能到达离庄园较近的一个码头。码头附近有一所道纳德森家族曾经居住过的、被称为费兰德菲尔德屋的院落。这所院落中的房子全部是木制的，由白色的立柱支撑，房屋上安装着又高又宽的百叶窗，屋外还有非常宽阔的门廊。建造房屋的桫木上已经长

满苔藓。春天，屋外的草坪上到处是杜鹃花和木兰花，就如一个大花园。到了这个码头后，还要再经过一段公路才能到达巴鲁克的居所。由此可见，要参观一下巴鲁克的水上庄园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而且还有毅力。这条连接费兰德菲尔德屋与巴鲁克住所的公路被称为“国王路”，路面没有经过仔细铺垫，蜿蜒曲折，总共大约 5 英里长，全部属巴鲁克所有。道路两边长满了各种树木，形成一片浓密的树林，树林边上则不时地出现一处处阴暗的沼泽地。在这里，每两天才会有邮差从乔治敦送来一次信件，如此偏僻的地方，巴鲁克却说什么也不同意架设电话线。妻子安妮生气地在客人留言簿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没有电话，这里怎么住人？”

水上庄园到处都是潮湿的沼泽地、未耕种的稻田、茂密的森林以及潺潺的小溪，到处生长着各种水生植物和动物。刚来这里不久时，巴鲁克曾经遇到过水獭、撞见过野熊甚至踩到过野猫。这里还生长着一种野鹿（在一本客人留言簿上，巴鲁克的儿子小伯纳德·M. 巴鲁克曾经用幼童的笔迹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喜欢小鸭子，不过更爱可爱的小鹿！”）还有野猪、小鹬、鹌鹑和丘鹬等动物。其中野火鸡数量最多，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有时甚至会阻塞国王路的交通。在河岸边或是小溪里，还总能看到牡蛎、泥龟、土鳖、鲈鱼、鲷鱼、牙鳕、美洲河鲱、鲱鱼以及螃蟹的踪影。生态循环中出现的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沼泽地边上的牡蛎壳总会扎伤动物们的脚爪。有一次贝勒开枪打死了一只短嘴鳄，12 岁那年她杀死过一只野鹿。《纽约先驱论坛报》在报道 3 个偷猎者由于私自侵入巴鲁克的庄园而每人被判 8 个月刑期的事件时，顺便提及了这一事件。

对那些喜欢户外活动的客人而言，巴鲁克的水上庄园最大的诱惑在于打猎。当然，并非每一位客人都喜欢这种运动（巴鲁克的朋友、报业巨头海伍德·布朗恩就拒绝了巴鲁克的狩猎建议，他说：“我只在睡梦中

才敢参与这种活动”)。为了打猎，猎人们必须早早起床，在打猎前一天晚上坐马车赶到位于一大片沼泽地附近的小木屋住下，然后在黎明前起身，吃完烤肉和粗燕麦粉早餐、喝完热咖啡之后，立即划船到沼泽地深处，在那里耐心地埋伏着等待猎物找上门来。很快，一些黑色的大鸟出现在淡粉色的天空中，当它们一只只开始向诱饵飞去时，狩猎者手中的枪一阵狂响，枪声响彻天际。由于野鸭总是成千上百只地飞来，所以被客人们乱枪击中的非常多，因此每次大家都能满载而归。到了 20 年代，猎物越来越少，再到巴鲁克水上庄园里来打猎的客人发现，用来装猎物的口袋显得有点大了（这里的野鸭数量一天天减少，美国政府对股票市场的管理却一天天严格，包括巴鲁克在内的投资商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大幅度增长。总而言之，对巴鲁克而言，这段时间可不能说“顺心”）。有一次，威尔逊的总检察长托马斯·W. 格瑞格里当着巴鲁克的面，用一种略带怀疑的语调对即将上任的复兴金融集团总裁杰西·琼斯说：“杰西，你最好先保持安静，让我们大家来听听巴尼对股市的看法，我想他肯定又要撒谎说自己庄园里的野鸭子一只都没少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水上庄园实际上是属于巴鲁克一个人的私有财产。他甚至经常提醒自己的朋友说，每次他们接到的住宿邀请都是他本人发出的，妻子安妮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位普通客人而已。总的来说，巴鲁克对自己的婚姻持一种夫妻互不干涉的态度。水上庄园和他后来为了夏天有地方打猎而在苏格兰租下的城堡都属于他本人的领地；而位于纽约西区 52 号大街 6 号、巴鲁克一家自 1905 年之后一直居住的那幢 4 层豪华小楼则显然是安妮的地盘。第四层除外，那里是他的。事实上，安妮对于金融股市、打猎以及桥牌（巴鲁克玩桥牌时一向非常认真）等等都不感兴趣，她不理解丈夫为什么会把这些活动看得如此重要，这就好比巴鲁克本人对妻子精心收集英国古董银器和家俱时表现出的那种热情感到不可思议一样。在很少有的一次公开提及妻子的谈话中，巴鲁

克把安妮说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30年代，朵罗斯·斯奇夫有一次与巴鲁克夫妇一同参加一个大型宴会，他说安妮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是，安妮与巴鲁克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种人。难怪自安妮于1938年去世后，巴鲁克与许多不同类型的女性有密切的交往。事实上，早在安妮去世之前，就有传闻说巴鲁克对妻子不忠。不过在这方面留下的唯一证据，是曾经写过著名的情诗《拉丁情人》的海伦·劳伦森后来亲口表示，她的这首情诗正是受到了巴鲁克的爱情激励才创作出来的。在巴鲁克去世10年后，海伦称巴鲁克就是自己梦中的拉丁情人。

贝勒于1899年出生，之后巴鲁克夫妇又先后生下了两个孩子：小伯纳德·巴鲁克于1903年出生，瑞妮于1905年出生。在自己是否尽到了父亲义务这一问题上，巴鲁克总是坦陈他是一个失败者。他建议其他父母不要学他，而应该趁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尽量与他们呆在一起，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父母亲情，因为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家庭矛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巴鲁克是一位经常不在孩子身边的父亲——除了因为生意上的原因必须经常出差之外，他还要花时间打高尔夫球，晚上还不时有应酬，巴鲁克虽然每个夏天都与妻子一同去欧洲旅行，但由于种种原因，孩子们并非每次都一同前往——但是，每当孩子们受到挫折和打击的时候，巴鲁克所表现出的那种悲伤则表明，即使没有在孩子们身边，他同样对他们关爱有加。这样的事情最早发生在长女贝勒身上。当时，巴鲁克的一位好友、洲际橡胶公司总裁霍沃德·佩奇的女儿与贝勒关系特别好，而佩奇的女儿考入了位于曼哈顿的布瑞尔利中学，所以她鼓励贝勒也报考这所学校，这样两个人就可以在一起读书了。1912年，13岁的贝勒真的报考了这所学校，而且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但是最终却没有被录取。很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件事时，巴鲁克称，贝勒未被录取的主要原因就因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这件事的确是我一生当中遭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击，因为它使我的

孩子受到了不必要的伤害，使我的心灵在后来很多年中都隐隐作痛。造成我女儿不能进那所学校的人们声称，他们不能让贝勒入学损害学校的声誉，因为她是伯纳德·巴鲁克的女儿。我想只能有这么一个原因，即宗教信仰。事实上，在此之前校方已经批准了两个犹太女孩入学，但他们说不能再收第三个这样的学生了。当初那位阻止了贝勒入学的男校长后来官运亨通，社会地位非常高，他的妻子也是一位积极参与民主党活动的政治人士。其实我完全有机会对他们进行报复，但我没有这么做。我相信那位男士肯定以为到我会对他做些什么，后来他得到一次升迁机遇，有人邀请他到联邦储备银行供职，地位相当高。这时有人对我说：“现在可以好好治他一下了”。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办法不让他得到这个职位。于是我又被告知：“你只需对麦克阿杜（威廉·G. 麦克阿杜，威尔逊总统执政期间的财政部长）说你不希望这个人当选就够了”。但是，我后来又一想，觉得自己没有权力用这种方式实施报复，如果我这么做，就会使国家的公职人员滥用手中的权力，因此最后我什么也没有做。这位男士的妻子当时与许多政治组织都有联系，但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我与她之间的那段不快，我想我唯一采取的报复行动就是我本人从不向任何有她担任董事的委员会捐款。现在，我心中的那种痛苦和内疚感已经有所减轻，但可能永远都不会完全消失。我想，我会原谅他们对我个人所做的任何事情，但为什么他们偏偏要让我的女儿因为我而遭受打击呢？

事实上，虽然巴鲁克出生于犹太家庭，他本人对犹太教根本谈不上丝毫的笃信。而且，他总是在能够避免冲突的情况下尽量不采取过激行动，再加上巴鲁克天生与人为善，所以在非犹太教的社会里，他能够做到如鱼得水，从不被视作外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巴鲁克可能更愿意生活在犹太教之外的圈子里。例如，巴鲁克是 RECESS 俱乐部的会员，在这里，一些犹太教的会员可以和非犹太教的会员共进午餐。另外，巴鲁

克还与安妮一起参加了新教徒社会团体，由于他们的这一举动，夫妇俩于 1905 年双双入选“社会名人录”，而在 20 世纪的前 20 年，边斯奇夫或古根海姆家族的成员都没能享受到这一荣誉。后来，就连巴鲁克女儿的姓名也不时出现在诸如赛马等新闻报道中（贝勒酷爱骑马，得过赛马冠军）。1911 年夏天，巴鲁克全家，包括巴鲁克的父母出国旅游的消息见诸报端。1920 年，巴鲁克是纽约市市立大学董事会中的唯一一位犹太人。30 年代，弗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帕金斯甚至干脆把巴鲁克划入了非犹太人的行列。

与此同时，巴鲁克虽然非常注意尽量融入社交界，但他也知道有些界限是不能跨越的。有一段时间，巴鲁克加入了作家俱乐部，但谢绝了大学和都市俱乐部的入会邀请，因为他的岳父本杰明·格瑞芬是大学和都市俱乐部的会员。后来，当他的一位商业合伙人、高尔夫球友约翰·布莱克邀请巴鲁克加入他本人任董事、位于昆西区的欧克兰德高尔夫俱乐部时，巴鲁克同样感到有些犹豫。他知道这家俱乐部对会员的身份要求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俱乐部成员清一色全都是非犹太人。可是同时，巴鲁克与布莱克的关系又确实非常密切，因为他和布莱克与另外两个高尔夫球友，包括巴鲁克的大学同学迪克·林登和詹姆斯·特拉威斯经常组队去欧克兰德俱乐部打球。詹姆斯·特拉威斯是巴鲁克两个弟弟的商业合伙人，当他们两个在 1903 年依靠巴鲁克的财政支持组建了一家经纪人公司时，特拉威斯曾经与他们合作过。据巴鲁克称，他们四个人的这一经常性活动最后都快转变成下意识的了，因为如果隔一段时间他们没有集体出动去打球，大家都会感到生活中缺少了些什么。巴鲁克说，他们四个人通常是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周末时间或是节假日上下午各打 18 洞，这种活动直到 20 年代特拉威斯和布莱克相继去世后才不得不停止。布莱克希望巴鲁克加入欧克兰德俱乐部的提议是在 1909 年提出的。

提出上述建议时，布莱克向巴鲁克保证说，宗教差异与能否加入该

俱乐部并无直接关系。纽约证券交易所前总裁 H. J. 普姆罗伊也向巴鲁克做出了类似担保，并宣称将大力支持巴鲁克。于是，巴鲁克接受了布莱克的建议。但事实证明，巴鲁克的入会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阻力。略感尴尬的巴鲁克主动提出放弃，但布莱克和普姆罗伊却不同意。这一入会事件还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最终，赞同巴鲁克入会的同盟军又增加了一个人——巴鲁克在未注册委员会的同事、该俱乐部董事詹姆斯·摩本——经过投票表决，巴鲁克最终被吸收进了欧克兰德俱乐部。

十多年后，又发生了一件类似事情。20 年代初，众所周知，赛马俱乐部不欢迎犹太人入会，而只有该俱乐部的会员才可以在贝尔蒙德公园内的赛马场上进行骑术练习和参加比赛。对于这种有失公正的规定，一向对养马和骑马都非常感兴趣的巴鲁克表面上没有表示出明显的不快。直到赛马界最知名的人物奥古斯特·贝尔蒙德询问他的意见时，巴鲁克才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回答说这一规定对于赛马界将产生恶劣的影响，势必将赛马运动引入歧途，使其失去在公众中享有的良好声誉。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巴鲁克使用了一个他最喜欢的口头语，说所有的人都有权享受公平的待遇，“不管他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但贝尔蒙德却接着说，巴鲁克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既然他从不亲自参加骑马比赛，也就没有必要为此生气了。对此，巴鲁克针锋相对地回答说：“你尽管放心，只要有你这样的人在赛马界指手划脚，我永远也不会为这种小事生气，不然弄坏了身体可就太不值得了”。此后一段时间，巴鲁克不仅从未踏入贝尔蒙德赛马场半步，而且还把自己的马厩交给赛马界一位名叫凯瑞·格雷森的朋友照管。后来，在吸收巴鲁克加入赛马俱乐部问题上争论双方长期相持不下，巴鲁克好几次拒绝了一些朋友的入会邀请。但最后由于赞成入会的人占了多数，而且该俱乐部同意在对犹太人入会的问题上采取更为宽松的标准，巴鲁克才勉强答应了加入这个俱乐部。

41 岁的巴鲁克已是美国股票界身份显赫的一位要人，他的行踪自然成了财经新闻报道的对象。巴鲁克一离开纽约，各种消息就充斥报端，仿佛巴鲁克不在股票交易所露面就预示着股市又将出现经济实力大调整的新格局。例如，1911 年 6 月 23 日，有一段财经新闻称，“根据消息可靠人士，今天中午之前的一段时间股市出现抛售热潮，主要原因是巴鲁克从下周六起将离开纽约到外地度长假”。再比如，1912 年 3 月 6 日的一段财经报道称，“很多纽约股市交易人今天感到行情不妙，原因之一是伯纳德·M. 巴鲁克即将出门度短假——事实上，大多数交易人显然已经把纽约股市视作了巴鲁克的私人财产，一旦他有事离开就会把好运也一起带走”。同年 3 月 10 日，《纽约世界报》在报道巴鲁克即将启程到他的水上庄园度假时，称巴鲁克是一位“华尔街上所有大宗投机交易中最有影响力的领军人物”。26 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对自己在市中心偶然听到的两位股票交易人之间颇有趣味的谈话进行了报道：

一位交易人说：“你知道巴鲁克正在收购雷丁公司的股票吗？”

另一位交易人回答说：“我才不相信这种传言呢！巴鲁克现在正在南方度假打猎呢”。

第一位交易人又说：“我没法不相信，你不知道，巴鲁克随身携带的火柴盒里装着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可以随时进行各种交易！”

1912 年秋天，当巴鲁克的个人资产达 1000 万美元时，一些新闻报道却说他已“发”到了 2000 万美元。对于媒体的过分夸大，巴鲁克一反常态，爬到一根柱子上，对在场的公众说：“股票市场的前景将一片光明，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事实却证明巴鲁克的预言并不正确。直到 1915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道·琼斯 30 种工业平均指数才又重新回升到 1912 年 12 月 8 日巴鲁克做出上述预测时的股市最高值 94.12 点。铁路建筑业的股票价格更是到了 1927 年才又攀升回 1912 年

10月5日的最高值124.35点。尽管如此，巴鲁克的声誉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丝毫损害，就在他于1913年离开纽约赴欧洲度假不久，纽约《每日电讯报》还对巴鲁克的离开可能对纽约股市的巨大影响进行了分析报道：

“巴尼”巴鲁克起程赴欧洲——他是昨天乘船离开纽约的。除了他的家人和好友外，这条其实早已是例行性消息的报道一般不会引起大家过多的关注，但在目前情况下，这一消息可能具有比表面看来重要得多的意义。

正如本报在最近的报道中经常指出的那样，伯纳德·巴鲁克是一位始终站在改革纽约股票市场、使其永远充满活力这一行动前列的倡导人和实践家。正是由于以他为代表的许多人的不断努力，股票市场才从大恐慌中恢复过来，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

巴鲁克身后是好几位拥有数千万美元资产的华尔街“巨头”，而巴鲁克本人则在这些人的支持下毅然承担起了挽救股市的重任。在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过程中，巴鲁克身上所具备的智慧和才干得到充分体现。事实上，自从他开始掌控纽约股市，积极致力于抬高股价以来，联盟太平洋公司股已上升了14点，美国钢铁公司股上升了10点，其他大公司的股票相应都有所上涨。

现在，这位“纽约股市里最能干、交易量最大的交易人”已到欧洲去度假了。可以说，巴鲁克早就该好好轻松一下了。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他为纽约股市投资交易所作的贡献的确突出。另一方面，由于他占据着旁人不可替代的地位，所以巴鲁克的暂时离开也将使华尔街强烈地感受到他留下的空白。人们可能会问：“缺了巴鲁克，股市岂不

是失去掌舵人了吗？”^①

新闻媒体将巴鲁克视为股票投资家并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这让库恩列伯公司的保罗·沃伯格和杰科伯·斯奇夫两位银行家非常生气。他们认为巴鲁克在股市上的一些做法简直令人鄙夷（詹姆斯·P·沃伯格援引他父亲的话说，巴鲁克在股票买卖中只会做卖空交易，但事实上，詹姆斯本人在情况需要时也做这个）。而巴鲁克对自己在金融界的地位有两种不同的想法。一方面，他坚持认为投机交易不仅必要而且还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投资方式。另一方面，对于某些行业，尤其是采矿业和农业，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方式，与通过股票交易获得财富的方式，巴鲁克更倾向于用“有建设性”（Constructive）这一词语来区分前者与后者的不同。事实上，要定义巴鲁克在股票投资行业的作用相当困难。他为获利而工作，他拥有自己的办公场所，他有权挑选自己喜欢的交易，甚至他使用的信纸上都印有“伯纳德·M·巴鲁克”的字样。巴鲁克与古根海姆家族成员、小尤吉·梅耶以及其他很多金融界的头面人物都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但他却不必承担由于隶属于某家大型金融机构而必须从事某项投资交易的义务。1912年，当国会对美国的金融市场被华尔街几大巨头称霸的局面表示不满时，一位股票交易人接受了记者格瑞特·戈利特的采访，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根据谈话内容，人们感觉这位交易人就是巴鲁克，而格瑞特·戈利特“恰巧”是巴鲁克的一位密友。采访中，记者询问这位未透露姓名的投资人，所谓几个富翁和大型金融机构掌握美国财政大权的状况对他有何种影响，那人回答说：

“我根本就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你知道为什么吗？……嗯，首先，我从未向他们借过钱，其次，我在股票市场投入的精力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多。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进行过他们以为的那么多宗股票交易。

^① 事实证明几乎如此。自巴鲁克于1913年8月7日离开纽约之后，从6月11日开始的股市上扬到9月13日已开始出现下滑趋势——原注。

这些人好几次想把我搞垮，他们以为把我逼得走投无路了，其实并非如此。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人告诉一位朋友说：“就在我们认为他已经完蛋了的时候，却发现这家伙又活过来了”。这位朋友后来又把这话转述给了我。其实，说这话的人之所以对我怀恨在心，就是因为在一次稻谷交易中我占了他的上风而矣。后来他们还试图把我也拉入那个圈子，让我在进行交易时与他们保持步调一致，不过我这人生来行事谨慎，知道自己不应该按照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我只喜欢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不愿意受人摆布”。

如果说这位人士所说的“他们”指的是那些大型金融机构，那么巴鲁克也应该算其中一员，因为他至少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之一。巴鲁克对自己担任的这一职务非常认真，他坚持原则，积极参与委员会的活动，与众人意见不一致时就无条件服从。^①同时，巴鲁克又是一位非常有主见的董事，他认为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许多交易规则都不够健全，如果根据纽约州的相关法律使交易所实行股份制倒不失为一件好事。但是，当时金融界的一致看法却是，股票交易所里并没有出现多少违规操作，而且根据政府法律实行股份制将使董事会的管理权受到削弱，所有的董事也会因此而处于政府法规监督之下。为此，《波士顿新闻》称巴鲁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哲学家，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被华尔街称作高标准商业道德的东西。他认为，商业买卖中奉行的所谓‘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理论已经在金融领域被运用得过了头，而下一代投资人肯定会对他们这一代华尔街交易人以获利为目的从事的一些投资活动抱以嘲讽的态度”。

不过，尽管巴鲁克在某些问题上观点鲜明，但他还不至于自负到欢

^① 例如，与大多数证券交易所董事不同的是，巴鲁克曾经主张帮助威廉莱姆比尔夫人获得应有的补偿。莱姆比尔先生是巴鲁克的一位朋友，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他于1913年不幸死于一场车祸。事实上，自1907年股市大恐慌之后，莱姆比尔由于损失惨重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他死后莱姆比尔夫人因为不能偿还欠款而被迫转让董事一职，而转让费也分文都不能得到。巴鲁克对莱姆比尔夫人非常同情，正如他对大多数女性都持怜惜态度一样，他主张给予莱姆比尔夫人7.5万美元的补偿费。但是，最终由于多数董事不赞成他的意见，巴鲁克也就只好做罢——原注。

迎政府对股市采取干预措施的地步。1913 年，巴鲁克参与了一部反对政府不合理干预纽约证券交易所事务的书籍编纂工作。在这部书中，巴鲁克负责撰写了其中的一个章节《卖空交易和证券买卖》，长 67 页，主要阐述了一些金融法规的问题（众所周知，虽然巴鲁克后来自己出资将这一章节单独出版，但他却拒绝署上自己的名字）。其核心观点是，卖空交易是一种有益的投资方式，政府对于股票投资领域的干预往往弊大于利。同时，股票投资领域的自我管理也存在不足有待改进。应该在正当与非正当操纵股票价格的行为之间加以区别。例如，如果交易人在向一位经纪人提出购买意向的同时，又向另一位经纪人提出抛售意向，而且购买和出售的都是同一种股票，两位经纪人也互不知道对方的交易内容，那么这一交易就是正当的（进行这种交易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增加股票买卖频率，至少在短时间内创造一种股市成交量增加的迹象以便吸引公众更多地参与。巴鲁克写道，这种人为制造交易假象的做法被视为“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投机交易模式”）。但是，如果上述交易是由经纪人事先安排好的，那么这种操作就带有欺骗性，根据普通法和股票交易所制定的相关法规应该受到处罚。

此时的巴鲁克在积极参与公职活动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和野心。1909 年，他对竞选纽约市市长的威廉·戈诺产生了好感并大力资助他的竞选活动。竞选获胜后，戈诺于 1910 年任命巴鲁克为市立大学董事。1912 年 6 月戈诺市长以民主党人身份亲自参加总统竞选，他特意派遣了包括巴鲁克在内^①的一个代表团赴巴尔的摩参加在当地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以争取候选人资格。在该大会期间，一天晚上当巴鲁克正舒舒服服地坐在会议大厅的一张躺椅上休息时，主张货币采用银本

^① 巴鲁克这次出行使一些股票经纪人产生了很多猜测。其中一位经纪人说：“……伯纳德·巴鲁克进行卖空交易后还应补足 30 万股，但他在巴尔的摩会议期间是不可能买进什么股票的。因此，我断定他在临走之前肯定会再购进 20-30 万股。我知道，巴鲁克一刻都离不开股票”——原注。

位制的主要倡导人、金融界的敌人威廉·杰宁斯·布赖恩^①突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动议：

朋友们，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民主党的发展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这次全国大会向美国人民送去了我们的问候，并向他们保证，以杰弗逊为代表的民主党人仍将是倡导民主自治政府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先锋。作为我们忠实于广大民众的一个证明，我们在这里庄重声明，反对提名那些代表 J.P. 摩根、托马斯·F. 瑞恩、奥古斯特·贝尔蒙或其他任何属于只顾追求特权和寻求优待阶层的人或得到过这些人的恩惠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还决定，要求那些属于或代表上述阶层的与会人员立即退出本会场。

布赖恩一说完这番话，会议大厅里立刻乱成一团。心情有些紧张的巴鲁克赶紧偷偷瞄了一眼瑞恩，发现瑞恩呼地从弗吉尼亚州代表团里站了起来，大打出手。那些被布赖恩勒令退出会场的金融巨头们没有一个走出会议大厅。而据称获得民主党最后提名的伍德罗·威尔逊在此之前非常谨慎，没有接受被布赖恩点名指责的三个“民主党巨富”提供的竞选捐助。

等到巴鲁克有机会见到威尔逊时，总统大选已近尾声。这次会面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与巴鲁克同为纽约市市立大学董事的威廉·迈克伯斯的介绍下进行的，会面地点设在迈克伯斯位于广场大酒店的办公室里。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的驻德国大使詹姆斯·杰罗德及威尔逊最得力的助手爱德华兹·曼德尔·豪斯。考虑到单独会见一位华尔街金融界人士可能会带来的巨大政治风险，威尔逊召集了几位助手作为证人一起与会。

^① 威廉·杰宁斯·布赖恩，详见第三章脚注——译注。

如果说一个非常男性化的男士也可以被说成爱上了另外一个男士的话，那么巴鲁克这天真称得上是对威尔逊“一见钟情”了。威尔逊的举止气质简直让巴鲁克为之倾倒，从他深灰色的双眸中放射出来的那种令人晕眩的目光使巴鲁克为之一震。而且，威尔逊还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南方人，这又让巴鲁克联想到自己的父母，一种亲切感不禁油然而生。巴鲁克听说过很多有关威尔逊意志坚强、毫不退让的故事，这些都让他倍感钦佩（这种敬佩感并未因为自己也成功地获得了欧克兰德俱乐部的入会批准而受到丝毫的削弱）。威尔逊主张降低关税，取消贸易保护主义，而巴鲁克由于当时在美国甜菜制糖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希望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保持一定的关税。尽管如此，巴鲁克本人还是对威尔逊表示理解，并耐心地听威尔逊把他的观点讲完。在谈到有关自由竞争和垄断资本的问题时，威尔逊顺手指了指办公桌上的一部电话机说：“美国的电话业已形成一种垄断，不过这种垄断可以说合情合理。这种由私人控制、资本高度集中的发展趋势非常必要，值得提倡。但与此同时，我认为对垄断资本也应该进行恰当的规范和管理”。事实上，无论巴鲁克是否真的理解威尔逊所倡导的新自由政策将带来的那些抽象意义上的好处，对他而言，首先的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一政策代表了威尔逊的政治主张，他应该无条件表示支持。

其实，巴鲁克并不是唯一一个出现在 1912 年的民主党竞选阵营中的金融界人士，但却是少数几个提供巨额捐款的华尔街头面人物之一。巴鲁克当时资助了 12500 美元。曾于 1910 年支持威尔逊竞选新泽西州州长一职的瑞恩这次却为了避嫌而没有提供任何捐款。瑞恩在库恩列伯公司的合伙人杰科伯·H. 斯奇夫也资助了 12500 美元；克利夫兰·H. 道奇捐款 35000 美元；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执政期财政部长的父亲、银行家亨利·摩吉恩索资助了 30000 美元。威廉·R. 拉斯特，那位在 1905 年曾经意外地收到巴鲁克签发的巨额支票的冶炼公司合伙人也捐了

7500 美元。古根海姆家族的律师、后来成为货币信托听证会主审官的塞缪尔·安特梅耶捐了 10000 美元。

1912 年金融人士参与政党竞选活动的一个令人称奇的特点就是虽然很多华尔街巨头都提供了捐款，但巴鲁克却没有象摩根、贝尔蒙德和瑞恩那样被指责为动机不纯，他的捐款反而受到了政界人士的认可和赞赏。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巴鲁克从不因为民主党人士对于华尔街的公开反感以及瑞恩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遭到抵制而表露出不满。相反，由于担心自己这样一个投机交易人出现在威尔逊的竞选队伍里可能会给民主党带来不利影响，巴鲁克对自己的捐款事宜一直低调处理，尽量避免让人怀疑他的捐款与竞选活动有关。

虽然巴鲁克是一个“自己说了算，不愿意受人摆布”的投资家，但在做出投资决定时，他往往也会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那些经常出入于巴鲁克位于“三一大楼”7 层办公室的商业合伙人中包括米德尔顿·斯库尔伯莱德·布瑞尔。布瑞尔是华尔街的专业律师，也是一位买卖频繁的股票交易人，他和哈里·康坦特以及豪斯曼公司构成的团体经常被新闻媒体称为“巴鲁克利益集团”。1911 年，这一集团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美国甜菜制糖公司身上。

1910 年，布瑞尔当选该公司董事。第二年就有传言说以巴鲁克为首的一些华尔街股票交易人准备一起投资美国甜菜制糖公司，巴鲁克本人至少是该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1911 年 7 月，一位看似得到了内幕消息的财经专栏作家对于美国甜菜制糖公司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如下预测：

华尔街上一些消息最灵通的交易人一直在预计不起眼的美国甜菜制糖公司股将出现大幅攀升。这些人士甚至预言大约明年这个时候，该公司股票的发行量和价格将有可能超过制糖业规模最大的公司美国制

糖公司。我认为，用不了多久，有关美国甜菜制糖公司的控股权另有所属的消息就将公开宣布。有人向我透露，在过去的 6 个月中，有关收购该公司的优先股和普通股的行动一直在悄悄进行。据称，最初拥有美国甜菜制糖公司主要股份的几位股东已经在出售他们的股票，而这些股票后来再也没有出手。现在，布瑞尔一巴鲁克一豪斯曼金融集团已经掌握了该公司的控制权，他们将很快对美国甜菜制糖公司的普通股实行每季度支付 4%红利的制度。可以肯定，米德尔顿.S.布瑞尔和伯纳德.M.巴鲁克这两位华尔街上交易量最大的股票投资商在收购该公司的行动中投入了大量资金。

事实上，当年秋天，美国甜菜制糖公司宣布其普通股的红利为 5%，而不是上述这位专栏作家所称的 4%，而且，该公司股票 1 月份还不到每股 40 美元，到 11 月时已猛升到了 55 美元。于是，有关巴鲁克和布瑞尔合伙收购该公司，因此有内部人士参与交易之嫌的传言一直到 1912 年时还在盛行。对于这一传言，《波士顿新闻》给予了批驳，用一种听起来很象是布瑞尔或巴鲁克本人声明的口吻称：“B.M.巴鲁克和 M.S.布瑞尔两人均早已持有美国甜菜制糖公司的股票，但从未共同计划过收购该公司。美国甜菜制糖公司的收入完全来自大众性交易，由于股息红利增加，所以其股票价格才有所上升，而并非是人为抬高股价”。事实上，无论巴鲁克和布瑞尔是否真的有意收购美国甜菜制糖公司，该公司的股票仍保持继续上升的势头，到 1912 年 9 月已高达每股 77 美元。但是，随着威尔逊当选总统以及不久将出台降低糖业关税的政策预测，美国甜菜制糖公司的股票后来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到年底该公司的股价已跌破 50 美元。等到 1913 年 1 月 3 日，当该公司的董事会以盘存报表过于繁杂为由投票表决通过停止支付红利这一惊人的消息被正式公布后，股价更是一路跌破 42 美元。这种股票暴跌的情况最后导致国会提出了对该公司进行调查的要求。根据华尔街的操作规则，股市如果

出现突然动荡，那么应该适时找出造成这一动荡的原因。当然，巴鲁克本人与该公司股票价格的先期上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是否真的与该公司股票下跌有关，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公开谈论过。尽管如此，巴鲁克仍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享有极高的声誉，这点可以从1913年1月底巴鲁克被任命为声名显赫的法律委员会委员这件事上反映出来。与此同时，也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有些人对巴鲁克在美国甜菜制糖公司股票风波中的所作所为非常怨恨，不过这种怨恨直到1913年的夏天才表露出来，背景是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即将遭受弹劾。

威廉·苏尔兹于1912年当选纽约州第81任州长。上任伊始，他宣称要对华尔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苏尔兹是一位资深民主党人，曾在纽约州州议会选举中代表民主党坦慕尼派^①的利益，1895年后一直担任国会议员。对证券交易人的人品，苏尔兹的格言是“不做亏心事，不怕夜敲门”，为此，这位新州长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烧到了华尔街，并提出了旨在取缔股票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和违规操作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对短期同行拆借利率规定15%上限以及根据纽约州相关立法加强对股票交易所的管理，使之处于政府法规的监督之下。

面对苏尔兹的强硬措施，那些已经对股市改革感到厌倦的股票交易人联合起来与苏尔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在巴鲁克的倡导下，法律委员会开始制定对应措施，并组织了一个十人代表团前往纽约州东南部的奥尔巴尼与苏尔兹就金融市场的管理进行谈判。这10位华尔街巨头包括巴鲁克、小犹金·梅耶、詹姆斯·马伯恩以及后来声名远扬的梅尔维尔·B.福勒。到达奥尔巴尼的谈判地点后，这些经纪人告诉苏尔兹，他们对于以合理和适当的法规约束纽约的股票市场这种做法没有异议，但

^① 坦慕尼派，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由原先的慈善团体发展而成，因其在19世纪犯下的种种劣迹成为腐败政治的同义词。——译注

是利率的高低不属于华尔街的控制范围，而使纽约证券交易所处于政府立法监督之下的做法只会弊大于利。对于巴鲁克来说，虽然他多多少少与苏尔兹有一些共识，认为使纽约证券交易所处于政府立法管理之下并无坏处，但他当然知道，这时最好对自己的个人看法保持沉默。

最后，代表团成员与州长友好地握手告别，纽约州通过了用于规范股市运作但较为宽松的立法，而有关抬高贷款利率和使股票交易所接受政府管理的法案则没有通过。与此同时，苏尔兹已经与当初支持自己竞选州长的坦慕尼派分道扬镳，指责这一派别的人都是些贪污受贿者，并且批准了一项旨在由选民直接选举州长的法案。为此，坦慕尼派的领导人查尔斯·F·摩菲不甘心，声称要对苏尔兹的个人财政情况进行调查。摩菲当时之所以要这么做只是因为坦慕尼派认为苏尔兹没有把他在竞选州长期间收到的所有捐款进行汇报，但谁知这次调查出来的有关苏尔兹的贪污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调查结果表明，苏尔兹州长甚至将其接收的一大部分捐款投入了华尔街股票市场，想着要在金融界也小试身手。而他的经纪人之一竟然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梅尔维尔·B·福勒，他不仅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之一而且还与巴鲁克等人一起到奥尔巴尼就股市交易道德与苏尔兹进行了辩论。后来，福勒在法庭上公开作证说，苏尔兹本人保存着一本有关经纪人帮助他从事股票交易获得的利润的账簿，不过这本账簿上只记录有收入金额。福勒还作证说，1912年下半年，当时尚未正式上任的当选州长曾经支付1万美元的现金以弥补账目亏空。

在对苏尔兹的个人财政状况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不时出现各种针对他人的人身攻击和诋毁，很多当事人的声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8月的一天，巴鲁克的名字也出现在《纽约世界报》的一个专栏中。据这一报道的作者称，担任州长一职之前只是一位普通国会议员的苏尔兹，曾经在政府考虑降低糖业关税时期购买过美国甜菜制糖公司的股

票。据称，帮助苏尔兹收购该公司股票的是两家经纪人公司，这两家公司的名字是 A. A. 豪斯曼公司和巴鲁克兄弟公司。《纽约世界报》的专栏文章是这样结尾的：“伯纳德·M. 巴鲁克这位目前在百老汇第 111 号拥有个人办公大楼的投资人以前曾经是 A. A. 豪斯曼公司的合伙人之一，而且他还在美国甜菜制糖公司股票风波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出现了时而暴涨、时而暴跌两种情形，情况变化极为反常”。

对上述报道，巴鲁克的弟弟哈丁和克拉伦斯·豪斯曼提出了强烈抗议，声称他们从未与苏尔兹打过任何交道，而且知道他从未进行过有关美国甜菜制糖公司股票的交易。另外，据可靠资料显示，身为国会议员的苏尔兹一直主张降低关税、取消贸易保护主义，而美国甜菜制糖公司却只有在维持高关税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最大利润。最后，这一针对巴鲁克的指责由于在事实面前很难站住脚而很快被公众当作笑料忘到了脑后，但是，有些人对此可不只是一笑了之，他们为此对苏尔兹提出了弹劾议案，罪名成立，苏尔兹被免去了州长职务。改良派认为苏尔兹受到了他人的陷害，巴鲁克本人也这么认为，积极参与了为苏尔兹辩护的行动，但没有成功。这一事件对于巴鲁克的意义在于，他懂得了要时刻警惕敌人对自己的攻击。不过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巴鲁克感受到了弟弟和朋友对自己的亲情和信赖。事实上，当他的名字被列入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名单时，巴鲁克正在启程赴欧洲度假的途中，于是有人心怀恶意地制造谣言，说巴鲁克是害怕接受调查才赶紧离开美国去避风头的。对此，巴鲁克的哥哥哈丁坚定在站在哥哥的立场上反驳说：“说伯纳德·M. 巴鲁克星期六去欧洲是为了避开调查委员会的质询，这一说法毫无根据。他从来就不是那种因为惧怕任何人或任何事而一走了之的人”。事实上，在巴鲁克的心目中，哥哥哈丁一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而现在能够从他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赞美之词，这真让巴鲁克感到万分的

激动。

第七章

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1911 年春天，股票市场处于淡季。这段时间里，巴鲁克接受了一项提议、拒绝了一项提议。前者是购买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型铁路公司的大部分股票，这一行动促使巴鲁克后来又收购了另外一家同样面临破产的铁路公司的大部分债券。后者是有人向巴鲁克提议，可以通过购买一家硫磺开采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来取得控股权。但是当时这家公司的大部分矿井还没有完全投入运转呢。

事后回忆起来，这一选择完全错了。事实证明，巴鲁克投资的铁路公司一直非常不景气，而那家硫磺开采公司却由于在位于德克萨斯州马塔格达镇的一个海拔 40 英尺的高原上找到了高价值的矿井而大发其财。当最终巴鲁克从那些铁路公司里抽出资金来重新投资于硫磺采矿业时，他不得不感叹“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自己为这一错误的选择白白付出了几百万美元的代价。

当然，在关键时刻选择投资铁路建筑业是有原因的。主要原因是巴鲁克本人对于铁路运输的浓厚兴趣。当生长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巴鲁克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被整日呜呜驶过自家门前的火车深深吸引。1902 年，身为股票投资人的巴鲁克仍没有忘记自己儿时对火车的挚爱，为此特意购买了路易斯维尔 & 纳什威勒铁路公司的大量股票，一心想着有一天能够拥有这家公司的控股权。但是，后来因为有机会获得 100 万美元的利润，巴鲁克忍痛割爱，出售了手中该公司的所有股票。1911 年和 1912 年间，巴鲁克再次向铁路业发起进攻。为达到进入公司管理层的目的，他花巨资购买了瓦伯什铁路公司的股票。对铁路业的过于执着阻碍了他做出客观而正确的判断，巴鲁克没有注意到包括瓦伯什铁路公司在内的整个铁路建筑业的前景并不乐观，他高估了铁路业的发展。

①

1911 年 3 月 30 日，巴鲁克以一级抵押贷款的方式购买了面值 312.8 万美元、红利为 4% 的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 50 年期的债券。消息一经宣布，立刻在公众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的人为此而重新鼓起了对铁路业的希望，有的人则对巴鲁克的行动感到迷惑不解。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当时正负债累累、濒临破产，还牵涉进了很多官司。以至于到

① 即使说巴鲁克本人并不从事铁路建筑业，但他在该行业却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以致于一名纳粹鼓动分子在谈及巴鲁克时居然没有搞清他的真实身份，而把巴鲁克称为“若干家铁路公司的总裁”。巴鲁克本人对于这一称谓当然是再高兴不过了。——原注

1954 年该公司发行的债券到期时，公司本身是否存在，或者是否有能力兑付这些债券，以及在这期间的几十年中是否能够恢复支付其于 1908 年终止的每年 4% 的债券红利这些问题，当时都难以确定了。当巴鲁克购买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的股票时，他可以以 46 美元的价格购买面值 100 美元的股票。^①这两个不同数字间的差距程度之大反映了股市对于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经济发展前景怀疑态度之深。另一方面，这一差距也显示了在该公司的经济效益得到恢复后巴鲁克可能获得的潜在利益。随着公司支付能力的不断提高，公司的债券价格也会有所上升。而巴鲁克这样一个精明的交易人都能够从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的发展中看到值得投资的方面，这无疑对于大多数的投资人来说都表明了一种乐观的前景。现在问题是，巴鲁克到底看上了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的哪一点？

事实上，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1908 年，该公司的债券持有人将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告上法庭，称该公司一直没有支付利息也无力兑付债券，并以此为由要求法官组织一个能够帮助他们收回投资的管理机构。法官同意了这一要求。在法律上，这一判决被称为对破产企业实施产业管理，负责管理的人选由法官任命而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担任。由于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收入很少而欠款较多，产业管理人的目的就是增加企业收入，同时尽量减少日常性开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债券的利润问题。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的火车虽然仍在跑动，其矿井也还在开采原煤，但该公司债券持有人却得不到丝毫的回报，这就是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无法发展的症结所在。

当初促使投资人组建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的原因在于宾夕法尼

^① 指价值 1000 美元的债券可以用 460 美元买到，巴鲁克的总投资是 1,438,880 美元，为实际债券面值的 46%，即债券总值为 312.8 万美元。——原注

亚铁路公司几乎垄断了巨大的匹兹堡运输市场。于是一些企业家决定签订一项合同，修建一条长 63 英里、通往匹兹堡西部而且可以与托利多相连的铁路。这些投资人还事先与卡纳吉钢铁公司预定了运输业务，并与另外两家中西部铁路公司结成了联盟，商定将铁路线联为一体。在这一协议中，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占到了一些便宜，因为惠灵 & 雷克艾瑞和瓦伯什两条铁路线都同意将一部分利润用于支付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股东的红利。这一联盟铁路公司的所有权由几家公司共同拥有，目标是最大程度地获得战略和商业利益。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将拥有惠灵 & 雷克艾瑞铁路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而瓦伯什铁路公司将收购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的所有股票。

除了其他一些原因，导致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最后濒临破产的主要原因是，该公司的铁路线途经之地的地形状况极差，修建时所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高得惊人，而该铁路正式运营后获得的收益却低得惊人，甚至低于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必须偿还的借款利息。此外，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虽然拥有 15000 亩优质煤矿，但却只有 1500 节货运车厢。第一年开工就损失了 936,972 美元，从 1906-1908 年连续 3 年亏本。1908 年 5 月 28 日，该公司债券持有人因为得不到利息而怨声载道，于是公司最终宣布破产，其全部经营时间总共为 4 年零 23 天。11 天之后，惠灵 & 雷克艾瑞铁路公司也跟着宣布破产。

事实上，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破产案的特点是，公司在 4 年多的时间里不仅没有获利，反而欠下了一大堆债。法庭宣布对其实施破产管理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机构重组。为此专门任命了一个股东权益保护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制定相关管理计划，但不知何故这一保护委员会却没有履行任何职责。于是 1910 年又另外组建了一个类似的委员会，但第二个委员会制定的措施仍然收效甚微。最后，忍无可忍的投资人联名向塔夫脱总统致信，请求政府干预。此外，让大多数瓦伯什匹兹堡铁路

公司的股东大感意外的是，身为律师的塞缪尔·安特梅耶出面将上述两个委员会进行合并，之后向股东们索取巨额管理费。当被问及这些钱的用途时，安特梅耶竟然回答说为了行使职责，上述两个委员会的日常总开销高达 300 万美元。事实上，当安特梅耶提出这一要求时，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债券的市场价值已经跌至 500 万美元，而仅在 1904 年年初时还高达 3000 万美元，最后就连刚刚上任不久的威尔逊总统也收到了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的股东们写来的求助信件。与此同时，自 1908 年被实施破产管理后，惠灵 & 雷克艾瑞铁路公司向法院提出了有关终止与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签订的合同的要求。于是，两家公司一直共同拥有一条铁路的联盟关系宣布结束，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的债券价格更是掉头直下。1911 年 3 月，当巴鲁克以面值的 46% 大量购买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的股票并成为该公司的最大个人股东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该公司的前景会变得乐观。

于是，巴鲁克这位最知名的投机交易人出资购买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股的时候，正是其他人恨不得赶紧抛售之时。也许是巴鲁克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市场行情，得出结论：该公司的困境已经到头，机构重组计划将很快为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带来新的希望，使其不久就成为经过重新修建的瓦伯什铁路网的核心部分。巴鲁克还了解到，他崇拜的偶像 E. H. 哈里曼就是在惠灵 & 雷克艾瑞铁路公司于 1908 年宣布破产、坏消息接踵而至时做出投资决定的。

巴鲁克对于铁路建筑业一直充满信心，他还购买了瓦伯什铁路公司分红利率为 4% 的债券。对于很多人来说，瓦伯什铁路公司与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一样，几乎没有任何赢利前景可言。果然，不久之后瓦伯什铁路公司就发现，自己也象瓦伯什匹兹堡和惠灵 & 雷克艾瑞两家铁路公司一样，无法按期支付股东红利。1911 年圣诞节期间，瓦伯什公司宣布破产，开始接受法院对其实施的破产管理。

巴鲁克对于瓦伯什铁路公司的第一笔投资是大笔购买该公司红利为 4% 的 50 年偿还和可延期债券。关于这笔投资的具体数额一直没有详细报道，但据称这笔投资使巴鲁克成为拥有该公司最大债券份额的个人投资者（就象巴鲁克在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拥有最多股份一样）。接下来，4 月 4 日，巴鲁克又被任命为股东委员会委员，这一消息使人们对该公司又产生了希望，这种希望随之使得该公司正处于下跌之中的股票出现回升迹象，新闻媒体对此也进行了乐观的报道。一些报纸甚至预测，巴鲁克在铁路建筑业方面的成就可与哈里曼相提并论。也有一些传言，说巴鲁克已准备退出华尔街，全身心投入铁路建筑行业。不过，纽约的《先驱报》对此持怀疑态度：“那些最熟悉巴鲁克的人宣称，巴鲁克根本没有退出华尔街的意向。对于他想成为哈里曼第二的说法，巴鲁克称他最想当的还是自己，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伯纳德.M. 巴鲁克，即他本人”（但是，1913 年 12 月，巴鲁克还是以业务繁忙为由辞去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的职务）。与此同时，通常很少刊登人物新闻的《华尔街日报》也打破常规对巴鲁克进行了如下报道：

道.琼斯公司有关 B.M. 巴鲁克即将被任命为瓦伯什铁路公司股东委员会委员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刻在公众中引起了不同反响。大多数人都把巴鲁克视为股票投机商或交易人，仅此而矣。公众对巴鲁克的这种认识不足为怪，因为新闻媒体总是在涉及股票交易等相关领域时才谈到巴鲁克的名字。但是，这种片面的认识对巴鲁克是不公平的。事实上，他是一位在投资领域具有非凡才干、能够审时度势地对股票市场做出准确判断的金融家。巴鲁克对于任何一个董事会都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瓦伯什铁路公司的发展前景也会由于巴鲁克介入其管理高层而变得大为乐观。

除巴鲁克以外，瓦伯什公司的股东委员会还包括早在 1889 年该公

司陷入困境时就参与过重组计划的托马斯.H.哈伯德；对铁路破产法了如指掌的律师、曾担任过联盟太平洋铁路公司主席的文斯罗.S.皮尔斯；纽约房地产投资商罗伯特.戈莱特；公平托管公司总裁艾尔文.W.克莱奇以及罗伯特.弗莱明先生。该委员会的职责是代替公司董事会行使权力。他们的工作从技术上讲难度很大，从道义上讲也是如此，因为所有的委员会委员都代表各自的不同利益，但又必须承担起促进公司发展和维护所有股东利益的职责。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对公司股东提出的固定投资回报，尤其是公司需要支付的利息进行多大幅度的削减，以及哪一种类别的证券将在这次削减中首当其冲。令那些自认为实权应该由他们掌管的委员会委员非常气恼的是，巴鲁克居然自以为是地挑起了解决上述问题的重担。当年5月，杰科伯.斯奇夫交给巴鲁克一份措词非常正式的字条，提醒他这里到底谁说了算。

虽然我们之间已就重组计划的具体措施进行过多次商榷，但我们一直在尽量避免将这些措施固定化和格式化，我们力求在完全了解公司进行重组后的发展潜力之前保持一个较为开放的头脑。我们本身就是瓦伯什公司的主要股东，我们当然希望每位股东都能拿到他们理应享受的4%的红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要比除股东委员会主席以外的其他委员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我相信在这一问题上，你一定会与我们通力合作，以尽早制定出一个既符合委员会利益，又与我们的个人利益相一致的重组计划。

但是，在巴鲁克看来，股东委员会“保持一个开放头脑”的时间也未免有些过长了。1912年，虽然公司顾问们提交了相关的报告，调查人员也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并落实了一些改进措施，但股东委员会仍未制定出可行的重组计划。到了1913年，虽然皮尔斯和沃勒斯等委员也参与进来，但仍然收效甚微。1914年，克利夫兰的一位联邦法官宣布瓦伯什匹兹堡、惠灵&雷克艾瑞以及瓦伯什三家铁路公司签订的联合

运输协议正式做废。巴鲁克曾经以 46 美元的单价购买的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的债券此时已经跌至 12 美元。与此同时，瓦伯什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一直未见好转。最后，瓦伯什公司股东委员会无法制定出可行的重组计划这一事实竟然成了华尔街上的一个笑柄。《纽约时报》在 1914 年 4 月的一篇报道中称：“瓦伯什铁路公司的重组计划一年前就号称基本就绪，后来又说再过几个星期就将正式出台。但自 4 月 1 日以来一直未见什么大的动静，这不得不让该公司股东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目前这种不尴不尬的局面看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5 月 21 日，就在斯奇夫劝诫巴鲁克在制定重组计划一事上要耐心等待后的第三年，股东委员会终于出台了一项重组计划，提议削减瓦伯什铁路公司的资产总额及其年度固定开支等措施。计划建议享受 4%红利的债券持有人将手中的债券兑换成新的瓦伯什公司面值较小（相应风险更小）的股票。股东们可以在每股缴纳 20 美元现金的前提下将持有的股票兑换成新公司的股票和小面值债券。但就在这一计划刚刚出台时，瓦伯什铁路公司的赢利情况又开始出现骤减势头。1914 年 7 月 31 日，欧洲即将爆发战争，纽约证券交易所受其影响干脆关门停业。10 月 15 日，瓦伯什公司股东委员会制定的重组计划被迫做废。对此，巴鲁克和其他股东委员会委员赶忙解释说，这一计划未能得到落实的原因并非由于战争迫在眉睫，而是由于政府对铁路行业征收了繁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在铁路管理方面采取了不明智的压低乘费和运费的措施。当时的《商业与财经》杂志也作此说：

在如今这样一个铁路运营成本开支日益增长的时期，旅客乘车费和货物运输费却一直维持原有标准甚至有所下降。在过去几年中，收支亏空只有 1/3 得到了弥补。简而言之，现在乘坐瓦伯什铁路公司的旅客需要缴纳的乘车费为每英里 0.1 美分，这一费用甚至低于铁路公司开展运营业务的基本开支；货物运输人缴纳的运费每吨每英里略高于 0.1 美

分，但也只能获得微小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增加旅客或货物运输量的做法都无益于弥补维持正常运营所带来的财政亏空。而且，运输能力已达到极限，不可能再继续增加业务量。因此，不可能再通过薄利多运的原则创造效益。与此同时，公司的运营成本却在持续上涨，基本没有降低的迹象，而改进运营设施的计划也已停止执行，因为银行拒绝提供继续贷款。事实上，并非只有瓦伯什一家公司正在面临困境，除这家公司以外，还有好几家公司也正经受不同程度的经营困境，瓦伯什公司的现状只不过是美国大多数铁路公司的一个缩影而已。

股东委员会对瓦伯什公司发展前景的悲观预测很快在股市上得到了验证。1915年1月19日，瓦伯什铁路公司红利为4%的债券价格跌至最低点，每股仅为19美元。巴鲁克在此之前曾以每股50-6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的债券（而且在该债券跌至最低点时他可能还没有抛出），因此当他听到这一消息时差点儿晕了过去，还有人借机传言说巴鲁克的个人财政情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有一天午餐时，由于手中的债券早已抛出而没有遭受很大损失的托马斯·F. 瑞恩特意走到巴鲁克面前，用一种语调高得其他人都能够听到的声音对巴鲁克说：“你放心，我会帮你分担一半的瓦伯什债券”。换句话说，瑞恩的意思就是如果有必要，他会以原价收购巴鲁克手中一半数量的瓦伯什公司的债券。后来尽管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巴鲁克还是对瑞恩在自己处于困境时伸出了援助之手表示了感谢。

1月底，由于管理和财政状况出现转机，瓦伯什公司的股东委员会又重新开始工作，并于1915年4月正式提交了定稿后的重组计划书。针对该公司持续恶化的运营状况，这一重组计划在早期计划的基础上对股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该计划规定股东必须以每股30美元而不是20美元的价格兑换新公司的股票和小面值债券，瓦伯什公司的资本将削减1700万美元而不是于1914年提出的1000万美元。债券持有人

可以在股东同意支付现金的前提下将手中的债券兑换成现金，兑换率为每 1000 美元的债券兑换 654.82 美元现金。债券持有人也可以将持有的债券兑换成新公司的股票。如果不愿意购买股票，那么债券持有人还可以以每股债券 33.15 美元的价格获得现金。

对巴鲁克而言，这一重组计划可能使他在这一过程中付出的全部努力白费，而且整个事件拖得如此之长，这些都被他视为自己的一大失败。回想起当初他刚刚被任命为股东委员会委员时曾经引起了巨大反响——瓦伯什公司普通股随之立即上升了 0.625 点，股票价格达到了 8.875 美元——巴鲁克将责任归结于股东委员会委员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公司管理层又总是一幅顽固不化的死脑筋。其实，真正的原因并非如此：瓦伯什公司只是十几个同样面临破产窘况的铁路公司之一，而该公司所处的美国中西部铁路行业市场要比美国其他地区更加惨淡：1907-1917 年期间，近六万英里长的铁路由于经营不善被迫接受破产管理，使得修建铁路投入的 37 亿美元的资金无法产生应有的经济效益，这一数字是美国在一战前所欠债务的 4 倍之多。因此，只能说巴鲁克的这次投资选择了错误的领域、错误的地区和错误的公司。1915 年春天，负责制定重组计划的股东委员会将正式公布股东报酬，但巴鲁克原则上不愿接受这笔酬劳。尽管 6 个月后不甘失败的巴鲁克又卷土重来，召集几家投资公司组成了一个辛迪加，准备购买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但是不管结果是福是祸，巴鲁克这次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来就并不狂妄的巴鲁克变得愈发谨小慎微。后来巴鲁克回忆时甚至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胆小怕事的缩头乌龟。他曾经致信弗兰克·肯特，说如果他真的变成了一只乌龟，那么他虽然会偶尔爬到一块大石头上晒晒太阳，但只要周围出现哪怕一丁点儿的危险迹象，他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溜到石头旁边的深水塘中，把自己藏得越深越好。巴鲁克解释说，如果他是一只乌龟，他只会在不冒任何风险的前提下才

会将自己宝贵的头颅伸出龟壳，而且一旦真的出现了危险，比如有人想要斩掉他的脑袋，那他“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在敌人动手之前将头颅缩回龟壳”。应该用“大象”而不是乌龟来形容巴鲁克的性格。有一天，斯沃普当着威尔逊总统的面向巴鲁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巴鲁克就象一只亚洲产的巨型大象，这种大象相对那些产自非洲、只有三个脚趾的同类来说具有一定的生理优势，至少它们拥有五个脚趾，而据说巴鲁克本人就非常向往拥有更多的手指头和脚趾头。这种巴鲁克大象虽然身躯庞大但却非常聪明，它有一天带领着一群小象来到一条深水河前，河上架着一座看似有些不太结实的竹木桥。于是，这头大象先是用它长长的鼻子拽了拽桥梁，然后又用它的左前腿踩了踩桥板，最后又转过身去用它的左后腿踏了几下桥板。这样进行了一番仔细考察之后，巴鲁克大象才向他身后的小象们大声宣布：“这座桥足够结实，可以承担我的重量，不过，我想还是应该由你们中间的一位先试着走一下！”

的确，在投资瓦伯什铁路公司这件事情上，巴鲁克固然在决定购买该公司债券时没有犹豫，但他却一直不愿从股东委员会中抽身，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得罪其他委员。另外，在投资硫磺采矿业的问题上，巴鲁克也象一头大象，犹豫再三，不敢果断行动。他在竹木桥面前踩了又踩，试了又试，足足浪费了好几年时间。如果巴鲁克早一些迈出第一步，那么他可能早就成了公众想象中的那种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了。

1909 年，巴鲁克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邀请，这一邀请来自华尔街上声誉如日中天的 J.P. 摩根公司，内容涉及位于德克萨斯州戈尔韦斯顿市郊的潜力很大的硫磺矿。摩根公司向巴鲁克提出了建议（巴鲁克当时已经在采矿业小有名气）：由他组织一批工程人员对这一名为布瑞恩蒙德的硫磺矿进行勘察；提交情况报告；如果一切顺利，他可以从中获取 40% 的利润。摩根公司将提供资金并收获其余 60% 的利润。巴鲁克同意了，并马上给西勒.W. 穆德去了电话，邀请他一同前往布瑞恩蒙德硫磺

矿。穆德是一位采矿工程师，曾在 1905 年因预言宾厄姆大峡谷铜矿将大有可为而在采矿业一举成名。穆德接受了巴鲁克的邀请。

他们先来到与布瑞恩蒙德相距几百米的布拉兹瑞阿村。据当地的矿藏勘察者称，他们早就预测到布瑞恩蒙德蕴藏有丰厚的硫磺矿，对巴鲁克一行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接下来，穆德和他的助手斯潘塞·布罗尼白天亲自进行实地取样，晚上就利用带来的工具对样品进行测试，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穆德用一种家用双层锅炉对收集来的土样进行干燥处理，而巴鲁克则负责研究全球硫磺市场的销售行情。大家每天都干到深夜，而当地又是蚊蝇肆虐，大家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不停地驱赶蚊子。

艰苦的工作条件不能阻止结论的获得。穆德认为，在该地开采到丰富硫磺矿的可能性最大是 50%。回到纽约之后，巴鲁克亲自将这一报告向 J. P. 摩根本人进行了汇报。他还补充说，购买这块硫磺矿需要 50 万美元，而他愿意拿出 25 万美元作为“赌注”，押这块地能够开采出足够的硫磺。

但是，让巴鲁克始料不及的是，也许是因为他使用了“赌注”一词，也许是因为他的语气给人一种孤注一掷的感觉，反正摩根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我这个人从不靠赌博赚钱”，一口回绝了巴鲁克的提议。巴鲁克感到受了污辱，他尽力克制了自己的气愤，立即从椅子上起身走出了摩根的办公室。

巧的是，就在摩根拒绝了巴鲁克的同时，另外一家同样位于德克萨斯州的硫磺采矿公司正准备组建，而且预计投资也正好是 25 万美元。

1909 年夏天，在海湾硫磺采矿公司成立之前，有关在玛塔戈达镇发现有硫磺矿的消息，引起了一起与巴鲁克到布瑞恩蒙德进行勘察的斯潘塞·布罗尼的注意，于是他主动给艾伦打电话说准备到玛塔戈达镇进行实地考察。海湾硫磺采矿公司的几位投资人也早已听出过有关纽约投

资人准备开采布瑞恩蒙德硫磺矿的消息，所以他们很高兴接待了布罗尼。结果，布罗尼一到现场就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在他向穆德和巴鲁克进行汇报的过程中，布罗尼称马塔戈达镇硫磺矿的开发前景至少与布瑞恩蒙德相当，甚至更光明。

此时的巴鲁克对硫磺开采业简直失去了兴趣。好在 1911 年初穆德向他提供的一份有关马塔戈达镇硫磺矿的详细报告，再次激起了他的热情。穆德的结论是，开发前景尚不确定，不过“值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就在这时，一位来自圣路易斯市、名为艾尔弗雷德·C. 埃斯坦的电动工程师声称他可以提供确凿的证据表明马塔戈达镇确实蕴藏有丰富的硫磺矿。出生于采矿世家的埃斯坦比巴鲁克年长 4 岁，在建筑和管理行业都称得上略有建树。埃斯坦有些秃顶，留着一撮小胡子，最大嗜好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曾经建造过很多盛赞圣路易斯市发展成就的电子标牌，在宣扬圣路易斯市的同时还使得前来参观和旅游的客人收获甚多。此外，埃斯坦还在多得数不清的地方俱乐部和公众组织中拥有职位。他本职是一位矿藏勘探家，是海湾硫磺开采公司最初建立时的投资人之一。埃斯坦和其他几位股东此时急需资金，以便尽快使公司运转起来，于是他们想到了巴鲁克，希望他能够慷慨解囊。

不过，对于埃斯坦提出的直接投资、购买股票等等提议，巴鲁克都犹犹豫豫不做决定，这让埃斯坦非常恼火。直至生性耐心的埃斯坦开出无比优惠的条件，巴鲁克才于 1912 年 6 月签署了一项购买股票特权的协议，根据这一特权他可以在接下来的 18 月里以固定价格购买海湾硫磺采矿公司的大部分股票，直至拥有控股权。同时，巴鲁克还同意投资 25000 美元用于购买土地。于是，巴鲁克在未完全行使其特权的情况下开始购买越来越多的海湾硫磺采矿公司的股票。到 1913 年，他已经成为该公司的第三大股东。

当位于布瑞恩蒙德的硫磺矿已进入积极运作准备投产时（这一开采

工程始于 1913 年 11 月，由弗雷波特硫磺公司投资实施)，马塔戈达镇的采矿作业却远未开始。就埃斯坦而言，他想尽快开始采矿作业，但另外两位来自圣路易斯市的股东 J. W. 哈瑞森和 J. M. 艾伦却希望能够卖掉手中的投票。巴鲁克本人也同这两人一样想赶紧出手股票了事。事实上，埃斯坦在开工这件事上确实有些急于求成，但由于巴鲁克拥有购买该公司股票的特权，所以打算购买该公司股票的投资人都被告知来找巴鲁克。下面就是巴鲁克在接待了几拨这样的投资人之后写给埃斯坦的一段话：

自打过一回电话之后，据称来自伯林加工厂的那位买主再也没有出现过。另外一位叫拉塔罗的在其律师的建议下曾经到马塔戈达镇参观过，他第二次竟然带来了一大群人来找我，你不知道他带来的这些人看着就像骗子，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确实就象骗子，我不能想象自己如何与这伙人进行交易。事实上，我看不出他们除了想利用我的名声骗些钱以外还能做些什么。截至我给你写这封信为止，所有那些号称对在马塔戈达镇开采硫磺有兴趣的人最终证明全都是骗子。

至于那些想靠着帮助埃斯坦找到买主而收取巨额佣金的经纪人，巴鲁克对他们的评价是：“所有这些被认为很想购买硫磺采矿公司股票的人都只知道站在一边看热闹，但还想拥有股票购买期权”。

1913 年春天，海湾硫磺采矿公司在财政方面已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6 月 7 日，巴鲁克的股票购买特权又一次到期，但他仍然没有使用这一特权。这时，对巴鲁克及其顾问穆迪的所作所为不断失去耐心的埃斯坦，忍不住给巴鲁克写了最后一封信，想使用激将法力促他采取实际行动。埃斯坦在信中写道：“现在我已经为马塔戈达镇的硫磺矿每天都失去一个绝好的开采机会而感到麻木了，我想可能是因为你现在手头也不宽裕，所以才对于这个硫磺矿的产出过分苛求。对于你目前的处境，

我非常能够理解”。^①

硫磺开采专家哈戈·斯皮兹进行过大量勘察，估计马塔戈达镇地下共蕴藏有 75 万吨的硫磺，而实际蕴藏量可能超过这一数字。事实证明，斯皮兹的预测是正确的。等到 1936 年马塔戈达镇地下的硫磺矿藏全部被开采出来之后，这座硫磺矿的总产量达到了 1235 万吨。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布瑞恩蒙德的硫磺矿仅仅开采出了 500 万吨的硫磺。

由于不像埃斯坦那样对马塔戈达镇硫磺矿的开采前景充满信心，而且也缺乏对硫磺行业将得到迅猛发展的洞察力，巴鲁克在这件事上只是一味地听取持怀疑态度的穆迪的意见，对海湾硫磺采矿公司的前景并不看好（事实上，国际纸张公司同样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该公司在 1913 年象征性地购买了海湾硫磺采矿公司少量的股票后就拒绝再次提供巨额资金）。不久，巴鲁克就与来自圣路易斯市的几位创始股东换了个位置，他主动提出给予这些股东购买自己手中股票的特权，但令他感到遗憾的是，这几位股东都拒绝考虑他提出的条件。而在圣路易斯，原始股东之一艾伦为此还特意在埃斯坦面前埋怨巴鲁克，称他在投资海湾硫磺采矿公司这一问题上行事过于谨慎，艾伦还尖刻地补充说：“除了‘百分之百能够赚钱’的投资领域以外，我觉得巴鲁克先生好象从来不会考虑尝试着去冒哪怕是一丁点儿风险。连海湾硫磺采矿公司这样 99% 能赚钱的企业，巴鲁克都不舍得投资，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一年过去了。1915 年年初，海湾硫磺采矿公司的股份仍然主要由巴鲁克、埃斯坦、艾伦、梅耶和哈瑞森几位股东拥有。这时，急于敦促巴鲁克进一步投资，从而将海湾硫磺采矿公司从当时的财政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埃斯坦又于 3 月 1 日给巴鲁克发去了一份电报：

^① 事实上，到 1913 年 6 月为止，巴鲁克以 46 美元购买的瓦伯什匹兹堡铁路公司的股票已经下跌到了 15 美元以下，这对巴鲁克也是一种打击，埃斯坦的话正好说到了他的痛处。——译注

J. W. 哈瑞森准备抛售海湾硫磺采矿公司股份。他可能急需现金。是否有意购买，请考虑并速回复。

巴鲁克直接回复：什么价钱。

埃斯坦又发报说：哈瑞森共持有 4500 股票和大约 6000 股债券，要价 35000 美元现金。如果是我，可以跟他讨价至 25000 美元。

但是，巴鲁克的回电再一次让埃斯坦大失所望：暂不考虑，多谢。

埃斯坦知道巴鲁克对于哈瑞森抛售股份这件事有一些顾虑，所以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又给巴鲁克写了一封信，以便向他解释清楚哈瑞森这么做完全是事出有因。埃斯坦在信中说，哈瑞森由于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所以想多积攒一些现金防老。另外，对于哈瑞森在海湾硫磺采矿公司拥有的股份，他的家人一个个都想据为己有，哈瑞森不想因此闹出家庭纠纷，所以不如干脆出手了事。埃斯坦在信中写道：“我之所以向你坦承这些有关我的合伙人的家事，完全是出于想让你和哈瑞森两人都能够从这一交易中受益，绝没有任何个人获利的不良动机”。3 月 4 日，埃斯坦又将哈瑞森曾经写给自己的一封信转交巴鲁克，在这封信中，哈瑞森请求埃斯坦向巴鲁克提出收购自己手中股票的提议，他希望埃斯坦能够帮助自己把股票卖个好价钱。当然，埃斯坦要求巴鲁克对这封信的内容保密。

几天后，巴鲁克正好到圣路易斯市商谈一项有关瓦伯什铁路公司的事宜，于是他趁机与埃斯坦进行了面谈（在到达圣路易斯市之前，巴鲁克给埃斯坦发了一份明显带有命令口吻的电报，通知他自己的行程和到达时间：“为我在最好的饭店里预定一个豪华套间，要随时有热水供应，我将在星期一晚上到达”）。正如埃斯坦在后来写给哈瑞森的信件中所说的那样，他和巴鲁克就开采硫磺矿的事项进行了商谈。事实上，当时埃斯坦并不知道巴鲁克到底是打算购买哈瑞森的股票还是拒绝考虑这一提

议，他写道：“巴鲁克先生坦白地告诉我他当时并不想购进任何股票，但如果你只是想尽快出手抽有的股票，那么他愿意出价 10000 美元购买你持有的股份”。其实，当初哈瑞森是花了 25000 到 30000 美元才买下这些股票的。对于巴鲁克而言，可能他觉得如果自己是哈瑞森，那么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出手，哪怕这意味着要做一笔赔本买卖。埃斯坦在信中接着写道：“我觉得巴鲁克先生并不急于收购你的股份，他只愿用如此之低的价格购买你持有的所有股票，而且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在开玩笑，他还跟我坦承说他真的对此不是非常感兴趣。巴鲁克说如果你真心同意低价出手，损失自负，那么他也甘愿冒一次风险，押 10000 美元的赌注收购你的股票”。

对于哈瑞森而言，虽然他与摩根一样对“赌注、冒险”这样的词语非常反感，但他当时的困境使自己不能因此而不做这笔交易。最终，在 3 月 11 日，哈瑞森真的以极低的价格将手中的股票和债券卖给了巴鲁克，除去零头折算每股 2.13 美元，而到了 1929 年，海湾硫磺采矿公司的股票已飙升至每股 341 美元。事实上，巴鲁克后来仅拥有了哈瑞森出售的一半股票，另一半他又卖给了埃斯坦，以感谢在他的牵线下自己才做成了如此划算的一笔买卖。但因为当时手头没有现金，据说埃斯坦是在向巴鲁克赊账的情况下才得以买下这些股票的。

在哈瑞森持有的股票被巴鲁克收购之后，埃斯坦又开始敦促巴鲁克收购艾伦和梅耶在海湾硫磺采矿公司的股份。埃斯坦认为，要想使马塔戈达镇的硫磺矿尽早投产，就必须由实力强大的投资人握有该公司的股权，即巴鲁克和他本人。对此巴鲁克表示同意，但他仍然坚持自己只拥有股票购买特权而不是完全拥有控股权。巴鲁克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再次让埃斯坦感到难以忍受，而且，由埃斯坦代表巴鲁克向艾伦和梅耶提出的股票收购事宜，还引起了这两位股东对于巴鲁克真实意图的猜测。后来，当这种相互间的不信任传到巴鲁克耳朵里时，他公开宣称说自己

宁愿放弃收购打算也不愿招致艾伦和梅耶两人对自己的不满。

埃斯坦完全没有意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情急之中赶紧敦促巴鲁克千万不能放弃收购努力，并向巴鲁克保证说，艾伦和梅耶两人并未真的以为巴鲁克是在“有意排挤”他们。而且，即使巴鲁克和他本人不收购艾伦和梅耶的股票，其他人也会趁机出手。因此，为什么仅仅因为不愿意再掏几千美元就使一件于己于人都有利的事情功亏一溃呢？在这件事上，埃斯坦在1915年6月14日写给巴鲁克的一封信中又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我已经意识到你对海湾硫磺采矿公司的投资最初只不过是出于非常偶然的原因，而且你并不急于做出最后的投资决定，但是，与此同时像我这样急于取得一定成效的投资人却越来越感到难以继续忍耐下去。坦白地说，我现在已经被逼到了这一步，即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独自一人肩负起为使海湾硫磺采矿公司取得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知道你的助手穆迪先生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我希望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只要你能够不抽出你在海湾硫磺采矿公司的股份，使我不致过于势单力薄。说来惭愧，我一直没有在这方面单独付出过什么努力，相反，我却成了使开采计划屡次成为泡影的罪魁祸首，每次都没起到有利于实现最初计划的作用。事实上，我觉得你应该能够意识到投资海湾硫磺采矿公司是一个很有潜力、成功率极高的提议，而既然你在其他许多投资前景远远比不上马塔戈达镇的硫磺矿井的领域都敢于尝试“放长线钓大鱼”，那么我认为这一次面对如此乐观的投资前景时你真不应该一而再再而三地退缩。

此时的巴鲁克还在为艾伦和梅耶对自己的不信任态度而感到生气，但是，1915年秋天，传来了有关马塔戈达镇地形非常有利于硫磺开采的好消息，为此有关人员建议再支付50000美元用于矿藏勘察。巴鲁克

同意提供这笔资金，并且派遣了手下的一位工程师前往硫磺矿开采现场。1916 年年初，巴鲁克在写给埃斯坦的信中用一种持有控股权的最大的股东才有资格使用的语调说：“我希望你能致力于改善本公司的财政状况，就象我以前建议的那样将所有的债券都转换成股票。否则的话，你知道我们马上就会遇到麻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斯坦收到巴鲁克的信后赶紧提醒他说，海湾硫采矿公司是一家拥有公司内部章程而且设有由公司董事和具有投票权的股东组成的董事会的公司，巴鲁克一个人不能说了算。与此同时，巴鲁克逐渐加大了收购艾伦和梅耶两人拥有的股份的努力，但当巴鲁克向艾伦提出购买期权时，艾伦却在回电中婉转地拒绝了巴鲁克的提议，不过他留下了余地：

别再提期权的事了。但如梅耶同意，可考虑。必须立即支付现金。

埃斯坦代巴鲁克回答说：

不可能马上支付所有现金。要依筹集到的运转资金而定。

在第二轮通过电报进行的讨价还价中，艾伦终于做出了让步，答应将他和梅耶持有的股票和债券以 70000 美元的价格卖给巴鲁克，其中的 30000 美元必须以现金方式支付。其余的证券巴鲁克将在接下来的 15 个月中以 40000 美元的价格收购（与可怜的哈瑞森相比，艾伦和梅耶的出手价已经算是高的了）。

即便艾伦做出了让步，巴鲁克仍然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提出的收购条件是一次性支付 15000 美元的现金，并获准在 2 年的时间里利用购买期权收购其余的证券。这次，艾伦仍然拒绝了巴鲁克的收购条件。于是，巴鲁克不得不增大收购筹码。他给埃斯坦发了份电报，向埃斯坦下达了新的谈判指示。对于埃斯坦而言，这份电报的措辞确实让他领教了巴鲁克的“自私自利和不近人情”：

考虑到你目前的个人处境和财政情况，以及为了避免在与梅耶和艾伦进行讨价还价的问题上出现更多的麻烦，同意支付 30000 美元的现金购买他们持有的 3/7 的股票，答应在 2 年内购买价值 40000 美元的债券。但他们必须同意将债券转换成普通股。

对于巴鲁克提出的新的收购条件，艾伦和梅耶均表示可以接受，不过这份电报可惹恼了埃斯坦。巴鲁克在电报中有意无意使用的“个人处境和财政情况”等词语让埃斯坦看后非常寒心：埃斯坦一直以为自己已对巴鲁克仁至义尽，巴鲁克自然也应该把自己视作合伙人，没想到巴鲁克却把收购股票当成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好象完全是为了给自己一个面子才勉强同意降低收购条件的。

至此，巴鲁克已经拥有，更确切地说是即将拥有，海湾硫磺采矿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同时，他也面临一个抉择：一，如果敢冒风险，那么他就应该尽快使该公司投入生产；二，如果他担心公司效益不佳，这一投资不够明智，那么他就应该通过出售股票的方式请其他人进行投资。最终，巴鲁克做出了第二个选择，他找到 J. P. 摩根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亨利. P. 戴维森就此事进行了商谈，戴维森给他推荐了摩根公司另外一位合伙人托马斯. W. 拉蒙特。拉蒙特又打电话给一位名为威廉. 伯伊斯. 汤普森的矿石开采商。汤普森在可以抽取佣金的前提下对于马镇硫磺矿开采前景进行了一番仔细的调查，并提交了一份有关证实该硫磺矿前景乐观的报告。于是，基于汤普森的这一报告，摩根公司最终同意收购海湾硫磺采矿公司 60% 的股票，巴鲁克的售出价是每股 10 美元。此外，巴鲁克还把自己持有的另外一部分股票卖给了一些朋友和亲戚，包括丹. 杰克林、约翰. 布莱克、犹金. 梅耶以及美国制罐公司总裁丹尼尔. G. 雷德。但是，摩根不久就把从巴鲁克手中收购来的股票转手卖给了汤普森一部分，摩根公司的这一做法让巴鲁克非常生气，因为他认为摩根公司在进行这笔交易之前，应该先问问自己想不想要这部分股票。巴鲁克在

这件事上的矛盾心理让人不禁对他当初主动将股票卖给摩根公司的动机产生了怀疑。当时，要使海湾硫磺采矿公司运转起来需要筹集 50 万美元的资金，而在 1910 年时巴鲁克就已经向摩根公司提出自己可以拿 25 万美元的资金做押金，先使海湾硫磺采矿公司投入生产。到了 1916 年，当股票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受到大幅度抑制时，巴鲁克本人也很少象以前那样动不动就会在一天的时间之内使自己的交易量达到 300 万美元。基于这种谨慎致富的发家原则，巴鲁克 1916 年的净收入已达到 200 万美元（在美国历史上只有 66 位美国人拥有达如此之多的家产）。

巴鲁克对于投资海湾硫磺采矿公司总是犹犹豫豫的首要原因也许是因为他一直低估了这一行业的发展前景。另外，巴鲁克从本质上来说仍是一位投资人和股票投机商，尽管他在金融投资领域经验丰富，但是他却并不熟悉包括硫磺采矿业在内的产业领域的具体操作。还有一点就是巴鲁克非常务实，他当时以为联盟硫磺采矿公司有可能会因为与海湾硫磺采矿公司（后更名为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在某块土地的归属权上有争议而向法院提出诉讼，而且巴鲁克认定海湾硫磺采矿公司一定会败诉（事实上，联盟硫磺采矿公司真的把海湾硫磺开采公司告上了法庭，这一官司于 1921 年了结，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被判赔偿联盟采矿公司 70 万美元）。最后一个原因带有一定的猜测性。摩根公司作为一家实力很强、声誉极佳的大型投资公司拥有多个合伙人，可以说是金融投资领域最有头有脸的公司，而巴鲁克却一直无缘与这家公司建立紧密的联系。因此，这次他主动提出请摩根公司收购自己手中的股票，而且是在这种股票的攀升前景不错的情况下提出的这一请求，目的就是为了交好摩根公司，希望该公司能够把他视为圈内人。但是，摩根公司却不领巴鲁克这番好意，而是将一部分股票转手卖给了汤普森，对于巴鲁克而言，这一做法无疑等同于自己被摩根公司拒之门外。

在 1917 年开始参与公共事务之前，巴鲁克几乎出售了自己持有的

各种股票，同时他出于爱国心用自己的收入购买了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巴鲁克曾在 1918 年对克拉伦斯·巴龙说，“购买债券就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免税 3.5%，这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低了”。事实上，如果是在和平时期，这一免税率根本算不上优惠）。对于巴鲁克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尽管他当时想要出手海湾硫磺采矿公司的股票，但是却没有卖出去，所以他只好一直保留着。等到 1919 年巴鲁克从巴黎和会返回纽约时，海湾硫磺采矿公司已经更名为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注册资金也已从最初的 25 万美元增加到 500 万美元。1919 年，该公司还开采出了第一批硫磺矿。到了 1921 年，该公司已生产了 100 多万吨硫磺，并向公众投资人公开发行了股票。可偏偏就在这时——即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的股票正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时——巴鲁克却开始抛售。

随着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不断地发行股票，巴鲁克偶尔也会买进一些。这样到了 1921 年年底，巴鲁克手中持有的股票总数已达到了 61963 股，市场价值超过 200 万美元。到了 1925 年年底，他又抛售了大量股票，使手中的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的股票减到了 19000 股。1916 年 11 月，就在巴鲁克将自己的股份卖给了摩根公司之后，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的创始人埃斯坦突然死于心脏病。

就在巴鲁克进行抛售交易的同时，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却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公司的利润和收益成倍增长。1921 年，每股股票的红利还是 1 美元，而到了 1925 年就达到 8.75 美元。在这期间，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的股票从每股 32.625 美元飙升至 121.875 美元。在兴奋和喜悦之余，公司的股东们在 1926 年 5 月以投票的方式决定将每股股票的价格降为原来的 $\frac{1}{4}$ ，同时将每位股东持有的股票数额增加到原来的 4 倍。对于股东们的这一决定，巴鲁克认为是对股市发展前景有些过于乐观的一种表现。于是，在 1926 年秋天，巴鲁克将他持有的最后一股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股卖了出去。在 20 年代后期这段时间，虽

然巴鲁克家族中其他一些人也拥有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股，比如巴鲁克的弟弟赫尔曼就从 1919 年以来一直担任该公司的董事，而且拥有很大的股份，但是巴鲁克本人一直没有再购买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的股票。

然而，在他持有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投票期间，巴鲁克已经赚到了巨额利润，仅仅是股票红利一项收入就高达 100 万美元。据称巴鲁克持有的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的股票还卖了 600-800 万美元。巴鲁克从收购该公司的股票到最后的出手都是非常谨慎的行动，但却仍然成为他进入股票投资行业以来获利最多的一笔交易。自巴鲁克将自己持有的股票全部售出之后，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的股票价格仍然持续上涨，到 1929 年时达到最高价——每股 341 万美元。事实上，这家巴鲁克当初可以用 25 万美元收购的公司此时的市场价格已飙升到了 216,535,000 美元。

第八章

众矢之的

对于自己拥有的巨额财富，巴鲁克的做法是通过政治捐款或其他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提供给社会，他不希望在公众的心目中自己只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就巴鲁克本人而言，他觉得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其次是一个美国南方人，然后是一个民主党人，最后才是一个有钱人，但令巴鲁克感到不安的是，他拥有亿万家产这一点却成了最令别人津津乐道的事情，谁都以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签发支票。事实上，巴鲁克给大家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丝毫不足为奇，因为他正是以一位富豪的身份进入美国政界的。最早的一次是在 1912 年，当时巴鲁克为威尔逊的总统竞选活动提供了 12500 美元的经费。1914 年，当威尔逊政府决定筹款 1.35 亿美元用于救助美国棉农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年美国的棉花虽然大获丰收但却无法在欧洲销售，棉农的利益因此遭到严重损害——巴鲁克主动提出在必要的情况下自己可以提供 350 万美元。对于生长在棉花主要种植地南卡莱罗纳州的巴鲁克来说，虽然他做出这一决定完全是出于真诚的善意，并非假装慷慨，但当他得知自己不必拿出这笔款项时还是感到松了一口气。巴鲁克最热衷从事的一项公共事业就是积极致力于提高美国在军事和工业领域的战备状况。有一次，伦纳德·伍德少将无意中向巴鲁克提及他需要 1 万美元用于修建其在纽约普莱茨堡的预备役军官营的马路，巴鲁克当即表示愿意提供这笔

经费。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同情，而不是考虑到自己可以从
中获利，巴鲁克还在 1915 年秋天购买了英法联军战争贷款组织发行的
大量债券。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巴鲁克明知这种债券的价值将一跌再跌，
却没有抛售，等到最后不得已出售时，已因此蒙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1916 年，巴鲁克又为威尔逊总统竞选连任提供了 35000 美元的经费，
此外还捐款 15000 美元用于帮助民主党弥补当选后的财政亏空。1917
年，美国正式对德宣战后，巴鲁克捐款 500 万美元，帮助当时的财政部
长、同样来自南方的威廉·G. 麦克阿杜超额完成了第一个自由贷款计划
的指标。

巴鲁克不仅向执政党提供巨额捐款，还非常擅长利用各种人际关系。
有一次，他请坦慕尼派领袖查理斯·F. 摩菲设法使自己的朋友迪克·
林登成为纽约州法官候选人之一。摩菲同意了巴鲁克的请求，但他同时
也要求巴鲁克给他帮个忙，帮他的一位密友在关税法院找个工，成为
联邦市政官，巴鲁克设法满足了摩菲的要求。另外，巴鲁克还非常高兴
地帮助威尔逊总统的顾问科罗纳尔·豪斯解决了一个难题。1914 年，豪
斯的小舅子、德克萨斯州立大学院长西德尼·爱德华·梅兹看上了纽约市
立大学院长一职，这个职位正好在一年前就已经空缺。当时身为该大学
董事的巴鲁克正好是董事会院长人选物色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于是他尽
全力帮助梅兹游说。11 月，梅兹获得任命的通知正式宣布。1916 年，
当巴鲁克希望辞去董事一职时，豪斯还请求他“看在梅兹的面子上”继
续留任。那时，曾经最早将巴鲁克带进威尔逊阵营的威廉·麦克考姆斯
已经与威尔逊政府关系破裂，豪斯因此担心麦克考姆斯会对梅兹进行报
复。几年之后，豪斯又向巴鲁克提出请他劝说董事会允许梅兹离任，以
便他能够担任后来知名的战后秘密计划机构“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梅
兹的离职申请后来得到了批准，不过巴鲁克在这之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
色一直不为人所知。

除了提供政治捐款和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为他人帮忙以外，巴鲁克还因为极力倡导提高美国军队的战争准备程度而闻名政坛。他对威尔逊政府加强政府管理职能的做法表示欢迎，对当时刚刚建立不久的联邦储备系统大加赞赏。从 1915 年开始，巴鲁克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号召美国为战争做准备、尤其是加大美国工业界的战争储备能力的动员宣传活动中。这一年春天，他还从一位股票交易人的角度发表了一份防务宣言，声称“对美国股票市场将起到阻碍作用的唯一因素是漠视战争、不进行必要的战争准备。我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尽快建立一个储备充足的军事防御基地，尤其应该加强海上军事力量的防务建设”。不幸的是，巴鲁克的这一宣言刚刚见诸报端，股票市场的变化就让公众认识到牛市已经到头。7 月 9 日，就在巴鲁克的防备宣言刊登在《商业日报》上的第二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就开始猛烈下跌，这次跌落的最低点在后来两年半的时间中都不曾出现过。但是，当时并没有人预计到股市会一直萧条下去，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纽约问询报》的编辑也不例外，这些编辑对巴鲁克胆敢将战争与发财联系在一起感到非常愤怒，他们在报纸上就巴鲁克在《商业日报》上所做出的预测发表社论文章称：“简而言之，巴鲁克先生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爆发战争的原因，即如果一个国家一旦拥有‘一笔财富’，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视之为非法和不易之财，就会发动战争来追回这些财富……”。不过，巴鲁克并未因为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强烈攻击而被吓倒，他继续大声疾呼建造更多的战舰和枪炮，招募更多的士兵入伍，以及加强工业的战争准备力度。1915 年度假归来后，巴鲁克把他的想法透露给了麦克阿杜，后者又将巴鲁克的计划告诉了威尔逊总统，总统于是邀请巴鲁克到白宫面谈。9 月 8 日这天，巴鲁克来到了白宫。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幸身临美国总统府。据一家报纸当时的报道称，巴鲁克在白宫呆了一个小时，向威尔逊总统大讲特讲了他所谓的“商人使命”，即如何团结美国工商业界知名人士，

共同为战争做准备。那年秋天，巴鲁克在写给豪斯的一封信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另外还补充提议说应该建立一支由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组成的预备役军队。

自从受到威尔逊总统的接见之后，巴鲁克就成了或者说看似成了一名政府圈内人士。于是，当海湾硫磺采矿公司的主管哈戈·斯皮兹在澳大利亚遭到劫持，需要有人进行外交努力才能返回美国时，这一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巴鲁克的肩上。至于他是否采取了行动并不清楚，不过他的朋友却都认为巴鲁克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海湾硫磺采矿公司的股东埃斯坦曾给另一位股东艾伦写信说，“巴鲁克先生告诉过我，他在某些领域正好与威尔逊政府关系密切，至于到底是哪几个领域我在信中就不一一重复了”）。

第二年春天，巴鲁克又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战备宣传运动，4月他致信豪斯，请他敦促威尔逊总统尽快建立一个战争动员委员会。当带有威尔逊总统亲笔签名的回复传到巴鲁克手中时，他不禁欣喜若狂，威尔逊总统写道：“豪斯先生已经将你于4月24日写给他的信件转交给我，信的内容涉及在必要时动员美国所有的资源和力量以提高工业战备水平。我还记得上次我们面谈类似事情时你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自那之后，这件事就一直是我优先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就这件事进行研究，对于你的建议和合作精神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且向你保证你的意见会受到高度重视”。6月巴鲁克再次来到白宫。威尔逊总统与他讨论了战争动员、政治局势以及某些内阁官员对现任政府是否忠诚等问题。在有关内阁成员的问题上，巴鲁克大胆地提出了他的看法。他建议威尔逊总统撤换整天只知夸夸其谈的海军部长约瑟夫·丹尼尔斯，由制铜业知名人士约翰·D. 瑞恩接替丹尼尔斯的职务，而瑞恩正好是巴鲁克的一位朋友（一年后，当威尔逊总统询问丹尼尔斯对巴鲁克有何看法时，丹尼尔斯回答说，觉得巴鲁克“有些爱虚荣”。据丹尼尔斯

称，威尔逊总统听后反驳说：“你见过不虚荣的犹太人吗？”。1916年8月，巴鲁克和其他人一直敦促建立的国家防务委员会正式获得组建批准。这一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作战部长、海军部长、内务部长、商业部长、劳工部长以及农业部长，职责是领导国内战时大后方支援活动。此外还组建了一个顾问委员会作为国家防务委员会的辅助机构。巴鲁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并没有表现出异常的兴奋，因为此时最令他忧心的是自己的风湿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简直让他难以忍受。10月12日，巴鲁克从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列在顾问委员会名单之中，对此他感到非常惊讶。

其他委员会成员都是宣扬战备动员的先锋，巴鲁克的身份是“纽约银行家”。对于这一婉转的称呼，巴鲁克感到有些不安，他不知道一旦自己进行股票投机交易的背景被揭露出来，公众会做出何种反应。于是，巴鲁克打电话对豪斯说，对于任命他感到非常不好意思。豪斯在接到巴鲁克的电话之后曾经在他的日记中写过这样几句话，“我对巴鲁克是否真的感到不好意思表示怀疑，但对于总统的这一任命我也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他完全可以任命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商界人物”。不过，当豪斯将巴鲁克的想法向威尔逊总统进行通报之后，总统的意见是，要么接受任命、要么主动退出。巴鲁克最后的选择是接受任命。而且为了保证能够及时到达华盛顿，参加顾问委员会于12月6日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巴鲁克特意租了一辆马力更强的火车机车，以提高他的私人专列的速度。

不幸的是，就在巴鲁克刚刚品尝到参与公众事业的乐趣时，他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次经历已经悄悄降临。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巴鲁克就遭到了谣言和匿名诽谤信的攻击，被迫在国会调查委员会成员面前替自己进行辩护。就在等待接受国会质询和做证的过程中，心急如焚的巴鲁克体重竟然一下减轻了12磅。

导致巴鲁克这次面临声誉危机的原因，是曾经在 1915 年让巴鲁克大吃一惊的牛市到了 1916 年年底却出乎意料地突然大跌，让股票交易人一个个损失惨重。事实上，欧洲爆发的世界大战给美国经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其中，国际商船运输公司 1915 年获得的利润是该公司过去 10 年间年平均利润的 10 倍，而仅在 1914 年，这家轮船货运公司还是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1916 年，美国钢铁公司的利润也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原油价格上升到每桶 2.75 美元，是近 20 年来的最高价；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到 1916 年秋天时已攀升到 100 点，而仅在 1915 年 7 月 9 日还只有 67.88 点。

面对如此火爆的股市和热情的公众，一些专业股票交易人已经感觉到一丝不安。1916 年 11 月，杰西·利沃莫首先进行了空头交易。犹金·梅耶也回忆说，12 月时他也对股市持续上涨的趋势感到不妙，而且还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巴鲁克。哈瑞·康坦特说：“镇子里所有的妇女都在大谈股票，而你无论到谁家做客都会发现人们对股票津津乐道”。11 月 21 日，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上升到了当时的最高点，110.5 点（这一数字要比 1915 年 7 月的最低点 67.88 点至少高出 62%）。

如果说战争给美国经济注入了生机，那么和平的到来将使美国股市面临惨淡的前景。1916 年 12 月 12 日，当时的德国总理做出和解性的宣言时，纽约股市开始下跌。12 月 19 日，虽然英国首相对这一和解意向表示了拒绝，但纽约股市仍然继续下跌。12 月 20 日是星期三，这天下午有传言说美国已经向各个交战国发布了外交照会。这一传言使得股票市场更加动荡不安，在最后一个小时的交易中，大多数股票都开始暴跌。第二天有消息证实说美国政府确实已经与各交战国政策进行了磋商，国务院甚至警告说，对美国中立立场的侵犯已经将其推到了战争边缘，必须制止战争的继续发展。而纽约股市则在战争与和平面前表现得无所适从，股票交易也出现异常局面。交易人的情绪变化异常激烈，整

个交易所里一片孤注一掷的气氛。尽管股市直到 12 月 21 日这天才跌至最低点，但在前一天下午就已经有人好像预先得知内部消息似的提前抛售了大量股票。对于大多数股票交易人而言，由于自己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决定遭受致命损失这种情况诚然让人不寒而栗，但假如有些人事先获得了内幕消息，又在交易中处于劣势结果弄得倾家荡产，后面这种违规操作的做法就更让人不能容忍。这时，一位名为托巴斯·W. 劳森的作家和股票交易人公开指责说，肯定是有事先故意走露了风声，这才让那些股市投机者在股票下跌之前大量卖空，从而发了一笔横财。劳森的上述指控很快引起了公众的共鸣，他的话还被多家报纸刊用，“那些与美国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40 多年来一直在华尔街享受着种种优待，他们骄奢放纵，赚尽了不义之财”。

劳森拒绝列举出他所说的“那些人”到底都是谁。后来，尽管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赋予其下属的调查委员会详细调查此事的使命，但却并没有在短的时间内发现确凿的证据。最后，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居然也轻信传言，还把这些传言视作既成事实在众议院全体议员大会上进行了公开宣布。1917 年 1 月 3 日，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威廉·S. 贝纳特在众议院全体大会上列举出了致使纽约股市在 12 月 21 日这一天出现爆跌的头号嫌疑人，他说：“我听说国家防务委员会成员之一伯纳德·巴鲁克应该对这起事件负责，就是他将内部消息提前透露给了一些华尔街交易人。而且，就在威尔逊总统拟定的指令得以正式公布的 30 分钟前，当钢铁业股票仍处于上升势头时，巴鲁克本人抛售了 15000 股贝斯勒赫姆钢铁公司的普通股。目前，有关巴鲁克就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的说法已经成为纽约州人所共知的事实”。贝纳特的话音刚落，众议院的会议大厅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很快，又有其他一些人被指责涉嫌在股市大跌前有违规操作的行为，其中包括威尔逊总统的私人秘书约瑟夫·P. 杜马尔提；卡恩列勃投

资公司的投资银行家、巴鲁克的朋友奥托·H·卡恩；威尔逊总统的小舅子、华盛顿州经纪人威尔莫·波令。不久，在一封署名纽约市科蒂斯、写给印地安那州共和党众议员威廉·R·伍德的信件中，巴鲁克的名字又一次作为“被告”出现。这位不管到底是不是真叫科蒂斯的检举人这样写道：

毫无疑问，纽约市的伯纳德·巴鲁克最早在12月9日就收到了国务卿兰辛写给他的留言。这份留言上注明的日期为12月11日，不过直到12月12日才投送出去（上述日期明显有误）。

至于巴鲁克先生收到这一便条的过程，我在这里就不便多说了。但是我的一位朋友非常肯定地说他有两到三次亲眼看到杜马尔提先生和巴鲁克先生曾在纽约市的巴尔的摩饭店共用早餐，而且他们两人一起用早餐的时间与这一便条书写以秘密投送的日期极为吻合。

毫无疑问，巴鲁克就是在那时在股市上大量高价出售股票的。这一结论可以很容易地根据下述事实得出：在其位于百老汇111号的办公大楼里，巴鲁克拥有一套可以与多个经纪人公司进行电话联系的私人网络。在他有时间将这些电话线拆除之前，你应该想办法得到这些电话的号码。如果你能迫使他交出这些电话号码，那么我可以通过向西部联盟电话公司和纽约电话公司要来类似的电话号码进行查对，因为巴鲁克的电话网络正是由这两家电话公司负责安装的。

拿到电话号码后，你可以打电话给那些经纪人公司，向它们索要股市下跌期间巴鲁克要求这些公司以他的名义进行交易的所有记录和交易副本。而且，你在调查中不仅要核实巴鲁克的个人账户，而且还要对任何的秘密账户，诸如由数字或虚构人名作为户主的账户，凡是经纪人公司账目中巴鲁克拥有控制权或提供保证金的账户都要检查。

如果这些经纪人公司拒绝提供相关的交易账目，那么国会会有权命令

其配合你进行调查。纽约证券交易所同样有权要求交易人出示其账户和账簿。另外，由于股票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过于空泛和弹性较大，不利于对交易人在进行股票买卖过程当中违规操作进行调查和监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向股票交易所管理委员会提出上诉，以便顺利地得到相关资料。为了将这件性质最为恶劣的股票交易丑闻查个水落石出，请相信现在有许多享有较高信誉的股票交易人都非常愿意向你提供必要的帮助。

事实上，这一事件后面还有很多你可能并不了解的黑幕，一旦你能够启动调查程序，那么我保证将向你提供所有相关信息。

此致敬意

科蒂斯

将这封信在众议院进行公开宣读之后，众议院议员伍德坦诚说他自己对于这位自称科蒂斯的写信人一无所知。在这之后，好多个姓科蒂斯的人都否认写过这封信。有传言说写信人可能是被称为“华尔街恶狼”的大卫·拉马，但并无实据。与此同时，华尔街上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巴鲁克在此次股市大跌中获利 6000 万美元。

对于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卡恩和杜马尔蒂感到异常愤怒，并立即对伍德的做法表示抗议。巴鲁克却不象他们两人那样激动，而是冷静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 1 月 5 日从南卡莱罗纳州的乔治城发给《纽约时报》的一份电文中说：“我从未事先收到过任何有关总统和平照会的内部消息，而且我也从未与杜马尔蒂先生在巴尔的摩或是其他任何地方共用午餐或进行面谈”。

对巴鲁克而言，这还是他头一次受到公众如此恶意的指责，他知道自己不擅长表达，所以非常担心在国会举行听证时他会由于紧张而词不

达意。巴鲁克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当时正在纽约的梅耶，并且说他准备雇佣曾经担任过参议员的约翰·C. 斯普纳作自己的辩护律师。梅耶听后却劝巴鲁克在这件事上要三思后行，因为斯普纳本人就是一位政客，而巴鲁克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根本无需找这样一位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否则只会弄巧成拙（最终，巴鲁克听从了梅耶的劝告，没有雇佣斯普纳）。在这次交谈中，梅耶还向巴鲁克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当面对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实话实说：“告诉他们你是一位股票投机商；你凭自己的喜好买卖股票。至于你是先卖空然后再购进，或者你先购进然后再卖出，这些都不重要”。

当1月9日这一天终于来临，巴鲁克必须到华盛顿的国会山进行作证时，他已经由于多日的失眠变得异常憔悴，体型也明显消瘦。此时他以前的那些对手一个个都欣喜若狂，以为这下巴鲁克可是栽到底了，而他身边的朋友却一个个垂头丧气，不详的预感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当巴鲁克最终坐在作证席上，众议院法规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罗伯特·L. 亨利请他报上自己的姓名、住址以及职业时，坐在旁听席上为巴鲁克打气加油的梅耶紧张得几乎呼吸都要停止了。

“我叫伯纳德·M. 巴鲁克。本人的商业办公地点位于百老汇大街第111号。职业是投资人和股票投机商。还有什么问题吗？”巴鲁克话音刚落，“投机商”一词立即在听众中激起了一阵反响，对他们来说这简直等于巴鲁克已经明白无误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的词语就。^①

接下来，巴鲁克始终用一种非常平和的语调回答问题，既没有表现出愤怒也没有显露出对询问人员的不屑。他在作证中将自己在股市下跌

^① 事实上，这一称谓当时已非常普遍。1916年，与列在个人所得税表格中的其他职业选项相比，更多的纳税人将自己的职业归为“资本家、投资人和投机商”这一栏中。当年，在国家财政部门收回的共437,036份个人所得税表格中大约20%，即85465份是由投资人填写的，而仅有2992份，比率低于1%的表格由公务员填写。此外，投资人缴纳的税款占当年国家税收总额的32%，而排在第二位的商人的税款则仅占12%。——原注。

前后的交易情况进行了陈述，将所有能够回忆起来的事情一一道来而且尽量讲得清楚详细。对于那些有关自己的传言，巴鲁克只是用一种一般性的语调进行了否认，说他并不知道“那位科蒂斯先生”到底是谁。此后，法规委员会又问起巴鲁克向总统竞选活动捐款 5 万美元的事情，一位共和党议员甚至开平玩笑地说：

“如果巴鲁克答应也向共和党捐款的话，我们倒是非常愿意吸收他加入共和党”。

巴鲁克回答说：“不是也有很多慷慨的资助人向共和党提供捐款吗？”

“但是谁都知道钱是越多越好呀”。

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巴鲁克还就其办公室里安装的各种设备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说他拥有两台可以自动收录道·琼斯指数变化情况的收录器，其中一台用于跟踪股市行情，另一台用于收录相关信息，此外他还与多家经纪人公司建立了直接的电话联系。在有关巴鲁克的办公室与经纪人公司联有多台电话线这一点上，“科蒂斯先生”信中的陈述是真实的（“科蒂斯先生”的信中倒是没讲巴鲁克办公室的所有墙壁上都挂有他驾驶快艇的照片）。巴鲁克说，他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布交易指令了。他作证说，自己已不再开展经纪人业务，不再进行空头交易。

巴鲁克回答说自己将所有的盈利存在五家银行里，其中他最信赖的两家是中央信托银行和抵押信托银行。他说自己手下主要有五家经纪人公司，分别是弗雷德·艾迪公司、兰斯伯格兄弟公司、A. A. 豪斯曼公司、巴鲁克兄弟公司和 H. 康坦特公司。

这时，一位国会议员问道：“这些公司都是经过正式注册的经纪人

公司吗？”

对于这一明知故问的问题，巴鲁克没有表示出不满，而是平静地回答说：“是的”。

当时，进行卖空交易仍然被视为一种有损声誉的事情，这一点不仅在华盛顿，就是在更为开放的金融中心纽约也是如此。巴鲁克回答说，自己不认为卖空交易有什么不好，而且他不同意亨利提出的废除这种交易方式的建议。

巴鲁克坦陈：“主席先生，我和您的观点正好相反。我认为如果股票市场中不允许进行卖空交易，那么当股市出现剧烈动荡时——当然，谁都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比如在证券价格急剧上涨一段时间之后突然爆跌，那么整个股市都有可能随之瘫痪。此外，请允许我再补充说明一点。我认为卖空交易其实是对那些总是持乐观看法的股票投资人最好的遏制因素，卖空交易人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提醒那些拥有过多证券的投资人或全体股民，这些证券有可能马上就会下跌，这样有利于避免投资人在证券价格过高时继续购进”。

这时亨利又岔开话题说，他认为为了减少股票交易中的投机因素，应该要求每个人在购买和抛售股票时必须提供其姓名和相关资产信息。为了显示自己的谦虚，亨利在做出这一提议时还加上了“如有不对，请多指教”的结束语。对此，巴鲁克的回答是：“你的观点是正确的，也许是我错了”。几分钟后，在一种非常客气的气氛中，巴鲁克获准可以离席，并被告知本月底他将再次接受问询。

与此同时，掀起这一调查波澜的劳森也提供了一张名单，上面是他认为与巴鲁克一样参与了幕后交易的嫌疑人，其中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保罗·沃伯格、财政部长麦克阿杜及其弟马尔科姆·麦克阿杜。得知这一消息后，马尔科姆气得希望他的财政部长哥哥能够好好教训劳森一

下，至少要打他个头破血流。随着这一名单的公布，劳森本人有些神经质的性格特点使得这一调查事件带上了一层滑稽和恶作剧的色彩。于是，当巴鲁克于1月30日重返华盛顿接受第二次问询时，他的心情已经不象第一次那么紧张了。根据国会的要求，巴鲁克这次还带来了一份经过审计人员核准、有关他在威尔逊总统的和平照会正式公布之前进行的所有交易的记录。

第二次问询一开始，法规委员会就对巴鲁克获得财经信息的来源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委员会顾问舍曼.L.威普尔问道：“除了股票行情和财经新闻自动收录器以外，你是否还有其他获得信息的途径？”

“没有，先生”。

“你在华盛顿是否安排有代表人？”

“没有，先生”。

“就你本人的习惯而言，你是喜欢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发号施令呢还是习惯于发电报？”

巴鲁克可能没听清威普尔的问题，他回答说：“是的，先生”。

“你是否从股票经纪人公司那里获得过任何内部消息？”

“没有，我对那些公司有关股市行情.....不感兴趣”。

“我没有听清你的回答”。

“我的意思是说我对那些公司有关股市行情的传言不感兴趣”。

原来，巴鲁克这位最著名的股票投机商只把经纪人公司所谓的研究成果当成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传言。这时，威普尔在查看了巴鲁克提供的股票交易记录之后发现，巴鲁克曾于12月11日购进了5000股美国钢

铁公司的股票，而等到 12 月 12 日，也就是德国总理发表和解意向书这一天，巴鲁克却在亏本的情况下以低价将这些股票出手。

对此，巴鲁克回答说：“我记得自己是以 123 美元多一点的价格购买的，我还记得当我下达抛售命令时，该股票的价格已跌至 120.5 美元，最后我是以每股 119 美元的价钱出手的。这件事我记忆犹新”。换句话说，巴鲁克根本未曾想到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会下跌，他还用一种充满懊丧的语调说：“都怨康坦特，没有及时把股票卖出去，最后我才不得不赔血本出售”。

“你在那天的交易当中损失惨重吗？”

“是的，先生。不过，这种情况在股票交易中在所难免”。

“巴鲁克先生，我很抱歉在这种场合涉及到你的商业失败，因为我想恐怕全世界的人都以为你是常胜将军呢”。

此时的巴鲁克已感到异常地轻松，他甚至用调侃的语调回答说：“说实话，此次调查唯一让我感到烦恼的事情就是必须要谈到自己的不成功”。

德国总理的公开讲话使巴鲁克抛出了他手中持有的美国钢铁公司、RAY 铜业公司以及古巴蔗糖公司的绩优股。巴鲁克证实说，当他对德国总理的讲话有所耳闻时自己正在与一家铁路公司谈判大量购买其证券的问题，由于预感到这番讲话将对股市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他立即终止了正在进行的谈判。

巴鲁克说，当时他唯一进行卖空交易的股票是加拿大太平洋铁公司发行的股票，他预计该股票将下跌，所以大量出售，等价格降低后再买进。

威普尔打断巴鲁克的话：“我指的是 12 月 12 日当天你都进行了哪

些卖空交易”。

巴鲁克回答说：“包括 12 日在内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对这家公司的股票进行卖空交易”。^①

12 月 12 日，巴鲁克将他手中持有的股票全部抛出。13 日星期三这天，他还用卖空的方式售出了大量股票，即 23400 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总价值近 300 万美元。换句话说，巴鲁克一人在 13 日这天进行的钢铁股票交易量就相当于整个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这一领域交易量的 6% 以及包括所有领域在内的交易总量的 1%。巴鲁克说，实际上在 12 日星期二这天他就打算进行卖空交易，但是因为他一整天都没在办公室，所以才在星期三完成了这些交易。巴鲁克接下来向规则委员会详细地解释说：

“在我看来，德国总理发布的和平照会是为结束战争向全世界发表的和平宣言，至少我本人是这样认为的，我想历史也会进行类似的记载。所以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我立即意识到这一和平照会将各个世界大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商业和金融领域。我认定长期以来一直满脑子都是战争的人们这下都会知道和平即将到来，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和平宣言。那么，战争结束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的结论是，有洞察力的股票交易人应该尽快采取行动，在股票价格开始下跌之前赶快出手”。

巴鲁克说，还有一个因素促使他做出了抛售股票的决定。这就是日本人自听说德国总理单方面发表的和解性宣言之后，就关闭了本国的股票交易所，而日本人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有经济头脑”的一个民族，跟着他们肯定没错。不过，巴鲁克还补充说，可惜的是日本的股票交易人

^① 巴鲁克说这句话的本意是指他在那段时间以卖空的方式出售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但这句话听起来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至少有一家报纸就称这意味着巴鲁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空投机商。而联邦储备委员会一位委员的儿子詹姆斯·沃伯格则以这家报纸的言论为基础，指责巴鲁克在进行股票交易时过于草率行事、不顾后果。——原注

不允许进行卖空交易，否则的话，全球股票市场的钱可能都要被他们赚走了。由于巴鲁克说这话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既是替日本同行悲哀又是为自己庆幸的语调，全场随之爆发出一阵笑声。

12月14日星期四，巴鲁克又以卖空的方式售出了另外1600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他使他卖空的股票总数达到了25000股，卖出价大约是每股119美元。15日星期五，巴鲁克开始“弥补股票亏空”，即为了完成交易买回自己先前以卖空方式出售的股票。这天，他以每股110美元的价格买进了14000股股票，其中的差价让他一下子就净赚了126,000美元。可以说，巴鲁克虽然在有关德国总理和平宣言历史意义上的认识是错误的，但在股市行情方面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

12月18日星期一那天，巴鲁克在股市刚开始营业时就利用卖空方式售出了11000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同一天下午，他还以同样的方式售出了另外几千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但是他是在这种股票在价格仍处于上升趋势时出手的，这一交易看似是一种亏本的买卖，巴鲁克做出这一决定势必要冒很大风险。威普尔不禁好奇地询问其中的原因。

巴鲁克回答说：“因为我预感到会有重大的事件发生，这就是劳合·乔治讲话。我早就意识到他会做出这一反应的”。

星期二中午左右，劳合·乔治讲话的部分内容传到了巴鲁克办公室里的自动新闻收录器中。巴鲁克记得当时他就在办公室里，而且一直站在显示屏前注视着讲话稿一个字一个字显示出来。

巴鲁克说：“……讲话的第一部分与大家的预测基本一致，即劳合·乔治拒绝了德国的和解意向，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考虑来自德国的和平倡议，等等。劳合·乔治的这一讲话使得股市出现了暂时的回升，但我还是继续进行我的卖空交易。果然，就在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显示屏时，后面的讲话内容出现了，‘但是他认为和平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霎那间，我一下子呆了，等我回过神来，我立即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以最快的速度卖空了尽可能多的股票。

到星期二股市收盘时，巴鲁克又出售了 28400 股股票，这样他总共卖空了 43400 股，总价值 470 万美元。接下来，巴鲁克又被问及他是否提前得到了任何有关华盛顿政府官方政策的内部消息，巴鲁克回答说，未得到过任何此类消息，并提交了一份有关自己在进行了大量卖空交易之后的一项交易记录作为证明。这份交易记录显示巴鲁克在星期三即 12 月 20 日这天购进了 17900 股的股票，而这一天正是华盛顿政府的和平照会正式公布从而引发了一场股市大动荡的前一天。

对此，巴鲁克说：“有关我提前获悉了政府将发布和平照会这一消息的传言是毫无根据的，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事实上，稍加考虑就会发现这种谣言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我真的事先获得了这一消息，明知股价要下跌还大量购进，那我岂不成了白痴？而且，如果真是那样，我肯定会在 20 日这天恨不能每分每秒都不停地卖、卖、卖，而不会像实际情况那样从上午 10 点一直到下午 3 点一笔交易都不做”。

巴鲁克说，他在 12 月 21 日即股市全线瘫痪这天将他在此前卖空的股票全部买进，还购买了其他种类的一些股票等待升值。这时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价格已跌至 100 美元左右，但巴鲁克说他没有买进这种股票，因为他“从来不在一种股票的价格跌至谷底或攀升至谷峰时买进”。

至此，巴鲁克已经在规则委员会的委员面前表现出他在股票交易方面游刃有余的风范，他甚至开始反客为主，问起威普尔是否想知道他在 21 日那天到底买进了哪种股票。

威普尔回答说：“我认为规则委员会对于你的股票交易内容并不感兴趣，除非——至少我本人不感兴趣，你没有必要在这里进行阐述……
嗯，不过你当时真的买进其他股票了吗？”

“是的，先生。在股市非常疲软时，我一般会买进那些我认为本身具有发展潜力的股票，而当股市刚刚出现疲软迹象时，我会尽力直到那些我认为本身最不具备发展潜力或者与其他任何一种投票相比技术含量最低的股票卖出去”。

本来就对卖空交易不太了解的威普尔此时更是云里雾里般糊涂了，这使他对于巴鲁克在如此复杂的股票操作中能够如鱼得水不禁感到钦佩不已。

巴鲁克却带着一丝得意的神情说：“这是最为简单的操作方式了”。

这时规则委员会已经大致得出了巴鲁克是清白的这一结论。于是委员们开始询问一些完全是为了满足各自好奇心的问题。

“对你来说，这次在股市大跌之前进行的所有交易称得上是一笔大买卖吗？”

“我过去还进行过比这规模更大的交易”。

“这就是说你只会把这次的交易称做一次重要的买卖，但却不是你从事这一行业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交易，是吗？”

“这次的交易应该说规模已经不小，但是我以前还做过——哎，我是必须回答以前都做过哪些大买卖吗？”

“噢，当然不是”。

“如果这是你提问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我还是会回答的”。

“委员会不会逼问你这个问题，大家都不想打探你的私事”。

“谢谢，不过我很愿意回答任何问题”。

“那么我们就只好以一种打听别人私事的方式询问这个大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我经常进行钢铁股票的卖空交易，而且数额大致与这次交易相当甚至更大”。

“你是说‘经常’？”

“是的，先生。尽管很多时候我都在做大笔的股票卖空交易，但是只有一种股票能够满足我随时可以大量购进然后再出手的要求”。换言之，美国钢铁行业的发展市场给了巴鲁克在购进和抛出股票，即进行投机交易方面最大的回旋余地。

这时，大家心里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巴鲁克，威普尔知道这一问题的敏感性，所以小心翼翼地绕了个圈子才说到正题。

“虽然你愿意为我们提供具体的数字，不过我不能保证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认为这一数字并不代表一种追求物欲的做法。但是，我还是觉得在某些商业领域，比如对你这样一个通过股票交易赚取巨额利润的金融界知名人士而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并不为过”。

对此，巴鲁克倒是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他的回答是：自己在这次交易中共获利 476,168.47 美元（杰西·利沃莫据称获得了两倍于此的利润）。

在问询结束之前，委员会成员又提起了此前巴鲁克已谈到过的一点。巴鲁克曾经作证说在股市出现动荡之前，他确实给两位华盛顿的政府官员、沃伯格和麦克阿杜打过电话，但是他们通话的内容与股票高层或政府的和平照会没有任何关系。巴鲁克说他当时只是想推荐一位朋友填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里的一位董事空缺罢了。于是巴鲁克又被问及是谁建议他打这些电话的。

由于意识到他将说出的这位人士具有众所周知的无可置疑的人品，巴鲁克不禁咧嘴一笑：“是 E. M. 豪斯先生”。

最终，巴鲁克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下了证人席。第二天，即 2 月 1 日，巴鲁克早晨一觉醒来就读到了《纽约时报》上一篇有关他“罪名昭雪”的社论性文章，大标题非常醒目“他根本无需内部消息！”

与此同时，那位真正提前获得了政府将正式发布和平照会的消息，并将这一消息通知给华尔街的恶人最终暴露了出来，他叫威廉.W. 普莱斯，是华盛顿州《星晚报》负责撰写网球等体育新闻的专栏作家。这位待人和蔼可亲、身材有些发胖的作家曾在克利夫兰总统第二任期当中开始担任白宫记者，整日在总统办公地周围打探各种消息。此外，普莱斯还在华盛顿州芝加哥市的好几家经纪人公司担任兼职工作，月薪 25 美元。在有关美国政府将正式发布和平照会的消息在华尔街开始流传那一天上午 11 点钟，华盛顿的新闻媒体已经从国务卿罗伯特. 兰辛召开的吹风会上得知了这一消息，但被告之一一定要到午夜之后才能将这一秘密泄露出去。普莱斯当时没有出席兰辛的吹风会，但他对和平照会的消息有所耳闻所以一听说国务卿召开了吹风会的事，就立即把有关内容透露给了芝加哥的《星晚报》和几家经纪人公司。国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追查到普莱斯的。他的一个女儿有一天忽然发现父亲的银行账户上出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收入，于是就将此事透露了出来，这才真相大白。最终，站在证人席上的普莱斯痛苦地回忆说：“《星晚报》这家大型报刊可能将我视作只是一种私人通报的事情误当做了应该向公众进行广泛宣传的重要新闻”。后来，《星晚报》对于普莱斯的话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看法，但就在这一年，普莱斯辞去了这家报社的工作，转而开始为华盛顿州的另外一家大型报刊《时报》担任撰稿人。

至于巴鲁克，当他遭受公众指责并不得不接受国会的问询时，他曾经下决心一定要做到两点：第一，洗清自己的名声；第二，再也不与政客们打交道或者涉足政治事务。但是，由于他在第一点上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最终放弃了第二个决定。

第九章

从纽约到华盛顿

正当巴鲁克在麦金利股票牛市呼风唤雨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一步跨入了美国政坛。巴鲁克把握两者的时机无懈可击——在一路上扬的股票市场中巴鲁克大量吃进，稳稳地持有这些为他带来无限财富的股票；同时在步入 20 世纪美国为自己在政坛找到了一席之地，亲身开创国家战时的管理体制。

巴鲁克的财富是在低税收和有限政府控制下的华尔街股票市场上获得的，但后来他却帮助建立了一种高税收和政府经济的干预制度。他到华盛顿时，美国的国债不到 30 亿美元，个人所得税微不足道，“国家经济计划”是个令人陌生的字眼。但当 1919 年巴鲁克完成使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国债已达 250 亿美元，最高税率翻了 10 倍以上，达到 73%，联邦政府牢牢地控制着国家经济。

是战争带来了这些变化。与其他交战国家一样，美国一边不断地公开表示要为自由而战，一边却在实际行动中背道而驰。美国政府以战争的名义征召部队、检查通邮、接管铁路和电信，并且规定了小麦价格。从巴鲁克父亲在家中接到的一份问卷调查中，可以对那个时期的特征看出一二。美国的《历史杂志》通过邮件寄给老巴鲁克先生一份问卷，问题是：作为一名德国移民，你是否愿意效忠和支持现在的美国？杂志的编辑同时通知老巴鲁克说，如果他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此事要被报告美国司法部，让他们采取适当的行动。

老巴鲁克立即表示了对国家的忠诚，而他的妻子来得更加直接，甚至表示自己没有任何德国的血统，将自己摘除干净（威尔逊总统没有顾及巴鲁克的父母是德国移民，在 1917 年 11 月巴鲁克父母结婚 50 周年时亲自送来了一篮菊花）。当时的美国对移民是否忠于国家非常在意，由于外侨和政治怪人的存在，导致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成立，这一联

邦机构由激进的记者组成，试图引出那些“散布消极故事.....，叫嚷和平或贬低战争胜利”的人。

如果说当时记者在公共信息委员会中所做的是控制言论自由的话，那么巴鲁格作为一个投资家和投机商却在帮助阻止自由经济——这些真令人匪夷所思。但巴鲁克在 1917 年早些时候的确是在全力以赴地做这件事，他把当时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变成了一种战时的社会主义。这段经历被巴鲁克自己称为一生中最伟大的实践。

在他摆脱了和平照会泄密事件的调查之后，巴鲁克转让了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席位，卖掉了大多数的普通股（萨尔弗湾、阿拉斯加杰纽和还没上市的塞浦路斯钨矿股除外），将剩余股票的分红捐给红十字会。当时，巴鲁克的财富已达 1000 万美元，他将其中的四分之三投资到了自由债券。安排完这一切，巴鲁克把妻子安妮和孩子们全留在这里，自己只身一人前往华盛顿住进了谢尔海姆酒店。他的第一个职务是国防理事会顾问委员会下属的原材料与矿物委员会主席。

1917 年的华盛顿还是一座小城，高大、英俊而又富有的巴鲁克的到来立即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巴鲁克很快进入了角色，显得很有信心。他没有华盛顿固有的官僚作风，上任第一步就根据国防的供需情况开始组织矿产和商品的调控。供应方面主要由矿主和供应商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巴鲁克都认识，他把他们请进了委员会参与意见。需求的一方主要是当时政府的各个部门，一般难于组织。根据这种情况，巴鲁克主要把精力放在了抓好供应、满足政府各种突如其来的需求上。

和平时期，供需是通过价格的杠杆作用自动达到平衡的。然而在战时，巴鲁克认为需要对价格进行控制，以减少平民的苦难、有效防止商人过多地获利。当时的美国政府也这样考虑，如果士兵和船员牺牲生命、冒死为国而战，那么商人至少要在利润方面做出一些牺牲。但这种考虑

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价格传达的是一种市场信息。如果通过控制价格扭曲了它所传达的市场信息，那么将会带来潜在的危害，这就像当时美国通过新闻审查扭曲了政治和军事信息一样。一战时期的美国最终没有实行全面的价格和利润控制，但其强制推行的有限价格控制被小犹太·梅耶称为“非自愿的自愿”制度。

巴鲁克在自传中曾提到了这么一件事。一天，他出席白宫举行的招待会，中途，总统的一个军事助手找到他，说总统有事要见他，巴鲁克心里暗自纳闷，后来，威尔逊忧心忡忡地对巴鲁克说有项特别的使命要交给他。原来美国一家私人财团战前从奥地利购入了数艘军舰，他们的打算是，一旦美国参战，便将这几艘军舰高价卖给政府。当然这家财团也冒了极大的风险，一旦美国不参战，他们的资金被冻结在这几艘军舰上，损失便惨重了。然而事实证明他们赌对了。开战后，这些军舰成了美国政府最需要的武器之一，他们完全能够借此获得一笔可观的利润了。

威尔逊总统对这些大发战争财的商人非常气恼，但无可奈何，便想到了巴鲁克，让他来做这件事。他对巴鲁克说：“你可以使用你能想到的总统所具有的所有影响力，拿到那些军舰，却不让他们赚钱”。巴鲁克曾经作为一名投机商在股市里搏杀，现在总统要他出马挫败的是他的同行，然而，巴鲁克对此并没有过多的想法。他后来写道：

离开白宫时是晚上 9:58。一回到谢尔海姆酒店我就开始给那些“囤积”军舰的家伙打电话。他们中有一个人就在华盛顿，其他人则在纽约，我把他们中的一些人从被窝里叫了起来，向他们郑重声明，“美国政府”需要这些军舰，但绝不可能付给他们想得到的丰厚利润。“你们看着办罢！”并且强调，他们在这件事上与总统对着干没有什么好处。也许是这番威胁起了作用，也许他们明白了事情的利害，最后这些财团老板答

应尽快把这几艘军舰交给政府。

第二天早上一爬起来我就拨通了白宫的电话，当时手表的指针刚好指向 8:58，距总统交给我这项使命整整 11 个小时。我通知威尔逊总统船已拿到手，没给任何利润。总统显然对我以如此快的速度就办好了此事感到有些吃惊，他在电话里赞了我几句。

虽然巴鲁克在接受总统的命令时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但他还是灵活处理了问题，堪称理想的下属。巴鲁克身上另外令人瞩目的一点就是他自然流露出的乐观精神。虽然有时职权被缩小了，他也不会像别人那样斤斤计较——比如，1917 年，煤炭从巴鲁克管理的原材料与矿产委员会中划了出去，单独成立了煤炭管理局（遇到这种情况，巴鲁克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斐兹姆门斯的话，“出类拔萃的人只有能忍受才有可能反击”）。除此以外，巴鲁克还有采取行动的热情。记者马克·萨利文在 1917 年春天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谈到了巴鲁克这个特点：

为了促成事情的解决或完成某项工作，他总是准备进行妥协、修改原定的计划或是尝试另外的途径。他是一个好人，有点天真，有些过于热切，但又不显得咄咄逼人。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充满热情，不断寻找新点子，精力充沛，不遗余力。他的身边应当配备十几名训练有素的秘书，才能将他飞快的思想记录下来，或是着手进行他所布置的各项工作。他的这种积极态度和对每一项新任务都兴奋不已的性格使他的对手不由自主地缴械投降。

当时，爱德华·科考恩是巴鲁克的私人秘书——做的就是萨利文建议的工作。虽然巴鲁克因为是从华尔街来的犹太人而有些不利条件，但他积累的财富却弥补了这些不利。比如他们不给巴鲁克所在的顾问委员会拨公共基金建立办公室，他就自己掏钱租下芒塞大楼的一层办公，并

且指示他的秘书，如果有什么麻烦就把整幢大楼买下来得了。

美国政府不愿意为顾问委员会解决办公场所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人清楚这个委员会到底应做什么。它的职责是向美国陆军和海军提供有关采购的建议、监管美国的商业活动和帮助政府进行战时动员协调。但是由于已经习惯了自由市场，美国军队又不屑于从文职人员那里听取建议，所以，事实上，顾问委员会的影响很小，虽然它的确在组织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比如成功地推动了航运委员会、应急船运公司和食品署的建立。

在巴鲁克看来这不是一种理想状态。早在 1917 年 5 月他就试图劝说威尔逊总统成立一个高效率的战时供应局，由总统任命专人负责。而总统最终同意建立的机构是战时工业委员会，巴鲁克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后来，是金融方面的工作为这个委员会建立了威信，而不是在工业管理方面，这当然与巴鲁克的经历不无关联。

威尔逊政府当时的计划是通过提高税收、增加货币供应来迅速筹集战争所需要的金钱，同时通过对价格有选择地加以控制来掩盖通货膨胀。这一抑制通货膨胀的任务交给了工业委员会，而刚刚成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具体地说就是财政部长威廉·麦克阿杜和美联储主席，则负责增大货币供应，产生通胀。这种安排非常有趣：是麦克阿杜的努力使巴鲁克获得了现在的职位，而他的职责却是抑制通胀，与麦克阿杜的职责恰恰背道。

相比而言，麦克阿杜的日子稍微好过些，通货膨胀毕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既成事实了。1916 年盟国用于向美国购买武器和原料的黄金涌入纽约时，商品批发价格的升幅不小于 37%。美国参战后，财政上出现巨额赤字，不得不靠借贷的方式进行弥补。在 1918 和 1919 两个财政年度，美国政府每天的花费高达四千三百万美元，超过别的所有交战国家；

据战争部估计，这笔花费以 18 世纪的价格计算，可以支持一千个独立战争。

这些花费的一部分通过税收和从人民储蓄中借贷而获取，这些方式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而另外一部分则完全凭联邦储备银行印制钞票进行弥补。因此从 1917 年到 1920 年，由联邦储备银行承担的信贷增加了 30 亿美元。就像人体摄入的热量是否引起肥胖，是由新陈代谢决定的一样，增加货币供应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要看经济的活力如何。但在一战中的美国来看，增加的货币供应肯定会引起通货膨胀：民用生产下降，人们手中拥有大量货币，但可供购买的商品却少得可怜，生活费用必然提高。因此，1916 年，美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提高了 17%，1917 年又提高了 17%，1918 年上升 15%。价格上升幅度有所减缓某种程度上归功于战时工业委员会对价格的控制，商品批发的价格也从 1917 年的上浮 12% 下降到了 1918 年的上浮 6%（而 1916 年时这一数字是 37%，天文数字一般）。但后来价格控制的有所放松，商品价格随之开始了新一轮的攀升。^①

1917 年早些时候，美国金融市场一段时期内猛烈下挫，倒不是因为巴鲁克离开了华尔街，而是因为他进入了华盛顿。长期利率和上等证券由 1917 年 1 月的 4% 上升到了 10 月的 5%，而当时其他的证券，包括巴鲁克本人购买的债券，价格都在下跌。很长时间以来，通货膨胀导致

^① 战争快要结束时，战时工业委员会（巴鲁克还是当时的主席）甚至出面告诫美国各方要降低生活费用，1918 年 8 月委员会发表了如下一份声明：

鉴于较高的生活费用仍在每天提高，这给普通的美国人和他们的家庭以及公众带来巨大的生活困难；

鉴于生活必需品的不合理价格正在引发社会的动荡和不满，因此削弱了公众的团结、和睦与信心；

鉴于这种动荡和骚乱将会带来巨大的危险，直接影响国家的战争计划；

鉴于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在于建立公众的信心，赢得他们的全面合作和对国家政策的支持；因此战时工业委员会决定，我们强烈要求商品价格要被固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各方要迅速根据这一要求制定相应的计划，尽快加以实施——原注

高利率，因此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意料之中的。1917 年底的美国金融市场几乎与 1914 年 7 月 30 日的情形相同：欧洲的抛售浪潮使得纽约证券交易所不得不暂时闭市。《纽约时报》的资深金融编辑亚里山大·诺耶斯写道：“1917 年，货币大量供应与工业活动的乏力不相一致的严重状况在美国的历史上前所未见，如果反映到其他时期的市场，必将会发生金融恐慌”。

引起股票市场熊市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府太“牛”了。虽然以前政府对经济也并非不管不问，但这一次，政府的手臂因为战争伸得太长。高税收、紧银根，投资者不能不望而却步。

当然有人对这种经济管理方式持批评态度，不过当时百试不爽的解释就是战争的存在。停战之后，对这个问题争论又起。二战以后，奥地利的经济学教授卢德维格·米谢斯针对惯用的战时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首先尽可能地从国家税收中提取战争费用，减少民用消费，扩大陆军和海军的购买力。人民收入降低，对民用商品的消费减少，商人将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扩大的武器市场上来。但是，对这一点，巴鲁克认为，商人自愿转产军火武器的速度太慢；但米谢斯认为，恰恰相反，如果价格能发挥作用，谁转产军火和武器的速度越快就越有可能获得巨大的利润，那么，所有的企业都会以闪电般的速度聚集到军火市场上来的，产量也将大幅提高。根本不用建立什么政府的计划机制，完全可以用市场来控制企业。相应地，战争的费用完全靠税收和从人民的储蓄中借贷来支付，也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但是，一战时期的威尔逊政府却反对战时企业获得利润，政府极力介入，由政府决定（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生产多少、由谁生产、价格多高，造成了当时的局面。

这种情况在作战最基本的需求火药生产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E. I. 杜邦公司是世界主要的弹药生产企业，一战初期它在向交战的盟国出售弹药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但是，1916 年（我们的主人公仍在华

尔街) 美国政府出台“弹药法”，没收弹药生产企业所获高额利润中的一部分上交财政部。杜邦公司指责这部法令是不公平的，带有事后算账的意思。尽管如此，1916 年的利润报告显示，当年获利 8200 万美元，是其 1914 年销售总额的 3 倍。

战争给杜邦公司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也给其管理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一战中，德国屡屡击沉美国商船，迫使杜邦公司在国内想办法保证原料供应。为此，1916 年公司打算在田纳西河上的玛索浅滩建一座水电站，请求政府批准。当时水能属于联邦政府保护的资源，因此国会拒绝了这一请求。但国会却又随即在同一地点批准建起一座由政府拥有的氮提取工厂，当时的海军部长强调建立政府弹药工厂与私人企业竞争的重要性，当然这私人企业主要指的就是杜邦公司。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美国参战后，联邦政府对需要多少弹药和多快时间需要这些弹药一直没有做出判断。截止到 1917 年 7 月，陆军与海军和杜邦公司共签订了 1.23 亿磅的弹药合同，这一数量凭杜邦公司现有的生产能力可以毫不费力地完成。但是到了秋季，弹药需求量急剧上升，政府开始与杜邦公司谈判提高产量的问题。这个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10 月 25 日，杜邦公司与政府的代表、陆军军械主管威廉·克劳泽尔少将签订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合同——用 9000 万美元将杜邦公司无烟火药的生产能力扩大一倍。政府首批定购的数量为 4.5 亿磅弹药，合同金额 1.55 亿美元。杜邦公司负责建造生产工厂，建造的花费由纳税人承担。每生产 1 磅弹药杜邦公司获利 5 美分，如果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其他方面的优惠。

据巴鲁克的回忆，克劳泽尔少将是个聪明而又锋芒不露的军官——“许多个晚上我与他坐在战争部里敲定生产的要求和安排，而他的妻子就静静地坐在房间一角织毛衣”。克劳泽尔将军起先根本没想起巴鲁克和他的战时工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确容易让人忽略。战时工业委

员会 1917 年 7 月成立，它代替顾问委员会，职能主要也是提供建议。它的首任主席弗兰克·斯科特由于健康原因而辞职，它的炸药委员会则开始调查杜邦公司与政府签订的这个合同。调查者发现了一些问题并向当时的战争部长纽顿·贝克提出了批评意见。由于个人性格和观点的缘故，贝克很容易就与杜邦公司的批评者站到了一起。于是，当克劳泽尔把合同交给贝克部长审批时，得到的批示是——“取消该合同”。

这一否决命令引起一片哗然。战时工业委员会，特别是首席价格审计官罗伯特·布鲁金斯和原材料委员会主席巴鲁克立即开始着手整理反对这一合同的理由，而克劳泽尔少将与杜邦公司的总裁皮耶尔·杜邦则为这一合同辩护。后者指出，杜邦公司承担了很多花费、很大风险，公司的获利却被大大地夸大了；而战时工业委员会的布鲁金斯却坚持认为，杜邦公司在弹药生产中“过度”获利。

虽然贝克和巴鲁克或许已经准备（用贝克的话说）“不依靠杜邦公司照样赢得战争胜利”，不过这样的扬言没有被当时的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丹尼尔·威拉德所认同。根据贝克的观点，政府应在弹药生产方面有所作为，巴鲁克对此也表示同意，他说自己恰巧认识这么个人可以完成这项使命。巴鲁克随即给远在旧金山圣弗朗西斯酒店的朋友丹尼尔·杰克林通了电话：“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接受你，但我想你最好还是先到首都来”。丹尼尔果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华盛顿。几天后，贝克提出要见见这位杰克林先生，结果丹尼尔得到了这份工作。

丹尼尔负责要做的是建一座或几座弹药工厂，在没有“杜邦”的情况下达到每天 1 百万磅弹药的生产能力。为此，贝克早先接触了一家名为汤姆森—斯塔莱特的建筑公司，该公司向丹尼尔表示有能力承担弹药工厂一半的建设任务，但仍需杜邦公司提供必要的建议。丹尼尔给杜邦公司打了电话，得到“愿意提供帮助”的回答，于是丹尼尔请求贝克批准与杜邦公司重开谈判。

此时，由于最初签订的弹药生产合同被取消，美国的供给状况急剧恶化，所以贝克不得不对杜邦公司温和一些，于是双方达成协议，杜邦公司负责一部分新弹药工厂的建设。丹尼尔负责这一工作后，巴鲁克给他的建议是：不要与美国军方搅在一起，以免失去行动的自由。后来的事实是，杜邦公司的建设人员却受到了丹尼尔的很多限制，行动自由被大大地缩小了。

全部工程完工之后，杜邦公司最终获得的与其最初提出的利润相差很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鲁克和他的同事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整个项目中有些纳税人的钱是被白白花掉的，比如，负责一半工程建设的汤姆森—斯塔莱特公司没有生产 1 磅弹药，却花掉了 1350 万美元。如果工程由杜邦来做，花费绝对没有这么高；而且从效益角度而言，如果按照最初与杜邦公司签订的合同进行弹药生产，而没有后来巴鲁克和战时工业委员会的参与，肯定能更好地满足战争所需。

巴鲁克作为战时工业委员会中原材料委员会的主席，每天的日程基本这样安排，以他在 1918 年 2 月一个工作日的备忘录为例：

打电话给麦克罗伯茨上校。

是否收到今晚前往韦拉德处参加跳舞课的邀请？如果没有，他们也希望你能前往。

昨天与你一同乘火车抵达的亨利·梅尔希望你的助手安排他与战争部长会面，谈论有关一家公司与巴拿马运河签订的合同问题。

希伯斯先生打来电话说诺沃克先生在他的办公室，诺沃克带着一封杰克·菲尔德先生的推荐信，他想知道什么时间可以给你打电话接受你的面试，他的电话是 M. 545。

布兰德先生给你打来电话，他说与你约好今天下午在你方便的时候见面，布兰德先生 3 点钟到。

巴鲁克一战结束前的最后八个月里担任了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职务，然而在此之前的整整一年里，他都在默默无闻的原材料委员会中工作。那是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他有许多建议，但没人采纳，他有很多计划，却不受人重视。当时巴鲁克正为生产弹药所需的硝酸苏打的短缺而头痛，看起来这种短缺不会是暂时的，巴鲁克写道，他简直快要神经崩溃了，这时一位海军的情报官走进他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刚刚截获的秘密电文。原来智利政府有一批黄金在德国人手上，智利几次想要回这些黄金，都没有成功。得知这一消息后，巴鲁克顿时来了精神，他写道：“我立刻给智利驻美国大使挂了电话，他在电话里一再向我抱怨他的国家控制通货膨胀如何如何的困难。于是我提出与他做笔交易，如果智利扣下德国政府购买的 23.5 万吨硝石，把它们卖给美国，我们将以黄金付这笔货款”。生意做成了，巴鲁克大松了一口气。^①

巴鲁克也在私人日记中记下他的一些烦闷，比如：“与罗姆周旋简直令人怒不可遏”，“让所有人都负责的事就是没人负责的事”，另外还有对毫无结果地讨论固定镍价会议的评论：“看来让整个委员会坐在一起是拿不出任何主意的，简直毫无用处、浪费时间！”（另外还有巴鲁克对自己私人生活的记录，他描述一个周日与家人这样度过：“清晨与两个女儿外出散步，……下午与妻子和儿子呆在一起”）。

很明显，到了 1917 年底，整个战争组织好像出了问题。一位研究战时工业委员会的历史学家这样写道：“整个战争机器好象呼哧呼哧地慢慢停了下来”，“根据当时的供给情况，潘兴将军预言 1918 年春季的

^① 令人不安的一个事实就是美国政府在战前拒绝了杜邦公司提出的在玛索浅滩修建提取氮工厂的建设。而让杜邦公司认识到美国完全在依靠智利硝石制造弹药这一现实的人就是克劳泽尔将军，他是与杜邦公司达成最初弹药生产合同的陆军军械主管——原注。

攻势将是灾难性的。1917年12月26日，由联邦政府控制的东部铁路出现了一片混乱”。在参议院，有独立思想的俄勒冈州民主党议员乔治·谢伯林开始就糟糕的陆军供应组织工作展开听证。美国报纸上也出现要求建立新的联邦军需部门的呼声。于是，巴鲁克果断地向谢伯林领导的国会调查委员会提出建议：建立一个经过改革的中央供应部门，由一人负责。当然巴鲁克几个月来一直在私下里为自己争取这样一个职位。

虽然巴鲁克没有向调查委员会建议由谁负责这个新供应部门的工作，但他心目中的第一人选就是自己，而且巴鲁克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然而他却遇到了来自战争部长贝克的反对，贝克不喜欢巴鲁克，或者说的不喜欢他在华尔街的背景，而且贝克把战时工业委员会看成是对他掌握的军需供应部门的威胁。但是，当时这位战争部长的声望正在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财政部长麦克阿杜，而他可是巴鲁克地地道道的朋友（事实上，麦克阿杜已向威尔逊总统提到了巴鲁克的名字，如果贝克被解职的话，麦克阿杜推荐由巴鲁克担任战争部长的职务）。在白宫的压力下，贝克根据巴鲁克的建议加强了战时工业委员会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由谁负责这个部门的工作。

巴鲁克的名字被提了出来，还有其他几个人，包括海军部长丹尼尔。起先，巴鲁克认为丹尼尔是个“心地很好、正直老实、思维简单的笨蛋”（后来巴鲁克改变了对丹尼尔的看法，他俩成了朋友）。他认为自己有能力胜任新的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政治忠诚、经济独立、经验丰富、行事果断——1917年西奥多·罗斯福评价巴鲁克是“当时威尔逊政府中能力最强的人”——但巴鲁克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农业部长休斯敦、商业部长里德菲尔德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考米克等人对他的行政管理能力提出了疑问；联合太平洋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战时工业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罗伯特·洛维特、战争部长贝克和内政部长雷恩则明确反对巴鲁克担任这个职务；美国商务部也对这个任命抱

有疑问。当然巴鲁克同时也受到一些人的支持，包括总统秘书乔·塔马蒂（也是和平照会泄密事件的受害人之一）、著名记者大卫·劳伦斯和美国联邦劳工主席塞缪尔·乔姆帕斯，当然还有财政部长麦克阿杜。

1918年2月围绕巴鲁克任命的各种传闻让他的情绪大起大落。2月7日，在与威尔逊总统的会谈中，巴鲁克再次强调由一人控制战时工业委员会的必要，但当时他得到的印象是，这个人会是爱德华·斯塔蒂纽斯。但斯塔蒂纽斯是摩根的合伙人、共和党人，他的资历甚至还不如这位犹太人。虽然有麦克阿杜支持巴鲁克，但由于有贝克等人的反对，因此这个任命迟迟不决。

梅尔劝巴鲁克不要过于担心，但巴鲁克却对朋友说，如果他不能得到这个职位，就考虑加入美国铁路管理部门工作。同时麦克阿杜也在寻求给巴鲁克在战争金融合作委员会中找到一个工作，他还写信给威尔逊总统征求意见。但威尔逊当时有别的计划，他在给麦克阿杜的回信中写道：“亲爱的麦克，我很抱歉不能让你把巴鲁克弄到金融合作委员会里去，他现在正在战时工业委员会中接受锻炼，一旦熟悉了这个委员会从上到下的各项工作，我将在不引起国会里新的麻烦的前提下尽快将巴鲁克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此事万望请你保密”。

1918年3月4日、星期一，战场上盟军正处于最低潮：前一天俄国正式退出战斗，而3个星期之后德国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这一天，巴鲁克被威尔逊总统召到白宫，正式宣布任命他为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同时，威尔逊还交给他一份授权书，详细说明经过改组的工业委员会及其主席的职责。巴鲁克接过授权书，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好放进兜里。离开白宫的时候，外面正下着带有寒意的小雨，巴鲁克暗暗在心里对自己说：“好了，现在当你说‘不’的时候，你的意思就是‘绝对不行’；当你说‘行’的时候，就是‘立刻照办’。无论你做什么，你都需要自己拿主意，不要拖延、不要犹豫不决，你要时刻做到当机立断！”

巴鲁克以前从没有当过什么主席，过去，他的家里有妻子安妮负责管家，办公室里玛丽·葆拉打理和安排一切，巴鲁克自己从来没有掌管过规模如此之大的一个机构，甚至从未在日常行政领导的岗位上试过身手。但是巴鲁克并不缺乏当机立断的领导作风，过去他在华尔街的一举一动不仅能影响几位重要的合作伙伴，甚至能影响整个市场。凭着这些经历，巴鲁克毫不费力地适应了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的角色。没有多久，他的手下便开始毕恭毕敬地称他为“头儿”（丹尼尔·韦拉德——前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曾在几年后给巴鲁克的信中这样写道：“甚至在我还是顾问委员会主席、而你只是其中一名成员时，我就认识到你才是整个委员会里最能干的人”）。

巴鲁克还是一位讨人喜欢的领导，他的到任使得外界普遍认为战时工业委员会与美国工业界的关系将会相当融洽。《华尔街日报》曾将巴鲁克控制价格的做法与美国煤炭局的生硬做法进行过比较，后者的强制态度曾激怒了矿主，从而导致了煤炭的短缺。该报称“巴鲁克的做法是跟工业界的首脑坐下来一起讨论如何压低价格，虽然完全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因此回旋余地不大，但通过巴鲁克的努力，工业界的人士至少在作出必要的牺牲后感到他们的做法得到了承认与赏识”。

巴鲁克以自身的素质征服了下属与对手。身为股票交易商，他擅长从宏观角度观察整个国家经济，而且还关注事实，采取行动之前，经常考虑是否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这些都使巴鲁克显得非常睿智，加上他出众的外表、惊人的财富，因而所到之处受到普遍的欢迎。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可以说明他受欢迎的程度：巴鲁克要将曾在 J. P. 摩根公司做过咨询工作的一位工程人员列兰德·萨莫斯招募到战时工业委员会里做事。萨莫斯看过工作的环境，特别是见过未来的上司之后，不仅立即同意，而且表示不要任何报酬。

巴鲁克的任期不长（从被任命到战争结束只有 253 天），但职责却

非常广泛。总统授权他了解战争供应方面的所有问题，让进展顺利的供应活动继续，而在需要决定优先供应次序或控制价格时，进行必要的介入。总统威尔逊对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的职责在授权书中这样规定：

主席的职责如下：

（1）为政府所有供应部门的集体利益而工作。

（2）不要干涉那些组织得力的供应活动，对目前政府部门中正常的采购与供给活动应尽可能不过多干预。

（3）当需要对供应工作进行指导或帮助时提供必要的服务，例如合同分配、提前获得某些即将耗尽的材料和公开供应来源等。

（4）当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就供应问题存在矛盾或利益冲突时决定如何处理，比如假设没有足够满足所有部门需求的物资时，要决定优先供应的次序，或是存在对生产原料和供应的竞争需求，或是如果签订的合同不能发挥国家的全面生产能力的优势，也要由主席出面进行协调。

（5）如果出现（3）、（4）项中的情况，要监督合同和供应是否遵照协调之后的方式进行。

（6）洞察政府各个供应部门未来的需要，尽可能早地对国家工业进行合理调整，以使工业企业人士看到明确的目标与机会。

简而言之，主席应当充当政府所有供应部门在工业界中的“眼睛”。

鼎盛时期的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有 750 人，巴鲁克担任主席期间，下设价格限制部门、优先决策部门、资源保护部门。另外还有一个法律顾问办公室，由阿尔伯特·瑞奇担任办公室主任，他后来成了马里兰州的州长。瑞奇曾提醒巴鲁克，他正在法律规定的权力之外行事，很有可能被那些因他的决定而蒙受损失的人们进行起诉。巴鲁克从来不信任律师和书面合同，因此根本没有理会瑞奇的提醒（他因潜在法律诉讼的损

失已经超过了他的个人财富)。不过他还是采取了一些预防性措施，比如要求与他打交道的企业人士不要带他们的律师一同前来。多数情况这个要求都得到了照办，这使得巴鲁克直到结束战时工业委员会的任职没有陷入任何法律官司。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提醒是极其正确的。

也许清楚自己是个随意的行政领导，所以巴鲁克费尽心机挑选了一批作风严谨的下属。这些人虽然在战前都没有达到事业的高峰，但随着战争的开始，他们的地位得以加强，逐渐成熟起来。以阿尔伯特·瑞奇为例，他后来甚至尝试冲击总统宝座（1932年海军出身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击败瑞奇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亚里山大·列吉，牛仔一个，担任巴鲁克的运营主管，后来成了国际收割机公司的总裁。比利·罗斯，战时工业委员会的王牌速记员，后来写歌并在百老汇表演，积聚了35万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

巴鲁克拥有一个三个人的参谋班子，加强了自己主席的职位。他们是：公用事业主管哈里森·威廉姆斯、投资银行家克莱伦斯·迪隆和报人赫伯特·斯沃普。其中斯沃普与巴鲁克的关系最好，在巴鲁克被任命为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时，斯沃普在纽约的《世界报》上对其致敬，称：“巴鲁克拥有美国总统对他的信任，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的才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甚至那些反对他的人也这样认为”。斯沃普对巴鲁克如此充满溢美之词的赞美是因为在此之前巴鲁克曾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我经常听人们转述你对我的赞誉，这使我有些愧不敢当；我敢大胆地预言，凭着你我之间的了解，如果我们尽快见面就一定能够成为朋友，而且我相信未来一定会见证我们这种持久的友谊。”事实上，斯沃普后来的确成为巴鲁克最亲密的一位战友。

战时工业委员会中还有一些像斯沃普这样的工作人员，他们与巴鲁克之间建立了一种牢固的忠诚的关系，后来他们都被称作“巴鲁克的人”。约翰·汉考克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个审慎从容、嘴里总是嚼着烟条

的投资银行家后来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的原子弹控制谈判中都帮助了巴鲁克。另外还有前面提到的乔治·皮克，一位农具生产主管，在巴鲁克的财力和精神的支持下，提高了战后美国农民的生产能力。在巴鲁克的核心圈子中，休伊·约翰森将军的经历最为奇特，他早先就读于西点军校，战时作为战争部的代表被派往工业委员会监督工作。对于这个派遣约翰森非常不情愿，但正是由于这个任命才使他结识了巴鲁克。停战之前，军方解除了约翰森在工业委员会中的任职，恢复了他的现役。但就在开赴前线的前夕，一场感冒使他错过了前往法国参战的机会，他只是登上了泊在新泽西霍伯肯的一艘兵船，战争就结束了。退役之后，约翰森加入了乔治·皮克的农具生意，后来他成为巴鲁克资助的作者和股评分析人。1933年，约翰森被选入国家复苏管理机构，这是罗斯福版的“战时工业委员会”。

另外一些并非巴鲁克亲信的人也不同程度地帮助了他，象犹金·梅耶，他曾是巴鲁克在华尔街的对手，比巴鲁克更富有，了解更多有关原材料的事。最初，梅耶向巴鲁克提出，应该让铜商压低向陆军和海军出售战争用铜的价格，以此向公众表明正在欧洲发生的战争并非只向富人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他们也会做出牺牲。当时正是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巴鲁克认为这个主张不错，但他拿不准铜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事情出奇的顺利，约翰·雷恩和丹尼尔·古根海姆等铜商一致支持压低铜价，为此双方达成了协议把向美国军方出售的铜价压低一半。巴鲁克本人为此受到广泛赞誉，甚至收到了当时任美国海军副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热情洋溢的信。

美国1917年4月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梅耶也开始为自己在华盛顿寻找一个职位。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巴鲁克，但此时的巴鲁克已今非昔比，他有些高高在上，不愿认真地帮梅耶的忙了。巴鲁克最后为梅耶找到一个顾问的职位，管理军鞋和帆布军装。对此梅耶非常不满意（这

没有发挥他了解金属材料的特长)，他又找到巴鲁克。梅耶的传记作者这样描述了他与巴鲁克的会面：“巴鲁克没有请梅耶来，也没有意思让他留下，当梅耶执意留下替巴鲁克效劳时，他没被分派干任何具体的工作”。

梅耶自己找活儿干，他接听电话，整理文件，而且不时派科考伦去巴鲁克所住的谢尔海姆酒店客房找落在那里的公文。尽管梅耶决心报效国家，但他在巴鲁克办公室所做的却是临时办事员的活儿。

一天巴鲁克对梅耶说：“伙计，为什么你总是拉长着脸，抱怨所有的事，难道你就不能像我一样多笑一笑？”

梅耶直截了当地回答，考虑到目前美国军需生产的现状，他根本笑不起来，而且如果巴鲁克本人也了解更多的情况，相信他同样不会那么轻松。梅耶甚至毫不客气地说：“你现在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而所有的人又都说你如何如何了不起，吹捧就快让你像气球那样胀裂了。而我现在是你唯一的朋友，敢在你的气球上扎出小洞，把多余的空气放一点出来。当事情进展得不太令人满意时，我不会硬说一切都好，我会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如果你不喜欢我的直言不讳，那么可以叫我走得远远的，我很高兴找些其他的事情做”。

梅耶又在巴鲁克身边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去担任另外一个顾问职务，负责非铁金属的管理，此后他在 1918 年进入战时金融委员会。在参议院对梅耶的这一任命进行听证时，巴鲁克对梅耶的工作精神大加赞扬，他的不遗余力的赞誉使参加听证的参议院委员会主席最后不得不问了一句“梅耶还活着吗？”随着时间的推移，巴鲁克开始把梅耶在战时所取得的成就归于自己的慧眼识英才。战后他还四处散布说他是第一个为梅耶在华盛顿找到职位的人。

巴鲁克总是赞扬他的下属（对他自己来说就是知人善任），通常总

与他们站在一起。一战后，巴鲁克接受了荣誉服务勋章，但被授予勋章时，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三位“高参”也应得到同样的荣誉。而且，在1918年夏季这样的关键时刻，巴鲁克要求他那些因为工作而劳累过度的部门负责人抽出一至两个星期休假。战后，经巴鲁克倡议，由自己在战时工业委员会的旧部成立了一个战时工业协会组织，1938年，组织成立2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到会的145名成员听了巴鲁克对时政发表的演讲，观看了表演，并随后参加了巴鲁克在塞维伊饭店举行的晚会。这一天，巴鲁克的旧部向他赠送了一尊巴鲁克的半身雕像。战时工业协会的秘书霍华德·因加斯后来记述道：“巴鲁克为此深受感动，我想这是他收到的一件最珍贵的礼物，这座雕像对他来说意味着很多，它最好地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毫无疑问，巴鲁克为他那些战时工业委员会下属所表达的尊敬而感动，但同时他更为自己的成就所陶醉。巴鲁克会滔滔不绝地对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与成就，好像谈论的是其他人。一战后，一位女记者向巴鲁克问了某个问题，巴鲁克承认无法回答，但接下来（记者写道）他向我足足谈了两个小时有关他个人的经历。他告诉我他如何从一个每周薪水3美元的办事员做起，而现在他是多么富有；他的人生哲学；他如何能够看到失败就要来临，做好一切准备重新开始；他的社会观念是如何的自由开放；他如何愿意为他的财富上缴巨额财产税，如果这可以帮助战后的世界走上复兴之路；他与下属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民主和平等；他在谈论自己时的语气就像描述另外一个他所钦佩的人，或是像谈论很久以前发生的事，这非常令人惊讶。

巴鲁克这种自我表白过于直接，多数情况它所引起的是嘲笑而不是赞叹，一些人常常毫不客气地指出巴鲁克的虚荣，像罗伯特·布鲁金斯，他就抱怨巴鲁克总是竭尽全力要给他留下刚从白宫回来或是赶着参加重要会议的印象。豪斯上校在1917年的日记中曾经写道：“我无法相信

我的国家会把如此重要的责任交给一个华尔街的犹太投机商”，据说他在战时工业委员会安置了一个间谍专门监视巴鲁克的言行。据艾利斯·罗斯福·朗沃斯称，陆军情报部门曾在一个漂亮妇女的家中安放了窃听装置，这名妇女被怀疑在战时替敌人刺探情报。巴鲁克并不知道这一切，他一次去那个女人家里，朗沃斯的夫人当时正巧与丈夫一同窃听那里发生的交谈，她回忆道：“我们听到那个女人问巴鲁克共有多少机车被派到了罗马尼亚，或者一个类似的问题，在间或喘息很重的接吻声里，依稀听到那个女人指责巴鲁克说‘你是个胆小鬼，你就不敢替我去查问一下’”。

巴鲁克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期间的确掌握着大量信息与情报，他可以利用这些顺利开展自己的工作。威尔逊总统在非正式场合甚至称巴鲁克为“消息博士”，1918年夏季，美国政府决定武装一些捷克部队，把他们派到俄罗斯战场与盟国一起打击企图起义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当时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打算在西伯利亚的冬季来临之前为捷克部队运去装备和冬衣，但战争部对此却很不配合。为此兰辛直接找到威尔逊总统，要求他指派一名得力的人负责此事。威尔逊在9月2号做出了答复：“我想你已用不着与巴鲁克详谈此事了，他和我已就运送装备和冬衣交换过意见，我发现他对战争部库存的装备情况非常了解，他的信息和建议可以帮助我们办好此事”。^①

第二天威尔逊总统又指示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在征用私人财产之前必须先向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申请，这使巴鲁克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威尔逊总统的决定不仅扩大了巴鲁克的职权——他已是总统八人战争内阁中的一员，同时还是价格控制委员会中的当然成员——而且简化了他的官方信函。几个月前，巴鲁克曾给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写信

^① 1918年圣诞节，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爱德沃德·本尼兹向驻巴黎的美国大使报告，大约2万件美国的军装已经正在运输途中，但他询问美国答应提供的另外4万双靴子、3万副绑腿和4万双袜子都在哪里？——原注。

抱怨各方为了征用公用设施所进行的激烈争夺：“海军征用任何电厂都不会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因为要与陆军和航运委员会进行一番争夺，往往是你感兴趣的重要地区，他们也都希望进行征用”。

尽管巴鲁克成功缓解了“瓶颈”的压力，降低了联邦供给系统的混乱状况，但政府的战时经济目标并非一一得以实现。美国的工业生产在1917年5月达到了高峰，之后便开始有所下滑，直到战争结束。虽然美国征召了超过两百万人的远征部队，并对他们进行了训练，装备，最后派往法国，但在战争中他们发射的每2250发炮弹中只有100发是由美国生产的，而号称覆盖欧洲上空的美军德·哈维兰德4型观察与轰炸机需要3227架，但只有1885架飞过了大西洋。美国政府只是凭借1918年成功压缩了各个公司的利润，这才缓解了人们对供给短缺的不满。

由于市面物品的短缺，战时工业委员会只得向人们宣传为了战争而节约，并号召企业提高效率。为此，汽车轮胎的型号减少了，铁犁、货车方向盘、甚至浴帽的种类都大大减少。商品型号的减少使得旅行推销商外出时携带的箱子更少，供货商送货也减少了许多麻烦。当只有四家提供送货服务的百货商店联手之后，巴鲁克和战时工业委员会在报告中称，这极大地避免了重复浪费。1918年9月，巴鲁克向《太太家政杂志》的读者发出倡议，不必总是坚持什么样的衣服非要配什么样的鞋子。巴鲁克说：“衣着上的过分讲究在和平时期无可厚非，但在战时就显得十分不妥”。

正像征兵宣传所描述的那样，志愿为国家效力的公民不计其数，战时工业委员会也努力使企业树立自我约束的形象。这种形象在多数情况下非常真实——比如美国钢铁公司在战争开始时还抗议联邦政府的控制，但在缔结和平协定后仍不愿放松生产——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自愿服从联邦政府的控制与管理。当巴鲁克威胁要没收一个不愿听从命令的制

材厂老板的财产时，这个老板反问巴鲁克，政府是否有能力管好这家工厂。巴鲁克承认这很难，不过他补充道：“如果我们强制征用了你的工厂，那么你在家乡将受到轻视和不屑，你将会无脸见人。如果你不肯为战争作牺牲，那么你的邻居就会叫你懦夫，小孩会大声地对你发出嘘声，入伍的人会把赶出镇子”。同样，巴鲁克在与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杰治·加里的争吵中说，联邦政府缺乏工商人才管理一个个复杂的工业企业，找到的只是少尉。也许是因为加里是个共和党人，但战时工业委员还拒绝了当时一些显要的民主党人的提议。纽约市长约翰·F·海仑打算出资 800 万美元建一所学校，但巴鲁克的答复却是：“一个公民战时的准则是——能出多少出多少”。学校的建设因此而被推迟。

无论战争进行与否，美国的福特与道奇公司却一直没有停止生产汽车，这占用了许多的人力和钢铁，美国政府认为这些人力物力其实可以更好地为战争服务。于是战时工业委员会代表美国政府向底特律方面提出了抗议，但当时这一委员会毕竟势单力薄，而公众对汽车的需求量又很大，所以这一抗议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事实上，1918 年以前，政府与汽车制造商之间一直矛盾不断。1918 年 3 月 4 日，在巴鲁克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的第一天，该委员会与底特律汽车制造商达成了有关在 1918 年至 1919 年将客车生产量减少 30% 的协议。但是，这一协议最终却没有执行；于是，这一年 5 月，双方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道奇汽车公司总裁约翰·道奇毫不客气地对战时工业委员会的谈判代表说：“我看出来了，你们就是想通过对汽车制造商进行合并重组来达到控制我们、自己说了算的目的！”正如道奇所预料的那样，巴鲁克的角色就是最后拍板定夺。对于道奇的直截了当，巴鲁克自然也是直言不讳：“是的，如果你们最后把我们逼急了，我们会关闭所有的汽车制造厂，到时你们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当然，巴鲁克这只是一时的气话，他并没有采取任何强硬措施，而是主张通过更多的谈判来化解相

互之间的分歧。随着夏季一天天过去，战时工业委员会的成员开始失去耐心，重点项目主任艾德文·帕克更是提出了切断汽车制造商的钢材和煤炭供应等建议，不过巴鲁克还是劝大家要耐心行事。8月，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厂商主动提出了降低生产量30%的提议（其实此时汽车销量已开始呈下降趋势），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谈判双方的关系比较融洽。但没过多久，战时工业委员会就向汽车制造商公开提出1919年前将民用汽车生产全部转为军用的要求。这一要求一经宣布，立即招来了全国所有汽车制造商的抗议，加上当时正好停战协议即将签署，所以这一要求也就不了了之。后来，一位研究战时工业委员会决策的人员曾就该机构对底特律汽车制造业的影响进行过如下评论：“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底特律的汽车生产商完全是在其自身发展宗旨之下和对市场行情的预测基础之上独立制定其发展计划的，战时工业委员会的限制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20年，巴鲁克恰巧在纽约的一家饭店大堂里遇到了道奇汽车公司总裁约翰·道奇，道奇当时到纽约处理公事，正好住在这家饭店。可能是因为想起自己当初在职谈判中言词过于激烈的原因吧，这位汽车公司的总裁主动走到巴鲁克面前，很热情地握住了他的双手，还邀请巴鲁克到自己的房间里喝一杯。据巴鲁克称，他为自己当时婉言谢绝了道奇的盛情邀请而感到非常庆幸，因为道奇自那次两人意外相遇之后就突然病倒，不久死于肺炎，但这只是各大报纸报道的病因；巴鲁克固执地认为道奇的突然去世与那天邀请自己去客房小酌一杯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时正是美国的禁酒时期，道奇一定是喝了劣质酒才遭此厄运的。

如果说战时工业委员会在与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谈判里没有取得上风，其原因并非因为身为主席的巴鲁克没有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件事逐渐为人所知，就是战时工业委员会曾经派遣了一个由12名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工作组亲赴伦敦与盟军政府就

战时的货物交换和购买价格进行商谈，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如果没有巴鲁克的努力，这一计划根本无法得以实施。事实是，1918年7月，当工作组成员已经准备登船时，巴鲁克突然接到了工作组负责人列兰德·萨莫斯的电话，萨莫斯在电话里焦急地告诉巴鲁克，美国政府财力有限，不能为工作组提供旅行经费，而且一时也无法筹到这笔款项，看来计划只得取消了。巴鲁克接到电话后立即让萨莫斯与自己的秘书伯伊勒小姐联系，请她签发一张支票。最终，依靠巴鲁克本人提供的资金，萨莫斯一行才到达伦敦，在这次谈判中，他们不仅成功地劝说英国政府同意降低出售给美国的黄麻和羊毛制品的价格，而且还与西班牙政府做成了一笔用硫磺铵换骡子的交易（这是因为潘兴上将称美国需要进口骡子用来拉大炮）。此外，萨莫斯率领的工作组还在与当时负责硝酸这一战略物资供应的英国官员温斯顿·丘吉尔进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有关盟军从美国进口硝酸的计划。为给工作组人员提供旅费和住宿开销，巴鲁克从自己的腰包里拿出了63572.25美元（后来巴鲁克不肯接受政府对这笔经费的补偿），而由于萨莫斯一行的出色表现，他们与其他国家达成的购买和交换物资的意向总共为政府节省了几百万美元的战争开销。

巴鲁克在一战期间所做出的另一个贡献后来也渐渐为人们所了解。当时，随着停战协定的签署，战时工业委员会也被解散，这使得该机构曾雇佣的几百名文秘人员，尤其是一些年轻妇女，一下子成了无业游民，整日在华盛顿街头流浪。巴鲁克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担忧，于是他聘用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女社会工作者，请她一个一个地找这些失业妇女谈心，告诉她们与其在华盛顿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寻找就业机会，还不如回到各自的家乡从事农业或其他工作。为了帮助这些妇女顺利返乡，巴鲁克为她们提供了免费回程的火车票（无论这些妇女的家乡距离华盛顿有多远），旅途一切费用由他负担，而且可以享受卧铺待遇。为此，巴

鲁克共花了 4.5 万美元。另外，这些妇女在临上火车之前每人还收到了一张印有巴鲁克地址的名信片，被告知一到家就把名信片寄回，以表示安全到达。巴鲁克后来一直保留着这些名信片。此外，他还珍藏着战时工业委员会全体成员赠送给他的一只奖杯，上面刻着这样几行字：

“敬赠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伯纳德.M. 巴鲁克先生，在您的领导下，战时工业委员会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谨以此向您表达我们的敬意和爱戴之情。

战时工业委员会全体成员

于华盛顿特区

1918 年 11 月 25 日

20 多年后，到巴鲁克位于纽约的住所拜访的一位朋友注意到，巴鲁克的办公室里摆放的唯一资料就是他在战时工业委员会工作期间整理的会议和通信记录（以及后来参加在凡尔赛举行的巴黎和会上的会议记录）。这些记录全都包着绿色牛皮纸，而且很显然是经过了细心装订的。

第十章

巴黎和会显风采

1919 年元旦。

夕阳西下。乔治·华盛顿号汽轮缓缓驶离港口，朝着远离太阳的方向无声而去。

伯纳德·巴鲁克在这艘汽轮的头等舱。凝望渐渐模糊的码头，他的心情复杂难言：一场外交恶战即将在巴黎展开，路途上必须为此作缜密、周全的思考；同时，在如此寒冷恶劣的天气越洋远行，少不了会有麻烦和困难。美国和谈代表团成员、威尔逊总统的顾问——一想起这些任命，他仿佛就感到一阵懊悔：凭自己的能力，能担当得了如此重任么？停战协定签字之后，他很快辞去了战时工业委员会里的职务，不久又拒绝了

接替麦克阿杜担任财政部长的邀请，理由是自己是犹太人，又曾是个投机商，随时可能让政府为难；虽然总统立即指出，这些所谓的原因在他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期间可没为难任何人，但巴鲁克坚持不让，于是财政部长一职最后由弗吉尼亚州众议员卡特·格拉斯担任。

乔治·华盛顿号汽轮上，还有两名军官带着 50 位军队文书，两千麻袋给军队的邮件，还有价值 200 万美元的黄金，也是给军队的。海军副部长罗斯福也在船上，还有战时运输官、钢铁大亨查尔斯·施万勃。此外，来自墨西哥的、中国的、拉美的和谈代表也在其中（他们往往有家眷仆从相伴）。随着乔治·华盛顿号长鸣汽笛驶入寒冬一月的苍茫大海，巴鲁克陷入了近乎悲切的孤独之中。后来，施万勃听说他不舒服，便过来看他，顺便问起威尔逊总统对公海自由权的原则看法，巴鲁克强打精神回答道——这是一场百万富翁之间的对话——你可以相信，总统对此很有兴趣。

船到布雷斯特之后，巴鲁克换乘特别列车去巴黎，火车上设备齐全，但旅途生活无聊至极。这次巴黎之行，他本打算带妻子和女儿一起同行，并已在里茨饭店预定了一个三卧室的套房，不想后来计划有变（安妮和贝勒二月才到巴黎，3 月 17 日乘船返美，她们的女仆汤普森小姐随行。只有巴鲁克的秘书玛丽·博伊尔一直在纽约，因而每次填写表格，巴鲁克都在“如遇紧急情况请通知……”这一栏里很无奈地草草写下博伊尔的名字）。现在，只有贴身男仆莱西跟着他，但他可能很快换船去巴黎。巴鲁克已经在巴黎郊外租下了一所房子供周末消遣。美国国内有传言说他将成为下一任美国驻法大使，其实这个消息不准确。还有传言他已经被任命为纽约州的一个 36 人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由州长直接领导，专门研究战后有关问题，这个消息是对的。然而，在巴黎，眼下没有具体工作分派给他。他试着向总统参谋长豪斯上校先报个到，但是正如他后来记录所说：“见上校颇不容易……那几天我在那儿干坐着，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召到巴黎去，只有这样的印象：‘我的到来可没有从上校的工作人员那儿获得真正热情的欢迎’”。并非巴鲁克财力不足或是资格不够——别的不说，他是总统的私人朋友、1918 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最大资助人、经验老道的欧洲熟客——终于，他获得了任命，进入赔款委员会工作，同在这一关键机构里任职的美国同事还有：美国头号财政顾问诺曼·H. 戴维斯和战时贸易委员会主席、前民主党总筹款人万斯·麦考米克。

1919 年 1 月的巴黎充斥着叫嚷和平的政客、助手、形形色色的参谋顾问，鱼龙混杂各色人等俱全。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痛的一次战争已经结束，可是，停战协定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暴躁、怒火、流行性感冒，还有一——布尔什维克主义。欧洲元气大伤：德国人食不果腹，法国北方惨遭战争劫掠，人人闻战色变。这个当儿，威尔逊出现了，背景好象一座空旷的舞台，他慢慢地踱了上去，代表各国政府对观众们承诺：不分输赢，只要和平！群情振奋，总统本人也为观众的情绪所感染而兴奋不已。就这样，人们从一开始便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濒临同一片大西洋，但不同海岸对“和平”的理解是迥然不同的。欧洲人对威尔逊一方面心怀钦佩，容忍其“14 点和平纲领”和建立国际联盟的倡议，可是另一方面，他们难以抑制对战利品的饥渴，这与威尔逊的原则不符。在巴黎，游行的人们口中呼喊着重“威尔逊总统万岁！”手里的标语牌上写的却是“德国佬，快掏钱！”法国财政部长路易斯·鲁西思·克劳茨在下议院发表讲话，竭力消除公众对战争债务的忧虑，他保证，战债——这张巨大的帐单——将由战败国的赔偿而不是法国人的税收来支付。在不列颠，有人炮制出了这么一条政治口号：“榨柠檬就要榨到籽里头”。可是，美国的情况与它们不同：参战晚、人员死伤少，却摇身一变成了欧洲国家的大债主。因而在赔偿问题上，美国声称自己无所求，或者说所求甚少，只希望为自己的盟国索求一份数额合理的赔款（这与英法开出的天文数

字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的数额上不封顶，简直不近情理）。巴鲁克、麦考米克、戴维斯身为赔偿委员会委员，肩负推进联盟关系之职，面临的却是这样一种形势。

巴鲁克身兼数职：既是赔偿支付方式委员会的成员，又是控制及担保措施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既是参加和平谈判预备会的美国代表团的一员，又是高级经济理事会的一员；另外，他还在食品信贷及原料专门委员会、经济条款委员会（关于奥地利、匈牙利及保加利亚的）、赔偿委员会和经济条款起草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条款的起草工作。这是一项艰巨复杂、要求严格的任务。巴鲁克一向笃信，充足的技术支持是做任何事都必不可少的。所以，他立刻开始搜罗强干的顾问、参谋人员。战时工业委员会驻巴黎办事处由他直接控制。二月的一天，他通过电话向国内提出需要人力增援。很快，五个人订购了从美赴法的船票。情人节这天总统亲自交给他 15 万美元，“用以建立并维持这一机构之运作，及为和平谈判美国委员会下属机构之补充，凡认为必需之活动皆可用之”。^①

随着巴鲁克私人顾问团队队伍的不断扩大，自然需要一个办公的地方。精力过人、专门负责救济事务的赫伯特·胡佛在勃盖街 10 号有 3 个楼层的办公地点，巴鲁克稍作安排便把它占了去。鉴于美国代表团主要下榻在克伦伊饭店，由此又出现了交通问题。国务院联合机动车队满足了他的要求，专门拨出三辆轿车供巴鲁克及其助手使用。

在巴黎开会的美国代表团有五名经济顾问，巴鲁克是其中之一，另外四个是：胡佛、麦考米克、戴维斯和亨利·M. 鲁滨逊，最后一位是来

^① 关于这桩究竟谁欠谁多少钱的事众说纷纭。共和党律师钱得勒·P. 安德森记得的情况是这样：威尔逊逗留欧洲期间，曾经向巴鲁克借了 15 万美元以支付礼仪性活动开支；后来，国会授权财政部为此专门拨了款。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这 15 万美元无非是总统还债罢了。巴鲁克本人后来报告，他只动用了这笔拨款中的 24128.64 美元，且没有一分钱用于私人花销——原注。

自加州的银行家，长着胖乎乎的娃娃脸。托马斯·W. 莱蒙特（此人为摩根财团的合伙人之一，曾经貌似不经意地作过著名的“黑色星期四”预言：“股票市场上出现了抛售廉价股票的迹象……”云云）回忆说，在他的记忆里，巴鲁克好像一位无定所大使，承担着无数工作，同时，拥有总统完全的信任。说到信任以及总统先生的注意，这五名顾问（加上莱蒙特一共六个）之间不可避免地进行着争夺。但巴鲁克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的有力竞争者。一次，在一个颇为特殊的场合，他公开与胡佛作对：那天，一个车队风驰电掣般行驶在比利时一片因战争而荒芜的地区，车队里有美国总统夫妇、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及他们的随从。车队中各台车行驶的前后顺序是根据外交礼仪严格排定的，王室的车领头，级别较低的官员靠后。巴鲁克跟威尔逊的海军顾问兼私人医生、海军少将凯利·T. 格雷森在一台车上，同车的还有第一夫人的社交秘书埃迪丝·海尔姆。他们的车行驶在车队的第五或是第六的位置，恰跟在胡佛的车后。海尔姆夫人后来作了如下描述：

车子开得太快了，震得我们的脖子都快断了——那时候的车没有现在这么平稳。就在这时，巴鲁克先生俯身凑近司机，手里捏着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说：“如果你能超过前面那辆车，并能一直开在它前面，这就是你的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的车疯了似地超了过去，险些碾碎了路上的一条狗，并且一直跑在那辆车的前面。不知什么缘故，胡佛先生却把这件事归咎于我，当天晚上国宴过后，他走上前来询问我的官职级别，我告诉他我只是总统夫人的办事员而已，别无其他，他听了没再说什么……

因为工作的关系，巴鲁克和胡佛在巴黎经常见面，但这些接触却没能培养起彼此亲密、相互理解的关系。又一次晚宴，巴鲁克发现胡佛身

边美女如云，可是他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盘子。巴鲁克深为诧异，因为他自己是从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与异性接触的机会的，迫切的程度不亚于负责救济的官员看见被人废弃的食物。他后来笑着问胡佛，身边有那么多漂亮妞儿怎么能坐怀不乱，可是胡佛好像根本听不懂他在问什么。

诸如此类的性格不合、利益相冲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和会召开前，美国代表团成员对基本的经济问题达成了一致。对于战时施行的经济控制政策，他们敦促全面开禁，回复到现实的自由贸易状态（“如果可能，必须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威尔逊“十四点和平纲领”的第三条是这样写的）。战争期间，巴鲁克曾举双手赞成对经济进行严格控制；停战协定一签字，他立刻宣布自己完全拥护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十二月份，他递交给总统一份备忘录，其中有一段他从“独立个体”角度出发为自由市场经济作了辩护：“公正持久的和平必当包含对地球上各种原料及生产设备的公正平等的获得权，故应立即取消所谓的特惠关税。不允许任何国家，包括中立国在内，加入任何可能有损他国利益的经济联盟……只有这样，各国的‘独立个体’才有机会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勤奋劳动而独立自救”。

“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尚处难产中的对德政策，会毁了整个世界”。参加的会议愈多，这个念头便愈清晰地深入他的脑海。它在巴鲁克心中激起了炽热的怒火，以致于他有时难以隐藏言语中的锋芒，完全不象外交辞令了。举个例子，4月16日这天，高级经济理事会原料部举行会议，恰好由巴鲁克主持。理事会收到了来自驻德国的法军元帅福煦的请求，请求运送36吨羊毛。该不该给？如果给了，是不是就此开了各种货物源源流入德国人之手的先例？当然，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会议久决不下，巴鲁克开口了：“我们翻来覆去地谈论这些羊毛，其实大家完全可以把它丢在一边不理，因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些

羊毛”。讨论却并未停止。最后，讨论原煤问题，巴鲁克又一次忍不住了：“我再说一遍，我认为原煤及其运输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严肃的问题。我们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委员会却只作壁上观。世界永远不会原谅我们。各人自扫门前雪只会一事无成，必须每个人都真心实意，都作出一定的牺牲。任何国家，如果不配合，我一分钱都不会给它。这件事情最终的处理结果必须对所涉及的各方都有利！”

话音刚落，一位英国代表当即表示赞成。可是没过不久，谈判又陷入了困境。于是有人提议，是不是跟另一个委员会协商一下这一问题？巴鲁克终于被激怒了，他想也不想，冲口而出：

“整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为什么还要协商？协商什么？曾经有人提议我到那个委员会去，我根本不考虑这种可能性，除非我们先下定决心撤销一切封锁，停止对邮件进行毫无必要的、可怕的控制。但这些事直到现在还没有做。我不愿意呆在一个整天南辕北辙、自相矛盾的委员会里。……先生们，他们没有邮递服务、没有电报、没法跟外界联系；即使他们把全世界的钱都拢在手里他们也什么都做不了！权力在哪儿？权力在我们手里，我们能够改变这个状况，但我们偏偏什么都不做！”

有人提议说让封锁委员会来决定这件事，这个委员会正在楼上开会。但巴鲁克不罢休。

“我到这儿已经 90 天了。我们早已决定，我们要做些什么，但总是出尔反尔。我们嘴上说我们应该取消封锁，然而接着我们就让取消封锁变得全无可能。我的意见是：我们别再讨论来讨论去，一会儿这样决定一会儿又那样决定，好好花点儿力气解开手中的这团乱麻吧……如果我们允许这些巴尔干国家的人们自由通信联络，各行业必然相互接触，他们能做的事情比官方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政府往往会把一切都管得死死的，谁都动不得”。

过了几分钟，一位名叫哈里斯的英国代表故意拿话激他：

哈里斯：我觉着，巴鲁克先生索性自己成立一个“单人委员会”得了。

巴鲁克：如果你能代表各国政府向我授权，我会这么做；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有条件，一定会有这样的委员会！

哈里斯：哈！但是，没有人能自成其为委员会的。

巴鲁克：如果这个世界在某个时候需要一位独裁者，那么现在正是时候。

战争期间，虽然也会受约束，但巴鲁克的确曾是个独裁者。战争结束了，他感到一丝惆怅。有一次，开会讨论能否交换硝酸钠，这要是在美国，那全得看巴鲁克的脸色。可当时的的问题是，在高级经济理事会的财政部碰头之前，任何人没有权利运一克硝酸钠去波兰。于是，巴鲁克不禁慨叹：“战争打得激烈之时，我们可以下命令做这做那。哼，太平盛世，却无能为力了……不行，我一定要采取行动”。

然而，雷声越大，雨点未必也越大。当英法代表开始谋求采取实际行动时，包括巴鲁克在内的美国人却心不在焉起来（虽然梅纳德他们并无恶意），表现在以下这些事情上：约翰·凯恩斯提议，向各国政府出售债券以筹措战后重建所需的费用，这一提议遭到了美国的反对，凯恩斯（巴鲁克渐渐讨厌起这个人来）愤然收拾行装、打道回府，还写了一篇措辞尖刻的文章，谴责巴黎和会及其最终炮制的和约。英国代表团又提出建议，保留战时成立的各种联合采购团，认为此举将有利于控制商品价格，也被美国人说了“不”。6月底，原料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记载了巴鲁克的一次发言，也许它可以作为美国人的观点的最好阐述：“他（指巴鲁克）认为，政府的干预应当尽可能少，供需之间自由运作、自行调节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作为外交官，巴鲁克是相当特殊的一位。也许，他比聚集在巴黎的大多数外交官都更熟悉华丽的晚礼服、流光溢彩的一流饭店。可是，在拐弯抹角、熟练运用外交辞令方面，他并非训练有素，同事们时常为他直言不讳的谈吐而惊恐不已。举个例子，去巴黎报到数周后，他宣称要看一看保存在凯道赛^①的某些秘密会议的记录。他的这一“兴趣”传到了国务院的耳朵里，一位级别不高的国务院驻巴黎助手克里斯琴·赫脱赶紧给格鲁写信：“如果巴鲁克先生真的向法国人要那些秘密记录，对方还不他妈的气炸了？！我倒有个提议，不如偷偷地把我们自己的那些记录给他看看算了”。可事实上，法国人没有大惊小怪，他们最终安排巴鲁克和助手们暗地里阅读了那些文件。4月里召开的一次有关原料问题的会议上，他和罗伯特·塞西尔爵士的一段对话，将他言语上随心所欲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巴鲁克：下面进行第四项，由战争储备委员会作工作进展报告。嗯，难道还有人能把东西卖出去？

罗伯特爵士：的确，没有人有钱去买东西了。

巴鲁克：嘿，个个都等着美国人把钱放到他们手里呢！^②

可是，与别国代表团成员打交道的时候，巴鲁克有自己的一套办法，结果是，他的意志——如同2月里有人向“纽约世界报”透露的那样——在“赔款委员会”里“居支配地位”。

巴鲁克认为，美国应当谨慎且有所节制地借款给别国政府，并且以有关政府建立自由贸易制度作为回报。他毕生用来处理与经济有关的问题遵循一条基本原则：人，必须克勤克俭（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理事会

^① 巴黎塞纳河畔一码头名，因法国外交部办公大楼在其对面而成其代名词——译注

^② 他本可以含蓄点——塞西尔在自己的日记里这么写道。塞西尔和巴鲁克曾经谈论过对欧洲的经济援助问题，可是在谈话的过程中，巴鲁克总谈他自己。塞西尔这么记述：“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做生意的方法，当时我想这又是跑题，他经常这样；可听到后来，我渐渐感觉，他在有意给我某种暗示，可能他认为欧洲面临的经济问题可以用这些方法解决”。——原注

上，他总鼓吹这一信条。他从巴黎给在米尔顿学院读书的儿子写信，论述工作对创伤的愈合作用：“即使和平已经缔造出来，我们仍要继续努力、排除万难，让整个世界重新工作，因为这个世界确实需要每个人都工作。工作可以治愈一切。如果你至今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目标或是志向，且它是需要你不断学习和工作的，我会很不愉快，相信你也不会感到舒服”。在 1919 年，在劳动常常一无所获、政府四处插手的年代，坚持这一理念是难能可贵的。

亚瑟·克洛克是一位为《路易斯维尔邮报》(Louisville Courier Journal)工作的年轻的巴黎记者，一次他找到巴鲁克（因为他是“金融家”嘛），约定作一次有关经济形势的采访。这天，他和另一个人——赫伯特·斯沃普，曾是战时工业委员会成员，当时已回到《纽约世界报》任职一起来到里茨饭店。两人到达时，看见了躺在浴缸里的巴鲁克：一位修指甲师正在仔细琢磨他的指甲，饭店负责送信的服务生笔挺地立在他的短筒靴旁，另有一位理发师已经作好了准备，而他的贴身男仆莱西则站在一边随时听令（克洛克记得大致是这样的情景）。巴鲁克姿态优雅地微微起身招呼客人，随即静听克洛克郑重地提出问题。有一个问题是斯洛普事先授意他问的：

“巴鲁克先生，眼下，美国人已经为欧洲乃至世界挽救了民主，可是，你对他们还有什么忠告么？”

“当然有”，巴鲁克回答道，“他们必须工作。还有，要节俭”。

[克洛克写道]我感觉到这一陈词滥调和眼下环境之间的极端不和谐，忍不住大笑起来。巴鲁克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①

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中，巴鲁克无疑是最富有的人之一。不虚

^① 这件事，克洛克津津乐道，巴鲁克听见了却不觉得有趣。后来，前者将它稍加修改予以发表。之后的某天晚上，在赫伯考庄园，巴鲁克见到克洛克便尖声大叫：“亚瑟，你真是个无耻的说谎大王”。——原注。

此名，他的消遣活动也极尽铺张之能事，典型的例子当属 5 月 22 日晚他在里茨饭店举行的那场盛大晚宴——主题可能是庆祝他的四十岁生日。晚宴场面之豪华令万斯·麦考米克都感到吃惊，竟在日记里对此专门作了记述。后来罗斯福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他的日记里也提到了这次晚宴——1942 年，即晚宴过后 23 年，巴鲁克仍对自己当年的“大手笔”吹嘘不已。还有一个晚会给巴鲁克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回，他正跟一位美貌无比的英国女士共舞，凯利·格雷森极不合时宜地插了进来把美人儿抢了去，留下他跟一个法国女人跳，这个女人缠了他整整一个晚上。事情还不止这么简单，不久，她又在里茨饭店巴鲁克住的那一楼层开了个房间。一天，她突然出现在他的会客室，手里捏着张纸，上面列着一长串证券的名称。好在莱西对这类突发事件早已见惯不怪，他站在主人身旁寸步不离，法国女人见难有作为，便缓缓起身走了出去。巴鲁克对人说到这里，嫌恶地加了句“讨厌！”。

以下是巴鲁克的一段记叙：

格雷森真是个机灵的恶作剧者，每次他得手之后，就会像深藏水底的老鲑鱼一样不声不响。可是有一天，一句话让他露出了马脚。他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我和潘兴将军都很想知道，那个法国女人是何许人也，就是那个脚踝上戴着金链子、跟你一块儿跳舞的那个，你们后来跳到哪儿去啦？”说着，他的眼睛轻轻眨了一下。我立刻明白过来。我把他逼到墙角，狠狠地对他说：“你这个无赖，原来是你开我的玩笑！”于是格雷森只好承认：那天，那个女人跟他坐在一起，问起那个“个头高高、头发灰白”的人是谁，他便回答：“什么？你竟然不认识他？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巴鲁克先生啊！”她嘟哝着：“巴鲁克先生？他是美国人么？您给我介绍介绍他吧”。格雷森问她想了解哪个方面，她问：“他是个聪明人么？”格雷森回答说：“噢，如果说金融上的事，他要算全美国最聪明的了。有时候他一天就能赚几百万美元，而且他对女士总是相当慷

慨”。格雷森说，她听了之后立刻冲到舞池中央，非要跟我跳不可，于是“我当然只好跟你的舞伴跳了”。

无论何时何地，富有、直爽、恰好又英俊美貌的人总是流言蜚语的当然主角，在巴黎的巴鲁克也不能幸免。有人传说他以前是个德国人；又有人说他之所以赞成把阜姆（现在的里耶卡）归还给奥地利而不是意大利，是因为他对奥地利的船只生产线感兴趣；还有传言，他资助了俄国革命，这一传言可能来源于他曾经宣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纯粹是文明世界容忍了沙皇独裁存在的结果”。

一封神秘的电报从柏林发往设在华盛顿的作战部，这封电报如果不是一场重大的误会，便是有人欲陷巴鲁克于尴尬境地。电报署名是“齐格马瑞斯”，电文口口声声称巴鲁克为财政部长（对于这一职位，巴鲁克本人的确乐于向人夸耀自己曾经坚辞不受）。电文内容如下：

请求美国官方电报通知前众议员、现财政部长“巴鲁克先生”，柏林的斯坦哈特先生紧急要求采访他和他的兄弟，顺便递交我起草的一份金融报告。请财政部长“巴鲁克先生”通过你们告知我何时何地能够与之见面。斯坦哈特先生的建议是，在科隆会面，越快越好。

电报从作战部转到财政部，又从财政部转到国务院，六月里电报传到了巴鲁克手中，但上面多了一句暧昧的批注：“财政部猜想你可能对它感兴趣”。巴鲁克当即回电澄清此事，说明自己从未听说什么“斯坦哈特”或是“齐格马瑞斯”先生，对自己兄弟的生意更是一无所知，同时，对会面这个“假定其存在的发报者”也毫无兴趣。

至于传言说他以前是德国人，原因之一可能是巴鲁克跟别的美国代表一样，支持一项相对英法温和得多的赔款方案。巴鲁克的想法是：德国人的确应当赔偿，但应在其能力范围之内、停战条款约束之下进行赔偿，数额应当明确，以使德国纳税人有盼头。3月（或是4月）里，他

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不希望用任何方式向德国表示我的一点同情，也不想以任何方式减轻其负担，因为它理应被强制赔付它所能赔付的一切，以使它充分认识到它对全人类的文明犯下的滔天罪行。可是，对同盟国内已然疲惫不堪的纳税人，如果此次和会强加给的他们是一个永远无法偿清的款额，那将是个极端的错误”。巴鲁克和他的美国同事都认为，如果条款过于苛刻，倔犟的德国人可能拒绝工作或转而移民国外，那么战争的胜利者协约国只会一无所获。

紧接着，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国务卿兰辛的夫人的外甥，30岁）作有关条款法律依据的发言。杜勒斯指出，停火协定事实上已为各方接受，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源自威尔逊总统的一项声明，即，德国人必须赔偿“由于德国从陆地、海洋以及天空的侵略而给协约国平民及其财产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此，军事损耗便不存在赔偿问题，因为签订停战协定时对此只字未提。另外，同样的依据证明，法律允许的赔款额是有限的。

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代表立刻提出反对：法国完全否认所谓“协定”的存在；正如他们的克劳茨所说的，德国已经投降了，就是这么回事。对美国的建议——向德国开列一张有明确数额的帐单：多少房子毁了，多少人残了，多少工厂倒了，多少马车散架了——劳合·乔治反诘道，规定数目便是排除了损失总额不断升高的可能性，这在政治上是要负责任的。巴鲁克猜想德国能够偿付得起的金额在120亿到150亿美元之间，凯恩斯估计还要少一些，然而，这一数字在某些代表看来太保守，甚至“少得可怜”。一次会议上，前英格兰银行行长康里夫爵士冒险说出1200亿这个数字，对此，巴鲁克的评论是“简直是让人人都去趟月球”。而法国人谈论不休的则是2000亿这个数字。

没有哪件事能像这样影响盟国关系。美国人试图对威尔逊的话如实地进行不折不扣的解释，而盟国却一意将它们扩大。虽然就战场损耗之

事在形式上达成了一致，即不予讨论，但有人努力将实际价值相当于有形损耗的款项，以所谓抚恤金或家庭津贴的名义包括到赔款中去。南非的简·斯穆茨的意见是，社会支付一个士兵服役期内其家庭的生活费用以及该士兵退伍之后的生活费用的开支，事实上应属于“补偿给平民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德国人出。巴鲁克、杜勒斯以及其他美国代表认为斯穆茨的方案是似是而非的诡辩，与威尔逊原则不符，可威尔逊本人却非常欣赏这一观点。4月1日，总统在克伊伦饭店对其顾问们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他赞成斯穆茨的意见。然而所有的问题并未就此解决。威尔逊对达成协议近乎绝望了：4月7日，他下令“乔治·华盛顿”号汽轮停泊布雷斯特待命，以便他随时返美，让那些欧洲人自己跟自己发牢骚去吧。

历经千辛万苦、相互妥协达成的最后结果与美国最初的提议大相径庭——各国同意设立一个专门的赔款委员会，对德国的清偿能力进行评估并负责赔款的收缴；1921年确定赔款数额的最后时间。当然，历史证明，在双方的角力中，赔款委员会最终落了败：渐渐滑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深渊、并近而纳粹主义泛滥的德国，最后只赔了50亿美元，其中一半还是从美国借的。

巴黎和会上，凯恩斯因自己的建议没有受到重视而愤然离会。巴鲁克跟他作法不同，他坚守阵地，继续参加有关许可证、原煤等事务的讨论，仍然寻求（当然是徒劳地）合计出一个明确的赔款数额的途径；另外他还不时去朗辛饭店拜见总统，跟格雷森和斯沃普争宠夺爱。4月初及5月里，巴鲁克78岁的老父因肺炎和心脏病同时发作，生命垂危，然而如此十万火急的理由也没能让巴鲁克离开巴黎回纽约。

终于等到了1919年6月28日。这天，巴鲁克穿上漂亮的礼服、条纹裤，戴上高高的礼帽，去凡尔塞宫镜厅参加条约的签字仪式。第二天，即29号，他又一次登上“乔治·华盛顿”号，与总统及其他随从一同返

回纽约。7月5日，风和日丽，午餐之后巴鲁克来到总统舱会客室，聆听威尔逊准备给国会作的一篇有关凡尔赛和约的演讲稿。麦考米克、莱蒙特、戴维斯和另外几个人也在场。威尔逊读完后向大家征询意见。巴鲁克心下认为这篇讲稿措辞胆怯，但他管住了自己的舌头——这是他的特点之一——后来私下里对威尔逊说了。在自传里，巴鲁克解释这件事时说，他不想在众人面前显得爱吹毛求疵。那天晚上，麦考米克、戴维斯、格雷森以及巴鲁克在船长舱里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8号清晨，距离桑迪湾约20英里处，一个由40艘驱逐舰、5艘战舰、10架水上飞机和一艘飞艇组成的护卫舰队进入大家的视线。总统立在舰桥上与久违的同胞们互相致意问候，21响礼炮从水面上响起；傍晚，在聚集于赫伯肯沿河大街的欢迎人群的欢呼声中，“乔治·华盛顿”号停船靠岸，以总统为首的代表团成员与前来欢迎的内阁官员们一起，换乘专轮，横穿哈得逊河，到达西23号街。离船登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径直驶往卡内基堂，总统将在那里作演讲。这一回，尽管巴鲁克被安排坐7号车，排在总统及内阁部长们的后面，但他在战争时结下的对头盖瑞法官乘8号车，跟在自己后面，所以他不介意。上一次在车队里跟赫伯特·胡佛玩飞车抢位游戏的事还记忆犹新，胡佛此时尚滞留欧洲。

一离开“乔治·华盛顿”号，巴鲁克便开始为争取对和平协定的支持奔走游说了——对协定中关键的经济部分，他事先准备了一份解释说明，一上码头便分发给有关人员。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巴鲁克作为代表团成员第一个出面作证，对上述说明作了全面答辩。困难之处在于：既要竭力维护和约文本，又要巧妙地承认其并非完美无缺，与美国的初衷相去甚远。必须指出，巴黎和会上各国对赔款问题的态度异常激烈，难以确定数目，仅代之以不定的数字，并互相承诺让赔款委员会负责将来的监督。

听证会上，巴鲁克开篇精彩，以一段熟练流利的英法互译震住了在

座的所有参议员，拯救了第 237 款中最令人担心的部分。接着，他不慌不忙地描述了和会上制订经济条款的工作情况以及美方参加人员所作的努力。加州共和党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问道，是否和约中的经济部分完全由英国人一手炮制的传言并非实情，巴鲁克回答：“绝非实情，先生。除非你们认为我是英国人”。但同时，他承认自己对“中莱茵区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不甚了解，且对可能与但泽、石勒苏益格等领土归属有关的赔偿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虽然当时在巴黎，巴鲁克为规定下赔偿的数字，奋战到了最后一刻，但此时作证，他选择了这样的说法：鉴于无法准确预见战后的经济形势，德国的偿还能力也不得而知，故确定赔款数额是不可能的。最后巴鲁克总结了自己的发言，他说：“条款内容是严厉而且严肃的，每个字都十分公正。在此我敢声明，设立这一委员会（指赔款委员会）是切合实际的安排，它将会有效地开展工作”。

约翰逊参议员仿佛觉察出了巴鲁克的一丝不安，便追问：

“说这句话的时候您是不是有点迟疑？”

“没有，先生”。巴鲁克回答道。

“然而，的确有相当多的事情被留到将来了，是么？”

“我对‘将来’毫不畏惧”，巴鲁克说道。

和约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遭到了反对。在外交委员会主席、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一手导演下，这种反对一开始表现为冷漠的拖延。洛奇先用了两个星期时间对着委员会大声逐条朗读和约内容，即使有时根本没有一个人在场，他也照读不误；接着用了六个星期组织听证（这在当时，在参议院审议条约的过程中，是闻所未闻的附加步骤）；然后又于 1929 年的 8 月 19 日这天用了 3 个多小时询问总统先生本人，白宫工作人员在座。威尔逊曾经通过欧洲各国的首脑向欧洲人民发表谈话，得到了热烈的反响；然而现在，通过参议院的议员们向美

国人民说话，他感到的却是极大的约束。于是，他决定直接与人民对话。9月3日，威尔逊乘坐列车出发了，接连22天，他沿途不断地向民众亲口呼吁、讲演，直到9月25日晚病倒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洛。工作人员飞速将他送回白宫。10月2日，总统瘫痪发作倒在了病榻上。尽管如此，他仍为和约拼搏着。他跟国会以及兰辛国务卿决裂了，拒绝会见自己的内阁部长，只见很少几个亲密的朋友，巴鲁克是其中之一。威尔逊在巴黎作过让步，但现在却拒绝妥协。尤其，关于“国际联盟盟约”第10款，原文是联盟成员“保证尊重并保护”各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及既存的政治独立，以反对外来侵略”。总统认为，这句话一个字都不能改；共和党人则认为，“保护”这个词如果具有实际意义，便是指成员国将以武力对抗侵略，可是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对此，前总统塔夫脱建议增加一条修正案，简明叙述美利坚合众国参加对外战争必须遵循宪法程序。刚刚卸去财政部长一职的卡特·格拉斯试图说服威尔逊接受塔夫脱的或是类似的某个建议，但失败了。于是他便恳请巴鲁克出面。1900年2月的一天，巴鲁克拜见总统进行劝说，希望从中调解，但也失败了。后来据总统夫人回忆，巴鲁克离开房间时，总统低声咕哝道：“哼，连巴鲁克也来劝我！”可是不久，威尔逊终究改变了主意，他对人说：“知道吗，巴鲁克完完全全是对的。尽管他知道我想听什么，但他只对我说他认为正确的话，而不是我想听的话。告诉这个亲爱的老家伙，我想让他当财政部长，就算了了我的一桩心事”。

自1919年7月以来，报纸上便出现了种种有关巴鲁克职务的报道，有的说他将成为邮政管理局局长，有的说他将是赔款委员会的美国代表，有的说是商业部长。巴鲁克1918年拒绝了当财政部长的邀请，但是，据他本人后来说，这第二次邀请对他有相当的吸引力，他回家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妻子。安妮却不赞成他出任这个职务，而是希望他能回家来陪陪她和孩子们（有的已经成人，有的快要长大了）。于是巴鲁克

照办了。这可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在这之前，巴鲁克在私生活里从不恋家。

然而不论接受不接受某一职位，巴鲁克始终不可避免地处于围绕和约的斗争的中心。不出众人所料，他出钱资助了一个支持和约的组织的活动；可是他还做了他人想不到的事。1920 年初，参议院即将就是否通过凡尔赛和约进行第三次投票，恰在此时，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个在巴黎受挫而恼羞成怒的英国代表团顾问所著的书面市了，书名是《和平之经济后果》。这是一篇煽情的辩论文章，一出版便怂动了公众反对威尔逊及其倡议的国联。凯恩斯大骂威尔逊是个“有眼无珠且充耳不闻的堂吉诃德”，是个“不信国教的官僚”，其政治手腕毫无“技巧和敏感性”，完全昏了头；在赔款问题上他对斯穆茨似是而非的诡辩缴械投降，同时也“缴”去了他自己在道义上的权威。凯恩斯说，和会临近尾声的时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突然转变态度，要求对德缓和，但此时已不可能在 5 天内说服美国总统认识自己的错误了，因为他们曾用了 5 个月的时间来证明总统是正确而公正的。总之，对这么一位长老级的老家伙，让他清醒比欺骗他困难得多，因为前者影响到他的刚愎自用和孤芳自赏。

和约最顽固的反对者之一、参议员威廉·博拉在参议院的辩论发言中，兴高采烈地引用了这本书的部分章节。该书面市不久，参议院举行投票，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否决了凡尔赛和约。巴鲁克被参议院的这一投票结果震惊了，他坚信，凯恩斯是罪魁祸首之一。于是，他当即决定自己也出一本书澄清是非。但是巴鲁克本人并非一位出色的笔者，这一问题通过出资 1 万美元得以解决，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答应出任主捉刀人，于是，便有了 1920 年秋面市的新书，书名朴素无华——《和约中赔款及其他经济部分的形成经过》。如果不经意地看这本书，读者可能会觉得它跟其众所周知的作者之间仿佛扯不上干系：无奇的字眼、平淡

的叙述，对自己的职业及业绩提之甚少这都不是巴鲁克的风格；然而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它深深地带着巴鲁克的痕迹，只有一件事例外：书里满是史实和引用的文件，甚至还有一章专门描述在巴黎的实况，这关系到“人的因素”（human element，巴鲁克最喜用的词之一）。写这样的一章意在说明：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已竭尽所能，可是当时的氛围是，战争情绪依然影响各方，战争仿佛一触即发，相互妥协不可避免。全书的叙述公正而超然，尽可能睿智。虽然他憎恶凯恩斯将矛头直指威尔逊，但是在书中却不点其名，只说他是“和约及总统观点的首当其冲的批评者之一”，他也不屈尊去作迎合读者感情的议论（数年之后，巴鲁克颇为公平地写道：“有人说：‘凯恩斯不顾事实却写了本最有味儿的书；巴鲁克堆砌事实但写了最无味儿的书’”）。事实上，凯恩斯在自己的书里对威尔逊的顾问们是称赞有加的，可是巴鲁克根本不领情，而是坚定而忠诚地与总统站在一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桩“抚恤金”的事儿。其实巴鲁克跟凯恩斯一样，反对将抚恤金等费用折算到赔款里去。但自从总统本人决定在此问题上作让步，“忠诚”便促使巴鲁克也放弃了原有的立场，认为那样“可能太墨守成规”了。在书中某些部分，巴鲁克偶尔放任自己说几句气话：“如果一个人敢于声称，不论条件如何变幻莫测，人力所及，在巴黎和会上为德国赔款问题寻求一个明确而稳妥的解决办法——且能获得国会的通过——是完全可能的，那么这个人要不是无知、逻辑有误，便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然而那一点恰恰正是他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

这本书于 1920 年总统大选前夕出版，好评如潮。《民族》周刊赞扬它为大选作出了“无价的贡献”。前战时工业委员会成员之一阿尔文·约翰逊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他的前主席所作的“赔款委员会能卓有成效地工作”的预测太天真，但同时亦宣称，此书为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的工作作了“成功的辩护”。伦敦的《观察家》杂

志将巴鲁克描述成“巴黎和会上最不偏不倚的人之一”，称他的书“虽然短小、精炼，但在某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未曾见过的有关和约的最具启发性的观点”。

如潮的好评中出人意料地听见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声音。在《曼彻斯特卫报》的一篇文章中，他对这本书中引用了如许多的他视为“秘密文件”的材料表示吃惊，对未来的赔款委员会的工作成效他表示怀疑，同时，有关文章风格，他表露出淡淡的自得（“这本书如果用上更多的写作技巧来写，内容当然会比现在的少。它有力地描述了史实，揭露了人性的秘密本源……只是我不知道，巴鲁克先生是否意识到他在这儿泄露了多少机密”）。然而，另一方面，他承认，巴鲁克在巴黎扮演的角色是“有相当份量的”，且他的这本书真诚、真实，理应受到赞扬。凯恩斯特别欣赏有关“人的因素”这一篇。他认为，这篇文章绝不是单纯的就事论事，而是了解巴鲁克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凯恩斯对巴鲁克书中的下面这段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个人角度说，虽然参加和会的代表们都能力超群、情操高尚，但是他们都被绑在了‘国家意志’这一巨大的车轮上”——他提醒读者仔细研究这句话。他本人的感受是：“它是巴鲁克人生哲学的中心信条，即，‘能力超群、情操高尚’的人受周围环境作用，可能会变成其自身的被误导的、灾难性激情的工具，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仍是能力超群、情操高尚的人，甚至，这正证明了他的能力与高尚的情操。这一点，这些人应该虚心地承认，因为他们能从中得到一个不容易得到的机会，试着降低他们激情的温度”。

本质上，巴鲁克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在证券交易所，他学会了怎样千方百计减少自己的损失；相应地，在政治生活中，为了荣誉和原则，他常常小心谨慎地不去紧抓住某个注定行不通的主意不放。再引用凯恩斯的话：在巴黎，他有自己的高见，他“竭尽全力维护他……但并非至死不渝”。

有人称颂巴鲁克维系友谊的能力，赞扬他对发生了重大变故的朋友仍然表达亲密的感情。的确，后来，伍德罗·威尔逊因和约的失败拒绝再次参加总统竞选，巴鲁克一直时常去看望他。1923 年，威尔逊去世前数月，两人作了一次长谈。巴鲁克坐在小桌边，威尔逊将自己瘫痪的胳膊放在小桌上，斟酌词句地说：

“我在那样的时候倒下可能是天意。如果我有健康的身体，我会把国联搞下去。发生的这些事情说明，这个世界还没有作好准备，所以它遭到了失败。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对建立这样的组织态度冷淡，可能时间和某些不幸的事件会说服他们认识其中的必要性。大概它不应该是我的方案，而是别的什么人的。我现在明白了，我的计划太早熟了，对这个计划来说，这个世界还不够成熟”。

话语中包含的痛苦令巴鲁克难以启齿，沉吟许久他只说了一句：“威尔逊先生，您将您所想的付诸实施，完全是出于好意”。事后，巴鲁克很懊悔，当时没有再多说些什么。

第十一章

农民. 金钱. 麦克阿杜

1919年夏，巴鲁克49岁生日前去了趟白宫，打算与白宫主人讨论一下自己对将来的打算。在那儿，他先跟《芝加哥论坛报》一位记者谈起自己不打算做什么，以此婉转地进入这一话题。

我再也不涉足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了。我不会再从事什么公务、担任什么公职，不会再给任何人说我闲话的机会，他们再也不会说我“充分利用”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负责为协约国进行采购的机会刺探秘密。

是的，先生，我不准备给任何一个长舌头的家伙以机会，说我在战争期间利用工作谋取私利，即使说只有一分钱也不行。我觉得我在打败德国佬的斗争中出了一点力，它给我带来的作为爱国者的满足感已足够了。

（他特别强调不会回华尔街。）

我再不回去了。我曾经是个赌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呆了那么多年，但是现在——我受够了。

巴鲁克究竟打算做什么成了一个谜。1920年初有报道说，他正资助麦克阿杜竞选总统；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指责他战争期间“仅青铜一项”便从政府窃取了5000万美元；又有报道说威尔逊瘫痪期间，巴鲁

克在背后操纵白宫，对所有这些，他都予以坚决否认。一段时间，亨利·福特的《独立报》——一家极端反犹太报纸——指责他是“掌握至高权力的犹太人”、“犹太国驻美国的前领事”，有好事的记者专门找到巴鲁克，请他就此发表评论，巴鲁克用尽可能温和的声音答道：“小伙子，我想，你希望我要是承认就好了，对吧？”

巴鲁克的对头们可能未曾想到，此时的巴鲁克财政空虚。1916年，他的纯收入曾经达到200万美元。开战的第一年1917年，他也有695,137.57美元进帐，可到了1919年却猛降到37,745.34美元。由于参与政府事务，巴鲁克花费加大，而同时其资本额也有所降低。战前，由于担心出现利率冲突，谨慎起见，他卖掉了手中的大部分股票转而购买债券。我们手头一张不完整的财产清单显示，战争期间，他拥有价值530万美元的自由公债^①、铁路及免税证券各超过100万美元（巴鲁克有个习惯，喜欢手里握有大量现金，这些当然不会列在那张证券财产清单上）。然而，随着战时通货膨胀的发生和不断加剧，银行利率开始上涨。利率一上涨，证券价格随之下跌。1920年春，当银行利率涨到最高点时，债券的价格则落入了最低谷，巴鲁克的帐面损失巨大。当时，巴鲁克的财产可能比1000万美元多一点，较1916年估计的1500万美元有所下降。及至1921年秋，为请求免除自己作慈善捐助，巴鲁克竟带着有钱人特有的夸张说法道：“我已经破产了”。

正是他在经济上落入最低点的时候，他又遭到了福特的猛烈攻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亚瑟·克洛克挺身而出为他辩护。克洛克此时已回到家乡路易斯维尔，重又开始为《邮报》及《路易斯维尔时报》撰写文章。1920年5月，他写了一篇支持巴鲁克的社论，巴鲁克给他回了一封热情、乐观的（在当时特定的境况下）信：

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对你有“好感”[他告诉这个年轻人]。我难以用

^① 一战时美国政府发行的战时公债——译注

言语表达我对你慷慨写下那篇社论的谢意。我不轻易给人以我的关心和钟爱，但一旦给了也不轻易改变。对某些道貌岸然的人，我已经受够了——财经界、工业界、华尔街商界、政界、战争中的以及巴黎和会上的。但是，在这里，我必须说，在我 8 月里的 50 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因为你的社论，我对人性以及我的同胞们的信心增加了。

那年夏天的另外一封信也令巴鲁克增加了信心。当时，一筹莫展的堪萨斯州农业委员会来信请他出面帮助解决当地农民面临的市场难题。这的确很棘手：延续了 20 年的农业繁荣期结束了，贸易滑坡、股市下跌。战争期间，农民们只顾眼前，大笔借款将田里种得密不透风。而一到了和平时期，由于通货紧缩，国外市场萎顿，地价、粮价一跌再跌，农民们的债务负担一下紧迫起来。巴鲁克的父亲是个业余农艺师，可当儿子的却对农业知识一窍不通，但是（正如堪萨斯州政府所关心的），有关经济的方方面面，巴鲁克却有深厚的根基。无论如何，这封信函颇令巴鲁克高兴。于是，八月底（或是九月初）他便动身出发去堪萨斯州。

巴鲁克对该州的访问一开始有点令人尴尬。在堪萨斯州的首府托皮卡议会大厦里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一位官员出于好意，向在坐的与从事与农业有关的观众们介绍说，巴鲁克是一匹“华尔街之狼”。可事实上“华尔街之狼”有名有姓，叫戴维·拉马尔，是个罪犯。

听到这一介绍，巴鲁克显得很镇定，毫不介意，他立刻进入正题，对在场的堪萨斯州的主人们表示，他将先收集有关资料，然后提出具体建议。至于投机活动，他说：“在证券市场我不属于任何垄断集团，我总是一个人单干。我从华尔街讨得的欢心，跟我猜想的华尔街从你们这儿讨得的差不多”。第二个星期里，他广泛地与农民、谷物经纪人、银行家、商人以及报纸编辑进行了交谈。随后他回到纽约，将所见所闻加以整理、消化，又致信给上届政府的农业部长 E. T. 梅瑞迪斯获取更详细的资料（为了向这位前部长确认自己已收到其答复，巴鲁克回复了一

张政治味很浓的便笺：“下届国会，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你可以向我提一切要求”。他对政治的心灰意冷由此可见一斑）。综合了所有资料之后，巴鲁克提交了一份长达 17 页的报告。此前一个月，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以压倒多数的优势获胜。

巴鲁克一直深信，世界市场是相互依赖的。美国农业的繁荣也取决于国际贸易何时能恢复元气，这一观点构成了他的报告的出发点。巴鲁克认为，第一步，应与德国结清账目。第二，国内应多建粮仓、谷仓，使农民在市场不景气时能够保存一些粮食，等待时机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与消费者讨价还价。如果可能，建仓的费用应当由私人资本支付，但是万不得已的时候，巴鲁克认为，公共资金也可以用。他又加了一句，投资者可以以储藏的粮食为抵押借钱给农民（谷物期货市场的存在显然将财政风险从农民和中间人头上转嫁给了投机商，而巴鲁克，这位前职业投机商，对此却只字不提）。报告里偶有颇时髦的观点——例如其中说到国家应当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给予农业——但总体来说，这是一份措辞正统的文件。“最后”，巴鲁克这样写道，“请允许我这样说，为这一重要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我们不可能到阿拉丁的神灯里去寻找，也不能变戏法。唯一需要的立法支持是，广开各种交易门路，给农民以公平的机会。同时，呼吁有关各方共同努力”。

后来这份报告被冠名《置农业于现代商业基础之上》印制成册，巴鲁克被塑造成提倡合作化农业的人物。曾率先提倡合作运动的加利福尼亚州年轻律师艾伦·萨丕罗读了小册子后称赞不已。美利坚合众国谷物种植者联合会希望巴鲁克去他们那儿工作（巴鲁克拒绝了）。^①巴鲁克

^① 《前景》杂志 1923 年发表题为《农民们信任的三个犹太教城里人》的文章，向三个人表示敬意，巴鲁克和萨丕罗是其中两位。第三位是小尤金·梅耶。小尤金·梅耶认为这篇文章用词不公，对巴鲁克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读来令人恶心，而对他却颇显傲慢，似有俯就之意。盛怒之下，他给巴鲁克疾书一封：“我无法相信你竟然想充当这一切的代表，你够格么？但是那些从你那儿获得情况的作家们却当然认为，把你塑造成这样的形象是他们的职责之一；传来传去，所有文章都说我所知道的和我所做的一切都来源于你的启发和建议，我事实上岂不是被看成你的工具了！”然而，这封信最终没有寄出——原注

将自己对农业的热情分散到多个地方。在肯塔基州，他帮助建起了一个烟草合作组织（在这上头，他得到了克洛克的老板、路易斯维尔《时报》及《邮报》出版人罗伯特·W. 宾汉姆的资助）；在南卡罗来纳州，巴鲁克向该州的棉花种植计划捐款 50 万美元。他还拿出更多的资金帮助扶持一些国家银行，因为这些银行曾以当时价格极低的土地为抵押借钱给农民；在中西部地区，巴鲁克几乎（但没有最后成功）促成了将阿木尔谷物公司出售给一个农场联合组织的活动。1923 年，国会通过法案，决定设立“中级信用银行”，意在鼓励商业银行向农业贷款。美国农业司的院外说客格瑞·希尔弗得知消息后，充满感激地给巴鲁克写了封信。信中说，如果没有巴鲁克在 1920 年关心此事，就不会有这项立法。而巴鲁克为祝贺新银行开业，当即存入 110 万美元。

另有一笔投资购买了北达科他州价值 5 万美元的债券。巴鲁克出于对农民真诚而纯洁的感情进行了这笔投资。购买该项债券时，该州的权力掌握在“无党派联盟”手中，他们鼓吹共同所有权和不介入华尔街的政策。1919 年，联盟为筹建一家州立银行和州属谷物公司，计划发行价值 1700 万美元的债券。但这一行动遭到了抵制，某纳税人联合组织认为州府手伸得太长，便加以阻挠。经过激烈斗争，最终债券于 1921 年上市发行。华尔街反应冷淡，但巴鲁克个人出资购买了一部分，以帮助联盟实施自己的计划。

巴鲁克对农民怀有单纯的同情心，时而仅仅因为某些计划与农业有关便表示支持，甚至不顾有的近乎稀奇古怪。可是，他对 20 年代一项最具深远意义的农业提案——旨在予农业以平等地位、被称为“麦克纳瑞·豪吉议案”——却表现得忽冷忽热。当时，国内的工业品市场是受到一定保护的，国外商品的竞争受到某种限制。可是农产品市场却不是这样，农民们的交易产品丝毫不受价格保护。此项议案旨在扩大关税，实行非统一关税。首先，由政府作出判断，是否某种作物，比如玉米，

因产量过高而拉低整个农产品市场的价位。如果确有这种情况，应当立即收集多余部分的玉米销往国外，以任何或高或低的价格出售，以确保美国国内的玉米价格，同时再通过关税对这一较高的价格予以保护。国外的销售由政府负责，但是农民并非就此坐收渔利，他们将通过缴纳一种特别的“补偿性”税收保证这一项目的继续实施。站在农民的角度看，收入大于支出，利大于弊。

“麦克纳瑞.豪吉议案”的提出，不仅是 20 年代农业大萧条的结果，更是“莫林犁具公司案”的后果之一。该公司董事长乔治.匹克战前曾在“笛埃尔合伙公司”取得过骄人业绩，1918 年进入战时工业委员会，与休.约翰逊将军结识并共事。1919 年两人一起入伙“莫林公司”——他们认为该公司潜力无限——想再创辉煌。不料，农民们（公司的主要顾客）手里没钱，对公司的产品只能“望具兴叹”。“莫林犁具公司”的生意因此越来越糟，最后宣告倒闭。为了引起华盛顿的注意，匹克和约翰逊以《请给农业以公平》为题写了一大篇文章。文章里他们希望政府采取措施为多余部分的粮食寻找出路以挽救局势。

巴鲁克对这一议案犹疑不定：一方面，他尊重匹克和约翰逊，认为在不作强制规定自愿执行的作用下，农民必然彼此合作，因而他赞成为此立法以及缴纳补偿性税赋；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一贯主张低关税的民主党人，他不能同意他们的保护主义想法。

1922 年，他没有对议案表示支持。1924 年，他却帮助该议案获得了国会的支持，他给为此议案游说的人送去 5000 美元，还施加压力在民主党宣言中加入这么一条：“为使多余产量的作物不影响国内农产品整体价格”，呼吁“建立一家股份公司或一专门委员会经营或管理这一部分农产品的出口业务”。然而，此时的白宫主人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两次否决了“麦克纳瑞.豪吉议案”，后来的胡佛政府部分接受了匹克的主张。待富兰克林.D.罗斯福入主白宫，对这一方案再次进行公开讨论时

议案本身已是面目全非了（用巴鲁克的话说，是面目可憎了）。

不用关注公益事业的时候，巴鲁克便放任自己享受金钱带给他的快乐、亦承受与之相伴的负荷。按惯例，夏天他在欧洲渡过，有时在萨拉托加赛马会前赶回国，有时跟他的合伙人凯利·格雷森一起喂马、遛马过瘾，也颇有乐趣。秋天他会呆在纽约；欢度圣诞节当然是回赫伯考，偶尔在那儿呆到野鸭及鹌鹑的盛产季节结束。春天他再回纽约。

对于旅行他有自己的一套既成好恶。随着年岁的增加，他发现自己对寒冷愈来愈敏感，愈发钟情阳光。出行时，他需要座位尽可能宽敞；在海上时则应尽可能平稳。所以每每乘船旅行，他偏爱住中舱，因为中舱颠簸最小。他倒并不喜欢住头等舱，嫌它太扎眼。1924年7月至9月呆在欧洲时，他曾组织了一次汽车旅行。这次旅行对所用的汽车有特别的规定，他对她的一位法国贵族朋友说：“我希望参加的车都是旧式的敞蓬汽车，能打开车蓬的那种。既然是旅行，怎么能没有阳光？！如果车蓬能完全折叠起来，那就再好不过了。另外，行李箱最好不止车后一个。车身两侧都得有，这样就免得在车内摆许多行李了”。

无疑，城堡也是个扎眼的玩意儿，且人尽皆知潮湿不堪，巴鲁克却不介意了。1923年，巴鲁克在苏格兰东部一个濒海地区租下了一座名叫费特莱索的城堡。城堡距离石港村大约一英里。城堡里除了有巨大的会客厅，还有餐厅、画室、书房、吸烟室、台球室，14间卧房、7个浴室（不包括仆人的住处和一个专供仆人用的浴室）。印象中——当然这种印象里没有巴鲁克的身影——度假中的富人总希望与外界保持最快捷的联络，所以城堡的房产主新近装上了一部电话。离城堡不远的一个狩猎场占地约一万英亩，每季的租金是15000美元；城堡的租金加上饮食费用大约是10000美元。巴鲁克付钱的时候相当愉快。后来他写信给在伦敦的代理人说：“我一直想在苏格兰或英格兰有一个能整季打猎的地方，而且一直希望它价格不菲”。况且那年8月17日，他和格雷森的

马各自在萨拉托加赛马会上赢 2600 美元，付了一部分租金。

巴鲁克有时很难找到朋友跟他一起消闲度假，因为像他这样既有钱又有时间，还没有紧急事务缠身的人委实不多。“我在苏格兰这儿给一个城堡钩住了”，1923 年他对阿肯色州参议员约瑟夫.T. 鲁滨逊（他是赫伯考庄园的常客）下命令道，“现在我开始来‘钩’你……跟我一块儿来打猎吧，带上一枝 12 号口径的猎枪。相信这里的一切将带给我们无限欢乐”。但是罗滨逊的确无法脱身。于是巴鲁克又说动了马里兰州州长阿尔伯特.C. 里奇。最后，8 月 13 日到 9 月 8 日，巴鲁克一行的打猎队伍浩浩荡荡（不断有人加入），总共打回 1 头雌马鹿、3 只松鸡、4 只凤头鸡、13 只鹌鸡、216 只野兔和 1662 只松鸡。回到纽约后，巴鲁克送给里奇一张 2600 美元的支票，资助他连任州长竞选活动，他在信中写道：“因为，……你他妈的真是个好州长，而且，因为你是我的朋友，一个我喜爱和尊敬的朋友”。

礼物的接受者对巴鲁克总是感恩的，这一点令他感到高兴。然而，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巴鲁克在某些慈善性捐助中常常隐去姓名。一次，他通过一个朋友送给南卡罗来纳州一个食不果腹的妇女 25 美元，要求不要透露资金来源。他是这么说的：“请不要让她知道钱是我给的，因为这类要求实在太多，如果我谁都满足的话，足够把我的钱花个精光，甚至能把大家以为我有的钱数都用掉”。后来当参议员乔. 鲁滨逊执意要宣布巴鲁克是阿肯色州散文比赛（文章的主题当然是关于农业的喽！）的捐助人时，后者赶紧给他发了电报予以阻止。然而，另一方面，接受过他的礼物或热情款待的政客及报界人士都很清楚该感谢谁。1920 年，著名的财经记者加勒. 加勒特、《纽约世界报》发行人拉尔夫. 普利策、以及该报著名记者赫伯特. 斯沃普都曾在赫伯考作过客^①（对斯沃普而言，作这样的拜访是罕见的：他一天 24 小时离不开电话，而电话正是

^① 1926 年，在一次赫伯考聚会上，普利策为巴鲁克献上了一首打油诗：股市显果敢，农艺慨而慷；能干又善攒，经济兴国邦！——原注。

赫伯考所仅有的几项不便利处之一)。1921年，赫伯考的来客中包括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拜伦·P. 哈里森；1922年有加勒特、马克·苏里文、鲁滨逊和凯利·格雷森；1923年有拉尔夫·普利策和他的兄弟、《圣路易斯快邮报》发行人约瑟夫，以及《世界报》的查尔斯·迈克尔孙、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弗兰克·肯特以及里奇州长。第一个造访座落在赫伯考庄园的美国总统是1944年的富兰克林·D. 罗斯福。当然在此之前，时常有刚宰杀的新鲜野鸭在此装船、带着无党派人士的情谊送往白宫，不论白宫的主人是威尔逊，还是哈定，亦或是柯立芝，无不如此。甚至法国前总理乔治·克里蒙梭都曾经接受过赫伯考送出的25只水龟，这位前总理后来说他觉得这些家伙太可爱了而不忍宰杀而食。克里蒙梭的门生安德烈·塔迪厄1925年给巴鲁克寄来19000美元，附信说：“我希望它们（指美元）能多产”。巴鲁克立即殷勤地将给自己订下的“不为他人理财”的规矩放置脑后。最近还有一个显示他的慷慨的例子：至少从1923年起，他便开始为约翰·J. 潘兴将军打理某些特殊事务了。

众所周知，干报纸这一行的人度日维艰、荷包羞涩，因而巴鲁克的财产不可避免地他们在心中激起了这样的向往：什么时候能到巴鲁克办的报馆里工作，那就高枕无忧了。戴维·劳伦斯卖了一小部分自己的《美利坚日报》股份给他，可是巴鲁克1922年想购买《纽约晚邮报》部分股票的计划却没能实现。1923年，亚瑟·克洛克带着妻儿从路易斯维尔搬到了纽约，一开始在“电影人联合会”里临时谋了个职，兼职为《纽约世界报》撰写社论。他干得相当出色，1924年已成为《世界报》发行人助理，同时担任巴鲁克的公共事务顾问。克洛克需要钱，巴鲁克需要一枝神来之笔——彼此互相需要，友谊之花便盛开了。1926年3月，巴鲁克捐款1000美元给《世界晚报》的禁煤基金，缘由如他给克洛克的信中所说：“是你请我这么做的”。那年八月，《纽约人周刊》上登载了一篇态度友好的侧记，署名克洛克。

然而，1925 年底（或 26 年初）巴鲁克无意中让克洛克卷入了一桩棘手的事件之中，最后竟令克洛克因此而离开了《世界报》，即使不是被迫地，亦是极不情愿地离开的。当时，狄龙&瑞德合伙公司正试图购买道奇兄弟公司，并已授权有名的财政专家——又是赛马好手——查尔斯·施沃茨和莫顿·L. 施沃茨兄弟帮助完成此事。巴鲁克与施沃茨兄弟挺熟（他们都是爱马俱乐部会员，在俱乐部设在贝尔蒙特的马场里，查尔斯、莫顿、斯沃普和巴鲁克四个人的私人场地紧挨在一块儿，从 42 号到 45 号），便指点他们去找克洛克，因为这桩购并交易一经宣布必将掀起轩然大波，有关的舆论、宣传工作相当关键。克洛克得知后，答应（正如他在自己的备忘录中所记）“……只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时，不致于违背任何职业道德或是将《世界报》卷进来”，便可以帮忙。然而其后《世界报》社论版编辑沃尔特·里普曼却斩钉截铁地认为自己发现了一桩违背职业道德的事情。一天，里普曼从克洛克的办公室外走过，恰巧此时克洛克正在电话上跟查尔斯·施沃茨谈话。里普曼认为自己偶尔偷听到的这段谈话是关于一篇社论的，一篇由他本人亲手捉刀的社论，严厉谴责了这次购买道奇公司的行动，尚未发表。里普曼将自己的满心疑虑告知普利策，后者立即让克洛克给出解释，尽管克洛克一再声明一切都是误会，是里普曼听错了，但是，于他不利的传言已经扩散开了，克洛克在《世界报》度日维艰。1927 年的一天，巴鲁克仿佛不经意地对克洛克说，《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道夫·S. 奥克斯对他颇有兴趣。不久，巴鲁克出面主持双方见了面。很快，5 月 1 日，克洛克跳槽到《时报》编辑部。

当时纽约的报界人士中，只有斯沃普自诩可与巴鲁克在经济上分庭抗礼，但这一势均力敌主要指花销这一方面。斯沃普 1909 年起家，一开始在《纽约世界报》作记者，周薪 42 美元，按篇幅计酬的稿酬另算。1921 年 39 岁时他当上了该报的执行编辑，周薪 1000 美元，另有《世

界报》及《星期日世界报》纯利的 2%分红。用几乎一切标准衡量，这一薪水都是足够可观了。不过，这些标准中不包括斯沃普对生活水平所定的标准。刚提升为执行编辑，他便和妻子搬进了一套宽敞的公寓，座落在西 58 号街 135 号五楼。不久，因为他们感觉太窄太挤，便索性将楼上的一套也租了下来，连在一起，形成一套错落式住宅，共有 28 个房间、8 间浴室、12 部电话，以及足够大的壁柜，以容纳斯沃普随时要选用的 75 套西服。夏天，当巴鲁克出发去欧洲的时候——斯沃普曾有一次托巴鲁克从巴黎捎一打白色羊毛袜回来——斯沃普则在巨颈区租下一幢三层的维多利亚式别墅，位于长岛的北滩，俯视曼哈赛特湾，景色一流。林恩·拉德纳的住所距离他不过百码之遥，两边鸡犬可以相闻。

（拉德纳记述说）有的时候几乎无法工作，入睡就更加困难了。《世界报》的斯沃普先生住在路对面，他没完没了地开家庭聚会。另外几户邻居也是这样。所以无论何时，总有相当多的客人在小树林里散步。偶而他们自己都糊涂了，忘记了是在哪座房子里作客，于是，将错就错，向就近的房子主人要些饮料点心，停留在那儿，娱乐片刻。

有很多这样的客人闯到了斯沃普家，执行编辑的伙食账单最高时曾达到一周 1000 美元，跟他拿的薪水差不多。斯沃普对金钱的需求从他的形象打扮上可以一目了然。作家及漫画家佩吉·巴顿曾这样勾勒：

身材高大，依建筑原理长成的脑袋俨然一个杂货铺：番茄汤的颜色，上覆修剪整齐的亚麻色短发。窄窄的前额遮不住宽而突出的颧骨。梨形的鼻子陡峭地竖在脸部中央，下坡处宽窄不一，仿佛被什么东西夹着。两道眉毛各长不过一英寸，大大的镜框、楔子般深凹的眼睛在侧翼包围。轻蔑的鼻孔装腔作势地哼着。上唇过长——典型的早期新大陆移民——嘴巴因而仿佛悬着，小得象裁缝的扣眼。尖刻的下巴微微晃着点赘肉。说起话来像开饭的铜锣，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大摇大摆，一幅“独创公

爵”式。比绝了种的渡渡鸟^①更以自我为中心：自命不凡、自成一统、自我束缚。脾气暴躁，一触即发，非暴利不牟——不折不扣的“愚人村”精神的再现！

为保住老本，斯沃普也挤进证券市场搞投机。一开始漫不经心，渐渐地投入了他的全部热情，成绩骄人：股市大崩溃前夕，他的帐面财产达到 1200 万美元。于是他开始豪赌。臭名昭著的职业赌徒阿诺德·罗斯泰恩也曾是他的赌友之一，此人 1928 年怀揣 6500 美元（这个数目对罗斯泰恩而言并不惊人——他有时兜里装着美元现金）在街头被暗杀。1923 年 2 月，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在乔舒亚·考斯登的私人列车里，斯沃普跟这位石油巨子用扑克狂赌两天两夜。最后，考斯登输了 443,100 美元，而这对他不过九牛一毛。同时玩的还有两人：一人是战时工业委员会里巴鲁克分管钢铁的副手伦纳德·瑞普罗格，他赢了几十万美元；另一人是老板佛罗伦茨·齐格菲尔德，他输的比瑞普罗格赢的多一点。玩牌前，斯沃普暗暗允许自己输 15000 万美元，结果却大赢 4,700,300 美元（尽管并非每一分一都到手）。

斯沃普跟考斯登的交往不仅在牌桌上。1927 年，他邀请后者同去观看登姆普希和腾尼的最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争夺战的重赛。同去的还有哈里·F·辛克莱，也是一个作石油生意的百万富翁，这人曾于前一年请斯沃普观看了登姆普希和腾尼这间的第一次交手。交往中，三人的话题时常触及金融、市场等等，斯沃普将他们交谈中的信息原封不动地照搬给了巴鲁克。1923 年，斯沃普得到了石油股票看涨的信息。两人一合计，买！结果非但未涨，反而跌了。那年九月，斯沃普写信给巴鲁克报告情况，认为辛克莱的行情仍然不错，自己打算“捂”下去；他在信中写道：“我手里的辛克莱、考斯登的股票一张没抛，当然后来也没再买，尽管有的时候想再买点，也没买。出于清理账目的目的，我把以下

^① 产于毛里求斯——译注

股票全部卖出了：阿齐森、南部太平洋、麦克重汽的普通股和优先股，还有底特律爱迪股和联合天然气股。我想，我的帐目现在是清楚的，只是损失惨重”。

执编的这封信写得面面俱到：有本赛季萨拉托加赛马结果的报告，有辛克莱去俄国找石油的新闻，有关于石油股票形势的“内部预测”，弗兰克·芒塞意欲出售《纽约先驱报》的消息当然少不了（他写道：“我们应密切关注，静观其变”）。甚至，因有传言，巴鲁克出行时在船上曾与一位年轻的女士发生口角，斯沃普在信里对她的姓名的首写字母作了猜测（是 B. G.，夫家姓氏缩写为 H.，“哼，什么都瞒不过我”）。在信里，斯沃普略带奉承地写道，交易所里的所有事务都得先请教巴鲁克才行。当然喽，他又加上一句，他敢肯定巴鲁克对它们根本没有兴趣。全信以引用《世界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结束：“巴鲁克谴责这一公然藐视国联的行为”，那是一篇痛斥墨索里尼对希腊采取行动的文章，是斯沃普从巴鲁克那儿拉来的，写这篇文章时，巴鲁克正在费特莱索。

斯沃普的这信看似漫无边际的信，暗藏让巴鲁克赔偿其损失之意。巴鲁克看出来了，回信表示愿意帮忙：

“你帐上的三千股股票转到我帐上来吧。目前它们的损失是 12000 美元，另加 10000 或 12000 的保证金。这样你的帐面能宽松些了。我之所以接手这些股票，一是因为当时我说了那些话，二是给自己买个教训：别人的话只言片语也信不得，免得寝食不安。当初股价在 22、23 之间的时候，我们应该全部抛掉的（现在已落至 18.5/8），其实当时我让博伊尔小姐在 24.7/8 的价位上卖掉 1000 股的时候确是这么想的。我对石油股票仅有的一点知识令我无法在这上头有大的作为，但这点仅有的知识足够让我避之唯恐不及”。

承担这一新的损失 7 个月之后，巴鲁克又对斯沃普说了些表示鼓励

的话，后者也再次表示了谢意。

那么，既然巴鲁克既是《世界报》发行人的朋友，又是其执行编辑事实上的经济高参，自然有人猜测其对该报的新闻、文章等会有某种特殊的影响力。对此，曾为斯沃普作传的小 E. J. 康恩却并不这么认为。

[康恩写道] 对于巴鲁克与《世界报》的关系，可能人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巴鲁克想发表什么声明，《世界报》一定会为他专门腾出位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斯沃普充其量为他做的好比 1926 年春他递给助手的一份备忘录上写的：“请通知体育部下次再提到巴鲁克先生不要叫他‘巴尼’。他的名字是伯纳德·M. 巴鲁克。我们就应当这么称呼他，或把它简写成 B. M. 巴鲁克”。如此云云。

1924 年，巴鲁克支持威廉·G. 麦克阿杜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麦克阿杜为自己在《世界报》受到的不友好对待焦躁不已，请巴鲁克出面代表自己和斯沃普和解。究竟巴鲁克有没有对斯沃普说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据他对马克·苏里文说，他既不能也不愿做这样的事），总之《世界报》自始至终未对麦克阿杜宽容过。

巴鲁克一度想买下一家中等规模的日报，价格上优惠一点，比稳住斯沃普所花的钱只稍多一点。但是加勒·加勒特却向他指出，既然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任何一家报纸的头版，就没有任何理由背上这样的经济包袱。的确，许多事情一开始做的时候，可能并不会觉得有多难，但要使其能顺利发展却往往充满了各种挑战。举个例子，1925 年，人们都热衷于舞台背景研究，但巴鲁克却捐资 25 万美元给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沃尔特·海恩斯·佩奇国际关系学院”以进行“将利润从战争中抽走”的理念研究。后来巴鲁克常向人夸耀：这全是他的主意。巴鲁克认为，在某种危急的战争状态下，一旦这种状态的延续不能给大老板们带来巨额利润，战争就可以避免。换言之，如果双方的敌意激化至非兵

戎相见不可的地步，一个在战时工业委员会牵头统一领导下运行的经济，将有助于加速胜利的到来。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潘兴将军的赞同与支持，克洛克被聘请作专门宣传工作。不久，一封信送到了巴鲁克手中，信显然出自克洛克的手笔，却署着学院财产托管理事会主席欧文·D. 扬的名字。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先生：

在您以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于 1921 年 3 月 3 日递交给总统的报告中，第六章的结尾语句是：

“我们不由想到，遇到类似的紧急情况，除了人力的动员以外，还应有物资和美元”。

这是第一次对工业战备体系和战时工业管理在文字上给出清晰的表述。实践中，在那场 1918 年结束的大战中，在战时工业委员会的指挥下，此种管理方式已经实施过一次了。同时，经验告诉我们，要做到不打无准备之仗，在下一次战争到来之前，它们必须以最完整的形式存在，随时待命。现在，对这一想法，您又作了两点补充：

（1）此种由某战时工业部门进行的“美元与物资”的动员将会“将利润从战争中抽走”，以及

（2）将利润从战争中抽走可能会被证明是对未来和平产生最强大影响力的因素之一。

从防止战争的角度考虑，这些建议无疑深具研究和发展价值。佩吉学院对与避免战争有关的各种措施都深感兴趣。我们知道，您所说的“将利润从战争中抽走”指的是凭借对利润加以限制的某些规定，防止借战争牟取暴利的情况发生。没有了利润，武力外交政策这一鼓励和战争的政策便失去了人心；没有了利润，即使战争已然爆发，它也只会被缩短

而不是延长。我们佩吉学院理事会认为，如果您的计划，即您在上次大战后期已投入实施的计划，又即您在诸多场合给“战争学院”所作的演讲中、某些报刊文章里、国会委员会组织的听证会上，及给其他从事公务人员的信件中，勾勒的那一计划能够在一流强国的某些院校进行耐心细致的研究，它肯定将成为遏制尚处谋划中的侵略战争或无缘由战争的最伟大的力量之一。可以设想，如果战争不再有利可图，那么挑起侵略战争的唯利是图的动机肯定将不复存在；另外，在一切处于战争边缘的国家里，一旦对物资和美元的征用与人员动员同步进行，那么这些国家真正进入战场的可能性便小得多了。

在此，我谨以佩吉学院理事会主席的身份真诚邀请您到这儿来主持美国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发出此邀请前，我曾将有关事宜通报潘兴将军，他对我以上所言皆表示赞同；其回复随信奉，敬请参阅。

尽管潘兴和扬都表示赞同，但财产托管理事会的其他人（其中不乏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包括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却顾虑重重。他们的意见是，这封答复信一旦公开发表，会给公众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即这个学院非但不为和平作贡献，反而从事经营战争的研究。他们的这一反对意见伤害了巴鲁克的感情，并令他退缩了。然而接着，理事们又重新考虑了这件事，得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不久，一份公开声明越过大西洋到达住在里茨饭店的巴鲁克手中。电文首先对他的“慷慨”捐赠表示感谢，同时约定巴鲁克的回信将立即在报纸上登出。不久，巴鲁克向该学院捐款的新闻，连同巴鲁克与学院之间的往来信件的大段节选也出现在《纽约时报》头版。

固然，社会主义者最喜欢把这样的说法挂在口头：攫取金钱是导致战争的根源之一。然而它恰应和了巴鲁克传统主义的批判思想，在这一点上，他略显头脑简单（无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否有实际意义，事实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严禁私有制的苏联把军队开进了芬兰和波兰，严格保护私有制的纳粹德国则蹂躏了几乎每一个人)。其实，巴鲁克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而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休·约翰逊将军曾说过这么一件事：一位画家因难以用画布捕捉巴鲁克的瞬间表情而对此感到绝望。画家说：“他的脸部充满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变化，各种表情的影子飞速地从那张深具立体感的、生动的脸上一掠过”。其实，巴鲁克在政治上也同样易变。总体上他忠实于个人和政党，而不是所谓原则，但他亦擅长对某些人物表示自己冷漠的不屑。比如，20年代初，亨利·福特提出一项开发玛索尔洲的水电潜能的建议，但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乔治·W. 诺里斯却立即拿出一个对立的方案表示反对。巴鲁克（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战时经验）便纯粹地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对两个提案进行权衡，最终选择了福特的，尽管他是自己的死敌。大选中，巴鲁克又试图同时支持这样的两个人：一个是保守主义者，另一个是极端自由主义者，原因挺简单：他认为他俩都是好人。巴鲁克一贯认为法律应少一些，自由应多一点，可是在相当长时间里，他却是个热心的禁酒主义者。^① 尽管他资助了鼓吹“均富”的无党派联盟，然而他不赞成对企业利润征收双重税收的作法。并坚持认为，将收入调节税严格限制在 33.33%之内有利于鼓励企业的发展。

在巴鲁克的职业生涯中，与意识形态有关的最奇妙的遭遇发生在 1925 年夏，当时佩吉学院事件刚刚公开不久。在凡尔赛一家不起眼的饭店，当时的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苏联政府部长的旧称）列奥尼德·

^① 这方面巴鲁克的确热心，但还不至于腾空自己的酒窖。1926 年，巴鲁克的酒窖里藏有白兰地 1 箱、科涅克上等白兰地 3 瓶、特级白葡萄酒 22 瓶、苦艾酒 34 瓶、戈登出产的杜松子酒 51 瓶、黑麦威士忌 11 瓶、苏格兰威士忌 45 瓶、什锦干红葡萄酒 35 瓶、高级香槟 12 瓶，另有五花八门的利口酒、白兰地、雪利酒和 1 瓶牙买加朗姆酒。在巴鲁克的屋檐下，“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即《禁酒法令》——译注）究竟有没有得到遵守，证据不一。巴鲁克自己偶而小酌两杯。可是据约翰·巴拉瓦纳回忆，20 年代，赫伯考提供的菜式虽然非同一般，也不提供烈性酒，客人们往往自己带酒来，餐前关起房门来大开鸡尾酒会，巴鲁克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然而 1919 年赫伯考老房子失火时，当时在此作客的客人之一、内华达州参议员基·皮特曼毅然重返火海，救出了一桶上等玉米酒——原注。

卡拉辛安排了一次与他的会面，向巴鲁克提出一个异乎寻常的建议。这个俄国人告诉坐在他对面的这个美国人，后者在战时工业委员会里的工作成绩给克里姆林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巴鲁克先生，我们希望您能够在和平时期为我們做那些您在战争时期为您的祖国所做的事情”。原来，他想邀请巴鲁克扮演某种人民委员顾问一类的角色，并让巴鲁克自己开个价。

巴鲁克当场答应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件趣事），说自己不要一分钱报酬，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俄国人民在饮食、交通、住房等方面的需求较之俄国的重工业，应当摆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据说卡拉辛有一位信奉自由主义的英国妻子，但是这位人民委员仍然被巴鲁克的“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吓坏了，会谈没有继续下去。此次与苏维埃共产主义者的蜻蜓点水般的短暂接触后不久，巴鲁克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考戴·豪尔提出一项纯美国式的建议：“我真的希望民主党人将来不要跟这些红色的或是粉红色的家伙结盟，也不要仅仅因为一个人比别人稍稍成功点就反对他”。^①

经过数年的战争，进入 20 年代中期后，巴鲁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除了威尔逊本人之外，便是总统的女婿威廉·吉布斯·麦克阿杜了。麦克阿杜想当总统又想发财，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后一个目标妨碍了前一个。

麦克阿杜 1863 年出生于佐治亚州的玛丽埃塔，当时当地的贫穷也使他未能幸免。1877 年，麦克阿杜的父亲，一位前南部邦联军官，被任命为田纳西州大学英语及历史副教授、年薪 1500 美元，于是他带着麦克阿杜等 7 个孩子举家迁到了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麦克阿杜很快

^① 无独有偶，1920 年“红色恐怖”的年代，五位依法被选举为纽约州众议院议员的社会主义党人却被无端剥夺了议员席位，为此，《纽约世界报》特别设立了“政府代表基金”，以支持这五位议员，巴鲁克向基金捐赠了 100 美元——原注

长大了，在田纳西州东南部城市查塔努加学习法律，后做房地产生意积攒了 25000 美元，但这点本钱在投资诺克斯维尔街道铁路电气化工程中赔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为了还债，1892 年麦克阿杜来到纽约，在华尔街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是没有顾客光顾，于是便试着出售铁路债券。他住在西 87 号大街一幢没有电梯的大楼五层。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麦克阿杜为了节约每天的 10 美分，早上从住所走到华尔街，晚上再走回来，来回一趟足足有 10 英里。1901 年，当比他年轻 7 岁的巴鲁克已经成了百万富翁的时候，麦克阿杜还在构想在哈得逊河底修建一条连接曼哈顿和新泽西的铁路隧道。及至 1909 年，麦克阿杜任总裁的哈得逊及曼哈顿铁道公司已开凿了四条隧道（号称“麦克阿杜隧道”），他还专门为公司宗旨制作了一句口号——造福公众。所有这一切为他赢得了公众的尊敬和成功的感受。然而令他刻骨失望的是，这一切仍然没有带给他金钱。在哈得逊河的新泽西这一端，他结识了州长伍德罗·威尔逊，并于 1912 年参加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在总统竞选中，麦克阿杜让自己成为威尔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得以在新政府中任财政部长。一战中，他肩负的重担足以把铁人压垮：他在掌握财政部的同时，还兼任铁路署署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还领导着农业信贷委员会、战时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国际高级专员公署。巴鲁克能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一职，全靠麦克阿杜在内阁的提名，后来还帮助巴鲁克在委员会里站稳了脚跟。这一好意巴鲁克永远不曾忘记。

为了充实自己的钱箱，麦克阿杜于 1918 年离开财政部。其实 1920 年，麦克阿杜就差点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只是他的岳父始终拒绝放弃谋求第三任的努力。后来，麦克阿杜在洛杉矶建立起自己新的基地：赚钱、从政、1924 年仓促投入新的大选。巴鲁克依从他的想法，大选一开始便给了他 5 万美元。1923 年，巴鲁克又公开称赞麦克

阿杜，说“在人们喋喋不休谈论的那些人里，麦克阿杜是出类拔萃的”。

①可是，政治上总有不测风云：1924年元月24日，爱德华·L·多尼，一个瘦小、蓄着八字须的石油大亨向参议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承认，在谈判租借分别位于怀俄明州的茶壶斗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赤鹿山的两处海军石油油田的时候，他曾经给政府的内政部长送去了一只内盛10万美元现钞的“小黑皮包”。数天后，又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威廉·G·麦克阿杜曾当过多尼的律师！

政界震惊了——就在哈定政府爆出腐败丑闻后不久，民主党头号总统竞选人麦克阿杜又被揭露以律师定金的方式，从一个被称为“共和党的恶人”那儿收取5万美元！人们皆拭目以待。

政治丑闻风起云涌之时，威尔逊已奄奄一息。麦克阿杜携妻子，即威尔逊的女儿埃莉诺，从洛杉矶匆匆登上东去的列车，但还未等他们到达，威尔逊已然咽了气。在华盛顿，麦克阿杜虽然身披重孝，但心不在焉（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一情景令他的岳母悲恸欲绝、气愤难抑）。为了抵御多尼事件对他的影射，他集合了一帮议员，要求给予特权以免在参议院有关委员会上作证。弗兰克·肯特在所著的民主党党史里写道：

① 虽然巴鲁克暗地里是个热心的党徒，可公共场合下他一向出言谨慎，所以像这样露骨的赞扬是极早见的。1924年1月初《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篇讥讽他的文章：

著名财经专家伯纳德·M·巴鲁克先生，一如既往的和蔼可亲 and 令人捉摸不透。他昨天悄悄溜进本市，之前没有走漏一点风声。他在“滨海酒店”开了房间，随即去拜访他的老友、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之后，他去了安纳波利斯去参加马里兰州州长里奇举行的“杰克逊日”庆祝宴会……

尽管巴鲁克先生彬彬有礼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但是至于他对当前世界局势及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的看法只能留待读者自己从以下对话里去作判断了。

“先生，你对欧洲局势有何看法？”；“……但是，这一部分请不要发表”。

“这儿的情况看起来怎么样？”；“……但是，请不要引用我的话”。

“你觉得谁最有可能获得民主党提名？”；“……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说是我说的”。

“你认为现任总统获得连任的机会有多大？”；“……不过，我说的这些是不能公开的”。

“先生，您看上去非常健康！”；“哦，我从来没感觉这么好过。今天的天气难道不是棒极了？我只是……”就在这时，站在电梯里的巴尼突然很快地挪了挪脚，电梯门轰然开了，人们一涌而出，只听见他又说了句，“这一段不能引用”。——原注。

这件事他（麦克阿杜）做得“相当潇洒……他声明，在赤鹿山油田租借案一事上，他不仅未向多尼先生提供任何法律服务，甚至声称对此事一无所知。这一租借案一露可疑迹象，他便立刻中断了与多尼先生的一切法律关系，辞去了担任其私人律师的职务。他与多尼先生曾经有过的联系，无不清清楚楚，是可以摆在台面上的，没有任何会给他作为一名律师乃至一个人招来非议的地方。这确是一篇明确的、果断的、有说服力的声明，然而它对降低公众呼声、减轻对他的谴责却没有起任何效用，人们依旧称他为‘多尼的代理人’”。

巴鲁克很久以前曾告诉过麦克阿杜，想当总统，就必须避开有钱的当事人。现在，事已如此，他的建议是，冒一次成败参半的风险。他劝麦克阿杜主动退让，他认为，即使摆个姿态也可以获得公众的同情，消除政敌的怒火，最终挽救候选人提名。他将克洛克从《世界报》召来，起草了一份表示屈服的声明，可是麦克阿杜没有签名。即使巴鲁克一度威胁停止对他的财政支持，麦克阿杜也执意不从，甚至仿佛不知从什么地方重新获得了勇气和力量。不久，巴鲁克屈服了，重新跟他站到了一起，正如四月里他对哈里森参议员所说的：“只要麦克阿杜需要我，只要他愿意把这场拉力赛比完，我当然会一直跟他在一起……无论乌云何时笼罩我的头顶，无论它是大是小，我始终相信麦克阿杜的信心、他的信念，以及他的意志”。

许是出于私人间的信任，亦或出于对朋友的忠诚，巴鲁克在那个阶段表现出了充分的集体主义精神。他坚定地遵守《禁酒法令》，张口闭口都是进步的字眼。约翰·W. 戴维斯是一位保守的律师，据说他将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扮演一个出人意料的重要角色，巴鲁克便许诺给他在市中心准备一个住处，并书面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愿望：“我希望还能常常见到您，希望您能和我的名流朋友们接触一下，以防止任何反对禁酒令的人或是反动力量获得提名。我想在麦克阿杜的竞选队伍中，我们即

将拥有防止这种事情发生的核心人物”。

麦克阿杜本人是个彻底的禁酒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他跟威廉·詹宁斯·拜伦完全一致。麦克阿杜瘦高个儿、长长的鼻子、忧郁的眼睛，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和许多极有野心的人一样，他缺少自嘲的幽默。至于巴鲁克，麦克阿杜曾对人说他是“我永不安宁的爱冒险的精灵”。麦克阿杜四处发表演说时，对“反动”、“恶劣影响”等词怀有偏见，他常用“恶劣影响”一词来形容华尔街、商业管理、铁路以及以《纽约世界报》为代表的对他充满敌意的东部报纸。无疑，说华尔街“恶劣”，部分原因是麦克阿杜认为华尔街给他的钱太少了（其实，他和巴鲁克的赚钱方法截然不同：麦克阿杜曾有一次试图从 J. P. 摩根手中获取风险基金！）

1922 年后，麦克阿杜在总统竞选中采取了一系列有力度的举措：他建立了一个活动范围广泛的竞选组织；即使发生了多尼案之后，他也能在民主党内占据明显优势；在他的对头斯沃普不遗余力的“帮助”下，1924 年全国代表大会选在纽约举行；6 月 19 日麦克阿杜乘火车来到纽约宾州车站，欢迎人群个个戴着写有“麦克必胜”字样的帽子；欢呼声中，麦克阿杜走下火车，乐队奏起欢乐的乐曲“欢迎你，长官！”。这位民主党头号竞选者钻进汽车，车队浩浩荡荡地朝范得比尔特大饭店开去，麦克阿杜住进恩里科·卡鲁索^①曾住过的套间。

到纽约反对麦克阿杜的“反动人士”中，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奥斯卡·W. 昂特伍德是引人注目的一位。他当过众议员，现在是参议院领袖，强烈反对禁酒令以及给予妇女投票权，但他是企业家们的朋友。令人吃惊的、同时亦颇为重要的是——并非不可预料——所有昂特伍德的朋友都是麦克阿杜的敌人，反过来也是一样。自相矛盾的是；三 K 党反对来自南

^① 恩里科·卡鲁索，1873～1921，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歌剧家，曾演唱过歌剧《费多拉》、《波希米亚人》、《弄臣》等，其嗓音刚劲而抒情，享有世界声誉——译注

方的保守主义者昂特伍德，却支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改革派麦克阿杜。

那一时期，三 K 党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尽管它对黑人产生不了影响，但它的政纲确是反天主教、反犹太人和反酒精的。1923 年秋，在休斯敦的一次演讲中，昂特伍德大无畏地对三 K 党及其纲领进行了抨击，从而为自己在该党内得了个“三奸——奸吝、奸滑、奸诈（Jew, Jug and Jesuit）”候选人的“美名”，继而在南部及中西部地区丧失了支持。昂特伍德的遭遇不能不令巴鲁克警惕，之后，他在有关宗教信仰的问题上出言谨慎、甚少攻击。他不为三 K 党人辩护，但亦拒绝谴责他们。这样一来，在获得这一组织的支持的同时，他亦遭到了痛恨这一组织的人的反对。巴鲁克也被夹在了中间，进退两难：在《世界报》的朋友反对麦克阿杜，他向麦克阿杜提出的建议又丝毫不被重视。他曾对麦克阿杜提出忠告：目前的局面显示，仿佛他们在一意寻求三 K 党的支持，对这一点必须公开予以否认。可是听的人只以沉默作答，巴鲁克只好三缄其口。1924 年 5 月，斯沃普邀请巴鲁克在《世界报》上发表声明，就民主、共和两党是否应同时公开反对三 K 党一事表明自己的意见。至少这一次，巴鲁克坚决地拒绝了。

6 月 24 日，民主党历史上一次相当特殊的代表大会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开幕，这是民主党自建立以来会期最长、最具破坏性、冲突最为尖锐的一次会议，也是候选人彼此第一次扯去体面、超然的面纱，营垒分明、真刀真枪地对阵。另外，也是第一次电台对现场进行转播。通过千万台收音机，美国人民可以听见会场里天主教徒和三 K 党徒之间相互的嘲讽奚落，麦克阿杜的反对者们齐声挑衅似地高喊：“石油！石油！石油！”，会议的主持人想恢复起码的礼仪与秩序，高喊着“你们这群蠢货，给我闭嘴！”但为时已晚，观众的情绪向着纽约市市长阿尔弗雷德·E. 史密斯。史密斯是个天主教徒，反对禁酒，被视为坦慕尼政治机器的产

物。在麦克阿杜的支持者眼中，史密斯在所有问题上都十分可憎；同样，史密斯派也痛恨麦克阿杜。

代表大会开幕那天，悬挂于建筑物通风口外的彩旗营造出一派节日气氛，然而空气中却弥漫着的却是马戏团的味道，尽管马戏团来此地表演已是许久以前的事了。哈里森参议员作了基调演讲，他无关痛痒地宣称，美国需要一位当今的保罗·里维尔^①；不料在场的坦慕尼拥护者错将这个名子听成了“饱饮冷啤酒”，而爆发出一阵喧闹的欢呼——代表大会纷乱的基调就此定下。

序幕过去，一场同室操戈的舞台剧正式上演。一个想在党纲中加入支持国联内容的提议未能获得广泛支持；关于点名谴责三 K 党的提议也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表面上这是麦克阿杜取得的胜利，可结果适得其反，反禁酒者、天主教徒更将矛头直接指向了麦克阿杜。

6 月 30 日，第一次投票。很明显，除非双方妥协，否则没有一个候选人能得到获得提名所需的 732 票。果然，麦克阿杜得 431.1/2 票，史密斯得 241 票，昂特伍德得 42.1/2 票。及至 7 月 4 日（人们猜想代表们已经心平气和地解散之后的一两天）第 69 次投票，麦克阿杜所得票数上升到 530，而史密斯亦上升到 335。为了打破这一僵局，巴鲁克与另一个支持麦克阿杜的富翁托马斯·L. 查德波在独立日这天拜访了艾尔·史密斯，与他商量退出的条件。结果被这个纽约人一口回绝。第 87 次投票，不耐烦的、对投票已然厌恶至极了的民主党人让史密斯领了先。7 月 8 日，经过整整一百次投票之后，麦克阿杜忍无可忍而投降，然而紧接着史密斯的支持力量（其中主要是反对麦克阿杜的）也急剧减少。最后，在 7 月 9 日进行的第 103 次投票中，约翰·W. 戴维斯拔得头筹。

其实几乎没有人真的想选戴维斯。固然，戴维斯是一位著名的辩护

^① 保罗·里维尔，1735-1818，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者，银匠，1775 年 4 月 18 日连夜将英军即将入侵消息骑马驰报波士顿居民使民军得以做好迎战准备，以此而闻名——译注。

律师，曾作过驻英大使，但用威廉·詹宁斯·拜伦的话来说，他“无非是摩根的私人律师”而矣。精疲力竭的代表们又可有可无地选出的威廉·拜伦的弟弟、内布拉斯加州州长、面容可亲的查尔斯·W. 拜伦为副总统候选人。

于是兄弟俩各执一方，哥哥帮助史密斯，弟弟帮助戴维斯，为争夺选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此时的麦克阿杜，漫不经心地对公众发表了一篇声明之后，登上了去欧洲的客轮。

7月9日，巴鲁克也远航开始了他每年一次的例行假期。他赞扬遭受失败的麦克阿杜，也为史密斯鼓掌喝彩，第二天又给戴维斯发了贺电（此次远行的消息上了《世界报》，登在通常刊登绝妙评论的版面上）。巴鲁克对戴维斯没有个人的好恶意见，只是觉得麦克阿杜至少可以做回完整的好人了。可是对民主党，他却彻底失去了兴趣。回想起1922年，他曾对人说过，如果他能改变自己“绝不当领导”的想法，再者，如果他不是个犹太人，或许他本人会寻求党的主席职务，以备战1924年的大选。可是到了1923年，他私下里说当时在位的民主党头头们一个个都“游手好闲之辈”。1924年夏，在费特莱索回忆起发生过的那些事，巴鲁克的结论是，党的领导者的素质已是江河日下。他的感觉是，党践踏了他和他的思想，并只是觊觎着他的金钱。于是他决定，以后不再对党那么慷慨，而且不再从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对克洛克说的一些尖刻的气话几乎不像是他说的：“杰斯·琼斯找我要钱——我想把这事跟你和你的朋友们说说——包括麦克、罗斯福、布里南、马什还有考克斯，你的这帮把我开除出党的朋友们！哼，别忘了，乔·图马蒂还跟我很有交情呢——我一分钱都没给他 [杰斯·琼斯]！”^①

^① 话中提及的人分别为：诺曼·E. 麦克，纽约代表团团长；富兰克林·D. 罗斯福；乔治·布里南，伊利诺伊州代表的头儿；詹姆斯·M. 考克斯，20年代美国政坛上惹人注目的人物。他们都曾反对麦克阿杜——原注

巴鲁克在维希大洗温泉浴，到苏格兰城堡跟人合打了 1724 只松鸡。在城堡里他给玛丽·博伊尔发了份电报，指示她送给美国小麦种植者联合会主席乔治·C. 朱厄特一封党派味很浓的信：“如果能消除柯立芝的敌意，戴维斯凭借其十分令人尊重的真诚可以接受任何允诺”。另外，他试着让自己读一读《纽约世界报》。9 月 23 日，巴鲁克携妻带子乘坐“皇家号”返回纽约，在船上，他否认了有关小巴鲁克（他总是这样称呼他的已成年的儿子）已和好莱坞电影明星卢娃威尔逊订婚的消息。“抱歉，我所能说的是，传言并非实情”。听到父亲如是说，22 岁的儿子在一边羞红了脸。^①

巴鲁克一家回到纽约时，当时的政治形势十分令人头痛。民主党内四分五裂，戴维斯在竞选活动中寸步不让，令他的朋友们深感失望与绝望。面对这样的形势，麦克阿杜痛恨自己放弃得太早，巴鲁克则踌躇不前——至少在主要筹款人詹斯·琼斯眼里是这样。巴鲁克到家一周后，收到了琼斯写来的一封五页纸的特别信函。信一开始便让巴鲁克回想起，民主党曾给予他很多而他自己回报得却甚少。

（有关巴鲁克具有超凡天赋的说法，他写道）你只不过抓住了一次机会就发了大财，上百万美元滚滚而来。但是我在想，你是否能够成为你应当成为的那样的好人。……你指责谢弗[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迷湾（Lost Creek），现任党主席]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指责他在决策时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你总是质疑这个、质疑那个，一会儿说活动多了，一会儿说活动少了，几乎凌驾于委员会之上。其实，你应该比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拿出更多的钱、多许多倍的钱——不仅钱，还有精力——可你却并没有给提名人或全国委员会作出任何表示，就跑到英格兰租了个

^①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巴鲁克称赞儿子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参加巴黎和会时，他写信给在米尔顿学院念书的儿子说：“许多人说你看上去十分英俊，想知道你是否聪明。我总是这样回答，对我的儿子，只有一件事情我很放心，那就是——他不撒谎、不做任何不光彩的事情”。——原注

城堡，享受起逍遥放纵的假日来了。回来之后呢？你仍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却一个劲地批评，拿出来一张小得可怜的支票。

不行——你说过为了争取选票你准备拿出 12 万美元的。如果你真的意使我们成功地获得选票并赢得竞选，而不是意在美化你自己，你就该问问委员会，他们准备怎样使用你所说的这 12 万美元。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的打算，再问问他们的意见，用什么方式能使你的这 12 万美元发挥最大的用途？为什么不把它，或者至少其中的一部分送给委员会？让民主党，而不是 B. M. 巴鲁克，去做那些你所提议的宣传吧。这才是一个伟大的人应该想到和做到的。

最后，琼斯还在信提了一些有侮辱人的宗教信仰的建议：“你应该为你所获得的机会和享受的特权而每晚感谢上帝……而且，你应该请上帝再赐予你一点谦逊的品质，那才是使人得以变得伟大的东西”。

巴鲁克震怒了。以他自己的标准，他已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认为自己的主意每每在残酷的市场中都得到了验证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杰斯·琼斯呢？他的想法将把党带向何处呢？另外，民主党内，巴鲁克即使不是捐款最多的人，也算最多的人之一，甚至在 20 年代初经济极其困难的时候亦是如此。这封信带给巴鲁克的难以言表的痛楚是，仿佛党有权力（且像它自以为是的那样大）、而且正打算一面从他的荷包里掏钱，一面却将他晾在一边。在克洛克的帮助下，巴鲁克写了一封火药味很浓的回信，信中特别提到，他那 12 万美元的唯一附带条件是得到合理使用。然而对这一点，巴鲁克说自己怀疑凭琼斯的能力实在难以做到。“你来信中的无端侮辱令我厌烦”，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但它并非全无价值，因为它恰好可以中止我们之间的一切私人关系，也就免除了我们相处时的诸多尴尬”。

大选来临，戴维斯遭受了比他自己最保守的估计还要惨痛的失败

（或者说，比巴鲁克预见的更惨痛，他为此跟人打赌输了 3000 美元）。数天后，巴鲁克通过捐款 5000 美元跟麦克阿杜的死敌艾尔·史密斯修复了关系。以后数年里，他和琼斯也渐渐互相客气起来。大选刚过，巴鲁克内心里一度对政治产生了极端的反感，但这只是暂时的，到 1926 年非大选年选举前夕，他又对政治恢复了兴趣。他向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基金捐款 46500 美元（其中 5000 美元指定给肯塔其州的阿尔班·W. 巴克利，此人后来当了哈里·S. 杜鲁门的副总统），又从托马斯·F. 赖安处拉来 20000 美元捐款。选举中，巴鲁克直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至少 10000 美元；选举过后又追加了 5000 美元弥补赤字。纽约市的小詹姆斯·W. 华兹沃斯——共和党参议员——跟罗伯特·R. 瓦格纳争夺一个席位。巴鲁克为此跟人打赌，赌前者赢。结果华兹沃斯当然败了北，巴鲁克也输了钱。那年纽约报刊有文章说，巴鲁克本人可能进参议院。这个消息由罗宾逊参议员带到了费特莱索。罗宾逊认为，通常情况下这类事情引不起巴鲁克的兴趣，事实也的确如此。麦迪逊花园广场的那场磨难使他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永远不要让自己卷入总统大选的初选。从此之后巴鲁克只支持整个民主党提出的候选人，而不再支持自己看中的某个候选人。总之，在政治上，巴鲁克决定放弃投机，而改作长期投资了。

至于麦克阿杜，他又回来开始赚钱了，只是仍不甚成功。1924 年底，他设法令巴鲁克对一项修建铁路的计划产生了兴趣，并从巴鲁克那儿借到了一笔钱，第二年却将这笔钱投进了佛罗里达州的一处房地产生意。1928 股市疯涨时期，巴鲁克一次偶然提起一个叫丹尼尔·罗普的人，以前也是威尔逊派的，说他曾经欺骗过他，所以现在很后悔曾帮他赚了那么多钱。麦克阿杜听了深表同情，随即把话题扯开了。

〔他后来却给巴鲁克写了封信〕我想既然你帮罗普赚了“大把大把的钞票”，你对他一定非常友好。的确，这真是好朋友之间互相帮助的最好的方式了。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非常希望你也能用这种方式让我

拥有某些有利可图的东西。要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类事情——钻法律的空子，在那个越来越狭小的舞台上跟职业高手们周旋，讨价还价却只能争取些小微利——我已十分厌倦。所以，如果不是很麻烦，请您考虑一下，助老朋友一臂之力吧！你曾经极其慷慨地贷给我一笔款子，若一切顺利，我希望能够在6个月内还给你。

麦克阿杜很快得到了回音，他如获至宝，于是“我在30美元一股吃进500股极峰公司股太好了，真是太棒了……我本来曾想一下买进5000股的……”然而，当他1941年于77岁上去世时，他只留给妻子埃莉诺·威尔逊·麦克阿杜很可怜的800美元。这位遗孀后来写信给巴鲁克说想找份工作，巴鲁克读后觉得很难过。他对当时在场的威尔逊时代的一个同事约瑟夫斯·丹尼尔斯^①叹道：“这太可怕了！”

第十二章

1928—1933

^① 约瑟夫·丹尼尔斯，美国新闻工作者，外交家，民主党人，曾主编《新闻与观察家报》，支持当选总统，历任海军部长及驻墨西哥大使等职——译注

亲爱的先生：

得知您对皮毛生意颇有兴趣，本人在此冒昧向您提出一个构想，从中您定能获得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希望您看了这一美妙构想后，即刻打电话告知您准备认购的股数。

本公司计划在奥克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港口城市）附近经营一个大型皮猫饲养场，此处土地价格最优。

我们计划先喂养 10 万只母猫，每只猫平均每年产小猫 12 只。其毛皮价格从白的每只 10 美分到纯黑的每只 75 美分不等，按平均每只 30 美分计算，每年可产猫 1200 万只，每天可得毛利 1 万美元。

一名雇工一天可以处理 50 张猫皮，工资两美元。此项生意共需 100 名雇工，这样，扣除工资，每天的纯利润 9800 美元。

我们计划用耗子喂猫，因此需要就近建立一个耗子饲养场。耗子的繁殖速度是猫的 4 倍，因此开始只需养 100 万只耗子，就足以每天给每只猫喂 4 只耗子。同时，我们准备用去了皮的猫肉来喂耗子，每只耗子需 $\frac{1}{4}$ 只猫肉。现在您可以看出来了：这是一桩自给自足、自动运行的买卖——猫吃老鼠、老鼠吃猫，我们坐收猫皮利润。

相信您会喜欢我们提供的这一机会，因为它将使您迅速致富。期待您即刻答复。

谨致以西蒙·古根海姆的问候。

猫咪毛皮股份有限公司

阿肯色州松柏崖

1928.10.1

民主党的戴维斯败给了共和党的卡尔文·柯立芝，令民主党人沮丧

不已，但使人感到安慰的是，股票交易市场牛市再起。巴鲁克敏感地察觉了，并大赢其利。选举后第二天，盖瑞法官发表了宣布胜利的宣言，但因为是星期三而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文中将柯立芝比作又一位伟大的亚伯拉罕·林肯^①，巴鲁克闻出了宣言背后的东西，两天内购买了价值 170 万美元的普通股，包括 3000 股联合天然气、8100 股巴尔的摩 & 俄亥俄铁路、7500 股美国冶炼、8000 股美国钢铁、5000 股南部铁路，以及 5000 股世界制镍。几天后，赶在月底之前，他又吃进 31800 股、价值 210 万美元的各类股票，包括追进 3000 股联合天然气、4900 股斯罗设德、7000 股美国钢铁、4100 股海湾国家钢铁、12000 股北部矿石和 800 股亚特兰大滨线（这还不算他在大选前就悄悄积聚起来的 16000 股瑞丁铁路股票，价值超过 100 万美元）。清晰的预测再加上市场的巨大威力，这番运作光 1925 年一年就为巴鲁克赚进了 1,424,309.57 美元的纯利，当然他同时也亏了 416,768.50 美元，数额不小，但同进账相比，比例适中。这两个数字令他的稿费收入相形之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年他在《亚特兰大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将利润从战争中抽走》的文章，该杂志付给他 150 美元稿费（当然，该文显然又是克洛克的代笔）。

读巴鲁克的自传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他参加公务时便将股票、证券统统抛诸脑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事实，甚至仅从地理位置角度看，一度也足以证明这一点。战后，巴鲁克将自己的办公室从金融区搬到了麦迪逊大街 598 号（1928 年股市狂潮里，他又向市中心挪了一次）。然而同时，股市上的屡屡得手让他愈发不知满足，这也是事实。不仅在股市上，他还一直希望在铁路管理上插一杠子，并为此向巴尔的摩 & 俄亥俄公司频送秋波，但是该公司总裁丹尼尔·威拉德却不为

^① 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美国第 16 任总统、共和党人，当过律师、众议员，就任总统后，爆发南北战争，他采取革命性措施，颁布了《宅第法》和《解放宣言》，取得战争的胜利，战后被暴徒刺杀——译注

所动。

1925 年夏，巴鲁克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巴尔的摩 & 俄亥俄公司董事会成员之一约翰·R. 莫伦。信中写道：“我今年已经 55 岁了，却对纽约中心铁道工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我认为它是一座真正的金矿，股东现在获得的利益远没有达到他们将会获得的那么多……我对纽约中心铁道工程的兴趣是认真的，并且正在逐渐培养自己在这一领域的个人兴趣”。

事实上，巴鲁克本人近期在纽约中心铁道股票交易中已经损失了 9 万美元。他仅保留了 1500 股，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投资。到了 1925 年 10 月，当该公司股价略有上涨，显示能赚取一点薄利的时候，巴鲁克便很快脱手了，从而放弃了又一个插手铁路的机会。

即使证券交易所已经不再是巴鲁克的一切，可它仍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关注着它，并在其中表现得十分活跃（他还帮助其当经纪人的兄弟俩），感到乐趣无穷、收益无穷。在 1926 年这一极不稳定的年，巴鲁克使尽浑身解数从股票交易中赚进纯利 457,597.04 美元，从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获得的远期投资收益不少于 1,936,662 美元。

股票牛市像地震般惊动了几乎每一个人。股市交易所里，后代的福祉跟旺盛的精力、无奈的轻信以及或大或小的财富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职业交易者——尽管他们心里清楚，投机之树不会永无止境——也难免相互猜疑，难逃损失的厄运。从 1906 年至 1924 年，道·琼斯 30 种工业平均指数一直在约 50 点到 100 点之间徘徊，柯立芝赢得大选之后，这一上限被突破了。1925 年即将过去之时，道·琼斯指数达到 157 点，后来在 1927 年下挫至 135 点。正像人们凭常识能够推想的那样，几次往复之后，它又恢复到了正常水平。然而进入 1927 年，道指又开始上升了，12 月 19 日，道·琼斯指数突破 200 点大关。1928 年，显示价格

变化的曲线上扬的角度近乎垂直，终于在除夕突破了 300 点。这样的势头一直延续到 1929 年 9 月 3 日，那一天，指数上升到 381.17 点，但随即，上升停止。接下来的三年，它狂泻的速度跟它先前爬升的速度不相上下，一直跌到 1932 年 7 月 8 日。这天，道·琼斯三十种工业股票平均指数为 41.22 点。

这一空前绝后的大动荡不仅将人们——甚至包括极有远见者——的净利掏得分文不剩，而且还将他们的信心剥夺得一干二净。小弗雷德·施威德后来描述当时的情景道：

“总有一些人作空头，禀性上他们是‘死脑筋’。交易日里，只见他们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冒出某些最终看来是绝妙的主意，在相当晚的时候转而作多头，而剩下的那些人呢，那些在股市崩溃之时还在作空的人却补进太快（然而又有谁会不这样做呢？）。然后，当股价跌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为了获利他们又买进股票（谁会不这样做呢？）。这种情形，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寻求‘清理者’的帮助，在那儿他们的同行可能在早些时候作了某些补救工作。‘清理者’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俱乐部，它是个颇神奇的机构；至 1932 年，每一个曾经作过投机的人都是它的成员”。

前面说过，巴鲁克 1924 年从牛市一开始便入场交易，占据了极有利的位置。然而后来的事实显示，1929 年他从虎背上下来得慢了。其实，其间的这些年，他也时常心存疑虑：公众对股市介入过大，股价上涨过快，股票应该脱手，以防大跌。这就有了他 1927 年的抛空通用汽车一事。

20 年代的通用汽车公司（GM）引人注目、令人向往，其显要的地位相当于六十年代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从 1920-1921 年经济衰退中一个险些被人遗忘的公司一跃而 1928 在年超过福特成为全国最大

汽车生产商，“通用”的股票因而在四年（从 1925 到 1929 年股市大崩溃之前）中价格暴涨了 1000%，足以令所有做该公司股票的空头客跌破眼镜。缘起 1926 年夏，J. P. 摩根公司的合伙人托马斯·考克兰发表了一篇异乎寻常的讲话。他说：“通用汽车公司按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它的股票价格太低。它应该并且将会比目前价格高出至少 100 点”。这本属于大户之间的内部消息，即使和记者探讨也属不被公开发表的内容。所以当这样的谈话一经公开，且和一个摩根公司合伙人的名字联在一起，几乎令所有股票交易商的眼睛都突了出来。于是很自然地（但在做空者想来，这是人为设计的圈套），通用股票价格猛涨。

这件事发生在 8 月。10 月，一场强度不大的衰退开始了。11 月，巴鲁克第一次做空头：他以每股 150 美元的价格，通过他弟弟的公司——西林·W. 巴鲁克合伙公司——卖出 3000 股通用；第二年，1927 年 1 月，他又抛空 12000 股，此时每股的价格已高达 155 美元。

既然作空头了，巴鲁克时刻期待着从股市传来通用股价下跌的消息。可是，事与愿违，2 月里，其股价继续上涨。巴鲁克不得不承认自己看错了，便以每股 160.1/4 美元的价格买进 8000 股，但不多久固执己见的他又卖出了 1000 股。

3 月，股市形势更加乐观，股价一再创出新高。月中，巴鲁克又买进——这是补足空头以减少损失的惯常作法——但月底他又改主意了，又开始卖出。他以每股 176 美元的价格抛出了 26000 股，但股市依旧没有顺从他的心意，他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再买回。

这样的循环往复——卖空、期待跌价、以更高的价格买回——在整个 7 月里一直进行着，直到他最后一次买入，价格是每股 213.1/2 美元，比前一年 11 月他第一次卖出时高出了 63.1/2 点。这一仗，他的损失高达 405,432.50 美元。所以，三月里，他跟潘兴将军谈话时承认：“一段

时间以前我跟你说过，我已经跟不上市场了。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恢复过来，所以没法提供给你任何有意义的建议”。

1928 年 5 月，平均指数依然直升，同时，为秋季总统大选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巴鲁克将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闹市区。几乎同时，他却把自己的家从与第五大街紧挨的西 52 号街搬到了第五大街与 86 号街的会合处即离市中心稍远了些（他和安妮考虑把家搬到那个街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开始，他们于 1909 年买下了 86 号街北头的两个地段，但是又在 1915 年将它们卖了）。于是，他的工作地址便变成了：百老汇大街 120 号，公正大厦（Equitable Building）第 31 层。这个地址清楚地标志着——又正是他担心的——他的职业生涯从公务回到了投机。这里有个难题：如果一个人一方面只用现金交易，不付押金，避免参加集合基金之类招人耳目的活动，另一方面他既作长期投资又作短期投机，同时在 26 家不同的经纪行留有帐目这样的人究竟能不能被称为“市中人”？（生意的分散可能意在保守他的秘密。在 H. 汉兹合伙人公司——这家合伙公司由巴鲁克的哥哥赫曼·巴鲁克领导，他曾为该公司介绍过相当多的生意——职员们对巴鲁克这个名字都讳莫如深。除非提及交易所里的各种消息，否则绝口不提。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到他，常常用帐号——19 号代替）。巴鲁克不希望公众对此有何异样的看法，就主动放出半真半假的话来，说自己到市中心确是为了赚钱，但不是投机。《纽约时报》坦诚报道说：“他无意到交易所里作生意”。

的确，巴鲁克已经许久没有在新约证券交易所里露面了。同时，他让自己留下明显的从事公务活动的印记。1927 年 11 月之后，他进入巴尔的摩 & 俄亥俄铁路公司董事会（他终究得到了威拉德的同意）。就任这一董事席位之后，1930 年春，在西蒙·古根海姆的邀请下，他又盛情难却地加入了美国冶炼公司董事会。

正当 57 岁上的巴鲁克最终进入企业的时候，46 岁的赫伯特·贝阿

德·斯沃普却决定放弃这种生活。1928 年秋，这位执行编辑一天突然对自己的妻子说：“我不想再当打工仔了”。于是，这位十分富有的编辑就这样辞去了《世界报》的工作。股票交易曾让斯沃普发了财，他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不会用言语去中伤它一丝一毫。1929 年初，当托马斯·查德波对斯沃普表示自己对股价之高的担忧时，后者安慰他道：“快别自寻烦恼了，我们正应该赶快坐到驾驶员的位置上，来个潇洒之旅！”话虽如此，可是狡猾的斯沃普却从不单独进场，总是跟一群人一起。他和经营出租车业务的大亨约翰·赫兹、做广告生意的阿尔伯特·D·莱斯克以及巴鲁克四个人共用一个佣金户头。斯沃普做股票生意的资本主要是他认识的一些人：首先是他的弟弟、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杰拉德，另外还有一些著名的企业界人士，比如约翰·J·拉斯考伯、查尔斯·M·施万勃以及沃尔特·P·克里斯勒等等。这三人 1929 年春天很热心地提携他在美国广播公司联合基金中一块儿赚钱，尽管他在投资时一分没掏。作为回报，斯沃普养成了个有趣的习惯：每每下大注打赌，他总是用他的朋友们的名字，而且直到赢了或是输了之后才告诉他们。斯沃普在长岛的沙点（Sands Point, Long Island）买了占地 13 亩的一处房产，七个车库、全天候网球场、距离海边仅 1/4 英里（周围全部用钢索环绕，钢索是他从贝瑟汉姆钢铁公司总裁尤金·格里斯处直接订来的货），另外还有一个小池塘，咸水塘，池塘边装有直拨电话。

1929 年的斯沃普没有正式的工作，但证券交易所足以占去他所有的时间与精力。同时，假以时日，这一业余爱好还是十分有利可图的。年初，他去棕榈滩过冬之前，给秘书海伦·米拉留下指示：每天中午去巴鲁克和莫顿·施沃茨处报到，了解最新股市行情，有重要内容就传到佛罗里达告诉他。二月里，巴鲁克给他发了份电报，表明当下自己心里的不踏实：“了解情况的人（比如 J.P. 摩根公司）认为股市完了。我个人准备静待事态的发展，因为我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由于不了解当前

局势，对工业复兴仍有信心”。有的时候，双方信息的传递亦会反向进行，斯沃普也偶有消息给巴鲁克。例如 1929 年 3 月 21 日，一封兴奋不已的电报向北发来：“真正内部消息——‘金士-萨奇贸易公司’（Goldman, Sachs Trading Corporation）的股票将再涨 50 点。消息绝对可靠，只想让你知道。给你我最好的祝福，赫伯特”。虽然电报中提到的股票那天的确涨了，涨 1.3/8 点，达到 119 点，但第二天便开始了一路的下滑，7 个月后跌到 32 点。3 月 22 日，南方又来了一封电报：“最新消息，通用电气一季度生产增长超过 40%。绝对令人吃惊。我必须买一些它的股票。想念你的，赫伯特”。这一消息应该是权威的。可一个月后杰拉德·斯沃普宣布的数字证明，他的哥哥把公司成绩扩大了。一季度的利润只增长了 23%。

巴鲁克知悉斯沃普钟情通用电气股票的那天，他从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对过于膨胀的信贷需求忧心忡忡，担心高峰过后会有低谷。银行的这一警告令巴鲁克感到寒心。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认为，1927 年夏（正是他准备结束通用汽车股票一役的时候）联邦储备委员会所作的将银行贴现率由 4% 降为 3.5% 的决定应当对目前的投机热潮负相当大的责任，现在对这一由它自己推波助澜出现的局面进行严厉的谴责是不合适的。几天后，全国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总裁查尔斯·米切尔公开重申，他的银行的政策始终是，以较高的利息贷款给股票经纪人、投资者以及投机商。无论如何，巴鲁克支持他。在写给米切尔的一封信中，他称 1927 年下调贴现率的决定是“错误的和不明智的”，他批评了联邦储备局里的亲英派主张，^①“我知道你

^① 英国 1925 年对金制进行了改革，实行一种后来被证明估价过高了的汇率，以致造成黄金流失，出口剧减，1926 年其经济遭受全面打击。英国政府面临两种痛苦选择：第一，实行通货紧缩政策，降低国内商品价格，使其在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第二，禁止一经客户要求即将英国货币英镑兑换成黄金的作法。正在此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次行动为他们提供了出路。由于降低贴现率，美国银行利率也随之下降。一时间，对投资者来说，伦敦比纽约更具吸引力：大西洋两岸一度完全西行的黄金终于又开始向东旅行了。

事实上，联邦储备委员会执行的是一种竞争性通货膨胀政策。政策施行前一个月，即 1927

不愿意这么说，因为这样说有点过分”，他写道，“但我要说，我觉得联邦储备制度并没有赋予这帮人跟外国政府缔结有关出售黄金的协议的权利，这是私人银行和私人银行家的事”。

然而，尽管心存种种疑虑和偶尔时机不当的卖空，总体而言，巴鲁克在生意上是显牛市的。20 年代中期开始，他仿佛预见“工业复兴”即将到来。他说，如果赔款问题能够解决，自由贸易政策得以保存，就会有惊人的繁荣。可到头来呢？赔款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贸易保护主义阻碍着国家间商品的正常流动，但是这一切无法改变巴鲁克对自己观点的执着。1929 年初，弗兰克·肯特拜访赫伯考，聆听了一番主人对工业复兴的高见，经过提炼加工，竟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系列的专栏文章论述这一理论。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巴鲁克持乐观态度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美国即将对德国采取的一项行动——一个由欧文·扬格^①和 J. P. 摩根率领的代表团将访问德国，以最后确定德国的欠款数额，寻求动员国际社会的资本投入以帮助其偿还这一债务。将会发行某些债券，收益用于资助德国向前协约国还债，然后，接下来，这些协约国就能够偿还它们欠美国的钱了。

肯特的文章说，财经界要人估计，这一计划的成功将引发“一场以前历次工业兴盛都无法比拟的工业大繁荣”。他写道，股票市场实际上已在拭目以待。他接着阐释巴鲁克的观点：“那些大人物们相信，扬格

年 6 月，委员会只掌握着价值 3.98 亿美元的财政债券，而到 12 月，它的资产增加到 6.06 亿美元，6 个月增加了 52%。这不仅为银行体系本身提供了新的基金，也为经纪人们提供了新的贷款来源，也因此，1927 年下半年的信贷增长超过了正常的商业需要。当时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委员阿道夫·米勒后来严厉谴责这一政策是“.....过去 75 年中，储备委员会及任何银行系统所犯的代价最大的错误之一！

经济历史学家们大多对此不能苟同，但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同意巴鲁克的这一观点“.....1926 年 6 月至 1928 年 6 月银行资产的充分增长是 1927 年放松银根的结果，而这一增长事实上仅用于投资及向证券贷款了.....”——原注

^① 欧文·扬格，1874-1962，美国律师和企业家，曾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参与制订一战后有关德国战争赔款的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译注。

和摩根能胜任这一工作，这些结果即将出现，他们觉得现在事情已经‘搞定’了。股市下意识里预见到了‘工业和复兴’的到来——这是一位一言九鼎的人物对它的说法。他和他周围的人们看到前方是一片比过去五年的情况美妙得多的繁荣”。^①

3月底，股价（指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停止上涨，突然从320点跌到300点，紧接着的4、5月一直缓慢下滑。6月里，正当股市即将再次攀升时，巴鲁克发表了一篇后来被证明最不灵验的预言。他借着和时事评论家布鲁斯·巴顿谈话的机会，强调自己清晰地看见由赔款问题的完满解决带来的繁荣景象即将到来，同时赞扬了世界范围内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

（以下为巴鲁克的原话）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我们有坚实的理由期待长久的和平；这是第一次，各国的商人能够获得由统计得来的信息、伴随以对有关经济法的真正了解；这是第一次，所有国家都建立起稳固的、集中化的银行体系，而且这些体系间正进行着密切的国际合作。所有这些有利因素，再加上世界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与渴求，使我对“工业复兴”笃信不疑。在美利坚合众国，它已初现端倪。

1929年6月底，巴鲁克开始了他一年一度的欧洲之旅。这段时间，他通过斯沃普掌握着股市的最新动态。而后者呢，则端坐家中，密切关注着每一点涨落，同时集合起一支越来越大的队伍，同伴间信息传递极为迅捷。时而，一封带着令人兴奋的好消息的电报飞到巴黎，是关于一家汽水公司的；时而，透露阿莫尔合伙公司（Armour & Company）内部情况的电报飞向卡尔斯巴德（美国新墨西哥州东部城市）。8月初的一天（地点不详，可能是在费特莱索），巴鲁克收到一封令他宽心的电

^① 除了给肯特提供写作的素材，巴鲁克时刻不忘经营自己的“投资”生意。专栏文章刊出后，巴鲁克很快通知这位作者，他在股票交易中获利900美元。“这的确不是一个‘大人物’应该做的”，巴鲁克写道，“不过——可以把它称为‘通过内部消息轻松得到的一笔小钱嘛’。肯特承认，这是他得到的最轻松的一笔“小”钱——900美元！——原注。

报，意在说明前一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贴现率下调（从 6%降至 5.5%）的举动将不会产生实际的伤害。电文内容是：“绩优股安然无恙。联邦储备委员会完全不了解公众心理。这一行动会限制交易量，但不会影响实际价格”。9 月，巴鲁克乘船返美，在船上发给斯沃普一封极其简短的电报：“新上市的莱姆股票是好货，代向玛吉问好。伯纳德”。“莱姆”指的是莱曼股份有限公司^①，原是一种共同基金，与其同名的投资公司正将其股票上市。玛吉是对斯沃普的妻子玛格丽特的昵称。

从巴鲁克的自传来看，他预见了大崩溃的到来从而及时将股票脱手避免被套。有一位传记作家，虽然他不可能详细地记述巴鲁克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处理手头的股票的，但他特别点明：他的主人公之所以后来在经济事务方面享有极高的声望，1929 年表现出的过人的洞察力起的作用最大。

股市崩溃之后，他当然丝毫不显受伤之态。第一次大震动之后的 1929 年 11 月初，他向参议员乔·鲁宾逊建议，政府应立即着手规划公共建设工程以防止严重的失业现象。提出这一建议之前，他拿出了 1000 美元作为给他的竞选赞助（支票是 10 月 29 日寄出的，那天道·琼斯指数大跌 30 点，许多华尔街的经纪人都只顾忙着接听、或是拒绝接听询问行情的电话呢）。12 月，他向纽约市犹太人联谊会捐款 10000 美元。这确是一份贵重的礼物，只是跟他的个人收入比起来不值一提。1929 年，他的总收入达到 1,986,995.63 美元，其中股票收益 615,786.31 美元。

大崩溃后衰退的数年内，巴鲁克一直没有明显受损的迹象：他依旧去国外度夏、资助有意义的事业、作慷慨的政治捐助等等。1930 年 8

^① 莱曼，全名为赫伯特·亨利·莱曼，美国金融家，民主党自由派的主要代言人，曾任纽约州州长和参议员——译注

月的第一个星期，他在英国拜访了温斯顿·丘吉尔^①，9月的第二个星期，他又回到了美国（此时，道·琼斯指数已跌至243点，还在下降。失业率已升至9%，还在上升）。他开出一张35.26美元的支票给滨冰公司（Riverside Ice Company）、一张594美元的支票给大都市歌剧公司（Metropolitan Opera Company）。他向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捐款4万美元；另外，座落在切萨皮克湾（靠近美国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杰弗逊岛群俱乐部（Jefferson Islands Club）是民主党人休憩、躲避外界干扰的圣地，巴鲁克深知自己对它承担的义务，也从不逃避。1931年，他向南卡罗来纳州食品研究委员会额外捐资13000美元，以支持他们开展一项调查，研究他家所在州的土壤及运输作物中碘的含量。他不仅大方地借钱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有的时候即使当事人不张口，他也会雪中送炭、借钱救急。他的侄女弗吉尼亚·埃普斯坦为自己的一个朋友找他请求一笔贷款，之后，他便每个月寄给她100美元（小姑娘抗议说，不是她自己需要那笔钱，但一百美元仍是每月定时寄到，直到玛丽·博伊尔自作主张停了下来才罢休）。在英国，温斯顿·丘吉尔的朋友们设立了一个基金，用来给这位未来的首相购买一辆“能够买到的最好的劳斯莱斯”，巴鲁克当仁不让，给基金增加100英镑。巴鲁克住在南卡罗来纳州赫伯考时的邻居，名叫汤姆·约基，他是波士顿红袜厂的厂长，两人常常一起给附近的穷人分发食物。1932年，他为这支付自己处于闹市区的办公室的各种花销，花去86716.07美元，但在这一年总统大选前后，这里被免费用作民主党的民意调查中心。1932年7

^① 巴鲁克在一战后的凡尔赛和会上结识了丘吉尔，之后，他一直希望将两人的友谊保持在讨论重大事件的高度。此番回到美国后，他给丘吉尔发了份电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措辞，表达自己对所受到的热情款待的谢意：

在你处逗留一周给我留下的美好回忆，我将永远珍藏。我十分了解英国以及她的人民、她的传统，并真诚希望新的繁荣与幸福将会降临给她，以使她继续为整个世界做她长久以来一直在做的贡献。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和你们的国家能够携手共同承担摆在我们面前的重任。我同意道威斯将军的观点，拯救人类文明与自由的诺亚方舟深藏于对英语国家的更深了解之中。请向所有人致以我万分的谢意和最亲切的问候——原注。

月 18 日，即股市跌及谷底之后不到两周，他的妻子安妮·巴鲁克从班克斯信托银行（Bankers Trust Company）外汇部申请了价值 25000 美元的信用证，准备夏天去欧洲旅行、购物之用。

所有以上无分巨细的叙述只想说明一点：伯纳德·巴鲁克确如其本人所暗示的那样深有远见。据他本人说（后来被许多人反复讲述），他是在苏格兰度假时，得到有关股市情况不妙的消息的。于是他即刻起程返美、出售股票、等待不可避免的可怕的后果。

1929 年夏末他究竟握有哪些股票？一个月接着一个月，无数家公司停业清帐，他还“捂”着哪些股票？股市爬到顶峰和跌到谷底时他所拥有的股票价值各是多少？整个过程中他是怎样处理自己的财产的？如果能知道这些，那该多么有趣！可惜并非所有答案都唾手而得。比如，虽然我们可以得到他 1925、1926 及 1929 年收入调节税的报税表，但是 1927、1928、1930 以及再往后的则无法得到。他留在经纪行的记录倒是数量不小、内容广泛，以前不曾被发现，但是 1929 年的记录可能是完整的、也可能不完整，而 1930 至 1932 年的记录则肯定是不完整的。

尽管数据无法搜集齐全，但是我们仍可以对主人公提出某些异议。沉甸甸的证据表明——他没有全部、及时脱手。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工业复兴乐观主义者，他低估了股市崩溃之后数月的形势的严重性，因而很晚才卖出股票（太晚了，以致于 1929 年的报税表竟然显示的只是他的股市收益——他到报税时还没脱手，所以损失显示不出！）。可是另一方面，他也试图从“清理者”的角度讲话。他没有让自己冒太大的风险，清帐开始之前他抑制了自己大规模买进股票的冲动。美元贬值之前，他极有先见之明地购进黄金及金矿的股票。他并非“神仙巴鲁克”，但那可能是他唯一不能胜任的称号了。

让我们重新回到故事的主干：1929 年 8 月底，巴鲁克正在苏格兰

度假——蹬着结实的靴子、套着毛衣、披着苏格兰花呢装，肩扛猎枪，他终日以这般形象在沼泽地边逡巡，耐心地找寻着野鸡。打猎的收获一般——原本设想能打 1600 对松鸡的，他和客人们最后只打到了 306 只——他的注意力不甚集中，经常被传来的各种消息分散。不过，他的情绪是乐观的，通过电报进行交易，做多头。8 月 16 日，他以每股比 30 美元略低一点的价格购进马里兰州硅胶股份有限公司股 700 股。其实 3、4 月里他买过这一股票，价格高达 45 美元一股。之所以买它，是因为事实上他不可能不注意到，在平均指数的强大作用下，只有小公司的、交易不甚活跃的股票，其颓势才不十分明显（的确，从广度或者从上涨与下跌的股票的比例的角度看，股市的下沉从 1928 年 5 月便开始了）。在苏格兰，巴鲁克时常感到自己与股市失去了联系，需要了解在现场的人的看法，于是他给花旗银行董事会主席查尔斯·米切尔发电报，征询他的建议。

巴鲁克跟米切尔一起打过桥牌，曾邀请他到费特莱索作过一次客，打打猎，印象里他是一个十足的银行家。巴鲁克对他的意见的尊重不是随便说说的，经受过严重的考验。1927 年，这一尊重令他损失了整整 100 万美元。米切尔引起他对一家古巴糖厂的投资兴趣，投入风险资本^①。不料后来工厂倒闭了。米切尔的脑袋长得大大的、杂货铺似的，言谈举止很有个人特点。他的个人事业从站在银行外出售证券开始，从 4 个人发展到 1400 个人，在 55 座城市建立了分支机构，并成功地向人们灌输了这样的理念：只有推销员，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独具发现潜在投资者的慧眼。股市崩溃前，人们叫他“查理大帝”^②；崩溃之后，他被嘲讽为“光光查理”（Sunshine Charlie）。他和巴鲁克一样，不愿意受任何教会的束缚。且两人都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它具有重振繁荣的巨大潜力。两人的不同点在于，米切尔是冲动型乐观主义者，结

^① 指股东用于重新投资或购买新股票的那部分收益——译注。

^②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译注

果 1929 年的股市崩溃令他一无所有（但是他令人钦佩却不甚明智地拒绝宣布破产，而最终偿还了所有债务并建立起另一份产业：经营投资业务的布里斯合伙公司，他任总裁）。所以，8 月 21 日，当巴鲁克收到米切尔打来的态度乐观的电报，了解对方性格的他丝毫不感到惊奇：

整体形势看上去格外稳定，只有不多的几处（例如橡胶）情形不好。信贷状况基本未受贴现率下调之影响，请放心。货币适时疲软，应该会在月底重新坚挺。证券市场价格的集中于走俏的股票，相当一部分的价格高得不正常。同时，另有相当多的股票，如铜、汽车、某些铁路等，价格低得不甚合理。我怀疑，有些因素虽然不会影响企业但会影响股市，毕竟后者是经济繁荣与否的风向标。但总之请您相信，现在的状况没有您离开时那么悲观了。

巴鲁克立即回了一封电报，一表示谢意，二询问细节。第二天米切尔来电告知，汽车股票前景不错，森蚺公司（Anaconda）（米切尔本人是该公司董事会成员，且他的银行在该公司的投资非常可观）股票“即将”上涨。

这个消息在巴鲁克脑中翻来复去之时，他正和潘兴将军在费特莱索的泽地边散步。将军到他这儿来住了些日子、打了打猎，马上将去法国（第二个月，亚历山大·伍尔考特在纽约报道说，将军在费特莱索被巴鲁克的另一位客人理查德·里顿的猎枪误伤，擦破了表皮；巴鲁克听说后道，如果真有这样的事，他不可能不知道；可他的确不知道，说明绝无此事）。巴鲁克后来记述说，两人正散着步，一种不祥之感突然向他袭来。他立即收拾行装，准备提前返回纽约。可是，假如说他在城堡里便卖空了股票，或是在回国的船上卖空的，都没有有关的记录以作证明。有记录可查的是，9 月 5 日即道·琼斯平均指数达到其 1929 年的最高值两天之后，也即巴鲁克从南安普顿（英格兰南部港口城市）登船的前一天——他还买进了 5400 股美国辐射、1000 贝瑟汉姆钢铁、1300 股联

合股份，共计价值整整 50 万美元的普通股票。此外，他是意外、偶然地突然离开苏格兰的，还带着'惊恐'的感觉，对此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乘坐的客轮 9 月 13 日、星期五停靠纽约港，第二周的第三天、9 月 18 日，他参加了巴尔的摩 & 俄亥俄铁路公司董事会的例会。巴鲁克回到美国不过数日，米切尔乘船去了欧洲。巴鲁克给他发了份电报预祝一路顺风，言辞间看得出他轻松愉快：

银行小伙子们齐声高唱的欢送歌透过窗户传到我的耳边；噢，是不是我们快乐的查理出发了？祝愿他迷失在海上的雾阵之中，逍遥不知身之所在。

巴鲁克回家不到两个星期便买进 5000 股莱曼，还作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卖空：通过跟斯沃普共用的户头，他卖出了价值 200 万美元的 2 万股美国广播公司股票。虽然这一股票是股市的顶梁柱之一，但是他俩都认为，没有它，他们的投机大厦亦能立得住（在此之前，斯沃普多次跟欧文·伯林^①说，广播公司股票会涨。他自己把这一股票抛空之前，他又极周到地给了这位作曲家明白的示意，让他立即抽身）。然而，何止广播公司股，大部分股票的价格都下跌了。仅 9 月 27 日一天，道·琼斯平均指数就下挫 11 点，跌到 345 点。跟后来的情况相比较而言，这一幅度不算大，但比起 9 月 3 日的最高点，已下降了 9%。现在巴鲁克决定抛出美国极峰（National Acme），他以每股 33 美元的价格抛出 1300 股，比他 8 月买进的价格每股低了 3 点。仿佛为了警告身边的人，巴鲁克售出了些股票，但到此便停止了。致命的 10 月到来之后，他从第一天便开始了新的买进。10 月 1 日，他从伦敦交易所购进一家名叫罗得西及刚果边境（Rhodesian Congo Border）的铜矿公司股票 1400 股，同天售出“广播公司”3000 股。10 月 3 日，道琼斯平均指数一天

^① 欧文·伯林，1888～1989，美国作曲家，曾为美国百老汇的歌舞剧、音乐娱乐节目及大型音乐歌舞剧电影谱曲，著名作品有音乐喜剧《安妮拿了你的枪》——译注

猛挫 14 点，跌至 330 点以下，这是不妙的征兆。10 月 4 日，指数曲线继续下滑，可是巴鲁克仍坚信会涨，继续吃进：米切尔支持的股票之一“森蚺” 2600 股；“美国冶炼” 700 股；甚至开始补进“广播公司” 2700 股——逻辑不变：会涨！我就这么干！

10 月 8 日，巴鲁克敏锐反应，脱手“森蚺”，赚得 8000 美元，但卖出“美国冶炼”时略受损失，紧接着又抛出“广播公司”。10 月 15 日，米切尔在伦敦宣称“.....美国市场现在整体上是健康的”。第二天，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大胆作了一个很快被证明是不朽箴言的预测：“股票价格已经达到最高点，永远不会再高了”。如果说巴鲁克不同意这些观点，但他也不强烈地反对。10 月 21 日，“黑色星期四”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他和斯沃普以买进 1700 股“美国广播公司”股票结束了一系列的卖出行动，两人各净赚 100,584.22 美元，因为他们当时的卖出价为 93 美元左右，可买入时每股已跌到了 83 美元。尽管巴鲁克警告斯沃普说，他们可能买进、或者说“补进”得太快了，但当时的他无论如何无法知道有多“快”，“快”了多少。11 月 13 日，“广播公司”股票交易价跌到了 $28\frac{3}{4}$ ，1932 年，谷底里的它每股 $3\frac{5}{8}$ 美元。

10 月 22 日，星期二，潘兴将军焦急万分地从巴黎发来电报：“机密。你对目前局势看法如何？你打算卖还是买‘森蚺’？如果卖出，你接着买进什么？请回答”。答复几乎立刻就到：“我就这么干！巴鲁克”。他确实这么干了：买进 1800 股“美国冶炼”、1400 股华纳兄弟公司（Warner Brothers）股票。

根据他以往的“华尔街经验”，货币市场出现问题或发生令人瞩目的破产事件往往是股市恐慌的预兆，可直至目前并无此迹象。的确，证券交易所当时的副董事长、后来升任董事长的理查德·惠特尼也说，此次股票市场崩溃的古怪之处在于，货币市场全无动静；至于是否发生了

非农业性破产，迟至 1929 年 12 月，花旗银行依旧敢信心十足地说：“尚未有重大破产，将来也不像会有”。

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巴鲁克本人的变化也不比它小。战前，他充其量是个单打独斗的投机商、风险资本家，然而到了 1929 年，他已成了羽翼丰满的现有权力机构的成员：既是企业董事、又是前政府高级官员，政坛举足轻重的知名人士；他究竟属于哪种人呢？举个例子，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莫瑞·巴特勒打算邀请五位名人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企划该大学的未来发展，“巴鲁克”是他首先跃入脑海的人名之一。1929 年 12 月，巴鲁克给温斯顿·丘吉尔写了封信，透露罗得西亚铜矿内情，因为他二人都握有相关股份。信中写道：“……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有人带头，将某些大企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大部分利益及其带来的富裕、安适作为追寻更高目标的基石，而非仅仅个人的自私的动机”。意思是，开明的企业主绝不会只满足于赚钱；他，巴鲁克，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商人，天生具备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然而正是这一乐观主义，却使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10 月 23 日的这一个星期三与星期二的情况差别会如此之大，更不会想到星期四跟星期五又将是两个世界。

那个星期三，股票交易所疲软得令人吃惊。“广播公司”股票跌至 68.1/2 落 11.3/4 点；“电信”，落 15 点，跌至 272。“亚当斯特快”(Adams Express) 是一家信托投资银行，前 24 个小时还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一刻却突降 96 点，跌至 440。道·琼斯指数下跌 21 点，打个比方，这相当于某股票从 5000 点的高度下落 300 点。事实上，从开盘到收盘，这一落幅比第二天、即臭名昭著的“黑色星期四”的落幅更大。只是，星期四，一切有条不紊的假面都丧失了，人们变得惊惶失措，近乎歇斯底里。为了平抑这一心理状态，中午过后不久，一群银行家钻进 J.P. 摩根设在华尔街 23 号的办公室，商议以什么姿态支撑股市。数分钟后，银行家们鱼贯而出，新闻界的记者们又被带了进去。曾参加过巴黎和会、

现今已成为摩根财团形象代表的托马斯·莱蒙特故作轻松地对记者们说：“股市的情形有点紧张，我们已经召集了几家金融机构的首脑开会讨论当前的形势”。他拒绝透露会谈细节。下午 1:30 左右，理查德·惠特尼以摩根的场上总经纪人的身份（他是接替亚瑟·豪斯曼担任这一角色的）出现在交易大厅，为数位银行家大量购进股票。他做得那么神气、夸张，以致于骚乱的人群一时沉寂无声。巴鲁克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买进 2000 股“森蚺”、买进 400 股“华纳兄弟”、买进 1000 股“美国冶炼”（这是他在 1931 年 12 月 16 日之前最后一次留下购进“森蚺”的记录，价格是每股 9.1/2 美元，而黑色星期四他为每股“森蚺”付了 104.1/2 美元）。收盘时，道·琼斯指数已跌到 300 点之下，但“下”得不多，比前一个交易日降低了 6 个百分点。此时，回想前一天星期三，仿佛已经很久远了。

星期五早上出版的《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与它紧挨着的是一篇有关贝瑟汉姆钢铁公司收入猛增的报道，下面是一篇写给棉花种植者的激励性文章《期待更好的棉花》）是关于股市的一篇社论，标题颇不吉利：《潮流的逆转》。文章说，星期三工业股票平均指数的颓势进一步确定了周一铁路股票的下跌之势，那么，根据已故的查尔斯·H·道的理论，熊市控制全局。在倒数第二段里，隐去真名的社论作家威廉·P·汉密尔顿评论道：“在华尔街交易的人以及在全国各地交易的人中许多不曾见识真正的熊市”。那么这一次，据推测，他们将会继续遭遇令他们不快和吃惊的事。巴鲁克固然不是个初出茅庐、盲目乐观的人，但无论如何，他选择买进。他挑选了一家自己了解的公司——“美国冶炼”。星期五，他吃进 5500 股，从而将其在过去一周内的吸入量猛地提升到了 8500 股，约值 83.5 万美元。星期五，股价略有反弹；星期六，又略有回落；星期天，百老汇大街停满了汽车，经纪人们蜂拥进办公室打出报信的电话（一时间，新的时代仿佛即将开始，坏消息的传播者还能开

得起车上班!)。对银行家们进行干预的信任占了上风，已经有人在谈论星期一将会跌停回升。

事与愿违，代之跌停回升的是灾难性的下跌。道·琼斯指数暴跌 38 点，下降 13%，以比 260 点略高一丁点的价格收盘。巴鲁克也售出了一些——2500 股“美国冶炼”以及价值 2.3 万美元的法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可是，他又从伦敦市场购入“罗得西亚与刚果边境”补足了。那天晚上，在他座落于第五大街的家中，他设宴款待温斯顿·丘吉尔（他是到美国来访问的，也未躲过在股市里丢钱），同时，被宴请的还有斯沃普兄弟、赫伯特和杰拉德，以及花旗银行的米切尔、切斯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董事会主席阿尔伯特·H. 威金、贝瑟汉姆钢铁公司总裁查尔斯·施万勃、“森蚶”总裁约翰·D. 赖安、尤金·梅耶和托马斯·莱蒙特。

在场的社会名流还有巴鲁克的另一位银行家朋友，第一国家银行（the First National Bank）董事会主席乔治·F. 贝克，这个人，据《纽约时报》估计，当天，仅因其持有的三种股票——他自己的银行、“电信”和“钢铁”——的价格下跌，便损失了 1473.7 万美元。

当晚晚些时候，米切尔向“我亲爱的前百万富翁们”致了一篇诙谐的祝酒辞之后，谈话转入严肃的主题——拯救股市。当时的气氛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得到了较完整的记述，信是赫伯特·斯沃普写给他的同伴约翰·赫兹的：

我相信形势会向好的方向转变，所以我下决心抓牢手里的股票，并认为你也应该这么做。在巴鲁克家的聚会上，与会人士的共同看法是：……目前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人绝不是孤军奋战，同时他们可以坚信股市必将恢复到比现今价格肯定高得多的价位（不论过去的牌价是高是低），而因此给他们自己带来巨大收益。大家已为集合基金的运作进

行了安排。有重要消息告诉你：明天“西部联盟”可能开始具体行动。今晚或明天将制定计划组织强大的购买力量。因为以上原因，同时相信你会允许我代表你行事，所以我要求哈里斯·温恩罗普暂时不动我的“西部联盟”股票。今晚发生的明显的、可喜的变化是：人们又开始谈论怎样赚钱，而不是总亏钱了。

巴鲁克的客人们对股市形势判断都过于草率，只有一个人例外：威金。他恰好没有自己银行的股票，因而这场灾难于他有既得利益。第二天星期二，10月29日，股票交易量创下记录，但道·琼斯平均指数狂泻了30点。“森蚺”跌8.1/2点，至每股85美元；“美国冶炼”掉6点，至每股84美元。至于金士及萨奇贸易公司股票，头一年3月卖到119美元时斯沃普仍相信它会涨，当天在场外交易中大跌25点，以每股35美元收盘。当天巴鲁克的情况是，他感觉抛售高潮出现了（其实因为他不在现场，而记录现场情况的胶带纸晚了两个半小时），便买进1000股“精炼”，5000股“钢铁”（可以肯定，施万勃在巴鲁克家作客时肯定又重复了他前一个星期五对美国钢铁学院作演讲时表达的观点，即“我跟炼钢业打了长时间的交道，从没看到它像今天这样稳定和有希望”）。星期五斯沃普通知赫兹：“我真的相信，最糟的时期已然过去”。两天后，这位前执行编辑的股票净值萎缩至负2,345,000美元。

巴鲁克也相信一切正在好转。那个时间前后，他对莱曼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之一、罗伯特·莱曼说，趁着股价便宜，他应当将现金变为普通股票，这几乎是他的信托义务（好在莱曼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真是有关现金的主人的幸事）。10月30日，他对他的朋友、一个名叫乔治·阿姆斯比的加利福尼亚商人说：“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且股价也下降了，降到我们能够抱着真正的信心做生意的水平上。接下来的60天生意可能很糟糕；但在这个国家，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很久，刚好‘久’到让我们布置好完善的投资格局、为繁荣的到来作好准备”。那段时间，潘兴

将军一直呆在巴黎，他无可奈何但是心急如焚。11月6日（自10月22日至这一天，道·琼斯平均指数已经下降了29个百分点。巴鲁克要求他有耐心）他发电报询问他自己的利润能否保证，巴鲁克回电让他放心。第二天，股价在一开盘的大跌过后略有回升，巴鲁克激动地给约翰·莫伦发电，作出预言：

看上去，一切技术性的和必须进行的清帐结算即将完成。唯一令人不快的是眼下和将来生意上的衰退，但这一状况的严重程度肯定被夸张了，好比六个月前熊市刚出现时一样。说到生意，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的商人们将会变得多么疯狂；无论如何，在这个国家，糟糕的局面总不会持续很久。

11月15日，巴鲁克又给丘吉尔发了份电报，后者遭受惨重损失之后已经乘船回国了。电文不长：“金融风暴肯定已经过去”。

1929年圣诞周，赫伯考失火了。火是从中间主屋烧起来的，当时巴鲁克夫妇、三个孩子还有巴鲁克的两个朋友——理查德·里顿、参议员基·皮特曼——都在房子里。人皆安然无恙，还抢救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物品，但老种植园主的这幢房子彻底毁了。1930年，巴鲁克下令用砖石、钢铁建一幢新房子，但11月的又一场大火耽误了工程的进度。他的这番坏运气仿佛象征了这场金融大衰退的进程史。尽管新房子可以在赫伯考很快立起来（十间卧室，每间都配有壁炉和浴室；管子多得惊人，有人开玩笑说比南卡罗来纳州别处管子的总和还多），然而股市之火仿佛永不熄灭——余火燃尽、用灰封死、明显冷却，却又有火苗从不知名处窜腾而出。换个比方，股市大崩溃中，股价像雹石般下落，接下来的漫长溶化期里它们在地面上滑动，好像秋日的片片枯叶；看着它们，人们心如废墟。

巴鲁克给丘吉尔的电报发出之后的短时间里，电报里所说的不假。

11 月中，最糟糕的局面暂时结束。1930 年 4 月，道·琼斯指数缓慢回升到接近 300 点；然而好景不长，6 月底又降回至 212 点。大约一年以后，平均指数落至 128 点，一天，又刚刚经历了奥地利克莱地汤斯特尔事件打击的约翰·莫伦问巴鲁克：“不知您能否运用您的影响力为我在您的门前立一个苹果摊？”其实，这符合当时的惯例，一段时间短暂的坚挺和乐观过后，结果是更低的价位；果然，1931 年 1-3 月中，道·琼斯指数飞落至 74 点。下降的势头持续到第二年的 7 月 8 日，停在 41.22 点上；下降停止了。此时，这个点数，比崩溃前的最高值下降了 89%，为 1897 年 6 月 5 日以来的最低点——回想 1897 年，当时的巴鲁克尚不满 27 岁，还在美国的一家制糖厂作清洁工呢！现在，他已经 60 岁出头——富有、充满智慧，两者完美地结合着——可是，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战却败了北，败在美国股市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动荡中。问题是战略性的、非战术性。小范围内他一直能够获利，尽管利润不大 [举例来说，他和梅耶在 1930 初的一次跌停回升中，及时处理了 2200 股南加州爱迪生股票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每股赚进 4 美元]。

他持股等待，期待“明天会更好”，可是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糟。以前遇到危机，惊慌失措的人们抛股出逃之时正是他吃进获利之际。然而这一次，最终，惊惶失措、忧天的杞人们对了。

在此必须重申，现有的 1930 年及其后的交易记录是不完整的。但是它们至少显示出这么两点：一、当时的交易量锐减；二、巴鲁克没有或几乎没有做空头，这和后来胡佛政府里的有关传言恰好相反^① 1930 年 3 月，乔治·阿姆斯比给巴鲁克写信，要求其给予股票方面的指点，因为他急需钱偿付刚过世的母亲的医疗费。巴鲁克表示愿意帮忙，便向

^① 在自传的草稿中，巴鲁克声称，他提前卖空了一“证券市场萎缩造成的损失通过保留一部分、卖空一部分而得以弥补”一事实上，他直至 1930 年春才开始抛售股票。我们手头的记录无法证实他的话，同时，在另一些回忆录中，巴鲁克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1930 年 11 月，《财富》杂志报道说，他曾经通过玛丽·博伊尔的帐户大做空头，但是没有记录作证据——原注

他透露了一条内部消息：“美国冶炼”当年的收益可能是 1929 年的 60%，但是，其股票一旦跌至 70 美元以下，值得一买（何止 70 美元！那一年，“精炼”跌到了 37.1/2）。1930 年月初，巴鲁克帮凯利·格雷森购进大宗股票：“基恩广播”（Radio Keith Orpheum）、新泽西的“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 Company），还有“可口可乐”。9 月，他自己售出 1000 股“西屋”（Westinghouse）和 2000 股“通用电气”。另一方面，1930 年晚些时候，他购买了约值 10 万美元（依票价值计算）、由不稳定的地铁快运公司（Interborough Rapid Transit Company）发行的债券，另加 3700 股瓦伦自来水公司（Warren Pipe & Foundry）股票。10 月 24 日，他给丘吉尔写信，说股票交易已达最低点。1931 年 1 月 21 日的董事会上，他提出动议，要求提高总裁薪金。

巴鲁克对自己的损失低调处理，只对很少几个朋友承认他也有痛苦。1930 年 11 月，他给参议员乔·鲁滨逊写了封信，说：“我想告诉你，我在证券上损失相当严重。它虽然不妨碍我仍像以前一样舒适、平和地生活，但是向外的援助恐怕不能像以前那样面面俱到了。但愿，在即将到来的大潮中，我们的船儿能漂往新的方向；当然，对这一点，我不怀疑”。^①显然，眼前这股大潮的长久活动引起了某些自省。在他的个人文件中，我们发现了一份备忘录，时间注明是 1930 年，但月、日不详；备忘录的内容是基于投资以及投机活动的：

个人素养

自立：必须独立思考。切忌情绪化。去除一切可能导致非理智行为的环境因素。

判断：不要放过任一细节——沉思片刻。千万不要让自己希望发生

^① 巴鲁克的预言并非都斩钉截铁。比如，1921 年 9 月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一语双关地写道：“肥料生意跟别的生意一样。人们首先必须吃、穿、住；只有想办法先做到这些，生意才能好起来”，——原注

的事影响自己的判断。

勇气：不要过高估计当一切都于你不利时你可能具有的勇气。

敏捷：善于发现一切可能改变形势的因素，以及可能影响舆论的因素。

谨慎：随和些，否则难以作到谨慎。股市于你有利时更要谦虚。当自己认为价格已达最低点便着手买进，这不是谨慎的行为，最好等等看，晚些买不迟；执意等到价格升至最高点再卖出，这不是谨慎的行为——“太快了”脱手大概更安全（利润低于 85%便不卖。在极其“晴空无云”的情形下，肯定不会有“如果”、“但是”的时候，可以将这一百分率降至 75 到 80 之间）。

灵活：将所有客观事实和自己的主观看法综合起来考虑、再考虑。必须彻底摒弃固执己见的态度——或称“自以为是”。执意在某段时间内赚进某个数额的想法会完全破坏你自己的灵活性。一旦决定、立刻行动——不要等待、观望股市会怎样。

客观事实

（1）能预示未来

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储蓄基金定存、售出的保险金额。

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银比价及其他活动，商业贷款的供求状况。

包括和不包括“优惠认股权”的股票收益，将它与债券收益、定期贷款进行比较。

新上市的股票的发行量。

用于股票交易的贷款与股票价格的比例关系。

交易中的股票量。

商品价格走向（关注黄金供应量和信贷规模）。

农作物长势。

国内、国外之政治形势。

银行票据交换结算总额。

铁路运输：衰退开始后相当长时期内，货物运输量未曾下降。但是，运输量的增长预示复苏。

订单：允建工程及合同金额钢铁的订单。

汽车生产订单。

商品零售总量：包括百货公司和连锁商店

就业状况。

对外贸易

（2）有关过去情况的记录：存货清单、分期付款购货。

生产状况：工业品产量，包括电力。

矿产量。

收入状况。

（3）私人公司

它是否是发展中的标准化企业（非实验性）。

这一行业的竞争是否太激烈。

它是否有占据优势的潜力。

它是否有实验新产品的能力。

考察客观事实必须周到、缜密。

心理因素

几乎每个人都难以逃脱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他们要么过于乐观、要么过于悲观。当你掌握了客观事实及形成自己的观点之后，请静观潮流。你该知道市场应该发生什么事，但不要将它误认为是市场会发生什么。公众对股市介入得越多，其力量越大。不要试图同大伙儿对着干，亦不要站得太靠前。如果是牛市当然不要卖空，可是，如果有逆转的可能或者手握股票令你烦忧不已，便不可久留；反之亦然。股市发生恐慌时，最好的股票也不要指望能卖出合理的价格。密切注意所有令公众鼓舞或惊恐的事。股价爬升时，全面考虑会令它爬得更高的情况，相反的可能当然也要想到；勿忘历史；相反地，当股价下落时，也是同样的道理。注意主流，但无须太多的同伴。

“停止亏损，让赢利继续”。

总体而言，动作要快。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尊请减少介入。另外，一旦心有疑虑，也请减少介入。下定决心之后应该立即行动，此时便毋须顾及市场反应了。尽管如此，制定计划时，你必须不时地考虑市场的动向。

在充分了解过去状况及全面掌握眼前形势的情况下，将两者加以比较。心理上为一切障碍作好准备。行动过激永远带来反应过激。

不可预知的成分：要考虑到“机会”的因素，并随时为此作好财政上、精神上及体力上的准备。

“总体而言，动作要快”。1931年之前，巴鲁克作了几笔重要的卖出，但因为一开始，他不清楚应该从哪儿“动”，结果还是抽身慢了。显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全国的情况缺乏了解。1931年8月，休·约翰逊从一个全国性的调查带回消息，有“明显的营养不良的迹象”，不动产市场凋敝，家具生意甚至比1921年还难做，建筑、汽车、铁路

的前景统统为零。具体到一家他和巴鲁克曾经投资过的生产汽车地毯的工厂，约翰逊写道：“让那家地毯厂的股票脱了手，真是罕事！当时（与别的企业相比较）他的前景那么好；只是，我相信衰退会永远地存在下去，我太相信这一点了，以致于下不了决心”。11月的第三个星期，巴鲁克让博伊尔小姐把财务报表拿给他。^①

成百万的人失业、英国金库空虚、银行关门、投资型债券同普通股票价格一齐下跌。比许多企业状况好得多的美国铅业公司（National Lead Company）宣布，它将其股票每股额外支付 25 美分的“紧急救济”性股息，希望持股人把它分发给周围的穷人。1931 年 11 月 11 日，前“战时工业委员会”的成员们聚集一堂；这样的场合，礼节上要求乐观的情绪占上风。巴鲁克待自己的股票老师米德尔顿·司库布莱德·巴瑞尔发言之后，谨慎地预言：“……我们已经打断了悲观情绪的延续”。可是，7 天后，在巴尔的摩俄亥俄公司董事会，与会人一致赞同将董事的费用减半。

在这一愁云惨雾笼罩的时刻，巴鲁克的秘书博伊尔小姐却心血来潮地统计了他的股票、债券、现金以及他给朋友们的借贷，并把结果详细地抄在了几张黄色纸片上，如下所陈：

股票：3,691,874.50 美元；债券：3,067,465.00 美元

现金：8,698,000.00 美元（其中 557,000 美元在他的保险柜里；7,141,000 美元分存于 7 个银行，最大的一笔存款 340 万美元。存在第一银行；还有，票面价值 100 万美元的财政部发行的国库券）

借贷：551,560.00 美元

^① 11 月 25 日，巴鲁克申请了一张持枪证；这个日期跟股市关联不大，而显然是由一个新的枪支管理法决定的。如果说 1931 年他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那么数年前牛市后期他就已经担忧过这个问题了，且看：1927 年有报道说，有 182 名美国人为自己投保的人寿险赔款金额达到或超过 100 万美元，巴鲁克是其中之一——原注。

共计：16,008,899.50 美元

在 1931 年这样的年头，竟能拥有 870 万美元现金，这确是一项罕见的、惊人业绩。可见，他已经提前将自己的现金从某些股票里撤出来了；然而，同样明显的是，他也承受了巨大损失。1929 年他的财产达到最高值时，可能在 2200 万美元到 2500 万美元之间。^①

股票清单颇为有趣。固然有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巴鲁克林·曼哈顿捷运公司、巴考克斯 & 威尔克斯公司、凯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联合雪茄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汽油公司、麦乳公司、麦克克劳利连锁店、联合饼干与威逊食油公司。但是，还有相当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的公司，包括法里斯电气公司、水银生产库、加拿大奎蒙特采矿有限公司、里威尔铜业公司、巴希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艺术家演出公司、米萨比钢铁公司。博伊尔小姐总共发现有 114,563 股各类股票的市面价值为零。清单里缺少绩优股，比如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美国制罐公司、西尔斯-罗拔克公司、美国钢铁公司。这一点也颇引人注目。至于“美国冶炼”他只有 200 股；而“巴尔的摩 & 俄亥俄”更加可怜，只区区 165 股，他还是该公司的董事呢！

博伊尔小姐还注意到，巴鲁克在债券上有损失。自大崩溃开始到 1931 年夏，由于银行利率下降，债券价格相应上升。但是，英国 9 月 21 日采取了新的金制，之后，联邦储备委员会调高利率以避免外国人用美元兑换黄金。可是美国人自己却开始从银行提取现金，银行为了给焦头烂额的老主顾们筹钱，只好发行债券。铁路债券是风行一时、发行得特别成功的一种（巴鲁克认购了 50 万美元），1931 年夏有传言要将

^① 据推测所知——1929 年，他申报股利收入为 585,811.81 美元，假设当年平均股利收入为 3.47%，那么他所持股票的票面价值约合 1700 万美元；同样地，同年，他申报的利息收入为 307,002.26 美元，若按平均利率 5% 计算，他所拥有的债券和银行存款约有 480 万美元；若按 4.5% 计算，是 530 万美元，由此得出了 2200 万美元这一巨额总数。1934 年，《时代》周刊用了 2500 万美元这一数字。1926 年亚瑟·克洛克在《纽约客》杂志中猜想他的净值在“3000 万到 5000 万美元之间”，好像估高了——原注。

它从某些名单中除去，以阻止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基金对其进行合法投资。

从票面价值上看，巴鲁克拥有的债券合 417.7 万美元。但是进行交易时，它们的报价不值这个数字的 3/4。举个例子，他持有的最大一笔债券是地铁快运公司发行的地下铁路债券，他认购的部分，票面价值为 81.1 万美元。1929 年每张债券价值 78 美元，到博伊尔小姐为他清理帐目时已跌至 52 美元；1932 年 8 月，这一工程宣布进入破产管理（最终属市政府所有），价格进一步降至了 44 美元。巴鲁克还拥有票面价值 14.8 万美元的曼哈顿高架铁道公司债券，这个公司是附属于上述“地铁快运公司”的一个赔钱货；另外，价值约 50 万美元的纽约铁道公司债券，这家公司经营公交巴士和有轨电车业务，前身是“都市铁道公司”（这家公司当年倒闭时没有一个人人为它惋惜），这一债券的最后报价不到 5 美分。

作为巴尔的摩 & 俄亥俄铁路公司董事会成员之一，巴鲁克更关心公司的借贷信用。1927 年他应邀进入董事会时，公司赢利状况良好，只是硬件上落后于时代，要求提高。公司董事会阵容强大，几乎全是威尔逊时代元老级的人物，包括前作战部长牛顿·D. 贝克、前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保罗·M. 瓦尔堡以及前战时工业委员会成员威拉德和巴鲁克。董事会的任务仿佛是发展公司而非巩固原有阵地。于是，在未料到会发生衰退的情况下，董事会 1929 年投票决定斥资 2000 万美元建造一对短程铁路以将纽约与芝加哥完全连接起来。他们选的时机不好。紧接着的经济停滞、加上自身计算失误——1932 年 3 月董事们竟忘记了向 1900 年发行的优先股支付第一笔红利——公司陷入现金短缺的危机之中。为缓解这一燃眉之急，董事会决定向援建股份有限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申请一笔贷款——这家公司是胡佛政府建立、专门查核破产申请的，曾力邀巴鲁克加入公司董事会，但被拒绝。截至

1932年8月，“巴尔的摩&俄亥俄”已成为“援建”的最大债务公司，贷款额远远超过另外65家处于困境中的铁路公司。这个时候，只有联邦机构的救助能使公司免遭破产厄运了。于是，巴鲁克在这个时候选择接受邀请，担任美国国家运输委员会（The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的副主席。该委员会由政府组建，专门负责为解决铁路危机提出建议。后来，该委员会确实提出了建议：将相互竞争的铁路公司合并，在联邦政府的保护之下，设计一个全国统一的铁路运输系统建议的提出是及时的，可是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不大。整个过程中，巴鲁克对繁杂的细节厌烦不已，后来请约翰逊代替自己参加讨论。^①

博伊尔小姐不仅合计了巴鲁克的财产，对她自己也小题大做了一番。1929年，她申报的个人股票交易收入不低于229,825.06美元，另有利息及股利收入32,883.66美元（她的收入调节税的税单显示，薪水收入大约只占1/4，为57,028.88美元）。她的财产最多时约合50万到75万美元；可是到了1931年11月20日，她只有12万美元现金和价值不到2.9万美元的证券了。然而她并不气馁，照样戴钻石首饰上班，也不放弃在股市里投机。为自己计算财产这天，她还有1.5万美元被套在棉花期货市场上呢。

应巴鲁克的建议，约翰逊将军于11月初吃进了几种价廉的股票，主要是美国安全剃刀（American Safety Razor）、加拿大干啤（Canada Dry Ginger Ale）和商业信贷（Commercial Credit），但是没有记录显示巴鲁克自己也立刻买进了；同样，没有记录说明他认为股市已达最低点。实际上，道·琼斯指数12月中旬达到新低点时，他脱手了价值

^① 巴鲁克辞去董事一职数年后回忆说，当董事一点不称心。“它占去了我大约一半的时间，可我对铁路还是知之不多。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总是首先讨论政策问题，接着会有人汇报大宗的业务活动。每个人都来去匆匆；如果某人提出许多问题，其他人准骂他‘讨厌鬼’。对一个有思想、有理智的人来说，如果他不懂得有关的细节知识，我看不出他当个铁道公司或其他任何大机构的董事有什么意义。……董事或多或少都是有名无实的傀儡，小一些的机构除外”。——原注

187,482 美元的股票和债券，只花了 13,378 美元买入。从我们手头上的记录看，巴鲁克先生这一时期突然对黄金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从个性来说，巴鲁克对黄金和金钱的看法——在此不谈“采金”，仅指黄金作为货币的终极形态——是凭直觉获得的，而非逻辑分析。“英国 1925 年恢复执行的黄金兑换率是否太高了？”他不曾跟人讨论过。至于战后开始实施的、被称为“金本位制”的新的货币体系是否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它竟然允许两个不同的国家在各自不同的货币储备中以相同的金条进行计算——他也没有跟人探讨过。巴鲁克与持以上这一观点的人正好背道，1929 年他对布鲁斯·巴顿说，现存的“集中化”中央银行体制是世界经济繁荣的支柱。

1931 年之前，没有人这么认为。物价下降，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相应上升。对投资基金的人而言，通货紧缩带给他们一笔意外之财，而对债务人而言，则可能他们导致破产。1929 年，抵押借款对许多人来说易借易还；可是到了 1931 年，不仅申请得很困难，清偿时更是沉重的负担。破产的企业愈来愈多，为解决这一问题制定的各种方案、计划，实施的结果只有一个：钱越来越多、钱越来越不值钱。这样做事实上的结果是：减少、甚至消除了货币的黄金支持。在 1931 年 9 月英国放弃金本位制之前，阿根廷、奥地利、乌拉圭、巴西和德国已经这么做了；而印度、挪威、瑞典、加拿大和日本则紧跟在英国之后。于是，黄金的价值，相对于世界上流通的新纸币，升值了。

鉴于这一前景，巴鲁克决定谨慎地为自己贮藏些黄金。他开始购买金矿股票。1931 年 11 月的财产清单显示，他持有的最大一宗股票是阿拉斯加朱诺。当时的报价是每股 15 美元，而 1927 年他购入时是以每股 1 美元成交的（并非所有与黄金相关的股票都有如此令人振奋的成绩，比如博伊尔小姐买入的 40,050 股“联合金田”（Goldfield Consolidated），场外交易每股报价仅可怜的 12.1/2 美分）。固然，购

买黄金股票对巴鲁克（这个老手）而言，大为有利可图，然而，购买金属形态的黄金则需要三思而后行，一般情况下，没有理由这样做：没有分红、没有利息、占用现金，且更糟的是，如果政府决定实施严格的通货制度——胡佛政府和后来的统治者福兰克林·D. 罗斯福不幸都发誓这么做——私人手里的黄金便找不到出路、无从定价。

30 年代晚期，当时的财政部长以官方身份质询巴鲁克为何私自购入黄金，因为这种投资行为在 1933 年是非法的，甚至可能被罗斯福政府猜疑为反动行为，巴鲁克的回答极其简短：“……因为我已经开始怀疑现行货币了”。的确，1931 年底到 1932 年初，处处不乏令人怀疑的事。“我们的钞票病了”，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朋友们冲到床边，想尽办法希望它能好起来”。1932 年 2 月，联邦储备委员会被授权以财政部发行的证券为抵押发行美元；至此，只有黄金和商业票据可作为合法抵押品。然而此时黄金已然流失欧洲，萧条的生意使多家银行根本没有可用的票据。结果便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发行纸币——实际为“期票”——以中期国库券^①为后盾，形成数种债务互相支撑、维持的局面。后来，联邦政府干脆发明了一个简而易行的应急办法——财政债券“货币化”——很快通行全国。3 月，美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停止支付股息；后来，大资本家伊瓦·克勒热和乔治·伊斯曼^②相继自杀身亡。6 月，联邦政府以 27 亿美元赤字结束上一财政年度，创下战后最高记录。

所有这些事件中，巴鲁克对财政形势格外敏感。（他认为）一个收支平衡的预算令是企业及投资者恢复信心的前提，所以，除非削减联邦政府开支、提高税收，否则失业和贫穷将永无止境。1932 年 1 月 11 日——此前一个月左右，他以令人痛苦的价格脱手了一批证券；此后一个

^① 偿还期为一至五年——译注

^② 乔治·伊斯曼，1854～1932，美国发明家、伊斯曼—柯达照相器材公司创办人，发明干片照相法、胶卷、柯达照相机和彩色照相法，曾捐赠巨款给麻省理工学院等——译注

月，他开始正式买入金属黄金——他在《纽约晚邮报》上对自己的这一观点进行阐述：

为重新获得繁荣及与繁荣伴随而至的充分就业而付出的所有努力能否奏效，取决于我们的政府的信誉。美利坚合众国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拿出令人信服的举措以求平衡预算，否则一切都将以失败告终。当然，这意味着削减政府开支、加重税赋，但是我们将会收获报偿：恢复信心、重新开始各种商业活动。

货币是商业的基础，它是一国政府对支付行为的承诺；美元代表着美利坚合众国的信誉，世界对这一信誉的信任程度决定了它的价值。毫无疑问，我们的货币是可靠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政府容忍非平衡预算的存在，我们的公众和这个世界将继续徘徊在阴影中。从一开始，赤字便成为信誉减退的“信号树”，在这个风声鹤唳的世界，我们的赤字已经伤害了我们的信誉。

看，成千上万的人掏出他们一生的积蓄，狂热地试图抓取金子；看到了吗？尽管投资债券的价格已经低得空前绝后，还有那么多人捏着大把现钞在风中排队等待。

文章结尾，巴鲁克恳请政府迅速恢复传统的金融秩序：

稳妥、有效、快捷地平衡预算的办法是停止支出。现有的、联邦政府无节制开支的状况是从 1914 年爆发战时通货膨胀开始的。（之前的）13 年中，联邦政府平均每年支出约 6 亿美元。

1923 年，去除公共债务，这个数字上升到 18 亿；1931 年，28 亿，增长了 $4\frac{2}{3}$ 倍。包括商品价格、工业产量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指数都掉落到战前的水平。我们无须经济学家来告诉我们应当切实地——而非仅仅想一想——减少消费，因为这是通向平衡的预算的唯一道路。现在需要的是锋利的斧头，而不是宽厚的犁耙。

基本日用品的价格必须提高，然而，应通过强化信贷机构、刺激需求的增加来达到目的——而不要自欺欺人地使货币贬值，从而破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的基础。

从 1932 年 4 月 2 日起，断断续续直至 1933 年初，巴鲁克在纽约的保险柜吃进了一批又一批黄金。截至 1933 年 2 月，“阿拉斯加朱诺公司”先后运来 66 块金砖（巴鲁克熔了其中 3 块作了检验），另有数量不明的金子从伦敦运来。其实，从“朱诺公司”购买的黄金的确切数量也不清楚，因为金砖不仅形状不规则，而且未经精炼。根据该公司 1933 年生产的类似金砖的重量推算，可能接近 72000 盎司；每盎司的时价是 20.67 美元，则大约值 150 万美元。后来，公司总裁菲力普·布莱德利与政府官员就此笔买卖的合法性展开舌战；被问及巴鲁克为什么要买时，菲力普用 6 个字作答：“预计金价会涨”。的确，金价涨了，但巴鲁克一无所获。1933 年 4 月，罗斯福总统下令，所有美国人以每盎司 20.67 美元的惯行兑换率交出手里的黄金。不出 3 个月，世界金价上涨到每盎司 29 美元。

1932 年 7 月，股市终于停止了下跌，继而猛烈反弹。道·琼斯指数在 9 月 7 日达到了最低点数的两倍。巴鲁克入市的时机选得比上一次出市时好。9 月早些时候丘吉尔打来电话，感谢巴鲁克提供的建议使他在跌停回升时大有收获。巴鲁克自己却在 9 月 6 日卖出了一些股票，其中有以每股 5.1/2 美元成交的 700 股“欧文风笛”（Irving Air Chute），回想 1929 年春，他为这些股票每股竟支付了 37.7/8 美元！

作家查尔斯·麦凯对 19 世纪发生的“南海大骗局”及“郁金香花球狂热”等事件进行了研究之后，写出《惊人的大众错觉：疯狂的人群》（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一书，探讨群体的病态心理现象。他邀请巴鲁克为自己的书作序。巴鲁克称赞这本书为研究自于各种经济活动中的人的心理现象提供了启示。

“我总是在想，如果在那个终止于 1929 年的可悲的‘新经济学理论时代’里，或是面对令人眩目的飞涨的股价，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不断地默念‘2 乘以 2 只能等于 4’，那么许多不幸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他写道，“类似的，假使遇上惨淡的年景（比如眼下写绪言这会儿），如果人们要问‘下跌难道停不了了？’最合适的回答可能是：‘它们总会好的’”。巴鲁克只字未提他的“工业复兴”理论，更没有将它与“新经济理论”作比较——毕竟，他动笔的时候，经济依然处在衰退期。只是，从股票价格角度衡量，衰退好像已经结束了。

第十三章

财而优则仕

只要战时工业委员会一聚会，斯沃普就会提到巴鲁克，说他在尝试做某件新鲜事务时，总是像一头过竹木桥的大象，先是满腹狐疑地缓步走上摇晃着的桥头，四条腿小心地试探一番，看是不是可以安全通过，然后它还要转过身来，先唆使某只“楞头青”小象先过去。巴鲁克本人对这一说法不置可否。是的，经过了投资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的风险，经过了在凡尔赛和会上勇敢善战但差点不能全身而退的经历，经过了 1924 年总统选举风云而得出不能再有自己偏好的候选人的教训，经过了 1930 年左右的股市大风浪知道了不应期盼在股价最低时买进而应再

“等一等，靠后买”的道理，巴鲁克确实变得十分小心谨慎了。

在国家危机发展到最严峻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推测下一届总统将在在野党中产生。1932 年早些时候，民主党还在召开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就开始雄心勃勃地谋划夺取总统宝座。当时，一位叫约瑟夫·P. 肯尼迪的华尔街人士事先看清了政界大市场的行情走势，早早地将一部分钱捐给了时任纽约州州长的富兰克林·D. 罗斯福。而此时的巴鲁克仍抱着自己特有的谨慎态度。尽管他更倾向于纽顿·D. 贝克、阿尔伯特·G. 瑞奇和艾尔·史密斯，反对罗斯福，但他表面上还是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其实他是在等待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最终推选结果。因此有民主党代表指出，巴鲁克最终加入到罗斯福阵营是“下山分享胜利果实”。

保守派民主党人在当今并不多见，但在巴鲁克时代却还很多。巴鲁克作为其中一员，也清楚地看到了一些决定竞选双方胜负的因素，即要建立的政府是节俭的还是浪费的；能给选民带来的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是采取自由政策还是限制政策。还有一点巴鲁克也心中有数，即他看出了罗斯福在财政和金融问题上持正统观念，而胡佛却喜欢做一些不合常规带有冒险性质的试验活动（如 1932 年胡佛的预算赤字为 27 亿美元，建立复兴金融公司^①又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过火行为）。

1930 年，巴鲁克曾公开阐述自己的政治信念：

我是一个民主党人，理由如下：我认为政府应致力于管好自身事务。而对人民而言，只有管得最少，才是管得最好。一个政府不能靠颁布《禁酒令》就使人民变得温文尔雅，也不能靠通过建立关税壁垒就使国内的制造商发达起来，相反互惠互利有助于我们的制造商打入其他国家，就像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现在在国外所做的那样，它们已开始雇佣当地劳动力而不再雇用本国劳动力。我认为，对于任何靠自己的力量自由

^① 复兴金融公司，英文全称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译注。

发展的阶层，政府不应采取任何权宜之计的经济政策来限制它们的手脚。这样的政策只会像《禁酒令》那样以失败告终。人民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来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一个好的政府唯一应该做的就是保障所有人在机遇面前享有均等的权利。在历史上，我们的国家还从未像现在的政府执政下这样，从民主政治原则和共和政治原则的轨道上滑出如此之远。现在，我们的政府什么都想做，但除了践踏法律外，他们什么都没有做成。^①

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逐渐吃不开了，中央计划经济的思想却开始抬头。巴鲁克本人在 1931 年便提出建立一个所谓的“高级商业法院”，以批准在有利的时机和有利的地点成立一些企业联合体（卡特尔），防止“由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商业竞争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和经济损失”。其实在一战刚结束时，他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不过此时他又将其向前推进了一步。1931 年，巴鲁克在一次战时工业委员会聚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通常，政府在经济上采取权宜之计会让我产生担心，但我想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着去建立一种合作型的、稳定发展的工业。当然，在不断的尝试中，我们会在取舍选择上难免犯一些错误，但只有付出一些代价才能获得进步”。

对于巴鲁克这样一个人，要把他的政治立场归类绝非易事，因为他对某个政治问题的看法，就像他对某种股票行情好坏的判断一样，总是摇摆不定。他本来狂热信奉某些自由论的原则，然而有时他会突发其想地产生某种左派思想观点，于是又转而认为左派的思想也无可厚非。他本来同马克思主义划清了界线的，可到了 30 年代，当几乎所有人都开始钻研马克思学说时，他也加入了这一潮流，甚至在巴黎豪华旅馆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的地方他都在孜孜不倦地研读。他曾在寄给斯沃

^① 1927 年，巴鲁克在给法兰克·凯特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如果基督是个凡人，他肯定是个民主党人——绝不会是个共和党人”。巴鲁克这句话决不只是为了表达幽默——原注

普的明信片上这样写道：“我无法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我觉得那些声称能理解这种思想的人是在假装内行。从目前我所读过的马克思的著作来看，马克思认定，如果一个人理解不了他的学说，也就跟不上他的思维，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庸俗的资产阶级分子。如此说来，恐怕我就属于这一类分子了”。对于知识界的人来说，政治观点是一种原则性的东西；而对于巴鲁克来说，所谓政治观点远不如权力、党派、友谊之类的东西实在。他经常出于对这三者中任何一个因素的考虑而放弃自己在政治上的立场。

总之，在那个时期里，往往是在某个潮流被事实证明正确可靠之后，巴鲁克才决定正式加入进去。在罗斯福宣誓就职前，民主党举行了一系列政策讨论会，巴鲁克在会上强烈主张实现预算平衡，削减联邦政府开支，以恢复政府信誉。他认为国内实际上有足够的财力恢复金融状况，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引导人们把握在手里的钱都拿出来。对民主党 1932 年提出的政治纲领，他基本持支持态度。该纲领第一条就是主张“立即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并采取措施裁减那些毫无存在意义的委员会和政府机构”；第二条主张“通过实现年度的联邦预算平衡来维持政府信誉”。

在罗斯福的内圈人士中，存在着一种对巴鲁克愤愤不平的情绪，因为巴鲁克是在罗斯福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才匆匆入伙的，他们认为这显然是太迟了。另外，巴鲁克财力雄厚，而且与新闻界和国会保持着独立的联系，这也招来了别人的妒忌。担任政府顾问班子成员的雷蒙德·莫利有一次当面对巴鲁克说：“巴尼，你简直是机智绝顶”（这番感叹似乎他以前没有见识过巴鲁克的机智）。面对新政派的猜疑，巴鲁克进行了猛烈反击。1932 年 12 月，巴鲁克忍着痛风的折磨，在一篇文章中不无怒气地这样指责那些活跃在当选总统周围的大学教授们：“这帮戴着厚眼镜的家伙就知道围着富兰克林瞎捣乱，搞得党内形成不了强有力的领导，也提不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方案来”。可惜他并未言中，事实证明，

民主党的领导核心并不薄弱，民主党提出的方案也不差，只不过这些方案与巴鲁克所想像的大相径庭。

在大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似乎有迹象表明，巴鲁克将成为新政府中的一名核心成员。当时还在巴黎的孔代尔·纳斯特在发回国内的电报中断言巴鲁克将担任财政部长。肯尼迪在与沃尔特·李普曼的谈话中也认为巴鲁克正在谋求国务卿的职位。然而，实际上巴鲁克并不想出任何实职。1933年1月，巴鲁克认为如果他不卷入政治事务的话，他将能够在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年2月，他到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阐述了裁减政府人员和保持政府财务体制健全的必要性。随后，他同罗斯福进行了一次会面，便和安妮一道去巴尔的摩参加霍普金斯大学授与他荣誉学位的仪式去了（当时丹尼尔·威拉德是该校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仪式首先由雅各布·赫兰德尔教授发言，他高度赞扬了巴鲁克高尚的道德品质、崇高的思想境界以及他在物质利益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大度风范。在赞扬巴鲁克在物质利益上的大度时，这位发言者的措词颇为婉转含糊，他当然没提巴鲁克也参与股票交易和商业投机这种行当。赫兰德尔教授还讲到了巴鲁克在政治生涯中取得的辉煌，尤其是借着当时新一届政府即将开始执政之机，提醒人们注意“当选总统是如何器重他并多次向他征询意见”。谁知后来罗斯福并没有请巴鲁克入阁，也绝少向他征询什么意见。赫兰德尔没想到，他的这番赞美之辞到后来竟被蒙上了一层讽刺意味。巴鲁克先致了答谢词，然后作了一个题为《政府权力必须加以削弱》的讲演，揭示了中央集权制的弊端，捍卫了“自然法则”的必要性。在演讲中，这位新科荣誉法学博士是这样慷慨陈词的：

照此下去，随着联邦政府的权力日渐膨胀，直到恐怕连自然界的土壤、空气和水都要由某些政府部门来挟制的时候，公民个人生来就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力也将不复存在。地方政府的作用将消失殆尽，商业隐私

无法受到保护，私人经营将基本上处于联邦政府的监控之下。《权利法案》为公民权利所提供的所有保障无不将受到削弱。扩大联邦政府权利的愚蠢做法花费也很惊人，现在的政府在很多方面并不比战前的政府建树高，但年开支却已达到 40 亿美元，是战前六倍。这是危及政府信誉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经济复苏的一大障碍。我们根本负担不起这样毫无必要而且近乎奢侈的花费。

在强调公民自由时，他还一再回忆起战时的政府作风，语气中充满了感情色彩和赞赏之意。他说：“那时的政府能把所有的力量凝聚起来，不是靠什么神奇的魔力，而是靠消除阻碍团结的因素”。他回忆说，当时的民众也付出了一些牺牲，但他们愿意付出牺牲。在演讲结束时，巴鲁克强烈号召人们支持即将挑起重任的当选总统，他说：“人民应该支持罗斯福，这并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人民自己和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应抛弃个人偏见、党派纷争和私人利益，全力支持罗斯福。人民会认识到，谁不这样做，谁就是对国家所面临的危险麻木不仁，谁就是眼看着国家处于危险之中而不愿履行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这样的人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就像在战场上临阵脱逃一样会受到公众的猛烈鞭挞”。

在这次仪式之后，事态的发展颇具讽刺意味。仅仅过了几周，曾被赫兰德尔教授称为“政治家的理想顾问”的巴鲁克就开始猛烈抨击罗斯福提出的一项法案，这一法案罗斯福几乎没有征求过巴鲁克一点儿意见。事情是这样的，罗斯福于 3 月 4 日宣誓就职后，立即于 3 月 6 日规定了银行停业期。20 日，他签署了《经济法案》，削减政府职员薪金，减少政府开支。这是最早施行的新政措施之一，在现在看来是所有新政措施中较为温和的一项。但在巴鲁克眼里，这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当月晚些时候，查尔斯.E.米切尔被指控犯有偷税行为。同时，已经破产了的美利坚银行的前正副总裁伯纳德.K.马库斯和索尔.辛格也先后被送

进了新新监狱。4月5日，政府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囤积”黄金，并要求人们把金条、金币和金券就近上交联邦储备银行。4月19日和20日，总统颁布了允许美元对外币贬值的政策，刺激美国商品价格上涨。随后，针对《农业调整法案》的《托马斯修正案》提交至国会审议，这项修正案允许总统将美元中的黄金含量减少一半。紧接而来的又是《紧急农场抵押法案》、《田纳州河流域管理局法案》和《全国复兴法案》。其中的最后一项法案是为了利用和平时战时工业委员会性质的机构来抬升国内物价。6月5日，政府又通过了一项决议废止了政府及私人合同中规定的“必须用黄金或用按市价相当的现钞付款”的条款。与此同时，参议院调查委员会顾问费尔南德·佩克拉（一个在孩提时代才移民来美的人）正在讯问 J. P. 摩根的合伙人及另外几个次要的嫌疑人，这些人都是在上一轮经济暴涨期活跃于华尔街的金融界风云人物。

这一系列风暴雷霆似的改革措施简直把巴鲁克弄晕了。他于4月5日对参议员基·皮特曼坦言说：“现在立法太多太滥，有许多我无法苟同，但我不想让别人说我破坏新政”。4月10日，他草拟了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贺信，信中不乏赞美之辞，他说：“人民正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个奇迹：一位新任总统切实履行了他竞选时所做出的每一项承诺”。但巴鲁克最终没有把这封贺信发出去。不管效果是好是坏，按照詹姆斯·P. 瓦尔堡后来所总结的那样，罗斯福总统在1932年所推行的路线，与其说是一条民主党人的路线，不如说是一条社会党人的路线。

巴鲁克对当时事态的发展所作出的反应还是较为温和的。他的一位朋友，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特尔·格拉斯则公开声称，民主党允许美元贬值的法案是对该党宗旨的背弃，使美国遭受了一次国耻。格拉斯在1932年曾参与起草民主党的一份纲领，宣称“要不惜任何风险保持货

币稳定”。巴鲁克本人对政府的黄金政策也深为不安。^①作为一个公民，他又很关注罗斯福的政策执行效果。而最令他头痛的是，他又是一个有可能成为总统顾问的人。总之新政措施的推行使他陷入了窘境。

罗斯福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揣摸到了巴鲁克当时的心境，她说，巴鲁克有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可他有时又并不认为自己真地做错了什么，实际上他也确实没做错什么，可他就是有那么一种负罪感。一个人千方百计地把手里的钱换成黄金的做法并不违法。可当政府发出命令要求把个人手中的黄金都交出来时，手里握有大笔黄金的人就被称作“囤积居奇者”，如不交出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当这些人被冠以恶名时，虽然他早先积聚黄金的做法当时在法律上并不构成犯罪，他还会产生一种犯罪感。他会觉得“我做了现在招致别人鄙视的事，可我当时并没想到会这样”。

珀金斯的这一分析可谓入木三分。除了这些话以外，她还提及了一次内阁会议上就执行反黄金囤积法令的问题所展开的一场辩论。参加这场辩论的人物之一就是热衷于推行该法令的副总统约翰·N. 加纳。珀金斯是这样描述的：

加纳抿嘴笑了笑，红着脸说：“总统先生，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推行该法令会使许多人陷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总统神情严肃的回答说：“我可不这么看，我认为没有哪个为国家利益而作出正确举动的人会因这项法令的推行而感到尴尬”。

在进行这番对话之前，我们讨论到是否连一个小孩子从祖父那里得来的仅值十美元的金制小饰物都该上交的问题。

^① 黄金政策也涉及到巴鲁克的个人经济利益。作为一名黄金拥有人，该法案将使他不得不以每盎司 20.67 美元的市价交出手中的黄金。作为一名金矿股票持有人，他也不希望有任何金价贬值的迹象。但在此事件中，阿拉斯加朱诺于 1934 年开始以每盎司 35 美元的价格收进黄金——原注

听了总统的话，加纳接着说道：“真的不会有人感到尴尬吗？”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位最亲爱的朋友手里就握着一大笔黄金”。

一听到这话有人尖声问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巴鲁克呀！据我所知，他手里的金砖相当于一家银行的储备”。

珀金斯并没有提到，5月份早些时候从佩克拉委员会批露出来一件事，正是这件事进一步加重了新政派对巴鲁克的不信任。调查表明摩根公司曾经列出一个“首选人名单”，上面全是由该公司直接提供普通股的人，巴鲁克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与他并列的是一串各色名流，其中有约翰.J.拉斯克伯、查尔斯.A.林德伯格、卡尔文.柯利芝、查尔斯.E.米切尔、威廉.G.麦克阿杜、约翰.J.潘兴，还有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威廉.伍丁。1929年，这些人都获得了摩根公司提供的一家或多家新上市公司的股票。摩根公司有个原则，就是一般不去认购没能卖掉的新上市股票，但有时也有破例，使手中的新股超过它自己认为应该持有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会想着把这些多余的新股卖给普通的公众，这不是摩根公司的作风，而是把多余部分卖给公司的友好人士和对公司有利的人士。

摩根公司曾以这种方式转让过一种“标准商标”(Standard Brands)股，它是由几家生产酵母和小苏打的公司重组而成的企业联合体。巴鲁克先前就持有弗雷斯查姆公司(Fleischmann Company)的股份，后来这家公司成为该联合体成员之一后，他自然地成了新联合体的股东之一。摩根公司给他及其他一些公司友好人士所提出的优惠条件是，他们可以签订一项合同，在1929年6月下旬买入摩根公司转让的股份，而付款时间可以推迟至9月上旬。这种交易方式本来也没什么不正常的，也不像佩克拉委员会认为的那样，能使购买者免除遭受损失的危险。据推算，该种股票升值是板上钉钉的事，购买者肯定会从中获利。其实股

票贬值的可能性也不是一点儿没有，购买者受损的危险依然存在。事情后来的发展是这样的，巴鲁克以每股 32 美元的价格买下了 4000 股。他的股票业务记录表明，在市场开始崩溃时以每股 32 美元卖掉了 3000 股——没有从中赚到一分钱。一年以后，他手里还握有 300 股，但此时每股仅值 15.75 美元，这就更谈不上赚钱了。巴鲁克当然坚持说，认定他从摩根公司得到了好处的说法是无稽之谈，相反，他倒觉得摩根公司在铁路建筑业和硫化业中同他作对。当佩克拉委员会公布的爆炸性新闻在 1933 年被捅了出来之后，斯沃普写了一篇冗长的文章来抨击这个委员会，他的结论是：巴鲁克与此案无关。

在当时的报纸上，巴鲁克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幕后政治操纵者。尽管他本人实际上并不握有任何实权，报纸上却说他手中的权力一手遮天。有报道说，他把自己的得力干将安插到了政府部门内部，可以通过这些代理人来操纵政府。被莫名其妙地称为“巴鲁克分子”的有农业调整局官员乔治·N. 皮克，全国复兴总署负责人休·约翰逊将军，当然也包括斯沃普（他在参加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的美国的代表团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很重要但也不可小视）。

这些报道真伪难辩，而且还有几分蒙蔽作用，实际上它们是很离谱的。其实皮克在农业调整局的那个职务本来是准备给巴鲁克的，但被巴鲁克拒绝了，因为他对即将生效的一项农业补偿法持有异议。这项法律规定向停止种植作物的农民提供经济补偿，目的是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巴鲁克认为这根本不可行。皮克在顾虑重重中走马上任，结果 7 个月后即被解职，转而担任贸易特别顾问一职，一直到 1935 年辞职为止（皮克从农业调整局去职时，《芝加哥每日新闻》发表了一篇评论，试图推测巴鲁克在政界的影响力究竟受到多大的削弱。该文在结尾部分写道：“皮克的去职是否表明一直作为总统密友的伯纳德·巴鲁克在政界的影响力已不复存在？我们还得拭目以待”）。如果说上述几个人中真有哪

个曾是巴鲁克的追随者，那么此人就是约翰逊。但这位将军并不是在巴鲁克的授意下才当上了全国复兴总署的头儿。相反，巴鲁克还曾警告过弗朗西丝·珀金斯，说约翰逊并不胜任此职，必须找个人提醒总统注意这一点。但巴鲁克本人并不愿意到罗斯福那里去出这个头，在珀金斯看来，这是因为巴鲁克当时正因囤积黄金的事被揪出来而处境尴尬。说到底，约翰逊能参予推行新政工作，非但不是靠巴鲁克的影响，而是因为他摆脱了巴鲁克的影响。

政府成立全国复兴总署这样一个机构，从巴鲁克主持的前战时工业委员会的成功范例中得到了一定的有益借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巴鲁克。正如约翰逊所看到的那样，在1932年经济危机中，工业界只能把领导权交给了政府。约翰逊对自己提出的经济萧条理论确信无疑，他写道：“经济萧条的原因是他们（实业家们）不能在有约束、有控制的状况下展开竞争，在生产经营中也不可能相互进行协商。他们没有把每一个产业看成是整个国家的一个生产部门，没有把全国经济看成是一盘棋，不知道在全盘棋局中每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不知道每一个实业家都必须履行应尽的义务”。

约翰逊认为，工业界的四分五裂阻碍了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带来了杂乱无序的竞争，结果经济发展过热直至走向崩溃。如果说工业界的分裂局面是由反托拉斯法造成的，那么，现在显然到了该制定新法的时候了。于是，他着手起草《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并把它称为“工业界的自我约束章程”。该法案规定，各部门的企业家必须制定本企业章程来确定最长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等等，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商业活动以及制定商品价格。对所有这些企业行为，联邦政府都将以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名义加以监控。

《全国工业复兴法案》使巴鲁克的心情极为矛盾，在他的思想轮廓中，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一面与主张战时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面正进行着

激烈的斗争。渐渐地，后者终于占了上风。他对战时社会主义经济的倾向在 3 月 20 日的一次讲话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篇讲话是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上给该学会的创始人（也是战时工业委员会的一位老同事）罗伯特·S. 布鲁金斯的致词。他在讲话中强烈主张建立一个由政府控制的、使各企业能“创造性地进行相互合作”的机制。他还把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与战时的紧张状态作了比较，列举了 1917-1918 年（他把这段时期称为战时“最危险的时刻”）所采用的一些做法，为制定新的国家复兴计划提供参考。这一讲话对巴鲁克来说是一个方向性的转变。仅仅 3 个月前，他还当着约翰·霍普金斯的面对“私营经济的自由性”遭到削弱深表痛惜。在讲话中他还附和了约翰逊的观点，认为《谢尔曼法案》的不妥之处在于，它使各企业陷入了无组织竞争，相互间没有任何合作可言。他指出，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法律的约束下”使企业能自愿地进行相互协作。巴鲁克还提出，随着企业在政府引导下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将得到提高，物价也将随之上升，但这也将带来新的隐患。他说：“价格普遍提高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届时政府有必要制定新的法规。因此支持《全国复兴法案》的实业家们应该有思想准备，政府将来会对价格施以限定。工业界当然会赞同政府这样做，但这意味着实业家们在一段较长时期内需要得到政府核准才能进行经营活动”。

巴鲁克最后说，期间肯定会有人同政府对着干，因此建议政府通过实行生产经营许可证制度，把拒绝与政府合作的那些人束缚住。但是，如果能使公众都有思想上的和物质上的准备，问题就会得到较好的解决。他说：“如果大家都认识到，与政府合作就相当于加入到与经济危机这个国家大敌进行搏斗的战斗中，而对政府的召唤毫无反应就等于站在敌人那边与国家对抗，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人踌躇不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需经政府核准，政府颁发的许可标志要悬挂在大门上，并

印在商用信笺的台头上和发货清单上。我们在 1918 年曾用过这套办法，而且获得了成功。这是一种迅速、果断的措施，同时能很快获得公众的支持。要知道，没有公众的支持，这样的方案注定失败”。正象巴鲁克所建议的那样，后来在全国复兴总署颁发的许可证上果真有了一个蓝鹰标记。

作为全国复兴总署的负责人，约翰逊在美国工商界掀起了一场革命。他们起草了限制最低工资额和最高劳动时间的法律，禁止了血汗工厂和雇佣童工制、建立了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一切都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着。正如约翰逊在就职时所宣称的那样，“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但巴鲁克对约翰逊的过火行为感到了几分担忧。H. L. 门肯曾这样描述约翰逊的一次过激表现（当时约翰逊正在主持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听取工业生产经营法的制定情况）：“这位将军把帽子摔在一旁，他大汗淋漓，外衣也脱掉了。一副大嗓门经过麦克风的扩音使人震耳欲聋”。这一作派与当年主持战时工业委员会时的巴鲁克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巴鲁克或许事先已经料到了全国复兴总署所制定的一大堆限制性法规中，多少会有一些与他的意见相左，但他恐怕没有料到，这个机构的家长制作风会如此厉害。他把面对政府压力的企业界各部门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试探着到华盛顿去看看能不能获得本部门自己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另一种则是彻底屈服了。1933 年 11 月，巴鲁克发表了一些对约翰逊的反对意见，他说：“当前，整个工业界都在被迫执行着形形色色的行业法规，有些规章完全是政府强加的。换句话说，即使在企业不需要也不愿意的情况下，政府也来干预它的事务”。约翰逊最大的反对者之一是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他认为，全国复兴总署针对报纸出版业的法律完全是对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格拉斯对约翰逊说：“将军阁下，我想对您说的是，我们其实不想让你们的那只蓝色怪鸟飞到自己报纸的报头上”。巴鲁克表明政治立场的方式和态度实在是老练而圆滑，

直到 1933 年后期，格拉斯和约翰逊这两个观点针锋相对的人都没能搞清巴鲁克的真实想法，他们都认为巴鲁克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这很能证明巴鲁克的性格魅力。约翰逊对巴鲁克极为信任，曾在 1934 年上半年从巴鲁克那里贷款 6000 美元。到 1935 年后期约翰逊准备辞职的时候，巴鲁克也是他唯一前去寻求建议和帮助的人。约翰逊 1935 年在自己写的《蓝鹰的诞生和消亡》^①一书中，把巴鲁克说成是“我所知道的最忠诚、最友好、最善解人意的人”。他对巴鲁克的尊敬一直保持到 1940 年自己去世为止。约翰逊临终时，巴鲁克一直守候在他的病榻旁。

在思维方式上，巴鲁克更倾向于作现实的考虑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他也不愿意招致任何白宫当权派的冷眼。所以，他很注意灵活巧妙地修正自己的观点。在罗斯福宣誓就职以前，巴鲁克有一个深信不疑的观点，即他认为通货膨胀有害无益。即使是在新政开始后，他还在一直在私下里表达这一观点。不过他不致于蠢到使自己在白宫失宠。1933 年春天，在政府决定回收黄金并签署允许美元贬值的《托马斯法案》后，他随即向总统建议，在即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开幕前，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

这次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的主题是，如何使采用黄金做财政结算的国家向采用纸币做结算的国家看齐，或者如何让后者向前者看齐。这样做的目的是，重新稳定国际上飘浮不定的货币流通价格。会议定于 6、7 月间举行，巴鲁克早在 3 月份就被任命为美国代表团顾问。巴鲁克的敌对派认为，他之所以获此任命，只是因为政府将此作为没有请他入阁的一种补偿。因为他太富有了，太圆滑了，在国会太有影响力了，使得政府无法不考虑他。就在会期临近的时候，巴鲁克所得到的这样一个政治补偿（这种补偿似乎并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引起了詹姆斯·瓦尔堡的警觉。瓦尔堡一向认为巴鲁克过于自负、见识浅薄，而且肯定会利用

^① 英文原名为 *The Blue Eagle from to Earth*——译注。

职务之便，掌握某些重要信息为个人的商业利益服务。事实上确有迹象表明瓦尔堡的担忧不无道理。早在一月份，罗斯福就曾告知当时的司法部长荷马·卡明斯，说巴鲁克已经靠密苏里一大西洋铁路（Missouri Pacific Railroad）的债券获利 100 万美元。毋庸置疑，这笔钱是在他了解了复兴金融公司一笔贷款项目的内部消息后赚得的。还有，他已获得了按规定价格在一定时间内优先购买一座银矿股份的权力，而白银正是这次伦敦会议的议题之一。

到 5 月份，又有消息说巴鲁克将不去伦敦参加会议，而是呆在家里作为白宫和会议代表团之间的联络人。在瓦尔堡看来，这简直是拿巴鲁克开了个大玩笑，因为在会议期间总统将外出度假，到时候巴鲁克能去找谁“联络”呢？6 月份，总统派出助理国务卿莫利赴伦敦督促美国代表团的工作。莫利与巴鲁克关系较为密切，他同意去伦敦时带上斯沃普。

在那些担心巴鲁克会从会议的秘密情报中谋取私利的人看来，选择斯沃普去伦敦是件令人担忧的事。众所周知，斯沃普与巴鲁克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斯沃普很可能利用自己在伦敦的有利位置向巴鲁克透露有关市场动态的情报。缅因州波特兰市一个叫霍华德的人，于 6 月 22 日这天费了一番周折给罗斯福打了个电报，提醒总统注意此事（罗斯福也曾亲耳听过一个叫路易斯·M. 豪的白宫助手轻蔑地称斯沃普只不过是巴鲁克这个大富豪的一个小兄弟。但罗斯福总统当时回话说：“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这个人的”）。斯沃普和莫利到达伦敦后，有人断言从斯沃普同巴鲁克进行电话联络的频率上就能推断出二者在多大程度上值得怀疑。尽管巴鲁克与斯沃普之间的电话十分频繁——巴鲁克曾接到过一个月 432 美元的电话单——斯沃普几乎每一次都能接到电话，而且几年中他还通过其他一切可利用的渠道与巴鲁克保持联系。1931 年，斯沃普曾在 6 天中连给巴鲁克写过四封信，这似乎非同寻常。毫无疑问，斯沃普一直在暗地里使巴鲁克能了解到最新消息，人们会把这种做法称为滥用

特权。还有，斯沃普在担任巴鲁克派往巴鲁克林·曼哈顿捷运公司的代理人时，他定期地把公司的赢利状况和红利分配状况提前泄露给巴鲁克及其他一些人，包括约瑟夫·P. 肯尼迪。而其他股东只能在晚些时候从报纸上才能得知这些信息。基于上述事实，说斯沃普在伦敦不断给巴鲁克提供投资建议并非捕风捉影。另外，在巴鲁克的鼓动下，斯沃普在去伦敦以前还卖掉了自己手中的一些采矿公司和国际贸易公司的股份，以备发生二者盈亏相冲突的情况。巴鲁克曾经历过“和平泄露调查”，在一战后还受到过许多有关他在战时工业委员会当主席时假公济私的指控。作为一个有过这么多教训的人，他竟在 62 岁时冒着名誉受损的风险轻易地倒向了个人私利的一边，这实在有些令人费解。

对于参加世界货币和经济大会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孔代尔·赫尔来说，斯沃普经常打电话同谁联系倒不是最关键的，他更注重斯沃普和莫利在会议中的表现到底怎么样。会议从一开始就进行得极不顺利，以至于令所有各方都感到十分失望。实行黄金结算制的国家集团在法国的率领之下要求美国和英国尽早放弃货币结算制。而美国则拒绝贸然实行任何试图稳定国际流通货币的措施，而且指责法国这个前盟友拒绝偿还战时所欠的债务。从美国代表詹姆斯·M. 考克斯和法国代表乔治斯·波内特的一番唇枪舌战中，我们能对双方水火不相融的立场略见一斑：

波内特：如果即将选举的货币委员会主席来自一个刚刚把本国货币的含金量降低的国家，法国断然不能赞同。

考克斯：如果这个主席来自一个连所欠外债都拒绝偿还的国家，美国也断断不会同意。

在美国代表团内部也发生了争斗。还是在国内时，支持赫尔的代表团成员参议员基·皮特曼就和另一位代表团成员，国务院的赫伯特·菲斯有过刀光剑影的拼杀。有一次竟有人看见皮特曼在克莱利奇饭店的大厅

里手持猎刀追打菲斯。还有一次，在阿斯特（另一位美国代表团成员）家的一次晚宴之后，参议员皮特曼先生竟把阿斯特的夫人南希女士放倒在地进行挑弄。在这次的伦敦会议上，只有白银问题才关系到与皮特曼有牵连的那些行业的利益。至于赫尔，他基本上主张实行低关税。唯一能使所有美国代表基本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就是：他们都希望美元的黄金含量标准在将来的某些时候能与国际标准接轨。

莫利在于 6 月 20 日带着斯沃普去伦敦之前，曾告诉记者们，在自己外出期间巴鲁克将顶替他在国务院的职位，这样一来诸位记者将有很多机会见到巴鲁克先生。其实他所放出的口风夸大了巴鲁克所能起到的作用，就像人们夸大了巴鲁克在“百日”时期所能起到的作用一样。6 月 22 日，一封写着“伯纳德.M. 巴鲁克收”的电报被发到了国务院。电报题头称巴鲁克为“美利坚合众国非官方总统”，内容只有两句话“祝贺您当选该职务。在我看来，除了您还有谁能配得上这一称呼呢？”发报人的落款是“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一位心怀良好祝愿的人”。这人显然对巴鲁克在政界的影响极为不满。正如赫伯特·菲斯（就是那个在与皮特曼的遭遇战中险些丧命的人）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评论的那样，莫利明知巴鲁克在货币含金量问题上持正统观念，可他还挑选巴鲁克来顶替自己，真是不可思议，要知道罗斯福正在摒弃这种观念，他派莫利和斯沃普去伦敦也正是为了同持这种观念的国家分庭抗礼。

不过莫利当时确实弄不清总统到底倾向于什么，恐怕连罗斯福自己也拿不准主意。6 月 20 日，莫利从伦敦打电话告知巴鲁克，会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黄金问题和建立世界货币体系的宣言，英国方面已经表示接受，但罗斯福总统是否赞同将成为这项会议成果能否得以巩固的关键。巴鲁克听后立刻开始兴奋起来。宣言条款中包含稳定各国货币状况、确立国际统一的货币含金标准这样的内容。各代表团在宣言中还代表各自政府作出了一个很脆弱的承诺：当相关国家的货币价值受到投机行为

的冲击时，将彼此相互合作防止出现动荡。在巴鲁克看来，所有这些都是鼓舞人心的。他立即同财政部长伍丁及副部长迪安·艾奇逊共同向总统施加影响，力劝他批准这一宣言。

然而，罗斯福并不愿意批准这样一个宣言。相反，在视察美国军舰印地安纳波利斯号时，他抽空在路易斯·M·豪和小亨利·摩根索的协助下，正式起草了一份声明，宣布拒绝批准世界货币与经济会议所提出的宣言。这一举动随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从治理经济的角度上，新政的目标就是提高国内价格，农业调整署和全国复兴总署的组建，正是为了通过立法和诱导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黄金法案的制定也是为了通过使货币贬值来提升价格。在与摩根索尔和豪进行讨论时，罗斯福对放弃自由管理内政的权力而屈服于什么国际协议这一主张勃然大怒。他措辞强烈地致信赫尔说：“对一个国家来说，保持国内经济形势的稳定，比保持其货币对外国货币的汇率稳定更加重要。过去，我们迷信于所谓‘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价值调节规律’，现在，我们应着力确定本国范围内的货币价值，目标就是使国内货币价值就国内商品价值而言其购买力相对稳定，并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于世界货币与经济会议后来的进展，人们不得而知。对美国代表团来说，总统的反对意见则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莫利因对这个遭总统否定的宣言持赞成意见而退出了代表团。曾在与莫利的对立中处于劣势的赫尔却名正言顺地在代表团中站稳了脚跟。那些主张统一世界货币黄金含量标准的顾问团成员也退出了。瓦尔堡是他们中辞职较早的一个，他临走时留下这样一句话：“我们尤如在一片陌生的海域奋力航行的领航员，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海图。我觉得自己无所适从，实在是难以胜任”。

巴鲁克这个“领航员”比瓦尔堡更老成，更有智谋而且更会看风使舵，因此他没有对总统的决定表示异议。7月中旬，在赴欧洲看望妻子和女儿一周之前，他给约瑟夫·丹尼尔斯写了一封信，说：“我一直在尽

最大努力去处理好不断出现的风险，但有些风险竟是自己的老朋友带来的。对此，我必须默然承受，就像有时必须吞下某种刺激性极强的药物一样”。他在信中告诉丹尼尔斯自己将动身去维希，用那里的温泉“把自己思想体系中那些邪恶的成分一洗了之”。斯沃普打来电报祝他一路平安，并祝他的婚姻生活在牢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同年夏末，巴鲁克在捷克斯洛伐克遇到了与自己在同一条战线中奋斗多年的两个民主党老战友卡特尔·格拉斯和法兰克·坎特。一位捷克伯爵邀请他们一块儿去打野猪，还作东给巴鲁克过了 63 岁生日（当时华莱士也受到了邀请，但因故未能前往。在华莱士看来，由于自己的缺席，坎特当时就成了到场的唯一一位旅居欧洲的“美国失意派政治专栏作家”）。也许他那只尚有听力的右耳在欧洲听饱了各种反对新政的牢骚话，当巴鲁克回到纽约时，他在政治态度上仍然犹豫不定。

何去何从？据巴鲁克对莫利讲，他当初曾为罗斯福慷慨赞助过 20 万美元的竞选基金。众所周知，他还在竞选中和竞选后呕心沥血地为罗斯福出谋划策。在罗斯福宣誓就职后的 1932 年秋天，巴鲁克曾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警告说，通货膨胀一旦发生，国家将面临危险。随后，《星期六晚报》请他撰文论证这一观点，他答应了。文章很快就写好并交了出去，报社准备在 11 月末刊登。

随着这篇文章发表日期的临近，作者巴鲁克却成了众矢之的。尽管巴鲁克在文章中没忘了赞扬罗斯福那“伟大的创造性的劳动”，他还是写道，由于人们对政府干涉货币价值怀有恐惧，经济的复苏受到了阻碍。数个星期以前，《幸福》杂志第 10 期上曾有一篇文章发出这样的质疑：“巴鲁克现在说话还管用吗？”作者所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显然是想说，巴鲁克的话已经不那么值钱了。该文为了攻击巴鲁克，还引用了他的一些保守性倾向极强、甚至有些极端的言论，其中包括这样的话：“国家降低货币的黄金含量是对债券持有者的掠夺”；“我们提高价格只

是为了维护那些仅占人口比例 20%的一小部分人的利益——那些失业者、负债者，那些无能的蠢人的利益”；最后还有“政府不是在播种财富而是在播种贫困”等等。

巴鲁克对民主党是无比忠诚的，他很担心自己会在党内遭到排斥。1933 年 6 月，他开始为自己辩护了。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去年，一些朋友请我写一篇反对通货膨胀的文章。我写了，并把它发表在《星期六晚报》上。如果我当初知道您将采取现在这样一套做法，尽管我对您所做的许多事情持有不同意见，我也绝不会把那篇文章拿去发表。我其实并不想在公开场合发表与您相左的意见”。他写完这封信后，又重新考虑了一下措辞，把“尽管我对您所做的许多事情持有不同意见”一句中的“尽管”改成了“或许”；把“许多事情”改成了“某些事情”。

30 年代是个百家争鸣的年代，所有有思想、有见识的人在纷繁的问题面前表现出了很多不同立场，彼此进行着剑拔弩张的争论。在金融界，最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如何废止商务合同中有关“必须用黄金或用市价相当于同等价值黄金的现钞来付款”的条款。从 19 世纪 90 年代的那次通货膨胀以后，信贷商因对通胀所带来的损失心有余悸，在借贷活动中一般都规定，在贷款和偿还贷款时必须用黄金价值进行结算。1933 年 5 月以前，美国财政部自己发行的债券也以同样规定为保证进行发售。据估计，当时在尚未偿清的国家和私人债券中，有约 1000 亿美元按规定需用黄金核算方式来偿还。

新政开始后不久，国会两院颁布了一项共同决议，宣布废止商业合同中规定以黄金价值进行核算的条款。该决议经总统批准后即行生效。美元随即于 1934 年 1 月 31 日起贬值。当初签定商业合同者之所以将以黄金价值进行核算的条款写进合同，就是为了防止货币贬值带来损失。随着美元的贬值，欠贷方的负担减轻了，而发贷方却不可避免地遭受了

损失。愤愤不平的债券持有人涌入法庭，控告国会的这一决议违反了宪法。他们说发布这样的决议等于是宣布盗骗他人资财的行为合法。在诉讼当事人中，有一个叫诺曼的人，他买过巴尔的摩 & 俄亥俄铁路公司 1000 美元的股票。铁路公司曾承诺每半年支付一次股息，全年共支付相当于股本总额 4.5% 的股息，并以美国金币或其他形式的黄金（统一纯度和重量要相当于 1930 年 2 月 1 日所执行的标准）来支付。1934 年 2 月 1 日，公司向诺曼支付的息票实际价格为 22.5 美元。既然此时美元的含金量已经降低，按合同规定，公司应拿出更多的钱来支付股息。诺曼认为，按照新的美元黄金含量标准公司付给的息票每张应值 38 美元而不是 22.5 美元。但是该公司以政府有关法令为由拒绝了诺曼的要求。

政府的禁令持续了 1934 年整整一年。人们不禁要问，政府到底有没有取消商业合同中某些条款的权力？巴鲁克作为巴尔的摩 & 俄亥俄铁路公司的领导人之一，当然也参与了公司当年的决策，在公司向诺曼这样的股东所作的按“黄金标准支付股息”这一承诺中也有他的份。不管怎么说，在感情上巴鲁克当然愿意铁路公司的债务负担能少一点。何况他还是个民主党人，应该站在民主党政府一边，支持它的决策。不过巴鲁克的思想意识中还有另外一套逻辑。他认为，国家政治应以维护群体利益为出发，而不应维护某些个人的利益。所以对一些联邦法律，包括一些即决性的法律，只有他认为是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他才会乐于拥护。尽管白宫律师们总是警告说，如果恢复用黄金进行核算的付款方式，就会爆发新一轮的经济灾难，欠债者们将被债务负担致于死地，1933 年，巴鲁克还以痛心的口气在《幸福》杂志上撰文，批判降低美元含金量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极大地不公正。巴鲁克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鼓励欠债人背弃债权人的国家”。1934 年下半年，当诺曼状告巴尔的摩 & 俄亥俄铁路公司案及其他一系列同类案件被辗转递到最

高法院时，巴鲁克主动写信给当时的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尔（此时伍丁已因健康原因离职）。他在建议中指出，万一诺曼等人胜诉，用黄金进行核算的方式得到维护，诺曼一类人所提出的追加股息的要求就必须得到满足。如果这样，财政部可以对他们要求追加的部分征税。他还建议把税率定为 100%，这样一来，既在形式上执行了最高法院的裁决，又在实质上达到了政府的目的。不过，最高法院最后的裁决使财政部不必如此费事了。1935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一，最高法院以 5 票对 4 票作出裁决，维持政府的法令。裁决理由是：政府在法律上有权决定和重新决定货币的价值，这一权力要高于私人商业合同的法律效力。对这一裁决持反对意见的一位最高法院法官愤怒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涨红着脸，操着南方口音厉声说道：“宪法是一种意义非凡的法律工具。但这一裁决却让人看到，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宪法含义已荡然无存。以前，宪法为制止滥用权力提供保障，可是现在，它已不再有任何保障作用可言了”。

然而，随着政府禁令的推行，股市已随着美元的贬值和上市公司债务负担的减轻而开始攀升。面对股市的好转，巴鲁克终于让秘书玛格丽特·莱汉德代表自己给罗斯福发了一份祝贺电报，他吩咐莱汉德说：“告诉总统，我对股市好转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巴鲁克的思想指南发生了动摇。其实他仍然坚定地认为，决定美元黄金含量的应是市场规律而不是政府干预。1937 年他与丘吉尔的一次谈话就证实了这一点。一位与巴鲁克有过较多接触的女士，正好亲耳听到了两人这场关于货币问题的激烈讨论。她回忆说，巴鲁克在谈话中大胆预言，说当前任何国家所推行的由政府管理货币的做法，都是愚蠢而不合适宜的。巴鲁克说，6000 年来唯一始终能按市场规律确定黄金含量标准的恐怕只有银制货币了，其他货币的价值都受到过人为的干预。这位女士这样回忆道：“当时在场的人都坐在靠近壁

炉的一张长沙发上。巴鲁克和丘吉尔表现得尤为兴奋。丘吉尔站起来打着手势陈述自己的观点，巴鲁克随即也站起来针锋相对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似乎总是占了上风。我记得壁炉的上方挂着一面镶有镀金边框的大镜子，这两个人都不时地把一条胳膊靠在壁炉柜上，并偷眼在镜中看一下自己说话时的表情。

赫伯特·斯沃普在巴鲁克圈子中一直处于关键位置，他曾以审视的态度评论即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老板巴鲁克：“很多人认为巴鲁克是一个乐于奉献的人。他的许多奉献引起了人们极力地歌功颂德，他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但他还是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有时我也问自己，他是否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有时也会表现出虚假的一面来呢？”

的确，很少有人一生能获得如此显赫的名声并被别人看得如此神乎其神，发出这种感慨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受了斯沃普上述这番话的影响。在公众的脑海中，巴鲁克是个富有、睿智、审慎而能量非凡的人。阿瑟·华莱士这个本应对巴鲁克有较深了解的人，1932年也在一篇文章中称巴鲁克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之一”，这使巴鲁克本人都感到诧异。其实，即使是在危机前他也没那么富有。据称罗斯福也曾当着莱克斯·福特和G.塔格维尔的面称巴鲁克在国会中至少“拥有”60名参议员和众议员。

对于巴鲁克的睿智，人们从海伍德·布朗为《纽约人》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略见一瞥，在文中布朗几乎把巴鲁克奉为神明，他写道：“总之，人们还没有了解到，做事如神的巴鲁克其实是他本人与比彻、唐·胡安、霍迪尼、门肯、艾德·怀恩六个人全部智慧的统一体（据布朗讲，危机爆发前一天，巴鲁克与布朗、华莱士和亚历山大·伍尔凯特一行人在大西洋城一条马路的人行道上散步。在话题转到股市问题时，巴鲁克建议大家抓紧买入）。在公众的印象中，巴鲁克还是一个有很多人欠他人情的“华尔街犹太人”——亨利·福特，参议员修·朗曾求助于他，

那些对威尔逊的战时政策发表各种评论的人也要找他帮忙。从 1934 年根据辛克莱尔·刘易斯的小说《多德斯沃斯》（“Dodsworth”）改编的一部百老汇歌剧中就能折射出巴鲁克的影子。该剧第二幕有这样一场戏：多德斯沃斯是一个来自中西部的汽车生产商，为了煞住一个号称是“国际银行家”的犹太人阿诺德的气焰，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犹太人也许真的有国际影响，或许也算个金融界人士，但他并不是巴尼·巴鲁克呀！”

对巴鲁克本人来说，他当然更喜欢被公众看成是一个睿智、审慎的美国政治家，但他为自己总被报纸杂志炒得沸沸扬扬感到头疼。他努力与新闻界人士保持友好的关系，并且能经常给他们留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印象。纽约《美国人》杂志“邮船新闻”栏目的专栏作家哈里·阿克顿曾在一篇文章中以感激的心情这样描写巴鲁克：“有一次当我与巴鲁克同乘一艘船时，他不嫌麻烦地浏览了乘客名单，热情地帮我寻找有价值的新闻线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对我慷慨相助了。他还说我可以任何时候在自己的栏目中报道他的新闻”。巴鲁克还有一个习惯，对于任何一篇刚刚发表的对持友好态度的新闻社论，他都会以私人名义向作者致信表示谢意。有时舆论界对他的赞扬声此起彼伏，于是他长期聘用了曾在纽约《世界》杂志当过记者的查尔斯·S·汉德，让他专门代自己给舆论界的朋友写致谢信。

作为一位要人，巴鲁克的很多举动都被视为能预示某种形势变化的“重大新闻”。1928 年，巴鲁克就“制造”了这样一条新闻——他把自己的办公地点搬到了纽约市中心。到 1934 年夏，当华尔街已不再是他的理想舞台时，他又宣布搬离闹市区。他向新闻界解释说自己已放弃了金融业（但是当年年底他又抓住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赚钱机会，只不过这次他拿出了 83% 的收益来交税），并计划写三本书——《一个美国之子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Boy）、《铺

在美国青年脚下的道路》(The Way That Lies Ahead for the Youth of American) 和《人对自然的征服》(Man's Conquest of Nature)。对于那本自传，他称将亲自动手而不找人代笔。其实这是个弥天大谎，他实际上已经请普利策奖获得者、曾为安德鲁·杰克逊作传的马奎斯·詹姆斯替自己写传记的初稿。这时的巴鲁克显然处于自己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上，《时代》周刊曾在一篇报道中这样评述此时的巴鲁克：“他出现在华尔街上的影子少了，但公众听到他声音的机会多了”。

巴鲁克的财富不仅始终是新闻界的热门话题，有时也会成为急需经济援助的新闻界人士的资金来源。卡特·费尔德是《商务周刊》的撰稿人，他在大萧条期间就曾受过巴鲁克的恩惠。后来他以歌功颂德的口气为巴鲁克写了一本传记。在危机期间同样受过巴鲁克恩惠的人还有戴维·劳伦斯和乔治·索考尔斯基（一位通过稿件辛迪加在多家报纸上同时发表文章的专栏作家），当然还有斯沃普。目前没有记录表明华莱士那时是否向巴鲁克借过钱，或委托巴鲁克管理自己的财产。而法兰克·坎特曾坦言说巴鲁克为自己提供过投资建议，比如在 1937 年，巴鲁克曾提醒他说缩管 & 铸件公司 (Warren Pipe & Foundry) 的股票行情不错，但不宜多买。无独有偶，1949 年，坎特因患关节炎身体被弄得很差，他问巴鲁克自己能否借住他的公寓，并在去市区参加缩管 & 铸件公司董事会（他当时已是董事会的成员）会议时用一下他的汽车。后来，人们果然看到巴尔的摩专栏作家坎特和巴鲁克同车前往市区。两个人住在一起时还互相帮着打针，并以此为乐。另外一个在大萧条时期被弄得举步维艰，并成为巴鲁克经济援助对象的是亚特兰大奥格尔惠普大学。后来，出于对巴鲁克的感念，这所大学为巴鲁克选定的几个人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这些人中包括坎特和肯尼迪。在参加完学位授予仪式后，坎特收到了他的赞助人巴鲁克亲笔写来的贺信，信中的用语相当风趣：“一想到你在学位授予仪式上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笑得几乎要晕了过

去。不知你可怜的老伴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尽管坎特曾多次得到巴鲁克的关照，但两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各走各的道。与其说坎特是“巴鲁克的人”，不如说他们是相对独立的。当然，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一致。比方说他们都对新政的一些措施持不同意见，都很敬重和怀念伍德罗·威尔逊。但至少在有关罗斯福的两个问题上坎特始终对巴鲁克感到很失望。坎特在这两个问题上始终对罗斯福持反对态度，而巴鲁克的态度则总是摇摆不定。1936年7月，坎特曾对巴鲁克发出质询：“我觉得您在民主党中最想做的就是当一个老好人，对这个党目前所奉行的道路您明明持怀疑态度，却总又去推波助澜。您也明明知道这是在帮一个自己不信任也不喜欢的人做事。您、赫伯特，还有我们所有人，都是些什么人呀！这个世界简直挤满了伪君子！”坎特与巴鲁克的另一个严重分歧体现在对罗斯福夫人的态度上。

在坎特看来，这位总统夫人感情用事，喜欢指手划脚，简直是她丈夫的翻版。而巴鲁克恰恰对罗斯福夫人印象颇佳，后者也很欣赏巴鲁克。巴鲁克是总统夫人所从事的慈善事业的最大赞助者之一，并且是她最信赖的一个“好参谋”。罗斯福夫人为人和蔼可亲，也是一个白宫中为巴鲁克通风报信的人。她在巴鲁克和总统之间充当着一个“桥梁”的角色。在1934年1月的一次接触中，总统夫人为表示亲密称巴鲁克为“巴内”，但这一昵称用得并不恰当（巴鲁克一直喜欢熟人叫他“巴尼”）。从那以后，罗斯福夫人又恢复用“巴鲁克先生”这一尊称了。不过两人都愿意为对方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尤其是巴鲁克，他始终给罗斯福夫人的工作以热情有力的支持。1934年，他为总统夫人主持的雷德斯维尔住宅工程出资2.5万美元，次年又为阿瑟代尔工程捐资1万美元，并向前一个项目追加4.35万美元（当时艾尔·史密斯正代表巴鲁克林动物园出面请巴鲁克捐资1250美元购进一对黑色美洲豹，而巴鲁克却以新政使他经济窘迫为由予以回绝。巴鲁克说：“您知道，我们已被政府的措

施搞得坐吃山空了，如果您能告诉我目前如何能赚到那 1200 美元，我一定豁出命去替您把钱弄到手”。1936 年，巴鲁克又为这两项工程提供赞助，这次他掏的钱超过 5.7 万美元。同年，他又为佛罗里达州一位孕妇捐款 200 美元，但没有留下姓名。这个妇女当时生病住院，但又穷得付不起医药费，曾期望以博爱著称的第一夫人能向她伸出援助之手。1937 年，当罗斯福夫人产生了援建纽约市一所学校的想法时，巴鲁克和他的弟弟赫尔曼当即表示把所需的费用全包了。

巴鲁克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帮助总统夫人还有另外一番用意。他想在相互接触中，使自己对国家事务的观点潜移默化地对她发生影响，并希望通过她把自己的想法转达给总统。有时，第一夫人还会把总统的想法转达给巴鲁克（她把与巴鲁克的关系称为“合作伙伴关系”），或者想办法缓解一下巴鲁克对新一轮“政策攻势”的不安。1936 年 2 月，当对政府不满的人又一次把控告政府违宪的状子递到最高法院时，罗斯福夫人还以安慰的口气写信给巴鲁克说：“富兰克林怀着同您一样的心情等着看宪法将得到怎样的诠释”。

既便是有斯沃普、坎特、华莱士及休·约翰逊（他在离开全国复兴总署后也当了一名新闻撰稿人）等人的支持（他们在报刊上成栏地发表支持巴鲁克的文章，试图制造有利于他的舆论导向），巴鲁克还是难以为自己确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大萧条时期是个妒忌与反犹太主义盛行的时代，巴鲁克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两股潮流冲击的对象。加之他从未公开表示过自己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新政，使政治舞台上的新政派和反新政派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他，国内外的激进主义者也都将他作为攻击的目标。在国会中，修·朗经常攻击他是在背后操纵政府的秘密势力。朗甚至认为，巴鲁克事实上还操纵过胡佛总统。他说：“我们觉得是用罗斯福换掉了胡佛，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换一个巴鲁克的代理人换掉了另一个他的代理人”。底特律广播业的“教父”查尔斯·E. 考夫林甚至把“美

利坚合众国事实上的总统”、“华尔街的无冕之王”这样的帽子扣在巴鲁克头上，并声称巴鲁克名字中的字母“M”是“玛拿西”^①的简写，而不是“梅涅斯”的简写。充满憎恨、写满恶语的信件不断涌向巴鲁克远离闹市的寓所。1935年他竟收到一封手写的出语恶毒、充满反犹主义情绪的信，写信人要求他为美国做点儿好事，“找个僻静地方一枪崩了自己”。

每一轮攻击巴鲁克的舆论宣传必将引起一轮与之抗衡的反宣传，因为每到这种时候，巴鲁克的那些朋友中总会有一个或几个人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例如，1935年，华莱士在一篇反驳朗的文章中提醒人们注意，巴鲁克远非有些人所勾划的那样无所不能。他说，事实上巴鲁克不仅已在华尔街严重受挫（他已不可能实现拥有一条铁路的梦想，这便是一个佐证），而且近期来在华盛顿也很不得志（因为他对政府的所有建议都遭到了冷遇）。针对巴黎一家报纸把巴鲁克描绘成“罗斯福总统最重要的金融问题顾问、美国犹太人政策半官方的制订者”的说法，作为巴鲁克最忠实朋友之一的约翰逊撰文指出，巴鲁克实际上对政府的金融政策持反对意见。有时，巴鲁克和他的朋友们把保持沉默作为最好的反击方式。例如，1935年，斯沃普主张用一言不发的方式来表示对考夫林的蔑视。不过紧接着考夫林这位政府法律顾问对巴鲁克的攻击文章，斯沃普写了一篇关于宝丽来成像公司的报道。他说这家公司仅生产太阳镜就足够了，不需要生产照相机和胶卷，因为戴着这种眼镜片看人“非常之清楚”，清楚得“让我感到惊诧”。^②1934年，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沙尔指控巴鲁克犯有将投资秘密转到国外这一卖国行径。巴鲁克立即与阿肯色州参议员乔·罗宾逊进行联系，商讨如何回应沙尔的指控。罗宾逊与巴

^① 玛拿西，古代以色列暴君，人们对他根深蒂固的印象是：惯用妖术、巫术，杀人如麻——译注。

^② 这是在讽刺考夫林常用有色眼镜看巴鲁克，不能象拍照片那样真实地反映人的本来面目——译注

鲁克关系极为密切，过去每当巴鲁克受到诽谤时，他总是忠实地站在巴鲁克一边帮他发起反击。罗宾逊建议说，对那些无稽之谈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连反驳的必要都没有。巴鲁克在给罗宾逊的回信中用十分风趣的语言表示赞同。他写到，假使“我们”作出什么申辩，反倒证明他们讲的那种事实确实存在。

1935 年，又有人企图证明巴鲁克在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期间曾以权谋私。结果适得其反，发难者不但没能得逞，他们的失败反而有力地证明了受非难者的清白。这些发难者是以参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为阵地向巴鲁克发起攻击的。该委员会由哈罗德.P. 奈于 1934 年召集成立，职能是对军火工业展开调查。在一个刚刚步入青云的白宫律师阿尔杰. 希斯的协助下，奈计划调查军火企业在一战中的谋利范围和谋利手段，以揭示那些“播种死亡”的商人们为谋取经济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对政府施加了影响，同时研究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如何避免这种影响。按照奈等人的逻辑，资本家谋取经济利益的需要是侵略战争的一个根源（事实似乎也真地如此）。那么，一旦政府试图达成和平而使资本家无法继续大发战争财，他们必然会对政府加以阻挠。奈氏委员会在调查中传唤了许多证人，巴鲁克就是其中一个。多年来，巴鲁克一直支持“利用战争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做法。在 1934 年 12 月，罗斯福总统还曾任命巴鲁克担任某联邦政府高级专门小组负责人，小组的任务是起草专门法律，为国家“利用战争创造财富”提供依据和保障。后来，他向总统夫人埃丽诺. 罗斯福提出了由政府来控制军火企业的建议。巴鲁克认为，这样做不仅能使国家在处于战争危险时较好地进入准备状态，还能使相关的生产设施发挥“最大的效益”。

作为证人，巴鲁克是愿意合作的。然而，奈在传唤巴鲁克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不怀好意。巴鲁克虽然直到 3 月份才受到传唤，他的朋友参议员詹姆斯.F. 伯恩斯从一月份就开始收集“弹药”，以备向奈那帮人发

起回击保护巴鲁克。到巴鲁克最终被传唤作证时，奈等人的询问果然明显带有敌意，他们要求巴鲁克出示 1916-1919 年间的个人纳税报表副本，以及期间他所持有的证券清单等。可在巴鲁克交出这些材料后不久，就有消息说巴鲁克的纳税申报表原件被财政部档案室给弄丢了（其实档案室是在例行销毁过期档案时将其处理的）。这样，就给人造成了一个巴鲁克为销毁证据而将原始档案秘密偷走的印象。

奈和希斯实在是小看了他们的对手。巴鲁克不但没有犯任何他们怀疑的罪名，还作好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的充分准备。在出庭前，他就向委员会提交了自己自 1916-1919 年度的纳税申请表副本，以及这几年间他持有的所有证券的清单（多数是一战时美国政府发行的自由公债），另外还有战争期间他无偿捐给各种教派组织的捐款清单（这些钱都是他从自己所获的红利中拿出的），这些组织包括哥伦布骑士会（the Knights of Columbus），基督教青年会（YMCA），犹太青年协会（YMHA）和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他还冷冷地向委员会表示，自己愿意交出更多的个人详细资料，并且愿意与委员会合作使工作进行下去，因为他理解委员会找他的目的就是调查军火工业。

三月下旬，有三个忠诚卫士一直战斗在巴鲁克的身边，他们是贴身男仆雷西，忙着为他准备各种档案材料的秘书阿黛尔·布赫女士，以及特意住进华盛顿卡尔顿饭店的斯沃普。斯沃普和巴鲁克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演练对阵方案，整理证据材料，设计战略战术。斯沃普提醒巴鲁克，在委员会会议室门口，参议院的朋友们会等在那里与他握手，以示支持，巴鲁克应该尽量拖长与他们握手的时间。斯沃普一辈子都把拖延行动作为一种策略，所以他还建议巴鲁克可以晚几分钟露面，不过巴鲁克没有采纳。斯沃普还帮他分析说，他用于陈述材料的时间越长（这些材料要事先准备好），委员会那帮家伙向他发问的机会就越少，次日的报纸把炒作的焦点放在他身上的可能性也越小，而委员会受新闻界批判的可能

性则越大。在巴鲁克出庭作证的第一天，一切都按上述计划顺利进行。到第二天时，巴鲁克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好陈述的。而那位一心想用一大串尖刻问题搬倒巴鲁克的提问人，那位白宫律师，在听巴鲁克义正词严地回答的同时，还不得不分出心来与在场的卡特·格拉斯周旋。格拉斯对他的提问方式表示不满，并提出抗议。他不时惊叹道：“上帝，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无聊又荒谬的提问！”最后，伯恩斯参议员挺身而出，他用自己的人格担保巴鲁克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慷慨精神和爱国情操，还列举了种种事实。伯恩斯特别提到了一件事，他告诉在场的人，巴鲁克在战争期间曾自己出钱给那些困居在家的战时工业委员会同事的家属们添置厨房用具。伯恩斯话音刚落，斯沃普就激动地大声问记录员：“这两位先生的话您听清楚了吗？如果听清了就请一字不落地记下来！”那位记录员点头说“记下来了”。于是，斯沃普转过头用更为激动的声音对巴鲁克说：“伙计，看那些混账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再也不用浪费口舌了！”

诽谤者果然从此哑口无言。

第十四章

他的职业是冒险！

1938年1月11日星期二，安妮·莱丽芬·巴鲁克染上了肺炎，5天后的星期日下午，她在纽约自己家中去世，终年65岁。第二天，家人为她举行了葬礼。在悼词里，人们称她为一个娴静、充满仁慈母爱情怀的女士。说她热心于资助艺术事业、尤其是戏剧事业，喜欢收藏银制古玩和家具，并且尽量使自己不生活在丈夫的闪亮光环之中。

巴鲁克邀请了总统夫人埃丽诺·罗斯福参加妻子的葬礼。在接到邀请时，埃丽诺对在场的朋友们说了这么一席话：“我弄不明白巴鲁克为什么希望我去参加这个葬礼。巴鲁克在妻子活着时可并不怎么在乎她”。巴鲁克对妻子的哀悼与其说是出于悲伤，不如说是出于他对妻子的负罪感，和他们多年以前的旧情。他们的婚姻在安妮去世时早已只是一种形式了。老年的安妮身材矮小臃肿、老态龙钟，而巴鲁克此时已把热情转移到那些年青漂亮的女人们身上去了。对充当权力经纪人、选购股票、打鹌鹑以及其他所有巴鲁克热衷的事，安妮丝毫不感兴趣。在朗和考夫林猛烈攻击巴鲁克时她还受到了惊吓。她生前为没能有个孙子而十分哀伤。

1936年秋天，当斯沃普夫妇添了一个孙子时，安妮在给他们的贺电中流露出很强的羡慕感和失落情绪，电文写道：“你们添了个孙子，我可没这个福气了”。

在安妮去世后，又传出了前白宫医生卡里·格雷森的死讯，巴鲁克又一次深深陷入了失亲丧友的悲痛之中。在哈定时代，心怀恶意的民主

党人有一次曾企图把这位医生发配出去。格雷森是海军的人，威尔逊任总统时曾提升他担任一个并不合适的职位，共和党人就是借着那个提升想要把他排挤到菲律宾去。巴鲁克得知这一阴谋后立即出面干预，制止了共和党调离格雷森的企图。格雷森一直是与巴鲁克并肩战斗的伙伴，如果他们被分开数千英里，当然不可能互相照应了。巴鲁克有一次在回忆格雷森时说：“我们共同度过了许多难关，经历了许多难忘的历程，我们的友情日渐深厚。正因为有了这种珍贵的友情，我们才觉得生活很有意义”。另外，巴鲁克也能对乔·罗宾逊说出这样的话。罗宾逊由于为自己在参议院的工作操劳过度，于1937年7月过早地去世了。

面对挚友和妻子的死，一个人很自然地也会想到自己迟早也将面对死亡的那一天。其实巴鲁克的日子还长着呢。他最终活到了可以向约翰·F. 肯尼迪总统提供建议的日子，活到了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弄得忧心忡忡的日子。他的长寿还使他目睹了两次规模小于世界大战的国际冲突，以及原子弹给全世界带来的威胁。他最终享有的是一个95年的漫长人生。对疾病的万分小心是维持他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巴鲁克的父亲是一个富有而且将个人利益视为至高无上的医生，作为他的儿子，巴鲁克也从来不让自己的身体受委屈，也从来没使自己（以及自己的亲朋好友）失去过良好的医疗照顾。他很注意饮食，喜欢用温泉水洗浴，还坚持在户外举轻哑铃增强体质。安妮去世后，他雇了个私人护士，专门在家照顾自己的生活。

不管身体状况如何，巴鲁克一直严遵医嘱。他丝毫不打折扣地按照医生的话去做，在向自己的医生付账单时也从不含糊。他大把大把地吃维生素等各种药片。一位医生并没给巴鲁克做过什么事，只是口头上答应巴鲁克任何时候都可以赶来为他服务，巴鲁克就给了他一大笔钱。那位医生说：“巴鲁克对医生的话言听计从。如果哪个医生告诉他到月球上去能保住健康，他肯定会想法到那儿去的”。

尽管巴鲁克十分注重保养身体和预防疾病，进入老年以后他的健康还是出了些问题。曾在 1932 年严重折磨过他的痛风病在 30 年代后期又重新发作。到 1935 年，他不得不靠拐杖走路了。1936 年的一天，巴鲁克在纽约 57 号大街东段与一个人发生争执而撕打起来，他用拐杖一下子就把对手打倒在地。一个在附近的警察过来处理纠纷，巴鲁克对他嚷到：“把这个混蛋拉起来，让我再揍他一顿！”此时他正患着严重的关节炎。他的左耳很早就丧失了听力，1939 年前列腺又发生了病变，肾脏也不是很正常。这年他还接受了一次乳突炎手术。可这年八月他却感觉健康状况比过去十年的任何时候都要好。他告诉别人说，他的医生刚刚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以前没能诊断出的“轻微感染”，并把它治好了。

也正是在 1939 年 8 月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一触即发。巴鲁克很希望自己的身体状况能更好一些，使自己能全力为战争奔走，他也竭力让别人相信他的健康允许他参与战争事务。早在 30 年代中期，他就预见到了战争的爆发，并提醒本国人民要做到有备无患。正如巴鲁克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战时经济动员的权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那天起，他就以巡回讲学和著书立说的方式，努力把人们的兴趣引到研究战时经济动员的问题上来。

一个非常了解巴鲁克的助手这样评价他：巴鲁克是个希望自己在危难时刻能有所作为的人，“他的职业就是冒险”。除了有一个在危机到来时贡献力量的迫切愿望，巴鲁克还有一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包括他个人的荣辱）的爱国心（在赫伯考庄园的大客房里，挂着一幅他的爱马“幸运的阿尔杰”的画像，这匹宝马曾于 1927 年在贝尔蒙特公园举行的障碍赛马会上夺标。画上的骑师穿着红白蓝相间的赛马服，这表现他是克尔肖·斯雷堡的骑手。克尔肖·斯雷堡是巴鲁克参加赛马会时的专用名。这匹骏马精神抖擞，从中能折射出它的主人勇于战斗的精神）。第二次大战刚一爆发，他就当了一名不拿工资的专职公务人员。

巴鲁克对待战争问题同他对待政治和经济问题一样，采取折衷主义。早在 1935 年，他就声讨希特勒是“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1938 年，他为志愿赴西班牙帮共产党人同弗朗哥作战的美国人组成的亚伯利罕·林肯旅捐款 11,060 美元。^①他对希特勒和弗朗哥的立场都能表现他激进的一面。1939 年，他又把斯大林同希特勒混为一谈，说他们是“嗜血如命的两个同胞兄弟”，这显然是偏右的观点。1941 年，巴鲁克还要求政府对工资、物价和私人收益加以控制，此时的他显然是站到了那些新政派理论家的一面。这些理论家主张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应扩大政府权力（1936 年，巴鲁克甚至建议实行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限额，这把新政中实行的相应措施又向前推进了一步。1937 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感到，对于工商界人士来说，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接受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够接受政府的安排而不是抵制政府，也不叫他们的律师们去找政府捣乱，那么，我们会在已选定的道路上发展得更快、更平稳）。但是在民间与军方的矛盾斗争中，他往往站在军方一面。

巴鲁克唯一坚持不动摇的主张，就是要求国家加强国防建设。他主张建立战略原材料的储备，扩大军备生产，尤其是战斗机的生产，还主张恢复前战时工业委员会的一些做法。1938 年 7、8 月间，巴鲁克正在例行每年的夏季休假。一天晚上他同罗斯福总统进行了一次会面，并陈述了自己的主张。巴鲁克预言说，采取上述措施是感到警觉的一种表示，这将引起希特勒的恐慌。罗斯福持着赞许的态度听取了他的建议并表示同意巴鲁克对形势的预测。两人研究筹建“国防合作委员会”，总统表示由巴鲁克出任该机构主席。鉴于巴鲁克即将赴欧洲，两人拟定在巴鲁克 9 月份回来以后成立该委员会。两人商定由巴鲁克在十二月份向政府提交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当时，巴鲁克刚刚受到政府委托赴欧洲考察军

^① 他说这笔钱用于帮助在战斗中受伤的美国人的返乡——原注。

事形势，他在极度兴奋之中上船起程了。在英国和法国，巴鲁克发现两国面对战争危险却毫无准备，对此他感到十分惊骇。他当即于 8 月 19 日（这天恰好是他的生日）给白宫打了个越洋电话，告诉总统自己将立刻回国着手执行即定计划。而此时的罗斯福，不仅面临着如何保卫国家的问题，还面临着如何赢得新一轮大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也无法同意按巴鲁克的提议仓促采取备战行动。巴鲁克在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篇公报中曾放风说，即将成立的国防合作委员会将包括前战时工业委员会的两个成员休·约翰逊和乔治·皮克，这当然令罗斯福不快，也让他无法接受，因为这两个人曾公开对新政说三道四。结果这个所谓的“国防合作委员会”最终没能得以组建。

远在欧洲的巴鲁克对这些毫无知觉。当他登上“玛丽女王”号回国时，还一直以为他在 1918 年一战结束时所完成的使命又将重新落到自己身上。当时甚至连温斯顿·丘吉尔都这样认为。丘吉尔当时还是一个普通人，丝毫没有露出将在政坛崛起的迹象。他在与巴鲁克分手道别是这样说道：“显然，如火如荼的局面很快就要到来。你将在美国大展宏图，而我将在英国靠边站”（也许他们在一起时还谈论了股市的情况。几年以前丘吉尔去美国时两人曾一道去巴鲁克林 & 曼哈顿捷运公司查看情况，1937 年 10 月巴鲁克给丘吉尔拍了封电文是“去商店时请考虑美国货”的电报，这显然是提醒后者全面买入美国公司的股票。像对自己的其他朋友一样，巴鲁克对这位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朋友也很乐于提供股票买卖建议）。

罗斯福 1938 年对吉米·伯恩斯说，巴鲁克“是一个备战狂人”。这话不无道理，巴鲁克确实一心一意地想着扩军备战。有一次陆军部助理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无意中提到，因缺少 300 万美元的经费，陆军部无法添置一种急需的火药生产设备。巴鲁克听说后当即表示他个人愿意出这笔钱。约翰逊当然婉言谢绝了（1941 年初马歇尔将军则接受了巴鲁

克赠送的由德国蔡司光学仪器公司生产的一架望远镜，并对巴鲁克深表谢意)。巴鲁克对美国的各种军事行动及美军的各级军官一直怀有强烈的近乎于主人翁式的关注之情。他定期地到陆军军事学院和陆军工程学院讲学。有一次他还亲自过问一个有关一名西点军校犹太学员的案子，这名学员在即将毕业时被控冒犯军校校长。巴鲁克怀疑此案中有反犹主义情绪在作怪。为这件事，巴鲁克与总统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进行了联系，后者又给陆军部打了电话。后来，陆军部撤销了军校校长对那名犹太学员的处理决定，使这名学员最后得以按期毕业，并获得陆军少尉军衔。^①1949年，海军准备任命原“班乃岛号”舰的舰长担任一艘油轮的船长，巴鲁克立刻向时任总统军事秘书的埃德温·华生将军提出建议，说这位当年曾指挥“班乃岛号”成功躲过日本飞机猛烈轰炸的英雄舰长更适合去指挥一艘新服役的巡洋舰或战列舰(巴鲁克对战列舰的青睐不次于甚至要超过海军方面，1940年他曾不无夸张地对斯沃普说：“战列舰在飞机轰炸下坚不可摧”)。

总之，巴鲁克投给军方的“股本”比他投给总统的还要多。据历史学家乔丹·施瓦茨分析，对于对付巴鲁克和进行战争准备这两个问题，罗斯福采用了两条原则。首先，决不能让巴鲁克或其他巴鲁克式的人物来分享权力，原因正如莫利所说的那样，巴鲁克这种人太狡诈了。其次，即使是在国家进行战争动员这样的紧急情况下，也不能允许有人乘机构架权力基础与白宫对抗。巴鲁克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留下最大的也是最明显的政治教训是，国家在战时不能仅靠一个人(他指的是总统)来对各种重大事务全权负责。罗斯福采取上面那两条原则，实际上是对巴鲁克这一观点的否定。

^① 这个年青人一直在陆军服役，后来成了一名战斗英雄。二战期间，他当上了在欧洲作战的一个美国陆军旅的指挥官，并获得紫心奖章和银星奖章。1955年他以上校军衔退役。在被问及当年在西点军校时所经历的那一事件时，他说：“如果没有伟大的伯纳德·M·巴鲁克先生的努力，我是不会从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他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连他的家人对当年由他引起的巴鲁克与西点间的争执都一无所知——原注

1939年8月1日，战时资源委员会（War Resources Board）宣告成立，其职责是负责巴鲁克20年来反复强调的战争动员问题。但巴鲁克却没进入该委员会。1940年，他也没有进入接替战时资源委员会的新的战时决策机构国防顾问委员会（the Advisory Commission on National Defense）和生产管理局（the Office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 简称OPM）。1941年，当物价及国内供应管理局（the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and Civilian Supply, 简称OPACS）和物资分配委员会（the Supply, Priorities and Allocation Board, 简称SPAB）成立时，巴鲁克同样没能入围。

研究这段时期历史的历史学家曾在书中写道，巴鲁克当时对这些最基本的战争动员机构的实际影响远比表面大得多。很多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被提名进入战时资源委员会的约翰·汉考克长期以来就是巴鲁克的一个同盟者，战时资源委员会给自己所订的第一条工作事项就是要经常性地找包括“前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在内的人协商各种问题。还有，身为生产管理局顾问之一的工业家塞缪尔·R·富勒也是巴鲁克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富勒曾受总统派遣去德国完成一项使命，在那里他曾向包括希特勒在内的许多人提到过巴鲁克的名字。富勒回来后报告说这位元首在听到巴鲁克的名字时暴跳如雷（他显然知道巴鲁克是个怎样的犹太人），巴鲁克听到这件事后十分得意。历史学家们后来还发现，巴鲁克与利昂·汉德森及其他一些为物价及国内供应管理局服务的新政派经济学家们关系友好。基于巴鲁克提出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总统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1941年2月份起，总统定期与巴鲁克会面并共进午餐。

人们能够或多或少地猜出巴鲁克当年是如何向罗斯福及其他任何人论述战争动员问题的，因为谁都知道，他主张在战时完全由国家控制各种资源。首先，他认为政府应该做到按国防需要优先安排交通工具制

造业的生产。例如，在飞机和碎蛋器^①之间，政府当然应该优先生产前者，这样才算是把珍贵的钢铁资源用在了刀刃上，而不是浪费在生产一些无关紧要的物品上。1941 年春天，一个推销商表示可以给巴鲁克提供一架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北极星”小型客机，这一下激怒了巴鲁克，因为按照他的“优先理论”，在当时形势下，洛克希德应该把生产的所有飞机都优先卖给军方。至于他个人，即使他需要那种飞机，也不会去设法弄一架来。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对巴鲁克的爱国心略见一斑。同时，出于对原料问题的考虑，巴鲁克还认为政府应控制好物价这一关键。他的理由是，如果物价无限上涨，一些财大气粗的制造商就会通过出高价把原材料从国防制造业那儿抢过来，用以生产可以卖出好价钱的物品，这样就会影响国防物资的生产。另外，他还坚决主张对价格的控制必须针对所有商品，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少数商品（巴鲁克是一个有钱人，但是当他评论通货膨胀和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必要性时，不是从通货膨胀对钱的价值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而从它对国家整体形势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1941 年 3 月他在《哈佛商务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在提到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必要性时，他将着眼点放在其他问题上而不是放在稳定货币价值上。1940 年秋，时任布鲁金斯学院院长的哈罗德·G. 摩尔敦查阅了大量巴鲁克发表的关于物价控制的文章或讲话，发现这些材料对研究控制物价对货币和银行业的影响毫无价值。可见巴鲁克反对通货膨胀并不是为了防止自己手中的钱贬值，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巴鲁克还主张，为了在战争时期控制过度消费支出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应把税率定得“像天那么高”。他认为，哪个国家能使国内生产成本和物质水平比其他国家都低，哪个国家就一定能赢得战争。

1941 年，尽管政府对巴鲁克及其冷淡，阿瑟·华莱士却称赞他是“国防经济学界的苏格拉底”，专栏作家乔治·索尔考斯基也呼吁由巴·坎特

^① 一种铁制的日常生活用具——译者注

在自己的栏目中做出这样的估价：“现在，形势被弄得一团糟，只有他（巴鲁克）一个人隐约地看到了如何才能理顺一切”。同年，在格雷第伦家的一次晚宴上，华盛顿的新闻记者们为了嘲弄负责人威廉.S.克奴森和西德尼.希尔曼扮演成一对行动笨拙的连体双胞胎，还用歌曲《哦！苏姗娜》的曲调编了首主题歌，让两位剧中人唱。歌词是这样的：

希尔曼：每当遇至棘手问题，我们总能侥幸蒙混过去。

我们把难题抛给 F.D.R（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他则跑去找巴鲁克！

合唱：OPM，那是一个好位子。

（慢速和声）我们可以带着难题找巴鲁克，民主党会因此得救！

此时的巴鲁克只是一个爱对政府吹毛求疵的政治个体户，他之所以仍能如此受到人们的推崇，原因之一就是他很乐于助人，人缘极好；原因之二是无数人因受过他的恩惠而心怀感激。索考尔斯基、坎特和华莱士之类的人对待巴鲁克不可能不持有一种出于主观感情的友好态度。1941年3月，坎特把自己写的一篇宣传巴鲁克战时经济动员理论的文章样稿寄给了巴鲁克本人，文章充满了感激之情。随稿件寄出的还有一封用词同样殷勤、洋溢的信，信中对巴鲁克设法帮他儿子小富兰克.坎特及其未婚妻搞到紧俏的船票表示感谢。巴鲁克在向华盛顿的官员们赠送礼物时总是一个不落。从总统、总统夫人到总统侍从武官华生将军，从数量众多的参、众议员到白宫新闻秘书厄尔利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他一个都不会忘掉（1941年圣诞节，巴鲁克向他们每人赠送了50美元的慰问金）。其实，总统新闻秘书本人就是巴鲁克的知心朋友，以前也接受过他的慷慨馈赠。1940年12月，巴鲁克给他送过一套金饰。1941年5月，在蚊子开始在华盛顿肆虐之前，巴鲁克又出钱给厄尔利

家的房子装了纱窗。还有一次，有人揭露厄尔利曾对纽约市的一位警官实施人身攻击，巴鲁克又在背后出面平息了这件事。这使总统新闻秘书深为感激，他特意给巴鲁克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您总是在别人遇到麻烦时默默伸出你那双有力的援助之手，对您这种作风我体会得最深。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鉴于罗斯福有时会同巴鲁克发生意见冲突，厄尔利由于自己的身份不得不站在自己的老板一边反对自己的恩人。1941年10月就发生了这样一场冲突。当时巴鲁克刚刚给威廉·兰索夫·赫斯特写了一封信，赞扬这位出版家在战备问题上所持的爱国主义立场。他写道：“我们不会忘记您为使国家认识到做好战争准备的必要性而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对于那些像我这样主张搞好战备的人来说，您的报纸又起到了多么大的鼓励作用！只可惜我们的努力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封信后来作为头版头条发表在纽约出版的《美国人》上。罗斯福从报上读到这封信后十分不快，他当即命令厄尔利以总统新闻秘书的名义给巴鲁克发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总统现在还没读到今天登在纽约《美国人》上那封您写给赫斯特先生的信。如果他读到的话肯定会过问这封信到底是不是您写的。

巴鲁克立即给厄尔利回信，告诉他那封信确实出自他巴鲁克之手。巴鲁克还声称，不管冒多大危险他都将继续如实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那封信并非出自巴鲁克之手，而是由斯沃普代笔的。不过厄尔利至少觉得巴鲁克勇于承担责任是一种义举。

当然，并不是总统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巴鲁克。很多人（包括巴鲁克本人）都认为也许算得上是总统最亲密的顾问的哈里·霍普金斯是使巴鲁克在战争期间无法有所作为的人。霍普金斯是一个以从事社会福利工作作为职业的人，他身体虚弱、长年有病，曾是工程兴办署的负责人，

后来当过商务部长。战争期间，他呆在罗斯福身边协助制定各种计划、制定各种战略。巴鲁克当年对新政的态度一直忽冷忽热。但他对新政最后时期霍普金斯推出的联邦政府救济方案所持的看法一直没发生过改变。他认为工程兴办署的这一方案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加剧了失业。他曾把这一观点告知霍普金斯。有时，当巴鲁克坐在公园的一条长椅上望着一只鸽子出神时，他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霍普金斯，或者说此时他是因为想起了霍普金斯才注意到眼前的这只鸽子。在巴鲁克看来，工程复兴署那帮人就像眼前这种小鸟一样懦弱无能。

不过巴鲁克是很讲究斗争策略的，他不会故意在高层官员中树敌。相反，既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也是出于个人的天性，巴鲁克很注重与他们搞好关系。在战争临近的时候，他更加注意不使自己对某些官员个人的好恶影响了自己对一些国家事务的看法。另外，巴鲁克也很善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能使埃丽诺·罗斯福觉得自己是自由派人士，也能让法兰克·坎特把自己当作保守派看待；能让罗斯福总统认为自己反对霍普金斯持支持态度，也能让霍普金斯的政敌发现自己强烈反对霍普金斯。关于巴鲁克对霍普金斯的态度，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去看。在政治观点上，巴鲁克也许是反对霍普金斯的，他曾指责后者在处理战争事务时总是犯一些不应该而代价沉重的错误。然而，1946年2月，当霍普金斯的遗体被抬下圣巴多罗马教堂前的台阶时，巴鲁克却获得了参加抬灵柩这一殊荣。

在战前和战争初期的任何时候，巴鲁克对霍普金斯都表现得十分大方慷慨。他经常请霍普金斯到自己在赫伯考的家中作客，还花钱为他取得了杰斐逊岛俱乐部（Jefferson Islands Club）的终生会员资格。1938年，霍普金斯遇到了一个复杂难缠的生活问题，巴鲁克又给他帮了大忙。霍普金斯当时已经丧偶，很想再婚。他已经留意多罗希·多诺温·黑尔夫人好长时间了。后者是个漂亮但一贫如洗的寡妇，她在舞蹈

界和演艺界发展了一阵子后欠下了许多债。黑尔夫人认为霍普金斯会娶她，可他没有。这可怜的女人本来已经饱受债务负担的折磨，这次又雪上加霜，经历了一次令她更加伤心的感情挫折。黑尔夫人也是巴鲁克的一个朋友，巴鲁克曾劝她不要考虑干什么事业了（她想嫁给霍普金斯就有对个人事业上的考虑），最好是先找个有钱的丈夫。他还给了黑尔夫人一张支票，让她花钱装饰一下自己的衣柜。黑尔夫人住在位于中央公园南边的汉普舍尔大楼。一天夜里，她参加完一个舞会后回到家，坐在打字机旁打了一份遗嘱，嘱咐别人如何安排自己的丧事。她还打了几封信给自己的朋友们（在给巴鲁克的信中，^①她说自己为没能按巴鲁克的建议去安排生活感到很抱歉）。凌晨来临以前，她从自己位于 16 层楼的公寓跳了下去。至于随后发生了什么作者就无从知晓了。据已经过世的托马斯·G·考尔克林讲，霍普金斯一直认为是巴鲁克利用其在新闻界的影响，最终把这则爆炸性新闻压了下来，使这起似乎与霍普金斯有关的自杀事件没有被炒得沸沸扬扬。考尔克林说，霍普金斯曾托他转达对巴鲁克的谢意，为的是巴鲁克默默为他做了一件暖心肺腑的事。

四年后，霍普金斯和另一位女士结了婚。巴鲁克为庆祝他们的婚礼，在卡尔顿饭店举行了一次盛大自助晚宴，并邀请在华盛顿的 60 位社会名流参加。在宴会上，每一位女宾都被赠送了一瓶名贵香水，所有客人都可以放开肚量享用高级香槟，厨房开出的菜单长得可以拖到地板上。这场庆祝活动的奢华与霍普金斯及其他一些政界人士平日里所极力倡导的“节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加之国家正处于战争时期，这次铺张的婚宴在新闻界看来自然是一个能引起爆炸性反响的话题，那些反对罗斯福的报刊更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其中华盛顿的《时代先驱》报就登出了一篇持明显抨击态度的报道。对此，巴鲁克向报社老板埃丽诺·帕

^① 1938 年 10 月 22 日周六的《纽约时报》在第 34 版上报了这一自杀事件。为了把事情解释清楚，报道中还提到了死者生前与霍普金斯的那段友情，但没提黑尔死前曾给巴鲁克写信一事——原注

特逊致信表示抗议，巴鲁克辩解说：宴会上所提供的都是饭店的日常饭菜，而不是特意准备的。而且，他们是吃多少买多少，没有丝毫浪费，每个客人的平均开销只有 5 美元。他还特意嘱咐饭店经理千万不要准备任何因战争而十分短缺的东西。还有，宴会用的香槟也是他巴鲁克从自己的酒窖里拿出来的，这些酒是十年前朋友送的，再不喝就变味儿了。据给霍普金斯作传的人记载：“这次婚宴后来被炒作成一场‘特大丑闻’。奇怪的是，霍普金斯因此而受到的责难比巴鲁克还多”。另一件有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是，巴鲁克乃至斯沃普事先竟没有预料到这些不良后果，他们脑子里搞公共关系的那根筋至少在这件事上转得不太高明。不过这些不良影响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在约一周以后，巴鲁克又开始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在报纸上了。这次是因为他宣布自己决定向美国及另外六个盟国的战时社会救济机构捐款 100 万美元做为圣诞礼物。

在哈罗德·伊克斯的日记中还记载了另外一件也在晚宴这种场合下发生在巴鲁克和霍普金斯之间一次尴尬。这件事是巴鲁克亲口告诉伊克斯的，它一下子就引起了伊克斯的注意，于是被记在了他的日记中。伊克斯写道：

巴鲁克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在白宫的一次晚宴上，总统夫人转身对着巴鲁克用那富有穿透力的声音说道：“巴鲁克先生，在我看来您是世界上最英明的人”。巴鲁克显然明白这种好话在当时的场合下不可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于是赶忙想把话岔开，可她却以更肯定的口气接着往下说。总统夫人之所以认为巴鲁克高明得很，也许是因为那一年巴鲁克曾向她建议如何准备个人所得税，而总统夫人采纳了他的意见。巴尼说他发现在总统夫人以这种方式称赞自己的时候，总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快，哈里·霍普金斯听得也很不自在”。

巴鲁克可以想像到，一旦希特勒在战争中获胜自己的结局将会如

何。因为他的名字确定无疑地已经上了纳粹的黑名单，名单上全是希特勒最想抓住的人。1940 年纳粹炮制了一场拙劣而恶毒的宣传攻势，他们先抛出“战争究竟使谁受益？”这个问题，然后自问自答道：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受益人是巴鲁克，他是“天下最有钱的犹太人”，还是“深受罗斯福总统宠信的顾问”。

面对那些抓住巴鲁克是犹太裔美国人这一出身作文章的人，巴鲁克无一例外地反驳说自己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具有犹太人和美国人“双重公民身份”的人（伍德罗·威尔逊曾轻蔑地用具有“双重公民身份”这一提法，指代外裔美国公民中那些把母国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的人）。具有“双重公民身份”，这一带有刺激性的提法不能不对巴鲁克有所触动，并使他感到不安。虽然是个美国人，他毕竟是属于犹太裔的。巴鲁克不信教（当然也不信犹太教），他对其他的犹太人尤其东欧犹太人甚至还抱有很多成见。然而，犹太人的痕迹是无法从他身上抹掉的，世人当然也会把放在其他犹太人身上的偏见放在他身上。在历史和现实中，世人对犹太人的偏见给这个民族带来过许多麻烦。

这些麻烦降临时，巴鲁克本人也时常为其所累。当纳粹开始反犹时，他在德国仍有一些亲属，于是他不遗余力地设法帮助这些人逃出虎口（1938 年一个叫伯纳德·巴鲁克的德国公民曾给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写信寻求帮助。这个人自称是伯纳德·M. 巴鲁克的亲属，也许这个德国犹太人在纳粹的舆论宣传下真地认为巴鲁克当过美国财政部长，而摩根索是他的继任者）。1939 年 12 月，一位德国妇女把自己能逃到英国和她丈夫能被救出纳粹集中营的原因归于巴鲁克的救助。1940 年 6 月，巴鲁克那两位年过九旬的老姑母在他本人和红十字会的努力下被救出德国送到巴塞罗那。

1938 年 10 月下旬，巴鲁克又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如何处理这一难题既关系到他在经济利益上的得失又关系到他的人格是否受损。问题

是由塞浦路斯矿业公司引起的。这家公司在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上拥有一些铜矿，它与德国人一直保持着相当多的业务往来，而巴鲁克曾连续25年持有该公司的股份。巴鲁克对公司应与谁开展业务的问题当然没有独断的权力，不过他在主观意愿上是绝对不想使自己与第三帝国产生哪怕仅仅是商务往来上的瓜葛。鉴于塞浦路斯矿业公司的股份并不在市场上公开交易，他写信给公司总裁哈里·S·马德（他的父亲就是德克萨斯湾项目中那个西雷·马德），表示想把自己在公司中的股份转卖给对方或其亲属。

马德回信说，对巴鲁克来讲，在现在这个时候抛售公司的股份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他说公司目前刚刚开始打开局面，将来的红利显然极其丰厚。不过，当前的股值还实在是难以估算。马德还提出了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他说欧洲唯一能处理本公司矿石的冶炼厂在汉堡，如果巴鲁克非要卖股份而让德国人查觉，他们肯定会被激怒而撕毁销售合同，这样公司将面临危险。

但是巴鲁克却坚持卖掉，于是马德在1939年3月再次写信阐述自己的立场。他说：

您的决定可能给公司带来不利局面，这令我十分失望和忧虑。我不想使公司的销售合同被毁，也不愿面对由此引起的任何后果。公司的股东们也许能承受得住公司经营不下去而带来的损失，但在塞浦路斯的成百上千名工人不能，他们会因此而失业，会成为最大受害者。作为公司总裁，我既要要对股东们负责，同样也要对工人们负责。德国人可以不买我们的精铜矿石和黄铜矿石，但他们还能找到其他买主。而我们的工人一旦失业就再也找不到饭碗了。

事情后来的进展表明，“巴鲁克先生显然接受了这种解释”（他后来没有再坚持卖出股份）。

每当面对一个大问题的时候，巴鲁克往往喜欢提出一个大思路去解决它。面对 30 年代末期那些面临绝境的欧洲犹太人和其他一些属于不同教派的难民，巴鲁克曾提出设想，让这些人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国名就叫“阿非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frice）。

巴鲁克并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没有谋划让犹太民族回到他们的发祥地巴勒斯坦去恢复古老的以色列国。他想为那些深陷困境的无国可依的犹太人提供一个开明的、而不是以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立国方式。这个新国家可以在非洲中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创建并先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开国者们将利用一切现代化工具来兴建这个国家。男人们将带着推土机、杀虫剂和建筑材料首先踏上这片土地并建立立脚点。由于拥有先进科学技术，这项古代靠刀斧石燧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做好的工作，现在只需极短的时间就能大功告成。妇女和儿童们随后就可以赶来加入创业历程。创业所需的资金可以完全由民间筹措，犹太人自己完全可以掏出所需的大部分钱。巴鲁克宣布，一旦这项宏伟蓝图开始启动，他个人将出资 300 万美元。

后来，巴鲁克在赫伯考的家中把自己的这一构想讲给了一位纽约参议员，共和党人汉密尔顿·菲什。菲什一下子就认同了这个想法，并于 1939 年夏天到欧洲去兜售巴鲁克的计划，试图游说英国和法国予以支持。在巴黎，菲什拜见了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斯·波内特和殖民地事务部部长乔治斯·蒙代尔。他提出把拟将成立的“阿非利坚合众国”选址建在乍得湖以西及以南的一片土地上，并说自己已同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哈里法克斯讨论过这一问题，还准备去见德国元首希特勒。菲什特别说明这一方案是巴鲁克提出的，他说按照巴鲁克的估算，这一方案大约需要筹措一亿美元的资金。关于菲什在欧洲所有活动的消息都通过美国驻伦敦的大使馆传到了罗斯福那里。总统把驻英大使馆递上来的报告连同自己的附言一起转给了巴鲁克（总统显然对巴鲁克托菲什去欧洲做这件

事深为不满)。他在附言中这样写道：

“你与我都是考虑问题讲究实际、处理问题讲究实效的人，基于我们的这种作风，我可以很肯定的作出如下评判（其实他作出这种评判的理由并不很充分）：无论是你还是我，都还应该把可敬的汉姆（指汉米尔顿·菲什）当作替我们说话或替我们做事的合适人选。我认为这位了不起的先生更适合回到哈佛的橄榄球队中去当阻截手，那才是他最胜任的工作”。

按照菲什通报的情况，法国对巴鲁克的提案热情很高，但随后战争就爆发了，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到了 1941 年 5 月下旬，希特勒由于害怕美国参战而使自己的敌对方扩大，开始向美国谄媚。他于 3 月 23 日和 5 月 30 日两天分别向德国的新闻界下了两道指令，调整舆论导向，先是停止了对罗斯福的人身攻击，随后放弃了对巴鲁克的污蔑。

许多人（包括巴鲁克的朋友和敌人）都认为巴鲁克对罗斯福的政府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不过人们很难把这种影响力讲清楚。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他基本上应归入巴鲁克的朋友系列）尤其认为巴鲁克在接近政府要员并向其施加影响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能量。1941 年 11 月下旬，正是这位前总统亲自将巴鲁克引见给了一位名叫拉马尔·E. 代斯沃耐恩的律师，代斯沃耐恩当时正肩负着一项意义重大的紧迫使命：防止美国向日本宣战。

代斯沃耐恩的客户是日本特使木栖三郎。这位特使正与国务卿孔代尔·赫尔进行一系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谈。木栖发现赫尔的态度非常不友好，而美国也认为对方含糊其辞。由于代斯沃耐恩是美国自由联盟派的成员，被认为基本上与美国政府高层人员无甚瓜葛，木栖觉得他相

对比较可靠，才委托他帮自己找一条跃过赫尔直接与罗斯福总统接触的途径。代斯沃耐恩最终找到了巴鲁克。1941年12月1日或3日那一天（按胡佛的记载是前一个日期，而巴鲁克的回忆录上写的却是后一个日期），巴鲁克、代斯沃耐恩和木栖在华盛顿的“五月花”饭店见了面。

巴鲁克拒绝了日本人的请求，他很厌恶通过非官方渠道安排会见的做法。事后，他立即向华生通报了情况，以便让白宫知道日本人的企图。华生经与罗斯福商量，指示巴鲁克继续与日本人周旋。于是巴鲁克与木栖的会面又进行了下去。在以后的会面中，巴鲁克询问木栖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位特使解释道，他们的天皇很希望保持和平，如果罗斯福总统能向天皇发出和平倡议，这将有助于安抚日本国内的主战派。他还笼统地提出了一系列交换条件，包括日本从中国撤出大部分军队（美国一直要求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作为回报，美国解除从上一年7月起开始对日本实行的贸易禁运。然而，无论是巴鲁克还是木栖和代斯沃耐恩都没有料到，他们所作的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日本内阁早在12月1日就由天皇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作出了发动战争的选择。

同许多美国人一样，巴鲁克于12月7日星期天早晨坐在家读报纸时得知了战争爆发的消息。不过他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情景与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相同。当时，巴鲁克正坐在纽约第五大街一幢小楼二楼上的居室中，按照自己平时星期天的习惯，他身着晨衣悠闲地翻阅着报纸（也许他首先翻到财经版看前一天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普通股的价格。他曾力荐自己的朋友们买入这种股票。其前一天的收盘价是2.3/8美元，而在大前天（星期五）的收盘价为2.1/2美元）。电话铃突然响了，巴鲁克的私人护士希金斯小姐拿起听筒听了一会儿，便立即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惊人消息转告给巴鲁克。巴鲁克立刻触电般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只喊了一声：“我早就警告过他们！”希金斯小姐后来才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巴鲁克是说他早已预见到将与日本爆发战争并明明白白地提醒过政府

应该如何做好战争准备。巴鲁克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后，下一个举动就是给一连串的白宫官员打电话，他对他们即有指责又有建议更有鼓励。对政府的生气使他几乎要发疯，而最令他恼火的就是罗斯福总统。可他12月7日那天早上偏偏没与罗斯福通话。

在战争爆发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巴鲁克甘愿为政府当顾问并且以个人身份做一些鼓舞士气的工作。他在珍珠港事件后一个月内调查了纽约和费城的军火工业生产状况。调查结束后他向总统致信说：“我发现我们的军工部门生产十分疲蹶，毫无战争紧迫感。我认为您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并使其得到改观.....”。巴鲁克还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名单，列出了他认为可以负责新的战时生产管理机构领导工作的五个人。按照巴鲁克的建议，这个新的战时生产管理机构几乎相当于前战时工业委员会的翻版。罗斯福没有让巴鲁克像在一战时那样继续担任这样一个机构的领导，他也踢开了巴鲁克所提名的任何一个人。最后，总统选中了唐纳德.M. 纳尔逊，他原来在一个并不起眼的机构担任负责人。同以往遇到类似的情形一样，巴鲁克对自己又一次遭受冷落表现得相当达观。在纳尔逊上任的当天晚上，巴鲁克就邀请他共进晚餐。

巴鲁克一向是个美国国家利益的忠诚捍卫者，但他在眼前这一国家遭受危险的时刻却没能担任任何公职。不过，他还是被人扣上了两顶帽子，这令他十分气恼。首先，有人把他说成是“总统顾问”；其次，纳粹的宣传机器长篇累牍地捏造说美国是在巴鲁克这个犹太人的驱使下才参加战争的。巴鲁克曾对华莱士说，纳粹的污蔑严重毁坏了他的声誉，使他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他说：“他们（纳粹）用战争贩子惯用的伎俩加上反犹太主义来诋毁我，使我无法担当自己最胜任的职务，因为他们害怕象我这样一个内行到那个职务上去发挥作用”。巴鲁克全心全意地为国家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这也鼓舞了其他人的工作热情。他一直为帮助唐纳德. 纳尔逊处理技术性和组织工作担当顾问。

他向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提供了许多关于如何管理金属原料和战略矿产以及如何调动各种积极性等方面问题的建议。他建议这位部长每天两次冲着镜子对自己喊几声：“伙计，你一定能行！”当阿瑟·华莱士开始感到自己没能作好给政府拾遗补缺这一工作时，又是巴鲁克出来给他鼓劲。有一次巴鲁克给华生将军写了一封信，解释自己为什么想在华盛顿做事的原因。他说：“我从昨天来到这儿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用自己的手臂帮扶那些气力不足和走路打晃的人”。

巴鲁克经常每周在华盛顿度过好几天时间。他一般在每周一乘早上四点的火车（如有可能他就给自己弄一节特等车厢）离开纽约。每次出发前，他都给在华盛顿的一大批高级官员打电报，通知这些人自己将要去寻找他们。这些官员包括：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P. 帕特森、海军部副部长詹姆斯·V. 弗雷斯特、最高法院当职法官詹姆斯·F. 伯恩斯、陆军装备部部长小列文·H. 坎贝尔将军、国务卿孔代尔·赫尔、国防部后勤部部长布雷荷恩·索摩维尔将军、物价管理局局长利昂·汉德森、战时经济委员会成员米罗·珀金斯以及战时生产委员会成员路德·古利克教授。在华盛顿的卡尔顿饭馆，巴鲁克为自己和贴身男仆雷西以 1000 美元的月雇金包下了一个套房，他们两个在里面各占一间卧室。巴鲁克对前来采访他的《纽约人》杂志的杰弗里·海尔曼说，他多数时候在自己房间中就餐，少部分时候同唐纳德·纳尔逊或其他来访的官员一道吃饭。他说要不是医生拦着，他一顿早餐就能吃下一份牛排和半打鸡蛋。巴鲁克告诉海尔曼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如果每天不能在 7 点半准时吃晚饭就会焦躁不安，容易对人发脾气。所以我在华盛顿从来不出去吃晚饭。我不喝鸡尾酒，也无法忍受到晚上 8 点左右还陪着别人坐在餐桌旁，看着他们喝这种酒。每到晚上我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象一头困兽。我一般在 11 点钟左右就寝”。^①巴鲁克还告诉过哈罗德·伊克斯，他每天晚

^① 后来，海尔曼根据这次采访在《纽约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道巴鲁克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一字不差地引用了巴鲁克的原话。巴鲁克看了这篇报道后十分恼火，因为他不习惯于别人

上上床时都带着《赛马小报》，一边看一边入睡。

巴鲁克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有清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而且惯于制造戏剧性效果。可他直到 1942 年才获得一个得以充分发挥这些特长的职位。这个职位再适合他不过了，好像是他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其实也正是巴鲁克本人为自己争得了这样一个工作机会）。1942 年，美国出现了严重的橡胶短缺。巴鲁克多年以前就预见到这种局面，而且一直敦促政府及早做好橡胶储备以防不测。作为银胶菊（一种可以提炼橡胶的经济作物）种植业的一个投资者，巴鲁克对制胶业非常了解。他对由于政界的浅见而造成橡胶短缺以及由此引发的争吵十分鄙夷。不过，他没有坐在一边看笑话，也没有加入互相指责的争吵之中。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采取应急措施。6 月上旬，巴鲁克就与自己的朋友斯蒂夫·厄尔利提出了一个议案供大家讨论。他们建议总统立即任命一个德高望众的人查明情况并提出解决办法，然后为进一步采取行动扫清道路。

鉴于橡胶短缺的形势异常严峻，政府必须立即开始大批量地生产合成橡胶，否则的话国内经济将面临崩溃。在厄尔利把巴鲁克的建议转达给总统的时候，国会也在研究自己的解决方案。1942 年 6 月，国会经投票决定新建一个管理橡胶生产的政府机构，同时决定建设一批可以从农业作物中提取橡胶的加工厂。除了从农作物中提取外，当时另一个处于改进中的橡胶合成方式是从石油中提取。对于采取哪种生产方式，国会中曾有过一番争论。鉴于从事农作物种植的人口数量要远远多于石油工人的数量，主张发展第一种生产方式的呼声要高一些。

然而，罗斯福认为两个方案都不可取。他在考虑如何否决国会提案

在报道中一字不差地引用他的原话。在那篇报道发表当天早上八点钟，巴鲁克就质问海尔曼为什么要这样做，并声称要到杂志社老板雷罗·弗雷奇曼那儿去告状。结果海尔曼在自己的下一篇关于巴鲁克的报道中又一次一字不差地引用了巴鲁克的一句原话：“我从来不愿意让别人直接引用自己的话”（由此可见，巴鲁克因担心出语不当而招来麻烦，从来不愿意新闻报道中直接引用他的言论）——译注。

的同时给巴鲁克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巴尼：

您是一个“在任何危急时刻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的人，现在您能否“再次伸手”？我相信您的才智将胜过最高法院所有法官的总和！塞姆（罗斯曼）会告诉您我的想法，我随后也会亲自与您会面。

您一如既往的朋友

FDR^①

罗斯福总统在信中提到了“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是因为他本来想让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哈兰·斯通牵头寻找解决橡胶危机问题的途径，但他发现斯通无法胜任这一艰巨任务。罗斯福提到他，等于是承认了自己仅把巴鲁克当成第二人选，但巴鲁克还是接受了任命（他从来不因面子问题拒绝履行使命），在两天后的8月6日，以巴鲁克的名字命名的橡胶问题委员会宣告组成。

巴鲁克出任“橡胶问题委员会”主席一职，一方面是担任领导工作，另一方面是利用他个人的威望起到一种凝聚力作用。他手下的委员会成员有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T.坎伯顿博士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博士。巴鲁克请这两个人加入委员会，表明他将主要依靠科学界的力量开展工作。委员会迅速组成了由25人组成的技术人员队伍，并把他们派到全国各地去查找问题并进行现场研究工作。后来成为政治问题分析专家的塞缪尔·鲁贝尔作为巴鲁克从事战时工作的助手而被指定为委员会的常务秘书。

巴鲁克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查明情况”也就是研究各种橡胶合成方式的优劣，并研究如何解决实行汽油配给制将给政府带来的棘手问

^① FDR，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简写——译注。

题。他们需要弄清能否在国内收集到足够的丁二烯^①来支撑“丁二烯式”生产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国家将主要用丁二烯做原料来生产橡胶。如果采用这种生产方式，那么生产出的橡胶越多就意味着所剩下的高辛烷值汽油越少。如何解决这一系列矛盾正是巴鲁克他们所面临的课题。

“橡胶问题委员会”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办公场所。起初，他们在巴鲁克住的卡尔顿饭店碰头，天气好时就到白宫对面的拉法叶特公园露天开会。巴鲁克在提到这种开会方式时风趣地说：“我们象一群蜥蜴，天气不好时躲在屋里，一有太阳就跑到外面去”。随后一段时间巴鲁克他们又搬到敦巴顿橡树园（在华盛顿郊区）办公。同以前一样，天气坏时在室内，天气好时就到园中的草坪上开会。直到后来政府为他们租下了拉塞尔大厦里的一间办公室，委员会才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不过到这时他们的使命已经快要结束了。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进行，委员会越来越倾向于采用以汽油提取橡胶的生产方式，并制定了一个汽油配给制方案。方案中规定，今后民用汽车只能得到辛烷含量仅能维持 35 英里时速的汽油。当时，美国汽油的供应是相对充足的，这一方案就是要把富余下来的汽油挪用过来弥补橡胶生产的不足。

在技术问题上，巴鲁克的想法与他那些来自科学界的同事们有所不同，因为他考虑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影响和政府如何实施行政管理这两方面的问题。^②作为前战时工业委员会的全权负责人，巴鲁克 25 年来一直抱定一个原则，即战时工业生产应置于某一管理机构的统一协调之下。因此他主张新的橡胶工业管理机构应置于唐纳德·纳尔逊所领导的

^① 丁二烯，一种无色气体，用于制造合成橡胶，主要从汽油中提取——译注

^② 作为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巴鲁克很注意听取公众向他提供的用以解决技术性问题的意见。一个自称来自罗特希尔德家族（欧洲著名银行世家，发展成立了 19 世纪欧洲经济史上有影响的银行集团，其创造人梅耶·阿姆斯切爾·罗特希尔德是德籍犹太人——译注）并同巴鲁克在曼哈顿作过邻居的男子曾向巴鲁克进言说：“尽管我因健康不佳很少出去走动，但不久以前我到过几家大饭店和俱乐部，发现在那些地方橡胶地板革铺得满地都是。如果把它们连起来足有数十英亩大的面积。这难道不是对橡胶资源的一种浪费吗？”巴鲁克听后回答说，据他所知从地板革中提取不出多少橡胶来，它的价值不大——原注。

战时生产委员会（WPB）的领导之下（其实就连这个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也是按巴鲁克等人的建议建立起来的）。巴鲁克还认为，最终使合成橡胶计划取得实际成果的应该是工业界，而不是政府。有一次巴鲁克警告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的两位工程师说，新泽西州橡胶生产部门的经营很可能会受到政府不必要的干预，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教会政府怎样去做它该做的事——为生产部门的生产提供保障。巴鲁克还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问他们是否已经开始教政府如何行事。那两位工程师中的一位法兰克·A. 霍华德后来回忆说，他为自己当时能在巴鲁克面前作出肯定的答复感到很骄傲。他还能回忆起巴鲁克与他们分手时所说的那句生动的话语：“你们一定能做好，要是你们把事情办砸了，我就扒了你们的皮”。

巴鲁克委员会以他们所做的调研为依据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并实事求是地阐述了各种问题。鉴于这些问题迟早要展现在世人面前，巴鲁克把报告的副本发给了所有国会议员及各大报社，还发给了 1800 家大学图书馆，6000 家公共图书馆，1500 家专门图书馆或商务图书馆，还有 230 家法律图书馆。结果，这份报告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巴鲁克委员会发表意见之前，只有 49% 的公众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石油配给制，但在报告发表之后，支持率猛增到 73%。正如巴鲁克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按照“橡胶问题委员会”的方案，到二战末，全体民众“从牙缝中挤出的东西”已经可以支持一个产值达 10 亿美元的产业。

其实，在这一工业奇迹最终实现以前，确切地说早在“橡胶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巴鲁克的出山就在全美国范围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也许出乎某些人的意外。连一向反对罗斯福的广播评论员富尔顿·刘易斯也表示赞许总统对巴鲁克的任命。《华盛顿邮报》在巴鲁克 72 岁生日那天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社论，其中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一看到那位七旬老人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画面，成百万美国人的信任之感不禁油然而生。这种由衷的信任是多么难得啊！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信任的产生是因为那位叫伯纳德·M. 巴鲁克的老人已经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一个研究橡胶问题的三人委员会负责人，他已经有足够的权力回报美国民众的信任了”（巴鲁克看过这篇社论后开玩笑地对《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尤金·梅耶说，这篇社论的用语很像一篇悼词。梅耶大概能够想起“像一篇悼词”这句话的出处。一位国会议员曾用类似的话评论巴鲁克曾对梅耶作出的一番略有些过分的褒奖之辞）。斯沃普的一位朋友还讲过这样一件事：在巴鲁克的报告公布之后，纽约一家电影院中的观众曾对纪录片里出现的巴鲁克报以热烈掌声。

也许是因为巴鲁克更喜欢充当一个能独立评判政府政策的自由评论家，或一个善于为国家解决棘手问题的“世外高人”（担任这两种角色使他得以保留个人的自由时间，同时，既能博得公众的赞誉又避免了日复一日地被公务缠身），也许是因为他的年纪一年年见老，总之，在他的橡胶生产方案即将大功告成时，他开始以非常慎重的态度考虑是否接受政府请他做的其他专职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次，一个从事反通货膨胀工作的职位需要人选，本来巴鲁克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担当此任，而且政府财政问题顾问委员会也有意请他出来担任此职。然而，巴鲁克最终没有接手这项工作，原因不仅在于主管政府税收的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不愿下放权力，还在于巴鲁克也认为这位财长无助于自己搞好工作。巴鲁克曾试图争得摩根索尔的支持，但后者就是不松口。1942年12月15日早上，巴鲁克给摩根索尔打了一次电话，商量认购战时公债^①问题。在他们的对话中，两人各自的性格特点展露无遗：

摩根索尔：你好！

^① 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发行的一种债券——译注

巴鲁克：早上好，部长先生，我是巴鲁克。

摩根索尔：哦，是您啊！

巴鲁克：其实我本不想打扰您，我知道您的公务相当繁忙，我只是.....

摩根索尔：没关系，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巴鲁克：我是说，我可能无法完全履行自己在认购战争债券这件事上所做的承诺，可我不想给您留下说话不算数的印象。

摩根索尔：噢，原来是这样。

巴鲁克：我已经买下了自己答应认购的数额，不过我不想就这个问题给您写一封表明决心的信，然后再让新闻界把它登出来。因为.....不管怎么说，对一个富有一些的人来说，出点钱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就是我通过正常渠道悄悄买下那些债券的原因.....

摩根索尔：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巴鲁克：所以我没写那封信.....

摩根索尔：没关系，您没有必要一定要写。您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我了解您的风格。如果您答应要做一件善事，无论公众知道不知道，您都会去做。

巴鲁克：是的，我只是不愿意张扬，我觉得.....我觉得.....对一个被认为有点儿钱的人来说不应该去.....

摩根索尔：我明白您的意思。

巴鲁克：你知道，那些宣传家们，他们.....他们想要所有人都谈论某个人认购了 100 万美元公债这件事。

摩根索尔：是吗？

巴鲁克：因为我认为.....不管怎么说，出于多种考虑，我不想让自己太显眼了，这似乎不太好。真希望您能理解我。

摩根索尔：我理解，我坚信您做的任何决定都不会错。

巴鲁克：这真是太感谢您了，那我就决定按自己的方式认购了。

摩根索尔：您请便。

巴鲁克：我准备把买公债的钱作为送给国家的一份小礼物，我悄悄地把它买下来，最好不让任何人知晓，至少不让新闻界的人得到半点儿风声。真抱歉打扰了您这么长时间，其实我只是想.....

摩根索尔：没关系。

巴鲁克：再见，部长先生。

摩根索尔：欢迎随时给我打电话。

巴鲁克：感谢。

政府请巴鲁克担任的第一个专职工作，就是就任新成立的经济稳定办公室（Office of Economic Stabilization，简称 OES）主任。这一邀请是总统的助手塞缪尔·罗斯曼于 1942 年 9 月代表政府向巴鲁克提出的，他把这项工作称作“最得罪人的活儿”。经济稳定办公室（OES）主任的工作是主持实施工资与价格法、召集公众执行那些他们并不欢迎的各种法规，并劝导他们与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合作。不过，巴鲁克因为他本人对财政政策问题的观点未能得到认同而拒绝了这项任命。但按照他的建议，经济稳定办公室主任的职位最终交给了詹姆斯·F. 伯恩斯。

巴鲁克差点儿出任的第二个公职关系比第一个更为重大，任务比第一个更为艰巨，意义也更非同小可。这次机会出现于 1943 年 2 月，当时，有关方面对战时生产局及其负责人唐纳德·纳尔逊的工作日益不满。

军方抱怨纳尔逊优柔寡断、缺谋少能，而纳尔逊的支持者们则反驳说，就算纳尔逊身上确实有因过分谨慎小心而造成失误的情况，他至少做到了避免军队直接介入国内事务。在战时生产局内部也存在着支持军队和反对军队的两股势力，纳尔逊当然是后一股势力的领导核心。该局内部支持军方的势力中最显眼的人物就是费尔南德·埃伯斯塔特，这个人过去有过一段辉煌的华尔街生涯，并创立过一项化学基金。现在，他在纳尔逊的战时生产局中主要负责监管优先供应军队的产品的生产和调运（埃伯斯塔特的朋友们认为他现在所创造的业绩丝毫不比在华尔街时逊色）。在支持与反对军队的两股势力的对立中，巴鲁克被夹在了中间。首先，他很敬佩埃伯斯塔特，对军方也持同情和支持态度。但另一方面，他又经常帮纳尔逊出点子、想办法，而且，当他认为军队有超越权限干预国内事务的行为时，总是毫不含糊地站出来加以批判。为了缓解战时生产局内部的对立局面，伯恩斯早在1943年2月就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建议巴鲁克接替纳尔逊出任局长职务。

伯恩斯在就巴鲁克任职一事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这样说：“除此之外您别无选择。在管理战时生产局这种机构的能力上，巴鲁克比其他任何人都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每周都有四到五天时间在华盛顿度过。各工业部门的巨头们都带着自己的问题去请教他。在手中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情况下，他竟仍能化解各种矛盾并使各生产部门间能顺利进行合作”。伯恩斯还指出，无论是国会还是新闻界都会欢迎由巴鲁克来负责战时工业局的工作。此外，巴鲁克还能解除批评家们对政府政策的攻势，而且他的忠诚可靠也不容怀疑。在信的最后，伯恩斯又巧妙地加上了这样几句话：“总统先生，如果您选择了巴鲁克，那么您不仅是任用了一个最胜任该项工作的闲才，而且还任用了一位您最要好的朋友。另外哈里·霍普金斯也让我转告您，对于我的这项建议，他也十分地赞成”。

罗斯福接受了伯恩斯的建议，并指示他替自己给巴鲁克写一封信，

请他出任此职。这封信将会经罗斯福亲笔签名后发出。信很快写好了，伯恩斯在总统审阅签名后亲自把信送到了巴鲁克下榻的卡尔顿饭店。巴鲁克打开信封，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巴尼：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在遇到有关战时工业生产的问题时总是请您出来相助。为此，您毫无保留地付出了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建议。这些都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我知道，您现在也许只希望以提供建议的形式为国家发挥作用，而且，您可能并不愿意接受一个行政职务，因为这样一项工作会几乎会占用您所有的时间。然而，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候改变一下国家战时生产管理工作的方向是个明智之举。所以，我又来找您这位资深政治家寻求帮助了。我想提名您担任战时生产局的新局长，并赋予您相应的权力去管理各项工作。凭着您对这类工作丰富的经验以及您卓越的组织能力，我相信您一定能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也不必去日夜操劳。虽然我不愿意让您过分劳累，但我希望您能接受这项工作。我相信，对于您认为有助于国家顺利走完战争进程的事，您甘愿作出任何牺牲。

最诚挚的朋友

富兰克林.D. 罗斯福

1943年2月5日

然而，伯恩斯并没有象自己所期望的那样从巴鲁克口中得到肯定的答复。巴鲁克只是说自己需要时间考虑一下，而且他还要听取一下医生的意见，看看自己的身体能否胜任如此重任。另外，一旦他接替战时生产局局长，他要求自己的一位老朋友和老盟友，莱赫文兄弟中的约翰·汉考克能同自己一道工作。伯恩斯对巴鲁克的答复感到十分震惊。他刚

刚为巴鲁克所花费的政治投资足够谋得一个国王的职位了，而这个巴鲁克竟不明白自己（伯恩斯）为他所争取来的正是他最需要的东西。伯恩斯试图劝巴鲁克改变主意，可后者还是固执己见，并且告诉伯恩斯，自己马上就要回纽约去了（在找巴鲁克之前，伯恩斯曾向罗斯福断言：“巴鲁克肯定会欣然接受。虽然他从未对我说过他愿意担当这种工作，但凭我对他的了解，我敢肯定他的心思一定是放在搞好战时生产这件事情上的。他对这一使命的渴求要强于对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的需要……”）。

尽管伯恩斯是在暗中谋划由巴鲁克代替纳尔逊这件事的，他的行动还是被人发觉了。白宫中有人把这件事捅到了热衷于调查政治事件的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那里。弗兰克福特这个人一向对巴鲁克很反感，他当然站到了纳尔逊一边（弗兰克福特在谈到巴鲁克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做好战时生产管理工作，不能仅靠时不时地搞一些别出心裁但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巴鲁克最大的本事也是唯一的本事就是不断地摆这种花架子。如果他被正式任命为战时生产局的领导，他仍会靠这一招去打天下”）。这位最高法院法官向在战时生产局工作的一位朋友拉响了警报，他的这位朋友又打电话把伯恩斯的密谋通报给纳尔逊。纳尔逊当即采取了反击行动。第二天（1943年2月16日）一大早，他就命令埃伯斯塔特走人，因为他认定这个人是巴鲁克的党羽，是隐藏在他局里的第五纵队。纳尔逊还立刻向新闻界宣布了把埃伯斯塔特解雇的消息，当晚就陪罗斯福总统一块喝咖啡去了。

与此同时，巴鲁克正躺在纽约家中的病床上。他在回来的路上开始发烧，一到家就病倒了。不过偶感不适对巴鲁克来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时他是确实染了病，而有时完全是心理因素在作怪——他过分担心自己的健康了。巴鲁克在任何时候都不忽视自己的健康。在外出散步的时候，他经常莫名其妙地停下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脉搏。曾经一次，别人邀请他参加一个露天宴会，他以这样的解释予以谢绝：“我不喜欢跟

一大群人呆在一起。总有人走上前来跟你搭话，他们咳嗽时浊气都喷到你脸上了”。1945 年他在奉命飞赴欧洲拜会丘吉尔时，还特地带上了自己的私人医生和私人护士。巴鲁克曾回忆起那年在谢绝了伯恩斯后在回纽约的路上染的那场病。他写道：“那一次的情形实在是可怕。他们怀疑我的肝脏出了大问题，甚至有可能是肝癌”。

伯恩斯也回忆说，那一次巴鲁克在回去好多天之后才给自己写来一封信。

不多久，巴鲁克决定接受总统的任命，他在汉考克的陪同下回到了华盛顿。不过此时的罗斯福已经改变主意了。

当巴鲁克来到罗斯福面前向总统表示自己愿意履行新职时，他只说了一句：“总统先生，我奉命来此向您报到”。可罗斯福却装作没听到他的话。

巴鲁克在回到纽约时实际上并没有生病，他是在下列心理因素的强烈撞击下才认为自己病得不轻；他感到了自己的衰老却绝不承认自己已经昏愤无能；他想继续当一个编外顾问，而不愿接受一个责任重大的实际职务；他想按自己的意志为国家出力可又很清楚最终决定一切的是罗斯福.....如果有人用上述心理分析的角度来揣测巴鲁克，他一定会嗤之以鼻。对于任何心理分析，无论是出自职业心理医生还是普通人，巴鲁克都会不屑一顾。不管怎么说，当巴鲁克因受到罗斯福的冷脸而离开总统的办公室时，他依旧感到无官一身轻，而且，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对自己能像这样轻松下去感到心满意足。

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春天，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一位妇女找到出自本州的国会议员阿尔伯特·高尔请求帮忙。这位妇女年纪有 50 多岁，身高 5 尺 4 寸，体重 150 磅。至于容貌，按她自己的话讲，“还不算难看”。这位女士告诉高尔，她很希望能与一个人结为夫妻，那个人

就是伯纳德·巴鲁克（她提供了另外一些个人资料。她说自己教过钢琴课，编过一本有关烹饪的书，为俄克拉荷马的百货商场编写过广告，还获得过法学学士学位。作为一个民主党人，她坚持按时参加党内的各种活动。她还是东星会（Order of the Eastern Star）的教徒。这位女士还对高尔说：“我万分仰慕伯纳德·巴鲁克。他是一位举止高雅、学识渊博、能力超群的绅士。我觉得自己的条件还不错，你能否从侧面打听一下巴鲁克先生是否愿意对我这样一个人作出考虑？”

其实，巴鲁克对婚姻的态度同他对人们每天上午 9 点到下午 5 点的日常工作的态度一样。他看待别人的婚姻就像看待别人的工作一样，觉得那是很崇高、很值得尊重的事物，而他看待自己的婚姻也像看待自己日常工作中的琐事一样，觉得没什么新鲜感。有一次巴鲁克曾告诉哈里·霍普金斯说，如果他能找到一个能同路易丝·梅西相媲美的新娘（路易丝是霍普金斯的第二任妻子，霍普金斯因找到了她而被巴鲁克称为“幸运的求婚者”），他肯定也会再婚。不过他说这番话只是为了像个骑士那样彬彬有礼地表达对女士的赞美之情。失去妻子后的巴鲁克始终过着独身生活。在安妮去世以前，巴鲁克不可能与妻子离婚。但在安妮死后，他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与情妇们来往了。据海伦·拉里森讲，那些女人中有一个对巴鲁克缠得非常紧，以至于有一年夏天当巴鲁克在法国维希养病时，那女人竟在一条马路上当众扑倒在他脚下（巴鲁克与那女人的关系后来以非常不体面的方式了结了。据拉里森回忆：“巴鲁克曾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向我承认，那女人最后从他身上诈去了 2.5 万美元。巴鲁克说后来他才得知，这个女人是一个专用美人计敲诈有钱人的国际犯罪团伙的成员）。在巴鲁克的所有情妇中，他至少真心爱过其中一个人，那就是克拉拉。巴鲁克甚至有可能动过和她结婚的念头。但克拉拉于 1935 年嫁给了亨利·路西。克拉拉在政治上是个有保守倾向的女人，鉴于巴鲁克曾对她十分倾心，而且还曾全力支持她到戏剧界和政界去发展，不

太了解巴鲁克的人有可能会因此推断巴鲁克也是个有保守政治倾向的人。其实，巴鲁克选择女人作生活伴侣时的态度，同他选择男人作事业上的合作伙伴的态度一样，都不考虑对方的政治立场。他的另一个相好，同时也是他朋友的海伦·拉里森就是一个在政治上思想相当激进的人，她与克拉拉恰好相反。

正因为丧偶后的巴鲁克把婚姻看得更淡了，他从不留意于找一个能与自己重新组织起家庭的女性，但他却很愿意把自己的许多事交给一些女性来管理。他的女秘书博伊尔小姐掌管着他的财务和办公室，还气势汹汹地去债户那里为他讨回过期的欠款。巴鲁克外出时也委托博伊尔小姐替他照管股票业务。每次当穿着优雅、身材娇小的博伊尔小姐出现在巴鲁克面前时，巴鲁克总是装作谦卑地称自己的这位女秘书“将军阁下”。在巴鲁克的家中，希金斯小姐照顾着他的健康并料理他的日常生活，使得独身的巴鲁克不至于非得凑凑合合地过日子。随着巴鲁克耳聋不断加剧，他的生活圈子也日渐封闭起来。他与老朋友们的交往大大减少了，孤独感也越来越强了。1944年夏天，在为提供建议而给马歇尔将军写的一封信中，巴鲁克告诉这位将军说，他正一个人在长岛的华盛顿港（Port Washington）避暑，没跟任何朋友在一起。巴鲁克找斯沃普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了，他解释说是因为丧失听力才使得他无法频繁地与这位老朋友会面。巴鲁克在1943年一战停战纪念日（11月1日）那天写给斯沃普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耳聋的加剧既伤害了我的身体又伤害了我的精神，使我不得不开始过一种隐居的生活，这绝对不是我所情愿的。耳聋令我难以正常地工作，我只好深居简出。我难以去处理日常礼仪和公务合同方面的事物，只有几个人参加的小型聚餐我也不能到场，更不用说晚上到剧院中参加大型集会了。不过我发现自己还有能力做相当多的事，但每到晚上我就感到疲惫不堪，什么事也干不下去。幸好每天下午临近晚饭的时候我仍能很

好地工作，有时甚至能比以前创造更高的工作效率。

即使是在精力和体力都大不如前的状况下，巴鲁克仍然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工作。在主持完成了关于橡胶问题的报告后，他又把研究方向投向了人力资源和军工生产问题。有一次，政府企图实行一项强制征用劳动力的法案，因受到较大阻力没能成功。而在阻止政府实行这一法案的行动中，巴鲁克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1943 年，巴鲁克与汉考克一起考察了西海岸的劳动力状况。次年他们还合作起草了一份关于如何在战后实现经济转轨的报告。当时美国正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斗争，一种观点认为战后的和平会带来经济的繁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停战后会爆发新一轮的经济崩溃。巴鲁克的报告持前一种观点。在完成这份报告后，他又出资 110 万美元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该项目主要是为了寻找实现战后经济复兴的良药和研究如何安置大批退伍老兵。1945 年初，在医生、护士和公关人员的陪同下，巴鲁克飞赴伦敦代表美国同英国政府举行了一次会谈。随后，他又赶到德国对正在那里作战的美国第三集团军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慰问。在德国，第三集团军司令小乔治.S.巴顿将军指着这位 74 岁高龄的来客，笑着对在场的新闻记者们说：“他跟从前一样棒！”将军还明白地告诉记者们：“我可不会让任何问题拖得太久（他既指战争的进程又指记者们的提问）”。

顾问工作是一项很微妙的工作，一般来说你很难估价顾问们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可是，单从高级官员们的高度评价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战争期间巴鲁克仅靠提供建议，化解帮派矛盾和敦促政府部门提高效率这些途径为国家赢得战争贡献了多么大的力量。拿唐纳德.纳尔逊来说，这位战时生产局局长写道，巴鲁克为他提出的关于如何确定优先生产项目的建议被事实证明完全正确。罗斯曼也曾说，很多官员都把巴鲁克当成自己“遇到困难时必去朝拜的圣人”。而海上行动指挥部（Maritime Commission）司令艾莫利.S.兰德上将则把巴鲁克说成是

给予他钢铁般力量的人。这位上将说：“我在自己的海军生涯中所得到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巴鲁克先生的帮助.....”。1945 年圣诞节，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帕特森在给巴鲁克的一封信中这样表达了自己的赞美之情：

敬爱的巴鲁克先生：

值此圣诞节之际我又一次想起了您，又一次想起了在过去五年多的时间里您所给予我的慷慨帮助。从我到国防部那天起，您的帮助就没有间断过。在我犯过的许许多多的错误中，绝大部分是因为我没能听从您的意见或没有征求您的意见。您给我的建议没有一次不是英明绝顶的。在我做某件事情之前，只要我认定自己的做法能得到您的首肯，我就会受到巨大的鼓舞。

巴鲁克受到的颂扬既有来自国人的也有来自外国领导人的。当巴鲁克的弟弟赫尔曼·巴鲁克于 1945 年出任美国驻葡萄牙大使时，当时的葡萄牙领导人萨拉查一见到赫尔曼的面就表达了自己对伯纳德·巴鲁克的敬佩之情，称他是“当代伟大的思想家”。

在和平的曙光来临之际，巴鲁克就许多方面的问题作了各种论述和预测。在他与汉考克合写的关于战后形势的报告中就有许多这样的精辟见解。那份报告后来交给了当时已担任战争动员局局长的吉米·伯恩斯（这个战争动员局与巴鲁克曾拒绝就任局长的经济稳定局是两码事，当时巴鲁克推荐伯恩斯作了经济稳定办公室主任。后来伯恩斯离开该办公室去负责战争动员局的工作，他又劝巴鲁克接替自己做经济稳定办公室主任，巴鲁克再一次婉言谢绝了，但他同意到战争动员局作伯恩斯的顾问）。在这份报告中，巴鲁克和汉考克建议到战争即将结束时立即变卖多余的政府资产。有趣的是，他们还警告不要让这些资产落入“投机商”之手（巴鲁克本人就做过投机商）。他们在报告中还引用了一句社会主

义者用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话，他们写道：“长期以来，那些人（社会主义者）总是肆无忌惮地重复这样一句口号：如果私有制不能为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它就该让位于另一种制度”。巴鲁克和汉考克引用这句话是强调战后恢复经济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过，他们对战后形势还是作出了较为乐观的预测。他们认为，尽管面临着退伍老兵游行和削减政府开支这类问题，战后会出现一个至少持续 5 到 7 年的经济繁荣期。考虑到当时存在着无数认为战后将发生新一轮经济萧条的说法，巴鲁克和汉考克的预测已经算是相当乐观的了。

其实，到战争后期，巴鲁克最想做的就是为铸造战后和平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他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在外交问题上他的立场是较为强硬的。比如，在德国问题上他赞同亨利·摩根索的观点，主张使德国“非工业化”。巴鲁克还在这位财政部长起草的一份对战败方条件相当苛刻的和约草案上签了名。这份草案要把战时的敌国变成一个靠农业和饲养业支撑的国家。对待日本，巴鲁克主张在经济上对其实行严格限制，防止这个国家再次靠“血汗劳工”和“出口补贴”威胁美国经济。而对待苏联，他则主张采取合作与遏制相结合的战略。他并不像自己的老朋友丘吉尔那样对布尔什维克恨之入骨。不过，当英国的工党在政治上频频得分的时候，他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了警觉。于是他开始反对美国向英国提供大量贷款或赠款，因为他认为这些钱会被英国拿去发展工业中的集体制成分。在雅尔塔会议召开时，他在家中开始整理自己参加凡尔赛会议期间所搜集的各种文献。他认为，一旦自己象 1919 年参加巴黎和会那样被召去参加雅尔塔会议，这些文献会对在新一次和会中制定政策产生很大的帮助。他把这些旧文献分类标号，加了索引和互见索引以方便查找。可惜并没有人请他去参加雅尔塔会议。

罗斯福总统溘然辞世时，巴鲁克还在伦敦访问。总统的死讯传来时，巴鲁克正在下榻的克莱利奇饭店和自己的私人医生闲聊。第二天，1945

年4月13日，他就率自己的代表团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同他们一道动身的还有塞姆·罗斯曼。罗斯福下葬后没几天，他就拜会了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并汇报了自己同英国人会谈的情况。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仍然定期地与杜鲁门会面。5月8日杜鲁门生日那天（这天偏巧是欧洲胜利日），他还与总统一起度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显然，此时巴鲁克对白宫的影响已经大不如昔了。1945年夏天，在与亨利·A·华莱士的一次谈话中，巴鲁克在提到罗斯福的事情时仍不断地直接用“总统”这个称呼指代他。当他一下子想起来当今总统已经是杜鲁门时才停下来解释道：“我刚才说的‘总统’当然是指罗斯福先生”。

罗斯福在巴鲁克心中留下的烙印是无法一下子泯灭的。

第十五章

他离 95 岁还有 59 天

1946 年 3 月 16 日，美国总统哈里.S. 杜鲁门与国务卿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的协商后，作出了一项高级任命。关于这项任命，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几句备忘录：“让巴鲁克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这个人认为自己应该管理整个地球，甚至还能管理月球和土星。现在就让我们见识一下这个老人的本领吧”。

尽管在杜鲁门总统看来，巴鲁克连管理地球乃至其他行星的野心都有，其实在这个人身上连管理一个小小的代表团的兴趣都不存在。在总统公布任命时，巴鲁克已经是个再过 15 个月就要过 76 岁生日的老人了，而且他还没有从战争时期的身心疲惫中缓过劲来。现在的巴鲁克每天上午还能干一点儿工作，午饭后他一般小睡片刻，到下午时有时甚至还能多做些事，可一到晚上就什么都干不成了。他只能靠助听器与别人交谈，但戴着这个多余的东西又令他烦躁。1945 年底他得了严重的胃溃疡，每天只能吃清淡的饮食。

然而，无论如何，在这个处于新时代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比原子弹的威力更大了，也再没有什么组织比刚成立的联合国更接近于伍德

罗·威尔逊总统当年的梦想了。巴鲁克曾被排除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这样决定战后世界命运的重大事件之外，他也因此感到倍受冷落。尽管困难重重，巴鲁克再也不愿使自己被排除在另一个重大事件之外了。于是，他接受了杜鲁门的提名，决定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可见在接受与推辞之间，他只有一念之差。

美国原子能政策的基本框架是由已担任国务卿的吉米·伯恩斯于1946年1月向世界宣布的。伯恩斯宣称：从投到广岛和长崎的那两枚原子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武器有多么可怕。所以，任何国家都不应再拥有它。美国作为唯一能生产原子弹的国家，将主动把自己的原子弹及其秘密技术交给一个以合适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掌管。伯恩斯宣布的只是一个政策框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的工作被交给了一个规格非同一般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戴维·E·利连撒尔亲自挂帅。3月份他们就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联合国成立一个国际原子能发展局，控制世界范围内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该局将负责管理世界上所有的铀矿、原子能原料加工厂和原子能工厂。现今世界唯一能生产原子弹的三座美国工厂也将置于国际原子能发展局的管理之下。这个机构还将负责销毁世界上所有的原子武器库和原子能实验室，使任何国家都不能独享对战略武器的垄断地位。面对原子时代的来临，艾奇逊和利连撒尔等人赋予了“国家安全”以新的解释，他们在报告中写道：“要保护国家免受原子武器的打击，我们必须先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有一个国家在本国领土上建立了原子工厂和原子武器库，其他国家为使自己不处于劣势，必将争相效仿。这样一来任何国家都无法使自己免受原子弹的威胁。”^①艾奇逊和利连撒尔承认，他们的计划或许带有不切实际的成分，但基于两种原因，这一计划还是被接受了。其一，谁都清楚美国迟早会失去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地位，与

^① 这段话的意思是，最好的保护方式不是发展原子武器，而是使所有国家都不拥有这种武器——译注。

其那样不如自己主动放弃它，同时也不让其他国家发展原子弹（这样做或许更容易争取主动）。其二，当时还没有人能提出一套更好的方案来。在 1942 年 3 月上旬的时候，巴鲁克还呆在赫伯考一边休息一边为到国会作一场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报告准备材料。同时，他还得躲避一些亲属为求他周济而打来的电话——这些电话实在让他感到心烦。3 月中旬他已经决定出任美国驻国际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并给伯恩斯作了答复。可没过几天他又差点儿改变主意。3 月 26 日（星期二）早上，巴鲁克突然从报纸上读到了一些有关艾奇逊-利连撒尔报告的消息（这些消息不知是从什么渠道泄露给报界的）。又过了几天，即将代表英国参加国际原子能控制谈判的亚历山大·凯多根爵士告诉巴鲁克，美国准备提交艾奇逊-利连撒尔报告，作为美国参加国际原子能问题谈判时所持的基本立场。巴鲁克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诧异，他认为既然自己将代表美国参加此次国际谈判，他就有权从政府那里得知自己的国家将采取什么样的原子能政策，而不应该靠外国朋友为自己透露消息。他立即去找艾奇逊，请他就凯多根所说的报告作出解释。艾奇逊只好证实了凯多根的话。巴鲁克十分气愤，他回敬艾奇逊说：“如果您想找个信使以方便你我之间的联络，那么年纪几乎和我一样大的凯多根爵士肯定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紧接着巴鲁克又去找白宫澄清此事。他问杜鲁门总统，美国的原子弹政策应该由谁来制定，是艾奇逊和利连撒尔那些人，还是他这个美国驻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总统温和地回答说：“那还用问，当然是您了！”这才使巴鲁克的怒火平息了下来。

杜鲁门认为巴鲁克是个自以为是而且老谋深算的人，但他又想利用巴鲁克替自己推销一些政策和主张。1946 年 3 月，正当美国准备宣布愿意公开自己的秘密武器之际，苏联仍保持着它在战时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东欧国家也开始沦为共产主义扩张的牺牲品。这年 2 月，斯大林

刚刚发出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责难，说正是这种势力的扩张才使两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他还雄心勃勃地宣布，苏联将在新一轮的五年计划中为赢得未来的任何国际战争作好准备。

本来杜鲁门在原子弹问题上主张实行强硬的政策，他认为巴鲁克是替自己提出并推行这种政策的最合适人选，因为一来巴鲁克与自己观点一致，二来实践表明巴鲁克的主张基本上都能得到公众的拥护。人们认为巴鲁克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他既注意照顾资方的利益又不忽视劳方的利益。在稳定物价、平衡预算、争取和平以及作战争准备方面，他都被证明是个顶尖高手。在处理各种事务中他所表现出来的刻苦精神和仁慈精神也堪称楷模。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巴鲁克坐在公园长椅上时的安详姿态：他把两腿交叠在一起，一条裤脚挽起来，露出一只老式高帮黑皮鞋（这种鞋是他多年前在席尔斯公司买的）。这样一个老人给无数美国人以放心的感觉，他们认为国家的领导人拥有了一位可以依靠的顾问。来自圣弗兰西斯科的律师约翰·弗兰西斯·尼格兰是巴鲁克的一位好友，他在写给巴鲁克的一封信中的一番话，虽然明显带有恭维成分，但却并不离谱：“美国人民虽然并不完全赞同您所有的观点，但他们绝不会怀疑你的智慧、刚直和果敢”。

几乎所有人都能从巴鲁克身上找到与自己相近或完全一致的观点——他所提出的观点实在太多了。在拜会杜鲁门总统之前，他曾到众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Banking and Currency Committee）阐述通货膨胀问题。他还能同时对两个几乎完全对立的观点持肯定态度。比如说，他一方面主张坚决实行自由企业制度，另一方面又支持一些与该制度不相容的做法，如继续坚持并加强战时的工资和价格控制政策、禁止工人罢工、禁止资方监视工人劳动、建立“商业高等法院”，等等（有一次他用一句十分精炼的话解释了自己观念上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矛盾之处：“我绝对信赖懂得自己照顾自己的美国人民——但必须让他们知道

该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什么”)。凑巧得很，就在巴鲁克到众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作报告的那一天，艾奇逊在参众联合原子能委员会所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宣讲了由他和利连撒尔起草的那份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政策报告。第二天《纽约时报》在第一版对两人的活动同时作了报道。但巴鲁克的报告是全文登出的，而对于艾奇逊的报告只报道了从秘密会议上透露出的一点儿细节。前者比后者要显眼得多。

在3月份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巴鲁克这位刚就任但尚未赴职的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以开玩笑的口气提醒各位新闻界人士说，对于自己即将从事的工作他一点儿经验都没有，但他已为自己在代表团的工作挑选了几位能干的同事。他们是：斯沃普和汉考克（这两人早在一战时就和巴鲁克相识并已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费尔南德·埃弗斯塔特（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华尔街人士，他在被唐纳德·纳尔逊从战时生产局炒了鱿鱼后又回到了银行投资业）、小弗雷德·席尔斯（时任纽蒙特矿业公司总裁）。正如艾奇逊和利连撒尔的委员会中没有一位来自工商界的人士一样，巴鲁克率领的代表团中没有一位来自科学界的人士。

巴鲁克的组织和艾奇逊的组织同为美国处理原子能问题的机构，但它们之间的摩擦比其中任何一个与自己的苏联同行之间的摩擦都要多。艾奇逊、利连撒尔和J. 罗伯特·奥本海默（艾奇逊和利连撒尔委员会的首席科技顾问）^①这三个人都对巴鲁克所作出的人选深表遗憾。利连撒尔的不满情绪可以从他日记中的一句话略见一斑：“巴鲁克的人事安排简直让人恶心”。

巴鲁克曾一度试图缓解与利连撒尔的矛盾。在利连撒尔的日记中也记载着他与巴鲁克在1946年4月的一次会面：

^① 奥本海默，美国物理学家，曾任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主任，时任艾奇逊—利连撒尔委员会委员——译注

巴鲁克年老乏智，面对使命态度勉强，他又有着可怕的虚荣心。我实在难以理解总统为什么选择了他。可是在与他的交谈中，我还是时刻提醒自己，应该把巴鲁克看成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他毕竟已经是我国派往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了。但我还是无法忍受与他的谈话。他说话语无伦次，在至少 1/4 的时间里（整个会面过程中几乎一直是他在滔滔不绝）他都重复着一些令人作呕的话，说什么总统坚持要他担任这一职务是个大错误，他试图推掉这个任命但没能成功。还说什么从事这种工作的应该是个比他年轻的人.....

当然，这些鬼话他一个字都不相信。可他还是说个不停，因为我不识趣，一直没说“你是这个世界上最英明的人”之类的话来安慰他.....

利连撒尔接着写道：

因为没有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些安慰的话，巴鲁克只好自己来安慰自己了。他对利连撒尔说尽管自己缺乏一些专门的知识，但这并不碍事，他仍然宝刀未老，可以靠“智谋”战胜一切对手。

利连撒尔接着还写道：

“就这样，巴鲁克罗嗦了大约一个小时，我被他的空谈和露骨的自吹自擂实在忍无可忍，只好开口应答。但我必须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对巴鲁克说，人们已经把他当作了知识的化身，还告诉他如果在做自己的工作以前不去积累专门的知识，无论他们的代表团还是我们的委员会都将得出遗害无穷的判断。

据利连撒尔记载，巴鲁克听了这番话后一下子泄了气，也没有兴趣将谈话继续下去了。这位老人承认自己也是在摸索着前进，而且他一直

在寻找和起用对原子能问题有较多研究的人。在巴鲁克结束自己的使命之前，很多人都认为他不太可能在自己所领导的工作中起到多么关键的作用。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听取专家进行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自己多年的阅历作出结论，然后向总统汇报。事实证明，他干得相当出色。有一次，他与一些军方人士共同讨论其他国家要用多长时间才能造出原子弹。有人认为经过调查，完全可以推测出第二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将在多少年以后出现。作为一个在华尔街混了一辈子的人，巴鲁克看惯了由于预测失败所造成的损失。他反驳说，根据他的个人经验，对任何事物未来状况的预测都是靠不住的。要想对原子能这样一个崭新领域的未来发展作出准确预测就更加困难了。曾负责曼哈顿工程特区^①项目的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认为自己原子能的发展状况了如指掌，他十分肯定地认为第二个原子武器国家将在5至7年后出现。在给杜鲁门总统作的汇报中，巴鲁克如实反映了军事专家们的看法。他说自己无法肯定这些看法的正确性，如果要他预测的话，他会认为其他国家研制原子弹所需的时间要比格罗夫斯将军预计的短。事实证明巴鲁克是对的，仅过了3年，苏联就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

无论是在组织形式还是指导思想上，巴鲁克的一套班子与艾奇逊和利连撒尔的班子都有着天壤之别。机敏风趣的艾奇逊经常拿巴鲁克手下那些“精英”们开玩笑，他的幕僚们也把巴鲁克那一伙人称为“研究原子能问题的华尔街人士”。曾有一次巴鲁克还指控艾奇逊窃录自己的电话（他过去还曾指控伊克斯用这种伎俩对付自己，而二战期间摩根索也曾出示过巴鲁克的一次电话记录作为证据，记录的内容竟与打电话人所说的一字不差）。有一次，在巴鲁克手下做事的汉考克轻蔑地说政府的人不会搞实业，这使得身为联邦政府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的利连撒尔听了大动肝火。另据利连撒尔回忆，曾经有一回巴鲁克一方在与

^① 曼哈顿工程特区，1942年美国陆军所建立的秘密生产原子弹的单位的代号——译注。

他们一方所进行的谈判中一言不发，光听对方讲，这很可能是在做圈套让他们钻。利连撒尔能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因为巴鲁克在与别人的谈判中是个有心计的听众，总想从对方的话中听出破绽并伺机反攻。在与别人打电话时，他总能使自己从对方口中套出的信息多于自己透露给对方的信息，每次得逞时，他就一边打电话一边向自己的女秘书挤眼，告诉她自己又成了赢家。

在政治立场上，巴鲁克一派要比艾奇逊和利连撒尔一派偏右一些。前者对苏联的怀疑态度更深，而且更关心美国原子能产业的资产权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侵害。这两派的分歧之一体现在核矿藏的所有权问题上。艾奇逊和利连撒尔的委员会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应将世界上所有的铀矿交给国际原子能开发局，而巴鲁克他们认为这种想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行不通，并予以强烈批驳。关于这个问题，巴鲁克曾在 1946 年 3 月下旬写给伯恩斯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发现了至少 112 种含铀的矿物质，其产地分布在美国的十几个州和世界上除美国外 20 多个国家的部分地区。另外，亚洲和非洲许多在地质上属岩石结构的地区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未进行过勘探。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地区很可能也蕴藏有铀矿。要管理好如此之多的矿藏，那得成立一个多么庞大的‘管理局’啊！”汉考克也指出，如果想成立一个能把世界上所有的含铀矿藏都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所谓“国际原子能管理局”，那么这个管理局必需先把南非黄金产区的全部金矿都买下来，因为在那里金矿石是与铀矿石伴生的。汉考克质问道，“有谁能出得起这笔钱来买金矿呢？这样一个管理局的所作所为又将给许多私营企业带来怎样的损害呢？”对汉考克的质疑深有同感的人大有人在，席尔斯就是其中一个。他是纽蒙特公司董事长，在至少 20 多家生产有色金属的矿业公司拥有股份（这些公司开采的有色金属矿中含有铀矿石）。后来，还是由艾奇逊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他提出，拟将成立的国际原子能管

理局可以不直接拥有遍布各国的铀矿，而只对它们的生产进行“监控”。“监控”一词的含义颇为模糊，却使得相互争执的两方不再较真下去。

到 1946 年春天，巴鲁克一派与艾奇逊一派之间爆发了一次最为严重的争执。然而，这次的矛盾却无法再靠使用模糊用语的方式来调和了。即将参加国际原子能问题谈判的各方拟将签署一个关于原子弹问题的条约，对于在这个条约中应如何措辞的问题，巴鲁克一方与艾奇逊一方又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巴鲁克看来，措辞问题关系重大，因为它体现着签约各方如何看待国家安全这个问题。他认为，作为谈判中的美国代表，他最重要的责任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防安全，而不是象一些空想家们所空谈的那样去维护什么“全世界的利益”。巴鲁克下定了这个决心之后，立即会晤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请他们关注原子弹问题。正如他事后所讲的那样，军方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同他一样，也是比较保守的。他们也主张在即将签定的条约中采取较为强硬的措辞。随后，他和斯沃普又参考了威尔逊时期对同类问题的处理方法，以及《国联公约》第 10 款的有关提法，该款规定，对国际联盟任何一个成员的进攻将被视为对所有国联成员的进攻。在巴鲁克和斯沃普看来，这种提法所体现的原则在当今的 1946 年同在当初的 1919 年一样，具有很强的适用性。5 月中旬，巴鲁克一方与艾奇逊-利连撒尔一方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对话，在对话结束时斯沃普作了发言。根据会议记录，发言中有这样一句：“.....如果不规定违反某种法律将受到怎样的惩罚，那么这种法律就形同虚设”。这证明巴鲁克和斯沃普认为，在即将制定的原子能问题国际条约中，必须规定违反该条约的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国际制裁。当然，很可能会有根本就不打算遵守该条约的某一方跳出来否决有关条款。巴鲁克建议，为应付这种可能性，在制定条约前，应废止安理会的几个常任理事国对它的否决权。

对于在原子弹条约中写入制裁条款这个问题，艾奇逊-利连撒尔一

方提出了异议。他们唯一的理由是，如果美国坚持这样做，苏联肯定会对美国的全盘计划予以拒绝。巴鲁克尽了最大努力试图说服对方，他对奥本海默的观点作出了极大的迁就，以至使己方的成员都有些不满（据说巴鲁克在提到这件事时曾讲过：“尽管我的手下人表现出了不满，但我不能全听他们的。汉考克的观点‘太右了’，我得适当纠正一下他；席尔斯是一个得力干将，但对共产主义的警觉有点儿过头”）。巴鲁克唯一的目的是说服艾奇逊-利连撒尔一方同意在条约中加入有关国际制裁的条款。双方在华盛顿的布莱尔-李大厦（Blair-Lee House）面对面地谈了整整两天，最终还是没有达成一致，5月18日两方分道扬镳。随后，巴鲁克的组织开始制定自己的原子弹政策，艾奇逊的委员会宣告解散。在5月18日他们休会以前，巴鲁克对艾奇逊等人说的最后一番话是：“请告诉我，你们是否真的清楚自己在那份报告中写的是什么？全世界的政治家们都在研究你们的报告，全美国的新闻媒体都在评论你们的报告。现在请告诉我，你们是否真的清楚自己写的是什么？”巴鲁克的询问令利连撒尔目瞪口呆。在过去整整两天里，他们除了互相攻击外没有讨论任何实质性问题。

1946年夏，阿尔杰·希斯（这个人后来在1948年被前共产党人怀塔克尔·钱伯斯指控充当苏联间谍，后于1950年被判犯有伪证罪）在写给艾奇逊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他建议，巴鲁克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致开幕词时应以艾奇逊-利连撒尔报告中的话做发言稿，但并不在发言中代表美国申明任何立场。他可以请别的国家先拿出方案来，然后建议委员会依次讨论这些方案。这一建议简直就是一堆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废话。

巴鲁克拒绝了艾奇逊等人为他提供的方案（其实艾奇逊他们制定这一方案也并不是为了供巴鲁克使用），开始考虑自己的一套办法。他最终决定的方案是以艾奇逊-利连撒尔报告为蓝本（因为这一报告已经向

全世界公布，无法彻底抛开它），但对它作了重大修改。首先，根据席尔斯的建议，巴鲁克提出先由联合国对世界范围内的铀矿资源作一番普查。巴鲁克认为用这个建议可以试探一下苏联，看它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容忍国际社会的核查。其次，他还指出，联合国的裁军要求不仅要针对美国占有优势的原子武器领域，还要针对苏联占有优势的常规武器领域。在巴鲁克的要求下，报告中关于铀矿所有权问题的说法也做了较大改动。对违规行为实施国际制裁的主张也被写进报告，并建议，在这项内容被写进即将签署的国际原子能问题条约时，任何成员国都无权对其进行否决。后来在与伯恩斯进行协商时，巴鲁克被迫放弃了进行国际核查和扩大裁军范围两项主张，但他在铀矿所有权和实行国际制裁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得到了对方的首肯。7月7日，杜鲁门总统逐段审阅并批准了巴鲁克提交的报告。至此，美国在原子武器问题上的政策正式出台。此时，距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在其临时驻地纽约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召开首次会议的时间只有一周了。巴鲁克将在为会议所致的开幕词中阐明美国在原子弹问题上的立场。美国的原子武器政策已经形成框架，但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述还得进一步斟酌。巴鲁克、斯沃普和埃伯斯塔特三人花了很长时间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一条长椅上反复推敲发言稿的措辞。巴鲁克强调，他在致开幕词时必须提到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第二天一早，斯沃普打来电话告诉巴鲁克说：“我为您从《圣经》里选出了一句话作为发言稿的开篇句，恐怕这是最佳选择了”。

7月14日，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首次会议开幕之时，利连撒尔正在自己家的菜园里间胡萝卜苗，而他妻子正在厨房里一边干活一边听广播。忽然，广播里传来了巴鲁克在大会上致开幕词的声音，利连撒尔夫人连忙喊丈夫进来一块儿听。在斯沃普的笔下，巴鲁克的发言稿是这样最后敲定的：

“今天，我们将在这里就生与死的问题作出选择。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使命。

“原子武器的存在为我们的新时代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但阴影之下，为人类解除威胁的希望依然存在，我们有信心抓住这种希望。如果我们不幸让希望破灭，那么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将被恐惧所占据。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让我们在让世界保持和平与让世界遭到毁灭之间作出正确的抉择。

“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发现了自然界中的一个秘密，我们发现小小的原子之中竟然蕴藏着大得足以使我们不寒而栗的潜能。但对这种潜能的恐惧却不足以使有的人彻底放弃拥有和使用原子弹。历史上，人们还没有哪一次因对某种武器怀有恐惧而把它丢掉。一般来讲，有矛就有盾，但面对原子弹这支利矛我们却不可能找到一面牢固得足以抵挡的坚牌。

“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福利，但我们却没能制止利用科学威胁人类安全的行为，这才有了原子弹这种具有如此可怕杀伤力的武器。现在，我们受全世界人民的委托来探讨如何消除原子弹对人类的威胁。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代表各自的民族进行一场心与心的交流和沟通。只有以全人类的和平愿望为出发点，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就是要先提出这种愿望，然后将它付诸行动。我们必须提出一种机制，以确保原子能只被用于和平目的而不被用于战争。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达成一个协议，签定一个条约，无论是谁违反这一条约，都将立即受到严厉惩罚”。

利连撒尔用沾满泥土的手拿起纸和铅笔，一边听巴鲁克的发言一边作记录。这篇发言稿前面的内容大部分出自他和艾奇逊合写的报告，这使利连撒尔听起来既熟悉又亲切。但主张实行国际制裁的内容令他深为不快。没过多久，奥本海默就打来了电话。这位物理学家说，对于巴鲁克的“14点方案”，他虽事先表示过赞同，但仍对其中有关国际制裁的

内容深为忧虑。奥本海默指出，艾奇逊-利连撒尔报告的基本格调是主张通过“国际合作发展原子能”，而巴鲁克加进去的内容与这一主题相去甚远，因此他对巴鲁克的外交艺术感到怀疑。利连撒尔对奥本海默的话深有同感。

巴鲁克的讲话在国际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认为，巴鲁克用“就生与死的问题作出选择”这句话作开场白“既有文学感染力，又真实地描写了客观现实”(实际上这句话是出自斯沃普笔下，更准确地说它是《圣经》上的语言)。只有苏联方面作出了十分冷淡的反应。代表苏联参加会议的安德烈·葛罗米柯建议：为了表示诚意，美国方面应立即停止生产和销毁现存的所有原子弹，并把这一秘密拿出来与全世界分享。苏联方面表示，同意对违反国际条约的成员国实施制裁，但坚持保留自己的否决权。7月中旬的一天，巴鲁克邀请葛罗米柯去观看乔·路易斯与比利·考恩的第二轮拳王争霸赛。当世界冠军路易斯把考恩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时，葛罗米柯扭过头来对巴鲁克说：“考恩一定希望自己有权力‘否决’考恩打他”。

在当时及以后的任何时候，苏联从未同意过开放自己的边界接受国际核查，也从未把任何主权交给某个国际机构。一句话，它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狂热和对西方世界的怀疑。

巴鲁克一直没能打破与苏联人之间的僵局，但他却从本来对他态度并不友好的一些美国人那里讨到过便宜。奥本海默就是其中一个。这位物理学家其实对巴鲁克的外交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但他还是同意为巴鲁克率领的代表团提供一些建议。有一次奥本海默和利连撒尔在一块儿聊天时，还借一件事把巴鲁克取笑了一番。事情是这样的：据说巴鲁克曾兴高采烈地向杜鲁门总统汇报说，谈判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巴鲁克告诉杜鲁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就美国的提案举行了投票，结果是十票赞成两票反对。他说反对美国的只有苏联和它的卫星国波兰。在奥本海

默和利连撒尔看来，巴鲁克简直是可笑至极。既然对会谈成功起决定作用的苏联投了反对票，何谈“决定性进展”？

7 月下旬，利连撒尔同意飞赴阿的隆德克山区（Adirondack Mountains）去会晤正在那里的温卡斯营地（Camp Uncas）休养的巴鲁克。这个营地曾是 J.P. 摩根年老时修生养性的地方。利连撒尔去拜会巴鲁克时心情很沉重。几天前，巴鲁克拖人带来口信说他需要帮助，并对利连撒尔不愿伸出援助之手感到很难过。在五名佣人和一名护士的侍奉下，巴鲁克与利连撒尔谈了整整两天。这一次主要是巴鲁克讲，利连撒尔听（谈话开始时，巴鲁克先是指着周围优美的山间景色对利连撒尔说：“既然这种环境当年很适合摩根老人，现在一定也很适合咱们”）。这次谈话使得利连撒尔对巴鲁克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出发来温卡斯营地之前，他还担心巴鲁克糊涂的思路和含混言语“会令自己窒息”。可在谈话的过程中，利连撒尔深深被巴鲁克的魅力所折服。在与巴鲁克会谈后第二天（7 月 29 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发现他（巴鲁克）并没有对谈判结果产生任何错误的判断。他很清楚谈判并没能取得任何成效，十票对两票的结果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也知道谈判的失败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这次谈话是迄今为止我与他进行过的最今人难忘的一次。不但气氛很轻松，两个人的兴趣也都很高……”在此之前，利连撒尔在日记中每次提到巴鲁克都称他为“那个老家伙”或直呼其名。在温卡斯营谈话之后，他开始尊敬地称这个老人为“巴鲁克先生”。另外，那一次利连撒尔是搭巴鲁克包租的 DC-3 型飞机与他一同返回纽约的。

如果那天到温卡斯营地访问的是同利连撒尔一样与巴鲁克观点相对立的斯大林，那么世界裁军进程将发生怎样的转机呢？人们不妨去推测一下（其实巴鲁克也很想同这位苏联独裁者通一次电话，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巴鲁克认为，如果美国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上

的提案（斯沃普称其为巴鲁克方案）由于其自身的重大意义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谈判很可能会取得一定成果。他敦促艾奇逊通过美国驻各国的使领馆把这一方案发到了世界各地，还责问为什么苏联的报刊没有将其全文转载。这位苏联外交官回答说他们的新闻纸不够用。巴鲁克反唇相讥道，如果葛罗米柯能告诉他苏联需要多少新闻纸，他会如数相赠。结果那个苏联人未作任何回答。

其实，巴鲁克和他的同事们在会议开始之前都对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国际协议没报多大希望。早在 1946 年夏末或秋初的时候，巴鲁克就已开始正视眼前的僵局。这年 8 月，一位曾被派驻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查尔斯·W. 塞耶提醒巴鲁克说，苏联人是绝不会信任任何美国官员的。他说：“我们在过去 20 年中曾在苏联人身上付出过无数的努力，但均未成功。每一次努力的失败都进一步证明了苏联人不可能不提防任何外国人，除非这个人在本国蹲过监狱，或者也是共产党人，或者干脆是个死人”。在 9 月 10 日的一次会议上，斯沃普指出问题就出在俄国人身上。巴鲁克也建议说，基于这种现实，美国只好加快原子弹的生产了。9 月 17 日在递交给杜鲁门的一份报告中，他对美国与苏联在原子弹问题上的对立立场作了一番总结，并指出双方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他提醒总统说，美国提出了对原子能的发展实施国控制，及对违约成员国强制实施制裁这两项建议，而苏联则拒绝将任何主权交给国际社会。巴鲁克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报告：“我们不应靠与对手的谈判获得成功来维护国家安全”。

亨利·A. 华莱士是杜鲁门政府的商务秘书，他同意与苏联人的谈判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一说法。但他并没有指责苏联，而是指责巴鲁克把形势搞得如此之严峻。他认为巴鲁克在两个问题上下立场过于强硬了：一是主张把取消常任理事国在原子能问题上的否决权作为先决条件，二是坚持设立实行惩罚性措施这一明显对某些签约国表示不信任的条款。华

莱士认为，正因如此国际社会才没能在这次会议上“在生存与死亡之间”作出正确选择。他建议：尽管如此，美国仍应采取措施主动销毁所拥有的原子弹，并向国际社会公布自己的原子弹技术。他把这些观点写进了7月份的一份备忘录，并把它交给了杜鲁门总统（其中还有这样的话：我们的提案没能引起苏联人的任何热情，这难道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设想一下，如果对原子弹拥有垄断地位的是苏联，他们表示愿意在未来某个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向我们公布武器的秘密，条件是我们现在就保证不去研制原子弹，并立即把关于我们的铀矿和钍矿资源的秘密情报告诉给他们，我们会接受他们的条件吗？）。9月12日，华莱士在麦迪逊花园广场作了一次演讲。演讲中他几乎按自己的逻辑重新为政府制定了一套新的对外政策，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我们的态度越强硬，苏联人的态度就越强硬”。9月18日，巴鲁克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华莱士公开发表了他7月份写的那份备忘录（其中当然包括猛烈抨击巴鲁克计划的内容）。此时，国务卿伯恩斯正在巴黎宣扬美国官方对苏联的强硬路线，巴鲁克也正在纽约做着同一件事。他们两个人都对华莱士的所作所为深感震惊。巴鲁克立即去见杜鲁门，并以很有礼貌的口气对他说，要么让华莱士走人，要么让他巴鲁克走人，要么就让华莱士收回自己的言论。第二天，即9月20日，华莱士决定走人。但巴鲁克仍然要求他道歉。巴鲁克说，华莱士发表这样的言论当然是件令人极不愉快的事，但应该使华莱士感到羞愧的并不是他对我巴鲁克所造成的伤害，而是他对事实的颠倒。

当时来自国外方面的对巴鲁克的攻击中，最险恶的莫过于莫洛托夫于10月下旬发起的一次。这位苏联外长称巴鲁克本人就是帝国主义的实际领导者。在五个月后的1947年3月，另一场形式截然相反的攻击降临在巴鲁克头上。一名妇女来到联邦调查局驻纽约办事处，告发巴鲁克是“苏联在美间谍网的头子”，而且他已经把美国的原子弹技术泄

露给了苏联。

1946 年整个秋天，参加原子弹问题国际谈判的各方都在反复强调着自己的立场，谈判毫无进展。11 月间，美苏双方进行了更为秘密的会谈，商讨巴鲁克赴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问题。但他的苏联之行最终没能实现。12 月 13 日，伯恩斯同意巴鲁克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上就美国的六月提案再组织一轮投票，投票时间定在 12 月 30 日。

人们预计，投票结果仍将是十票对两票——苏联和波兰投反对票，而美国及其盟友们投赞成票。谁知就在投票开始前，英国代表亚历山大·凯多根爵士把巴鲁克叫到一旁，告诉他说英国政府可能无法在新一轮投票中继续支持美国。巴鲁克听后立即当众大声斥责了凯多根一通，气势好不吓人。结果，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英国政府还是投了赞成票。新一轮投票举行的那天，巴鲁克表现出了神态镇静但气势咄咄逼人的外交家风范。他走进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大厅时胳膊下夹着一瓶牛奶，手里拿着一包咸饼干。一见到苏联代表葛罗米柯他就指着牛奶瓶说：“我带来了答应交给你们的原子弹”。

“什么？那不是一瓶牛奶吗？”葛罗米柯一下楞住了。

“没错，是牛奶。我想会议会拖得很长，所以准备中途补充一下营养”。巴鲁克回答说。

这一次苏联和波兰都投了弃权票。表决结果是十票赞成零票反对（但这次表决仍没起到任何实际意义，苏联还是于 1949 年 9 月研制并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1947 年 1 月 4 日，巴鲁克辞去了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职务，一周后又宣布退出政界。同以往几次一样，这次他又过早地宣布了这种决定。

还是在 1942 年春天，密苏里州参议员贝内特·克拉克在参议院的一次会议上作了一次发言。他首先回顾了一战时期巴鲁克领导战时工业委

员会所取得的种种业绩，又列举了二战以来巴鲁克为国家提出的每一条建设性意见（包括那些未被采纳的），最后他口头提议授予巴鲁克国会荣誉勋章。不过他的建议没能被通过，因为巴鲁克不是军人，国会无法把这项只有战功卓著的军人才有资格获得的军功勋章授予他。到 1947 年止，除了国会荣誉勋章和另外几个为数极少的奖项外，巴鲁克已经获得了一个美国人在国内可能获得的全部荣誉。自从巴鲁克离开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以后，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新的荣誉又接踵而来，使他不得不到处去领取各种奖状、证章和聘书，忙得不可开交。向他颁奖或授予荣誉的单位和部门数不胜数，其中有：南卡罗来那州、纽约市、美国橡胶工业协会、犹太人教育互助联盟委员会、全美童子军协会、全国法律互助协会、美国犹太老兵协会、美国军团纽约县分会、全国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联合会、纽约市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拉特哥斯大学、叶西瓦大学，等等。

从《纽约时报》1947 年 3 月 27 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关于巴鲁克的消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为到各处领奖跑成什么样了。这则小消息是以赞美的口气写成的，全文如下：

巴鲁克不幸脚踝扭伤

昨天，伯纳德·M. 巴鲁克不幸扭伤了脚踝，其医生劝他“最好歇上几天”。但这位身为金融家兼总统顾问的 77 岁老人在接受作者电话采访时却说，他离卧床不起的地步还远着呢。他告诉本文作者，“我一点儿事都没有”。

1947 年 7 月，一尊巴鲁克的半身塑像被赠送给美国国防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并安放在那里。早在美国国防学院成立前的 1940 年，斯沃普就谋划着在某一所全国性的高等军事学府中为巴鲁克立一尊像。当时已担任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听说这件事后准备出面

制止。他对副国务卿艾奇逊说，如果国防学院的校园内果真需要添一些名人塑像的话，那也该是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等人。

可几天之后马歇尔却递给艾奇逊一张请柬。艾奇逊见上面写着请马歇尔到国防学院参加巴鲁克塑像捐赠仪式之类的话。看罢请柬，艾奇逊以无可奈何的语调对自己的上司说：“我想您是知道该怎么处理那尊‘巴鲁克’的”。

马歇尔答话说：“我当然知道，或许我还得在它的揭幕式上致辞，不然的话它怎么能算落成了呢？”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巴鲁克在公众心目中的威望如日中天时，有人建议杜鲁门就一个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征询一下巴鲁克的意见，没想到竟惹恼了总统。杜鲁门趁机大声道出了巴鲁克在自己心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他说：“我才不会去找那个巴鲁克，我也不想再让那个老家伙浪费我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时间了。管他是谁呢！你要是接受了他的建议他可就把你粘上了，他向来就这样。我决不会再去找他了！”不过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杜鲁门仍与巴鲁克保持着不冷不热的关系，直到1948年夏天新一轮大选来临之际。就在这年巴鲁克过自己78岁生日那天，杜鲁门在别人的提议下请巴鲁克到民主党财政委员会工作。即使是在正常情况下，巴鲁克也是不会愿意担任这种工作的，对这一点杜鲁门很清楚。不过当时共和党人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托马斯·E·杜威势头十分强劲，杜鲁门请巴鲁克出山是想让他帮自己壮壮声势。

一周以后，巴鲁克在给杜鲁门的回信中以温和的口气作了一个答复。他说自己从不在党内的任何一个委员会任职，也从不代表民主党发表任何政治声明，这是他的原则。他的很多朋友，包括罗斯福总统，都认为这是再明智不过的做法了。巴鲁克答复得十分巧妙，不过接下来他却很愚蠢地想向杜鲁门讨个人情。他说自己希望总统能派驻荷兰大使赫

尔曼·巴鲁克代表美国参加朱丽安娜公主就任荷兰女王的加冕典礼。巴鲁克说，尽管赫尔曼偏巧是自己的弟弟，总统应该相信他作为驻荷兰大使肯定是最佳人选。

在具有非凡影响力的长兄伯纳德的提携下，赫尔曼一生也干出了一番名堂。他先是学医，然后在华尔街做事，最后才进入外交界，担任过美国驻葡萄牙大使和驻荷兰大使。到四十年代后期，赫尔曼已经是个神态严肃，鼻梁上架着深度眼镜，下巴上留着白色短髭的七旬老人。他很敬畏自己的长兄，可与性情镇静的伯纳德相反，赫尔曼经常烦躁不安。此外，他还缺少哥哥的那种自控力。1945 年，赫尔曼曾与杜鲁门有过一次仅仅几分钟长的闲谈。他给总统留下的印象很深，但很不好。杜鲁门在自己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描述赫尔曼的：“他是个阿谀奉承之徒，有当驻法国大使的野心，同他哥哥一样是个阴谋家”。

巴鲁克给杜鲁门的回信像一条导火索似地引发了一连串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它首先带来的就是杜鲁门对巴鲁克的一顿训斥。巴鲁克不但拒绝接受任命，反而还向总统讨情，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让杜鲁门无法忍受。他在 8 月 31 日写给巴鲁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读罢您 27 日的回信，我十分失望。民主党对您及您的家庭给予了那么多，可当这个党面临困境时却未能从您那里得到应有的回报。对此我深感遗憾”。在信的后面还有这样几句附言：“我已经任命威廉·G. 麦克阿杜先生和托马斯·J. 沃森先生担任特别代表前往荷兰参加朱丽安娜公主的加冕典礼。当然，我会叫他们带上我国驻荷兰大使”。巴鲁克与杜鲁门闹翻的事起初还没有暴露出来。后来，韦斯特布克·帕格勒通过稿件辛迪加发表报道使两个人的矛盾昭然于天下。1948 年 10 月下旬，当这位专栏作家正躺在马萨诸塞州巴鲁克林市一家医院里养病时，前来探望他的约瑟夫·P. 肯尼迪将杜鲁门写信痛斥巴鲁克的事告诉了他。不等肯尼迪走帕格勒就抄起电话找到还在南卡罗来纳的巴鲁克，想从他本人嘴里

打听出一些关于那封信的事。巴鲁克在电话中先证实了确有那样一封信，随后他越说越激动几乎到了不能自己的程度。巴鲁克的嗓门极高，他的声音从帕格勒手中的听筒里一直传到站在一边的肯尼迪耳中，使得肯尼迪几乎笑出声来。巴鲁克毫不掩饰地发泄着胸中的愤懑，他骂杜鲁门是个“粗鲁无礼、缺乏修养、愚昧无知的家伙”。没过多久，就在大选即将开始之时，这几个不堪入耳的词被帕格勒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自己的专栏里。帕格勒在自己的文章里还提醒读者们不要忘了，巴鲁克是美国犹太社团中的“一号人物”，他断言“自从美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具有领袖地位和非凡才能的人像巴鲁克今天这样，用如此尖刻的语言来批判一个美国总统”。

巴鲁克有生以来还从未陷入进如此难堪的境遇。杰西·琼斯于 1924 年指责巴鲁克对民主党没有一点儿知恩图报的表示，但他的指责并没有招来新闻界的炒作。他一辈子都恪守着一条原则，就是不允许别人在新闻报道中一字不差地引用自己的原话，这样做的目的恰恰是担心因一时失言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就像一位神父绝不敢当众亵渎上帝一样，巴鲁克也绝不会冒自己的言论被引用的危险当着新闻记者的面去谩骂一位美国总统。

帕格勒的报道面世后，巴鲁克立即指责他断章取义引用自己的话，而帕格勒则予以完全否认。不管怎么样，巴鲁克在评价总统时肯定用了“粗鲁无礼、缺乏教养、愚昧无知”这几个词。这一点毫无疑问，帕格勒在以后的文章中仍继续大肆引用。有时在引用之后还借此“称赞”巴鲁克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帕格勒这种穷追猛打的做法也得到了支持。华莱士在写给帕格勒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评价巴鲁克的：“巴鲁克竟以这种方式诋毁总统，这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也是最不值得的一个错误。他既不应该因对方是总统就表现得低三下四，也不该采用这种神风特工队似的战术来使自己“仍能”对白宫产生一些“影响”。他应该采取另

外某种姿态”。

3 年以后的 1951 年，杜鲁门和巴鲁克曾有一次都到马歇尔将军家去参加一次活动，当时两人也试图达成和解。不过，他们之间的隔阂永远也没能消除。到了 1952 年，巴鲁克在新一轮的总统选举中已经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了。在斯沃普看来，面对责难的巴鲁克不应一味委曲求全，而应奋起反击。1948 年，在杜鲁门刚刚竞选连任时，斯沃普就曾鼓动巴鲁克应该就维护公共利益问题对总统进行批评。他在给巴鲁克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应该选择一个您与 H. S. T（哈里·S. 杜鲁门）意见相分歧的问题，如果杜鲁门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有明显的破绽，我们就公开发表对他的反对意见。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理想的突破口。不过我们首先要确保能得到参议院和新闻界的支持。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现在在华盛顿的许多政府部门中盛行着一股自高自大、不顾公共利益的作风，连我都对此日益反感。而您，长期以来就因致力于维护公共利益而受到民众的爱戴和信任。现在这个时候您，应该展示一下您的这种风范，而不应使它被人遗忘。另一方面，这样做还能有力地向公众证明：您仍然有权力用自己的观点对政府作出评价，仍然有能力独立判断问题。

1950 年 6 月 25 日，大批共产党军队在朝鲜半岛越过了北纬 38 度线，美国又一次卷入了战争。杜鲁门政府决定在朝鲜打一场有限战争，在国内也只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控制措施。机会终于来了，巴鲁克总算可以用斯沃普提出的那套战略向杜鲁门发起进攻了。他指出，杜鲁门对待朝鲜战争的政策是一种胆怯的表示，现在必须在国内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措施。1950 年 7 月，再过一个月就到自己 80 岁生日的巴鲁克向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建议。这次他开出的仍然是他以前在任何紧急形势下都会开出的处方：控制工资、物价和利润，将税收提高两倍。

斯沃普绝对不必担心巴鲁克在国内的声望及这种声望的影响。不出他所料，当人们听了巴鲁克对“处方”所作的说明后，也认为国内物价已经趋于失控，便涌起了一股强烈要求政府在国内加强战时控制的情绪（其实物价确实在暴涨。在 50 年代的最后五年间，美国的批发价指数以每年 22% 的速度上升）。当时，人们对二战时期实行的配给制还记忆犹新，加之政府不断加印钞票，使得商人和消费者们都拼命地抢购，这自然引起了物价的上涨。引起人们抢购的是恐慌，而引起恐慌的是政府所推行的某些政策，这就使得人们开始审视政府的政策。在巴鲁克的力谏下，参议院 1950 年通过了《战时生产法案》，规定政府必须控制物价和工资。但此前，政府却表示它不想要也不需要这种权力。当《战时生产法案》在参议院通过时，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哈里·伯德立即对在场的巴鲁克表示了由衷的称赞，他说：“您使整个国家在 24 小时内认识到采取控制措施的必要性，这真是一个奇迹”。

芝加哥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阿尔伯特·D·拉斯克（这个人的富有程度与巴鲁克不相上下，但在社会影响方面却要比巴鲁克差得多）也对巴鲁克能创造出如此奇迹感到惊讶。他声称，如果谁要让自己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不妨去学学巴鲁克的样子（有一次，巴鲁克因大力倡导努力工作精神又一次使自己在全国的报纸上成为热门话题。帕格勒见了便把巴鲁克和拉斯克在新闻界的受重视程度作了一番对比，他说：“两个人都是大富翁，可报纸上每出现一则阿尔伯特·拉斯克的报道就会出现一版伯纳德巴鲁克的报道。结果这一对比招来了拉斯克的不满）。拉斯克还对当时已退出政界的戴维·利连撒尔说：“看看我们共同的朋友巴鲁克本事有多大！他没有任何实权也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可他一个人却决定了整个国会的意志”。

渐渐地，巴鲁克不需要斯沃普为自己大造舆论就能在公众中树立起极高的声望了。而斯沃普作为巴鲁克的一个宣传工具，也为自己的重要

性越来越小而感到失落。从 1947 年 6 月（就在这个月中巴鲁克的塑像被安放在国防学院）斯沃普为自己写的一串备忘录中我们就能看出，一段时间来两人的关系处于何种状况。这串备忘录的第一篇写于 6 月 3 日：“早在 3 月份我就劝巴鲁克不要让新闻界把国防学院为他立塑像的事宣传得太过火了，我告诉他，他已经被抬得太高了。后来，格鲁恩瑟将军（国防学院副院长阿尔弗莱德·M. 格鲁恩瑟少将）和其他一些人也放出这种话来。巴鲁克对此很生气。虽然喜欢这种宣传的是他自己，他却责备了我一通。这使我心里很不舒服。他甚至也向正在报纸上大肆赞扬他的比利·罗斯也发了火”（这个比利·罗斯曾在前战时工业委员会当过记录员，后来作了节目主持人。他因为靠巴鲁克靠得太近而引起了斯沃普的猜忌。巴鲁克需要保持自己良好的公众形像，而罗斯却被很多人认为“不太老实”。他的形像显然与巴鲁克的形像不协调）。6 月 10 日的备忘录中斯沃普抱怨说：“自己基本上被别人看成是巴鲁克的尾巴……”6 月 18 日（也就是国防学院举行巴鲁克塑像安放仪式后第五天）的备忘录中，斯沃普写道：“在国防学院为自己立一尊像是巴鲁克梦寐以求的事。为促成这件事立了汗马功劳的是我，事先劝他不要把宣传调子定得太高的是我，连他在塑像揭幕仪式上的发言准备讲稿的也是我，可他却一点谢意都没有表示。同以往一样，这份讲稿同样遭到了玛丽·博依尔和小伯纳德·M. 巴鲁克的批评”。

在巴鲁克与斯沃普之间这种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中，钱始终是一个关键因素。他们两人之所以没能建立起一种平等的伙伴式关系，关键在于斯沃普总是在经济上依赖于巴鲁克（他几乎从未还清过欠巴鲁克的债）。由于斯沃普挂帅在舆论界大造声势，巴鲁克才被人们视为一个“活圣人”，而斯沃普却是为数不多的能把巴鲁克看作凡人的几个人之一。当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时，如果斯沃普认为巴鲁克哪句话说错了或哪件事做得不合适，他就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冲着这位“活圣人”大吵大嚷或打断

他的谈话。有一次斯沃普看见巴鲁克穿着旧晨衣，觉得太不雅观，便粗声粗气地对巴鲁克嚷道：“真是个乡巴佬！你难道连一件像样的晨衣都买不起吗？”一件晨衣巴鲁克当然买得起，不过他还是喜欢凑合着穿旧的（他曾把一件扣子都不全的短大衣穿了好几年）。而斯沃普，不但总是不加犹豫地掏钱买任何买得起的东西，很多买不起的东西他也敢买——办法是找巴鲁克借钱。众所周知，债权人和欠债人之间往往会产生矛盾，巴鲁克和斯沃普之间也是如此。即使是在收入不景气的时候斯沃普的购物兴头也丝毫不减，这使巴鲁克很看不惯。而斯沃普则觉得，自己对巴鲁克是如此地尽忠竭力，换一个比巴鲁克大方的人早就把自己所欠的债全免了。1948年春天，眼看自己欠巴鲁克的5000块钱债还期已过，斯沃普给巴鲁克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无限深情地回顾了两个人共同走过的岁月：

我对您无比敬仰，为您效劳和为您所用是我最大的愿望。在与您共事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这种愿望得到了满足。我把您所取得的所有成功看成是自己的光荣，如果您能认为我在您的成功中尽到了一点微薄之力，我会感到更加荣幸。

随着一个人一步步走向衰老，他能从生活中得到的补偿也越来越少，而最能给人以补偿的就是从朋友那里得到信任和关怀。您的信任和关怀是我能从生活中得到的最佳补偿，我为能得到它而感到骄傲。事实证明您的所有朋友也因同样的原因而感到骄傲。他们中没有一个会受到痛苦和不幸的折磨，也没有一个人会被世人轻视——这都是因为您的缘故。所以，一旦我们之间的友情受到损害，生活对我的意义必将大大减小。我们是荣辱与共的朋友，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应得到对方的支持。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在我眼中您是永远正确的。您还记得吗？每次您受到诋毁时总要对我说：“看那个家伙，他竟对我捅刀子！”每到这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捍卫您。

我将永远爱戴您，信赖您。

E. 小康恩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斯沃普是一个靠‘用笔跟人吵架’发家的人。他一般不等事态严重起来就拿起笔开始斗争。他的信条是：‘谁喊得最响谁就能说倒别人’”。可是在 50 年代初，斯沃普却在与自己作斗争——面对自己与巴鲁克的关系问题，他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感情斗争。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巴鲁克与斯沃普是密不可分两个人，他们的关系也是牢不可破的（1953 年在一次由体育记者组织的晚宴上，竟有四个人把斯沃普错当成了巴鲁克）。但实际上，他们在许多年以前就开始在很多方面各走各的路了。斯沃普其实并不想永远生活在巴鲁克的影子之中，可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因此他经常感到郁闷和焦虑。斯沃普一直对总是围着巴鲁克转的罗斯怀恨在心。而每当巴鲁克拒绝到他家参加某种社交活动时，他也会惴惴不安。在斯沃普的秘书海伦·米拉病危住院期间，巴鲁克也没有给这个与斯沃普关系如此密切的人送过花。在斯沃普与妻子玛吉的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巴鲁克曾暗示一定要“好好表示表示”，可到了正日子那天他连一件小礼物都没有送。1954 年的一段时间里斯沃普手头缺钱缺得很厉害，他只好允许用自己的名字为一个挽车赛马^①的赛事命名，以换取几个钱作酬报（作为纽约州赛马协会的主席，他这么做实在是大跌水准）。即使是在经济状况如此窘迫的状况下，斯沃普也没敢去找巴鲁克。然而，就在这年年底，巴鲁克写来的一封信驱散了斯沃普心中的疑云。巴鲁克在信中很动感情地写道：“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感到我们已经在互相疏远。我绝对不希望这种情况存在下去。曾有一些人到我面前来对你说三道四，我很清楚他们的目的是挑拨离间并引起我们的互相猜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叫他们立刻闭嘴。我心里对你没有任何怀疑，所以不会信他们的话。相反，我倒开始怀疑起他们来。他们说你不具备体察舆论反

^① 用马拉单人双轮赛车的跑马赛，与被称为是“国王的运动”的正规赛马相比显得不够高雅——译注

响的能力，也不具备替公众表达意见的能力，因为你从来没展示过这种能力，也没人见你展示过这种能力。他们这是在胡说八道，你绝对具有这些能力”。巴鲁克还告诉斯沃普，他已吩咐博伊尔小姐每年在斯沃普的欠债记录中划掉 3000 美元。他还答应斯沃普，如果自己先于对方离开人世，那么斯沃普所欠的全部债务就一笔勾销（事实上斯沃普走在了巴鲁克的前面）。巴鲁克在信中还写道：“我死前立遗嘱时对你所欠的债务半个字都不会提到。我认为应该把这个决定也告诉你，不然到时你仍然会担心有麻烦”。

即使是在一些完全为交代私人事务而写的信件中，巴鲁克也很容易拐到如何维护公共利益的话题上（在给斯沃普的那封信中，除了畅谈友情和宣布减免债务外，巴鲁克还简单论述了纽约州和纽约市增加政府开支的做法会带来什么害处，说这些话似乎有点儿离题太远）。同在以往任何时期一样，进入 50 年代后人们仍然很难料定巴鲁克会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发表什么样的高见。对于政府推行的健康保险制度，强制征兵制度和工资与价格控制制度，巴鲁克当然十分赞同，他也支持成立一个负责优先安排重点产品生产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与他以前所提倡建立的所谓“高级商业法院”同出一辙，是后者的更新版）。而面对社会主义的扩张和政府压制个人自由的做法，巴鲁克则予以强烈谴责。1946 年，斯沃普提出了“冷战”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当代世界不战不和的国际形势。巴鲁克则认为，只要苏联的威胁依然存在，美国就始终处于准战争状态，处理一切国家事务时都必须考虑到这种状态。他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于 1953 年放松了价格控制法的推行。1955 年 8 月 6 日，再过三天就整整 85 岁^①的巴鲁克未事先通知就来到了位于弗雷广场的联邦

^① 据《先驱论坛报》报道，1955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五，前来祝贺巴鲁克 85 岁生日的要人和各界名人纷纷云集。尽管这些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见彼此相左，但作为巴鲁克的亲朋至友，他们欣然同处一室。其中包括埃利诺·罗斯福和罗吉·马西亚诺；比利·罗斯和克莱尔·路斯；阿德莱·斯蒂文森、J.艾德加·胡佛、杰克·凡普西和理查德·尼克松（他们共同朗诵了一篇贺辞“献给伯纳德·梅涅斯·巴鲁克——当代圣人”）。

出席庆祝会的还有：乔治·C 马歇尔将军、戴维·萨诺夫、林顿·约翰逊（参议院多数党领

法院大楼。此时，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正在举行一场听证会。巴鲁克不请自来的目的就是向正在听证会上接受质询的一位民歌歌唱家公开表示支持。当巴鲁克从后门走进听证会的会场时，宾西法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弗兰西斯·E·沃尔特正在向这位歌唱家提问，让他回答共产党人是如何渗透进美国演艺界的。有人把巴鲁克引到会议记录员身后的一个座位上，巴鲁克坐下来时故意把助听器的接受器指向了审讯人和证人，表示他很想听听这两个人在说些什么。会间休息时，巴鲁克很不客气地发表了一番评论以讽刺那些证人（这些人作证前要按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所规定的誓词发誓），他说：“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畏惧，他就敢于回答任何问题。因为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里，唯一能令人感到畏惧的就是犯罪”。说完这席话，他特意走过去与会议主席沃尔特握了一下手，并夸他道：“你干得可真不赖！”

1954 至 1955 年间，美国股市再度狂升。许多美国人对这种暴涨势头的警觉程度不亚于对他们的国家敌人。巴鲁克又一次凭着他对金融问题高超的判断能力被请到了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这件事发生在他到联邦法院听证会上教训沃尔特之前 100 多天的 1955 年 3 月，当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 415 点，比上一年度同期增加了 38%。在 50 年代中期出现如此大的增幅使人们不禁想起 20 年代末期出现过的那次增涨，恐慌气氛立刻蔓延开来。巴鲁克在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会议

袖）、约瑟夫·W·马丁（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艾德加·富尔（法国总理）、托马斯·E·德威、詹姆斯·F·贝尔纳斯、奥马·N·布莱德里（陆军将军）、小赫伯特·布朗内尔（美国首席检察官）、纽约市市长罗伯特·F·瓦格纳；W·埃弗罗·哈里曼州长、C·E·威尔逊（国防部长）、路易斯·圣·劳伦特（加拿大总理）、罗伯特·莫西、考底斯·勒梅将军、比弗巴鲁克爵士以及当然出席的斯沃普。后者在贺辞里有这样一句：“您就是我们的论坛；你就是生活的力量”。

罗斯也现场朗诵了一首颇有百老汇风格的打油诗：

当你的财富和幸运
均已不再像昔日般辉煌
你的真实朋友们却永远陪伴在你身旁
啊，亲爱的巴鲁克先生
你就是永远活着的胜利之王
——原注。

室中一落座就开口说，他在这里作陈述的频率要远远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国会下属委员会。陪同巴鲁克就座的塞缪尔·鲁贝尔随即开口说，他深信巴鲁克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可巴鲁克赶紧予以否认。他说，任何人都无法对股票市场的变化作出准确的预测，他巴鲁克也不敢去作这种预测。接着，他先列举了“牛市”的一些特点（其中一点就是在“牛市”期间金融部门在股市中所起的作用大大增强），然后又转而谈论国家的经济政策问题，接着又强烈呼吁建设一支强大的陆军和一支强大的海军，还提出保障税收充足以平衡预算的主张。巴鲁克还为沃尔特·温泽尔通过广播向外界透露股票消息的做法进行辩护，说他在法律上有权利这么做。巴鲁克还恳请议员们不要试图去制定一些旨在“限制人的冲劲和冒险精神的法律，因为这些精神在使美国富强的过程中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随后的听证会上，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参议员 J. 威廉·富布赖特想请巴鲁克对经济学家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斯的观点作一番肯定。这位经济学家早些时候也曾来到委员会就同样的问题作过陈述。可巴鲁克却不想说加尔布雷斯半句好话。他解释说，因为自己没有拜读过这位先生的著作，而且对经济学家也不太感兴趣，所以不想多说什么。巴鲁克说：“我觉得经济学家——我这里不是专门指加尔布雷斯先生——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总是想当然的认为自己知道的很多。如果他们真知道那么多，世界上的钱早就全跑到他们的口袋里去了，而我们这些人也早就成了穷光蛋了”。

可富布赖特还是坚持要巴鲁克谈谈对加尔布雷斯的想法，并且问巴鲁克是否认为委员会请加尔布雷斯来作陈述是个错误。

巴鲁克没有作正面回答，而是讲了一个小故事：

“一次一个酒店老板问身边一个人：‘麦克喝酒行吗？’

那人反问：‘他刚才是不是喝过酒了？’

酒店老板回答说：‘喝了’。

于是那人对酒店老板说：‘那他喝酒肯定行’”（在巴鲁克看来，加尔布雷斯就相当于那个“麦克”）。

巴鲁克最后说：

“我不想开玩笑，我只是想说，无论对于股市飙升还是对于加尔布雷斯作陈述这件事，我们都应该像对待其他所有已经发生过的事一样，正视并接受它就是了。我看再讨论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其实这种讨论根本就没什么必要”（1961年，加尔布雷斯被任命为美国驻印度大使。巴鲁克给他写了一封信，想吐露一下自己对肯尼迪政府一些政策的担忧，他根据某种“第六感觉”作出判断，这些政策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不过，巴鲁克并没有把这封信寄给加尔布雷斯）。

历史进入 50 年代和 60 年代后，最令巴鲁克担忧的事情仍然是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发的物价上涨。在与自己的股票经纪人通电话时他总是没完没了地谈及这一问题。有一段时期市场上鲜肉的价格居高不下，巴鲁克认为这种现象令人无法接受，便宣布拒绝购买和食用各种肉类，以对肉价如此之高表示抗议。他认为自己已经清楚地看到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而美国的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尤其是高等院校）面对这种危险却麻木不仁，他为此深感痛心。1949 年，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致信巴鲁克，请求他为建立一项基金提供援助。巴鲁克在回信中谈到了一个与医学教学并不相关的问题，他说现在的大学只热衷于兜售凯恩斯主义和其他一些时髦的经济学理论，而把一些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打入冷宫，这使他深为不满。在巴鲁克看来，通货膨胀是多种不良的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性的贪婪，对暴利的追逐，不同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货币价值下降以及一些人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忽视。巴鲁克认为，通货膨胀的发

生表明上述不良因素正在起作用，所以价格上涨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标志着社会各方面的水准都在下降。他慨叹整个世界都在越变越坏，而通货膨胀就是侵害社会肌体的“腐蚀剂”。巴鲁克生前反复预言说通货膨胀即将发生，在他撒手离世后，这些预言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应验。比如在 1980 年 1 月，阿拉斯加州朱诺市以每盎司 20.67 美元的成本开采出的黄金，其市价已经达到 875 美元一盎司。1959 年，萨拉托加赛马大赛开始用巴鲁克提供的基金为大赛的优胜者颁发奖金，并把该奖项命名为“伯纳德·巴鲁克奖金”。当时的奖金额为 2.5 万美元。到 1980 年，这一金额被追加到 5 万美元。这也是一种通货膨胀吧！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项奖金，这是巴鲁克在几年之内从赛马运动（“国王的运动”）界得到的第二项荣誉。3 年前的 1956 年 8 月，就在巴鲁克 86 岁生日的前夕，萨拉托加赛马大赛以巴鲁克的一匹爱马的名字命名该赛事当年度的第 5 场比赛。这匹马叫“快乐的阿尔杰”，是一匹不到五岁的爱尔兰小公驹。它以前在爱尔兰的赛马场上从未有过上乘表现，经常不听骑手的指挥而跑出赛道或横穿场地，因此遭到禁赛并被转卖到了美国。巴鲁克一眼就看中了它并将其买下。经过调教，这匹小公驹成了全美国最快的赛马之一，并于 20 年代后期连续在萨拉托加、牙买加和贝尔蒙特的赛马大赛夺标（在这匹马退役后，巴鲁克交给了玛丽·博伊尔小姐一项新任务，就是留心一下各赛马会上的赛马名单，看哪些马与“快乐的阿尔杰”是同一品种，巴鲁克就把赌注压在那些马身上）。就在 1956 年 8 月萨拉托加赛马大赛举行当年度第五场比赛那天，一位记者问作为嘉宾到场的巴鲁克“今天准备怎么个赌法”。巴鲁克回答说，他一辈子参加赌马总是很走运，但今年（1956 年）的运气恐怕不会很旺，所以他已经把赌注撤回了一大截。巴鲁克告诉那位记者：“我过去之所以赢得多，就是因为每次都能在看准了之后才多下注。至于今天嘛，我不准备下得太多”。

在年过八旬之后，巴鲁克有时已感到手头的钱并不很宽裕。他在去世时所留下的财产共值 14,076,076.30 美元，^①但与在一战时期相比巴鲁克反而变穷了，因为在 10、20 年代物价要低得多，而且那时需要交的个人所得税也微乎其微。另外，在德克萨斯湾硫化公司项目中他还放弃了唾手可得的一大笔钱（据罗伯特·夸克估计，他本来至少能从这家公司赚到 2000 万美元）。而且，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能遇到这么好的可以大把大把赚钱的机会。有一次他告诉当过自己私人护士的布兰奇·希金斯小姐（她后来成为艾斯夫人）说，他现在已经无法仅靠收入过活，已经开始吃老本了。他说：“你知道，我正在坐吃山空，这真是再糟糕不过了”。有时，他也为没能赚到本来完全可以到手的钱而感到可惜，不住地对别人说：“真遗憾，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富翁”。

1946 年，还是在巴鲁克参加原子能问题国际谈判时，他卖掉了自己在纽约第 1055 大街的豪宅，搬到了被他自己称为是一套“小公寓”的地方。这套“小公寓”位于第 66 大街东段 4 号，从那里可以俯视中央公园。巴鲁克说它小是相对于他原来的房子而言。他在第 1055 大街的老宅共有六层，内设电梯，有 10 间浴室和 32 间卧室，还有一间椭圆形餐厅，一间舞厅，一间两边各摆着一排赤松的吸烟室和一间日光浴室。但他在第 66 大街的新居只有 12 间卧室。有一位在 1951 年来这里拜访过巴鲁克的先生曾这样描述室内的陈设：地板上摆着两个由英国奇彭代尔家具厂制造的中国式贮藏柜；墙上挂着两幅钱德尔画的油画（一幅画的是丘吉尔，另一幅画的是巴鲁克本人），还挂着一幅由南方联邦女儿会赠送的条幅（上面写着赞美巴鲁克的话）；桌上摆着一个插满黄菊的花瓶。房间里还陈列着巴鲁克于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拍的照片和一张斯佩尔曼大主教的照片（照片上的斯佩尔曼身着红色大主教服）。在公寓的卧室里有一张床头柜，柜上摆着成排的药瓶。

^①曾作过巴鲁克私人秘书的玛丽·博伊尔靠着从巴鲁克那里得来的收入总能大把大把地花钱，她还常年雇佣着一个男管家和一个厨师。看这架势她似乎比自己阔绰的老板更有钱（连巴鲁克本人也经常开玩笑地说，他认为自己的秘书确实比自己富有），玛丽·博伊尔在 1973 年去世时留下的财产为 1,115,200.81 美元——原注。

随着年龄逐渐衰老，巴鲁克去观看赛马的次数也少多了（他记性有些不太好了，1948 年他在贝尔蒙特一家赛马俱乐部的草场上弄丢了一卷 100 美元的钞票，一共有 32 张。一位已退休的消防队员拾到了这笔钱并把它还给了巴鲁克）。不过，即使是在 80 乃至 90 高龄的时候，他仍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在一次股票交易会上就买入或卖出多达 10,000 股的股票。他每天要与自己最得力的股票经纪人通三、四次电话。他有时在博伊尔小姐的办公室里的自动收录器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还自己给机器装纸带。他对报纸所登出的股票信息也十分留意，其留意程度不亚于以往任何时期。1955 年，斯沃普曾把巴鲁克称为他所认识的人中“最会读报的一个”，因为巴鲁克能够仅仅依据报纸就能准确地把握股市行情。^①有一次，他的一个纪人不假思索地告诉他某种股票的收盘价为 30.1/4 美元，巴鲁克一下子就发现了对方的错误，于是大声纠正道：“小伙子，不是 1/4 美元，是 1/8 美元”。

一个曾与巴鲁克共过事的人回忆说，每当有人来找巴鲁克要钱时，“他就开始皱眉头”。他的厨娘安妮·马隆就既见识过他性格中大方的一面又见识过他吝啬的一面。安妮是个非常心善的女人，在他们搬家到第 66 大街东段 4 号之后，安妮经常把家里吃剩下的饭菜送给那个看电梯的人吃。巴鲁克本来对安妮是十分关照的，曾有一两次还帮她避免了在股市中受损失。后来他发现厨房里的剩饭剩菜总是莫名其妙地不见了，就问安妮是怎么一回事。当他得知了安妮对电梯工的乐善好施后便问她怎么看待自己所做的事，安妮解释说那些剩饭剩菜即使不送人也只能扔掉。巴鲁克告诉她：“那就把它扔掉好了！”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安妮按照巴鲁克的吩咐去做了。可没过多久她又开始自行其是。有一天巴鲁克问

^① 巴鲁克也十分关注外国股市的情况。1957 年 5 月的一天他发现伦敦股票交易所金属交易中的一个情况非常可疑。他找来了一位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这位调查员后来在写给上司的汇报材料中这样写道：“巴鲁克先生发现，在伦敦交易所中铜的价格一直在以惊人的幅度回旋，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出现这么大的波动很可能会使世界经济受到令人担忧的影响。他怀疑这是有人在蓄意操纵，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爪牙或共产党的附庸在背后捣鬼”。巴鲁克向这位调查员解释说，他所讲的仅仅是一种猜测，大概这种事也不在联邦调查局的管辖范围之内，但他又说或许这一现象确实值得派什么人去调查调查——原注。

那个电梯工安妮是不是很关照他，那个傻小子回答说：“那当然了，连我每天的晚饭都是她送的”。巴鲁克一气之下辞掉了安妮。

辞掉安妮所引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巴鲁克放在她名下的那笔信托基金。于是，巴鲁克找来了自己的律师。经过商量两人决定，如果安妮确实需要那笔钱就给她好了。接下来他们准备把安妮找来问问情况。结果安妮穿着体面地来见他们了。巴鲁克和律师告诉安妮，如果她想得到那笔信托基金的话就必须公布自己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安妮愤然予以拒绝，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他们的办公室。

过了些日子，安妮邀请了几个朋友到自己的新家做客。这几个人找到了第 72 大街西段靠近中央公园的一座漂亮的公寓楼。他们告诉门房说是来找马隆夫人的。门房应答道：“你们找安妮呀，她可是个好人”。

有时候，钱也会把巴鲁克弄得无奈，沮丧甚至痛苦。在妻子安妮去世后他曾把安妮留下的首饰拿去估价，其中一枚当年她在伦敦用相当于 1.6 万美元的价格买来的蓝宝石戒指仅被估价为 4000 美元。巴鲁克说这不可能，绝对是珠宝商弄错了。但当这枚戒指被拿去再次鉴定时，得到的结果仍然是仅值 4000 美元。这次那位珠宝商还附带上一句话，他说这枚戒指上的那块貌似蓝宝石的东西是他见过的最好的一块人造宝石。安妮当年买那枚戒指时上了大当！

这件事之后某一天，巴鲁克同他的女秘书坐在自己寓所的办公室里聊天。他见到旁边一张桌子上摆着自己的一枚戒指，便拿过来赏玩一番。有好一会儿，那位女秘书觉得看巴鲁克的样子他是想把这枚戒指送给自己。

巴鲁克最后终于开口了，他说：“你知道吗？既使我太太的戒指上镶着一枚人造宝石，别人也会认为那是真的。可对于你，即使你戴的是一枚真宝石，人家也会认为它是假的”。他最终并没有将这枚戒指慷慨

相赠。

对于巴鲁克来说，即使是在他真地拿出慷慨给予别人恩惠时，他所要表现的并不是钱本身的意义，而是他对朋友的一种特别的、发自内心的友爱。圣弗兰西斯科的一位报社编辑和他的夫人于 1953 年 3 月曾受宠若惊地收到巴鲁克的一封来信。巴鲁克在信中是这样写的：“你们可能想不到我会在这个时候给你们写信。其实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我只是偶然想起了与你们共同度过的一段快乐时光；想起了你们曾是我非常亲爱的朋友。我只是想写信告诉你们二位：我非常地爱你们”。

1950 年 11 月 1 日，巴鲁克曾受到别人的一次敲诈。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被派到巴鲁克家调查此案。巴鲁克托他回去复命时给胡佛局长捎个口信，他说：“告诉胡佛先生，我这个老头儿什么都不怕”。

巴鲁克年青时在这方面都对自己的父亲西蒙·巴鲁克崇拜之至。现在，进入晚年的他决定也以他父亲的方式迎接死亡。西蒙生前曾让儿子们答应，在自己死时不要请拉比^①到自己的病床前来作祷告，因为他认为“到死时才忏悔是愚弄上帝，那太迟了。1921 年，81 岁的西蒙·巴鲁克临终之际，他的儿子们遵照他的嘱咐没有请拉比。而巴鲁克夫人却不认为“死时才忏悔太晚了”。当时他也病倒在床上而且伤心欲绝，面对着墙独自悄声啜泣。

晚年的巴鲁克尝到了一个九旬老人所能尝到的从关节炎到孤独的各种生理心理的折磨。他经常失眠，双脚不停地作痛，还患有前列腺炎。因耳聋，他经常在跟人谈话时弄出笑话，使自己很尴尬。他还经常跟年纪也已经不小的儿子吵嘴。1957 年，巴鲁克自传的第一卷《我自己的故事》（My Own Story——这本书一出来就成了畅销书）出版时，他的

^① 拉比，犹太教负责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译注

体重突然大幅度下降，使他担心自己快不行了。^①1958年，因为医生们的制止，他没去芝加哥领取美国军团颁发给他的战时优异服务勋章。同年春天，在不到10周的时间内，斯沃普和坎特相继离开了人世。

种种令人忧愁沮丧的事不断向巴鲁克袭来，他只能到伊丽莎白·纳瓦罗那里寻找慰藉。伊丽莎白是他的最后一个私人护士某种程度上也是他晚年的生活伴侣。白天，巴鲁克做事时，她总是伴随左右。晚上巴鲁克不能成寐时也是她守在身边给予抚慰。每次巴鲁克宴请朋友时，也是由伊丽莎白来充当女主人的角色。因为作为男主人的巴鲁克已基本上丧失了听觉，助听器又不大好用。当好他的女主人可不是一件省力的事。如果来访的是一对夫妇，伊丽莎白必须在不失礼貌的前提下尽量让女客人免开尊口，好让巴鲁克能跟男客人交谈下去。尽管巴鲁克作为一个大人物在处理大问题时很有大将风度，但他在对待一些生活琐事时经常是骄横跋扈。他规定午饭和晚饭必须在12:30和19:30准时开始，一分钟都不能差。他用餐时经常狼吞虎咽，几分钟就草草了事。有一次吃晚饭时，有位女客因吃不下自己盘里的洋姜而磨磨蹭蹭。巴鲁克竟不奈烦地对伊丽莎白喊道：“伊丽莎白，教教这位女士怎么吃洋姜，她吃完了我们好收拾桌子”。

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巴鲁克都是靠伊丽莎白陪他玩搭牌来消磨时光。他们定的赌注是每点1/10美分，每次都是伊丽莎白赢。1965年，巴鲁克去世时留下了一张欠条，说他欠伊丽莎白40万美元的赌债——

^① 其实，当时险些要了他的命的不是体重下降而是一起谋杀。不过他至死也不知道有关这起谋杀的任何细节。50年代末的某一年（警方已记不清具体年份），南卡罗来纳州的执法机构发现有人在密谋杀巴鲁克。调查机关认为正在策划这起刺杀事件的是三K党。他们立刻向贝尔·迪摩曼州长报告，迪摩曼又随即将这件事通报给前任州长詹姆斯·F·伯恩斯。伯恩斯说，如果巴鲁克本人得知此事，他绝对经不起这个刺激。但警方却找不到充足的证据逮捕任何人，他们只是给嫌疑最大的一个农民打了电话想吓唬住他。警察警告这个人，他们已经掌握了有关他的一些情况并且已经盯上他了。这个家伙在接电话时后裤兜里还别着一支手枪，但他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不过谁都听得出来他的辩解是苍白无力的。他告诉警察他本人还不准备去杀巴鲁克，但又说：“如果有别的什么人宰了这个老不死的犹太猪，那当然再妙不过了”。多年以后，一位参与过调查此案的警官回忆说：“我们没有搞错，当时绝对有人在密谋杀巴鲁克”。

其实他是以这种形式来报答伊丽莎白。不过，如果巴鲁克发现伊丽莎白真刀真枪地去跟人赌博，即使赌注很小，他也会横加干涉。伊丽莎白后来回忆说：“如果巴鲁克见我跟人打搭牌赌钱，哪怕每点只有 25 美分，他也会大声唠叨着不让我赌”。

尽管巴鲁克对死亡总是报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还是认为多活一分钟也是好的。所以在已是耄耋之年时，他仍像以前一样注意保养健康。纳瓦罗女士每天都要对他的身体进行例行检查。他还进行一些适当的体育锻炼，如举哑铃、游泳等。不过，他毕竟已是 90 多岁的人了，每次去游泳时再也不能跳水入池了。他打鹤鹑的爱好直到去世前几年才不得不停止，因为他对这项运动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他说：“我再也盯不住那些鸟了，我也跟不上同伴们了”。当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在南非获得成功时，他聘请了一位医生到那里去了解这种医术，以备将来自己用得着。有一年他去欧洲度假时，还专门在瑞士惠顾了保罗·内汉斯医生的诊所。这家诊所以擅长“细胞疗法”著称。内汉斯曾提出过许多大胆的手术方案，如将一只怀孕母羊的肝脏经修剪后去替换人的肝脏，或把经过培植的奶牛的心脏移植给人，等等。他还用很大的注射器把从动物组织中提取出的成分注射给人，认为这样可以增强人的肌体。说不清是什么原因起了作用（巴鲁克自己并不确信内汉斯的疗法能使自己受益），巴鲁克的心脏一直跳动到 1965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 时 25 分，再过 59 天他就 95 岁了。

巴鲁克的神智自始至终都很清楚，脑子也一直够用。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能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决断，并能把自己的思想准确地传达给别人。他支持肯尼迪政府力图控制物价的做法。对于美国到越南去进行战争冒险他也呐喊助威，这是他平生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目睹自己的国家卷入战争。1961 年，传来了加拿大准备向中国出售小麦的消息，巴鲁克听说后立即写信与国务卿迪安·拉斯科联系。巴鲁克写

道，加拿大不应该这么做。这些麦子将会救了中国人的命，使他们“不至于饿死并一天天强壮起来，直到有一天来消灭我们。我相信您正在采取措施以阻止这种结果的出现”。尽管巴鲁克已有 91 岁高龄，仍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地就把他应付了。结果，拉斯科只好认真地给巴鲁克回了信，并附上一份关于小麦事件的长达 14 页的备忘录。

巴鲁克传记的第二卷《政坛岁月》(The Public Years)是由哈罗德·爱波斯坦与塞缪尔·鲁贝尔合作完成的。据爱波斯坦讲，有一天早上巴鲁克一边吃早饭一边审阅爱波斯坦替他写的一篇发言稿。他不知不觉地入了迷，连早饭都忘了吃。读至酣处，巴鲁克不由得拍案叫绝，高声喊道：“太妙了，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发言稿！”这篇发言稿的最后几句话引自史蒂文森的《引言集锦》(Home Book of Quotation)，巴鲁克非常欣赏，他有好几次还津津乐道地在爱波斯坦面前提起这几句话。这种情况实在难得。在斯沃普死后巴鲁克总是苦于找不到得力的笔杆子。有一次他看了别人替他写的一份发言稿后很不满意，认为这篇稿子应该写得更有力度。于是他嚷道：“真该死！要是斯沃普还活着，他一定能写得很带劲儿，让所有人听了都像被针扎了一样受震动”。

晚年的巴鲁克在军方人士那里仍然很有市场。他还不厌其烦地重谈诸如实行战时优先政策和价格控制政策这些老调，好像这些观点对他来说依然很新鲜。

进入风烛残年之后，巴鲁克逐渐染上了一种强烈的愤世嫉俗情绪。在大约 90 岁时，有一天他接到了克莱尔·路斯打来的电话。据当时恰巧在巴鲁克身边的爱波斯坦讲，从他所听到的内容来推测，显然克莱尔是在向巴鲁克诉说自己婚姻生活的不幸，而巴鲁克则在极力劝慰这个他终其一生深爱着的女人。巴鲁克劝克莱尔在与丈夫相处时不要总是急躁行事，还对她说：“你以前不是把自己的家说成‘温暖的爱巢’吗？干吗不试试重新找回那种感觉呢？”聊了好长时间，克莱尔才觉得说够了。

巴鲁克放下电话，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从嘴里蹦出一句：“去他妈的，管她是死是活呢！”

1965年6月20日，巴鲁克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3天之后，他的追悼会在第79大街东段2弄的西区犹太教堂举行。这座教堂是巴鲁克生前做礼拜的地方，不过他参加这种宗教活动时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巴鲁克曾要求自己的丧事从简，希望能以一个犹太人的方式被送离人世。对于这种安排，爱波斯坦评论说：“巴鲁克希望在他死时能有人来安慰他，但不想让他们用替自己忏悔的方式去‘愚弄上帝’”。按照巴鲁克生前留下的嘱托，他的遗体被火化了。在追悼仪式开始前20分钟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意外：教堂的空调设备突然出现了故障，教堂里顿时变得酷热难当。也许这更合巴鲁克的心意——他生前所遭受过的寒冷实在太多了。

教堂内外聚集了来自各界的约700多名追悼者，数目真不少。其中包括巴鲁克两个依然健在的子女：小伯纳德·M. 巴鲁克和勒内·塞姆斯塔格夫人（他的另一个女儿贝拉已于1964年64岁时先于自己的父亲去世）。女宾中有他的红颜知己兼秘书博伊尔小姐和他晚年的私人护士和生活伴侣内瓦罗小姐。其他宾客中有他参加原子弹问题谈判时共过事的斐迪南·艾伯斯塔特，以及梅耶·瓦格纳、比利·罗斯，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亨利·路斯和克莱尔·路斯夫妇，纽约市立大学校长布维尔·盖勒格尔博士和英国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爵士。前来向他作最后告别的还有一个家住第79大街东段、已届82岁高龄的老人。老人名叫厄内斯特·史赖瑟。25年前，正是在巴鲁克的帮助下他才得以从澳大利亚移居到美国。在巴鲁克弥留之际一直守在他床前的伯恩斯州长当然也在场。民主党人阿德莱·史蒂文森也来了，尽管巴鲁克在1952年曾反对过他。另一位不久前刚与巴鲁克发生过一点小矛盾的斯佩尔曼大主教也来了。在巴鲁克去世前几个月，斯佩尔曼和他曾闹出过一件让两个人都觉

得很没面子的事。那天斯佩尔曼顺路到巴鲁克家去拜访老朋友，偏偏赶上巴鲁克在打盹儿。斯佩尔曼误以为这位老伙计已经不行了，赶紧替他祷告。结果巴鲁克从睡梦中惊醒，立刻火冒三丈，叫老朋友斯佩尔曼马上从他家里滚出去。不过，巴鲁克毕竟不是一个轻易和朋友翻脸的人，没过几天，两个人又和好如初了。

1965年6月23日，巴鲁克黯然入土，一切恩怨随风飘散。